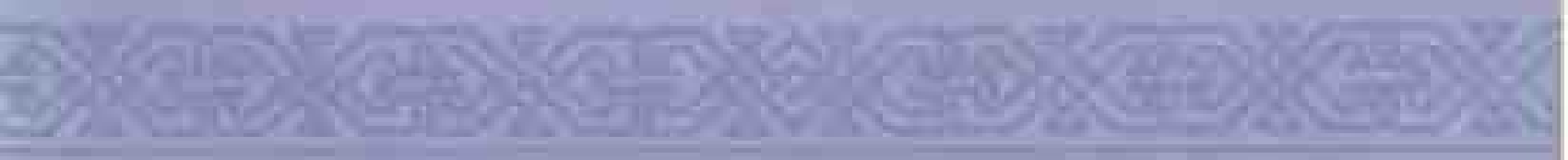


05 201

呼和浩特文史資料



第九輯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

第九辑

(少数民族与宗教专辑)

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一月

目 录

- 土默特辅国公家世简述……………满都勒提供 克什格整理 (1)
- 土默特辅国公漫述……………咏岭 (14)
- 呼和浩特蒙医的发展……………刘春甫 (22)
- 呼和浩特蒙药的发展……………刘春 (33)
- 近代土默特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彭勇 (46)
- 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于永发 (56)
- 抗战前夕土默特旗职官的产生与安排……………刘映元 (69)
- 土默特六十佐领沿革……………于公 (80)
- 土默特两翼都统的兴废及其它……………咏岭 (99)
- 土默特步骑两营及其演变……………于永发 (113)
- 归化城的旗庄头与庄头地……………彭勇 (123)
- 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杜焯 志莫勒 (128)
- 从蒙古学院到厚和兴蒙农业中学……………杜焯 白燎原 (132)
- 先祖父福坛与刀什尔战役……………赵相璧 (137)
- “老一团”始末……………张尔杰 (143)
- 玉禄事迹补正……………杜晓荣 志莫勒 (170)
- 曾祖父白维利创办中和店以及白氏
父子在民族和宗教事业上的奉献……………白慧中 (175)
- 绥远满族岁时节俗……………富景华 (186)
- 忆我的父亲冯振玺……………冯必嘉 (200)
- 绥远五族学院……………杜晓荣 白燎原 (206)
- 土默特地区喇嘛庙的制度及经会仪式……………伯谋 (211)

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	伯谋	(215)
归化城的小召和大召.....	韩云琴	(217)
博格达喇嘛和广化寺.....	澜赓	(219)
解放前公教教育的回顾.....	李西樵	(225)
天主教在我区所办的慈善事业.....	音阳	(233)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及其伊斯兰文化.....	甄可君	(242)
呼和浩特市伊斯兰教协会时福森会长.....	代林	(257)
归化城城隍庙史.....	孙明亮	(264)
后 记		(274)

土默特辅国公家世简述

——我的家庭情况

满都勒提供 克什格整理

前 言

有很多研究土默特历史的学者，对土默特部第一代首领阿拉坦汗，有着广泛的研究，对其后裔“辅国公”喇嘛札布也有所论述，但对喇嘛札布以后的辅国公概况，则很少探讨。虽然有的人也写过一些介绍的文章，但有的与事实不符，如《土默特沿革》中说：“按此（辅国公）名号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后以绝嗣而告终。”①；又如有人写座落在呼市的土默特镇国公府房院之事，也与事实有出入②；还有民间相当普遍的传说，说美岱召是辽代萧太后的府邸，并因而断言土默特公是萧太后的后代，等等。因此，我想就我知道的情况，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叙述如下，兼正视听。

我是阿拉坦汗直系子孙，喇嘛札布第八代孙。阿拉坦汗（1507—1582）是成吉思汗十七世孙，是巴图孟克达延可汗嫡孙，是巴尔斯博罗特济农之子。阿拉坦汗死后，长子森格都楞汗（黄台吉）继承了第二代顺义王。第三代顺义王由黄台吉的长子扯力克继承。由于扯力克的长子晁兔已经去世，故由扯力克的嫡孙博硕克图汗（卜失兔）继承了第四代顺义王。后来，管理归化城土默特部的俄木布，就是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于1632年归降后金满洲，不久，被诬以谋叛而削职为民。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上亲征噶尔丹，途经归化城时，俄木布孀妇携子进见皇帝，为俄

木布鸣冤。皇上说，待返回来时给以处理，当即授其子为台吉。俄木布同族后人喇嘛札布台吉^③，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因擒获青滚札布有功，封为土默特辅国公，并以其大青山后之原牧地及属民，编为四个苏木，为另一旗。授札萨克，隶乌兰察布盟。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怠惰罪，削札萨克，成为闲散公爵。乾隆三十一年（1766）卒。喇嘛札布之子索那木旺札勒，于乾隆三十一年袭辅国公位，并诏赏“世袭罔替”。此后，一直交替承袭。最后一位辅国公，是我爷爷色楞鲁勒精札布，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袭位。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给所有翊赞共和的蒙古王公晋升一级爵位，土默特辅国公也升为镇国公了。直到1947年，色楞鲁勒精札布去世，最后一位辅国公到此结束。见表一：土默特辅国公家族世系表。

一、土默特辅国公爵位承袭之争

到第五代土默特辅国公贡格巴勒时，娶有一妻二妾。长妾为土默特右翼朱尔沟村人，先生一子名叫色楞鲁勒精札布，家中人唤作“色一分”。两三个月之后，妻生一子名叫色楞多尔计。光绪二十七年（1901）贡格巴勒去世。（次妾回归乌拉特西公旗娘家。）是时，在由哪个儿子承袭爵位问题上，妻与长妾发生了争执。妻的理由是，嫡妻之子应袭；长妾的理由是，其子虽庶出，但系长子。将此争执上报到理藩院。皇上依据长子继承的惯例，断为长子承袭。于是，色楞鲁勒精札布，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承袭了辅国公爵位。民国元年（1912）晋爵为镇国公。参见68页谱一。

色楞鲁勒精札布，系北京蒙藏学校毕业，性格温良，待人处世宽厚随和，威望很高。日本侵占时期德王曾多次登门拜访，请他出来参加工作，一起共事。曾有半年多时间，每月把薪金送到其家。但色楞鲁勒精札布不愿给日本人办事。起初是婉言谢绝，

以后便躲到美岱召，有时还躲到后山“土默公”封地（现武川县大公村）。德王见屡次找不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相求之意便也随之淡化了。色楞鲁勒精札布先娶一妻，是土右旗萨拉齐奇明胡卢图村人，蒙族。生一子名叫达赖。达赖四五岁时，父亲抱着他在井边玩。把手中的银元，扔进井里溅起了水花，他高兴地笑了；父亲又给他银元，达赖又往井里扔。色楞鲁勒精札布的妻子看到此情景，批评丈夫不该这样娇惯孩子；并吓唬孩子，不让他往井里扔银元。由于孩子哭了，夫妻俩便因此发生了争吵。妻子十分生气，当夜吞服大烟而死。色楞鲁勒精札布后又娶一妻，是满族。她家住呼市新城鼓楼旁，才学高深，能双手写字。以后，协助达赖主持家务有方，家道得以维持。后来，色楞鲁勒精札布在美岱召住时，腰间生一烈性恶疮，多方医治无效。其间雇请村中一汉族姑娘服侍，名叫陈银焕。她每日为色楞鲁勒精札布，用口吸吮疮口。久而久之疮渐痊愈。为报答其诚心服侍之恩，遂收陈银焕为妾。

达赖1915年生，后娶妻李连女。李连女是土左旗祝拉沁村人，蒙族。三岁时，其父李有思因疫病去世；七岁时，随母李玉环改嫁到西梁村李根车兄李车车家。十七岁，嫁与达赖。生女温都玛，生子满都勒（萧秀龙）。李连女于1989年12月16日去世，终年70岁。温都玛生有二女、三子，长女张香香，在武川县水电局工作；长子张桂香，在武川县林业局工作。满都勒毕业于武川县中学，妻子叫宁仙丹。生子额尔敦，生女苏布德。在本家族中，还有台吉后裔萧相汉，现住武川县西红山乡西营盘村。他的女儿在武川县供电局工作。还有本家勋旧佐领（世袭章盖）赛补音的儿子图布信巴雅尔，现在达茂旗白云敖包乡牧民，也生有子女。

二、辅国公府邸

土默特辅国公，后晋爵为镇国公。公爷府有三处：一处就是

现在土右旗的美岱召；一处是在呼市旧城小东街大观剧园的后院；一处是在武川县西红山乡土默公。

美岱召是土默公的祖居。庙院内东北角的楼房院，就是公爷府。色楞鲁勒精札布经常在这里住，并在此娶妾陈银焕。后来，他们也都回到武川土默公的公爷府了。美岱召就没人住了。一直由美岱召的喇嘛，给代为照料。听说，美岱召要按旧样子修建公爷府，供旅游参观。我曾给提供了一些资料。

另一处，是在呼市旧城小东街新24号院。原大观园戏园子的后面，解放后市晋剧团曾在那里住过。是一处砖瓦结构的里外院，外院的黑油漆大门上写着“土默特镇国公府”字样。建筑布局是座北朝南；正房一堂两屋三间（此房现尚存在），每间之间有木隔扇；房顶上东、北、西三面，都是砖砌的花栏墙；东、西厢房，各有一丈五尺的一间和一丈的一间；西南角有个厕所，东南角有个井房；里外院之间有个二门，院子中间有个大花池。此院约在1942—1943年间，典给一个叫齐兆魁的人。此人当时是火车站站长。房院典期为两年。当典期快到时，达赖筹足钱要赎房院时，齐兆魁却躲藏起来，以致找不到他。有人说，他回老家去了。因典期已到，达赖就找总管衙门（原土默特旗政府），说明情况，要求赎回房院。齐兆魁回呼市后，达赖与齐兆魁到总管衙门打官司。断决结果：房院归还达赖赎回。齐兆魁先腾出了外院，说是里院还放着些东西，过几日搬走。达赖信以为真，就先搬进外院住着。是时，达赖突然病死。齐兆魁便把郭长清（旧社会骑兵旅长）留进里院住下。郭长清看到没有男人，便叫了个照像的在院里照了些像片。郭长清仗势欺人，硬说像片就是证据，证明房子是他的。李连女无能为力，不仅未要回房院，还被赶出门外。在1945年深秋，她带着九岁的女儿温都玛，三岁的儿子满都勤，含冤凄惨地回到了武川县土默公。

还有一处是，现在武川县西红山乡大公村。这里是土默特辅

国公的公爷府，当地人叫它土默公（指地名）。它原先是阿拉坦汗后人的牧场。封为辅国公并授札萨克，另设一旗。隶乌兰察布盟时，所辖四个苏木，就是现在武川县整个西部地区。后虽削去札萨克为闲散公，其分封的四个苏木食邑不变。

土默公既是指公爷本人；也指其封地四个苏木地区；还指公爷府所在的村落。而大公村，后来则是专指公爷府所在的村庄。早年，大公村边的东西各有一个石雕拴马桩，叫做上下马桩。进村者，到了马桩前必须下马；出村者，过了马桩后才能上马。到贡格巴勒时期还是这样。当时有府兵二、三十人，经常住在土默公，为公爷服务。他们是所辖四个苏木的属民，定期轮换来服役的。

在公爷府的东南方向有一水井，是专供人们吃水的井。在井的南面有两个大灰堆，象座小山似的很显眼。这是多年用牛羊粪生火的炉灶灰，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使人一看，便知道公爷府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在公爷府的四周，有三、四尺厚的一层牛羊粪土。这是多年的牲畜粪积压形成的。1956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这些炉灰和粪土，给庄稼上了肥。西南方也有一眼水井，专供饮牲畜用。从井口到水面约三、四尺深，而井水倒有一丈多深。井旁有一大石槽，成群的马，全村的牛羊，每天早、晚两次都在这里饮水，而井水却不减少，说明井水特别旺盛，对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连女于1945年，从归化城回到大公村时，村中只有公爷府的人和为公爷服役的属民（家奴）们。属民们另有房院居住。公爷府有东院和西院，都是布局相同的里外院。东院全是砖木结构，比较高级，是色楞鲁勒精札布之弟，色楞多尔计住的院落；西院是色楞鲁勒精札布母亲居住的庭院。东院已塌毁，色楞多尔计（人称二少爷）已去世。西院外院的大门，是五檩四椽全架结构。两扇大门约有五寸厚。门外两边的马头下，各有一块长方形石基。高四尺、宽三尺、厚一尺。门洞中有一石制门槛，凿有两道过车

的辙槽。大门西靠磨房，东挨碾房。外院的厢房都已倒塌，改做牲畜圈了。里外院的面积大小基本一样。里院正厅一堂两屋，配有东西耳房。全部是两出水，四脚落地，白灰混水墙，窗前全部是石条台阶。西耳房的西侧是供佛的神房。神房前有一旗杆，插在一园形石礅上，杆的顶端冠有一葫芦桃形铜顶，是为纛。杆的两边，各有一三股义（苏鲁定）。1964年四清时，将此杆搬倒。原来的东西厢房已塌，新盖的西房专作厨房用。里外院各有一拴马石桩，是五尺多高的方形桩，顶端刻成桃形，桃下凿孔可供拴马。

土默公（大公村）以西八里远有一村庄，叫西营盘；以南五里远有一村庄叫公营盘；东面二里远有夏营盘。这些营盘，早年是公爷府所统辖的兵丁驻扎之处；后来是放牧牛羊群的人住宿之处。色楞鲁勒精札布娶陈银焕为妾后，在夏营盘专门为她盖了一所房院。自陈银焕住在夏营盘后，夏营盘这个村名，便逐渐被叫作小公村了。原来的土默公，也逐渐被叫成了大公村。现在的大公村和小公村，就是以土默公爷府而定名的。当地还有种传说：大公村南面是土凤，北面是土龙，龙头向东，龙尾向西。故至今，人们谁也不敢在村东盖房。说什么东面是龙口，怕被吃掉；都争着在原来村子的西边盖房，为的是骑龙兴旺。当然这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

大公村周围几十里之内的村名，大都是蒙语村名。大大小小的山坡上到处都是脑包。据说，有排行的就有十二个脑包；零零星星的脑包，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公村北山上的脑包，是过去供神的地方；天旱祈雨时，人们也来此领牲祭祀脑包。

三、家庙、坟墓

美岱召原本是阿拉坦汗的宫城府邸，同时也是家庙。

阿拉坦汗晚年笃信佛教。他曾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来蒙古传

教。几经往返，之后，阿拉坦汗与黄教派喇嘛苏南加措，在青海会面。后又请他来蒙古传教，并赐苏南加措为达赖喇嘛称号，是为三世达赖喇嘛；意思是他的佛学造诣如海洋那样博大精深。达赖是蒙语大海之意。苏南加措后来在蒙古传教，病逝在土默特地区。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在阿拉坦汗家族中，是阿拉坦汗的曾孙，叫云丹扎木素。

阿拉坦汗信奉黄教后，即在美岱召宫城内，兴建佛殿庙宇。至其孙媳大成台吉妻五兰比吉时，盖起灵觉寺泰和门（见泰和门额石刻）。云丹扎木素，于十四岁赴西藏坐床，执掌黄教，是为四世达赖喇嘛。西藏又派麦达里活佛，来蒙古主持教务。麦达里活佛，首先在美岱召留住传教，并为修建好的殿宇和弥勒佛塑像主持开光仪式。（汉传佛教称弥勒佛，藏传佛教称麦达里，蒙语称买达尔，皆为同一佛之不同民族语言之称谓。）以后人们就把这召叫作麦达里召（美岱召）。其实这是阿拉坦汗家族的家庙。由于庙宇的建筑规模远远大于府邸的建筑，加上蒙人崇信佛教的虔诚，和佛教在蒙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人们便约定俗成地用美岱召的称呼，取代了他们以往叫汗乃敖日登（汗廷）的称呼④。

另外，在美岱召院外的西北方向，北靠大青山最高大、最雄伟的一座山峰，叫宝丰山。峰顶上有一个用白石垒成的圆塔，当地人称之为白塔。白塔的南坡山凹里，就是阿拉坦汗家族的坟地，是三世达赖喇嘛苏南加措给看定的。阿拉坦汗及其后人和历代辅国公去世后，均归葬于此坟园内。每座坟从地面上看，是用砖砌成的圆锥形塔式封顶，在地下面则砌成藏（窑洞）。传说，人死后焚化为灰，将骨灰袋装入木箱内，然后把木箱放在窑洞里。每座坟塔间都保持着同样距离，层次分明。所有的坟塔，形成一个大圆圈。埋贡格巴勒的坟塔，与埋其子色楞多尔计的坟塔中间，留有一个坟塔的空地距离。原来这是准备以后埋葬色楞鲁勒精札布的位置。我在1967年去察看时还是这样。色楞鲁勒精札布是在

武川土默公府去世的。当时，未来得及正式安葬，而是暂且“沙”

（厝）在土默公，准备以后埋入美岱召祖坟里。后来陈银焕看到归葬无期，便果断地决定把色楞鲁勒精札布，安葬在了大公村大脑包山南坡下，同他母亲埋在了一个坟地里（美岱召坟地里不埋女人）。达赖在呼市病故后，暂厝在“老李坟”内，原意是准备将后归葬美岱召祖坟内。但过了几年，由于看护坟地的人已死，无法找到装达赖的棺木而未果。色楞多尔计之子保庆死后，暂厝在大公村与小公村之间，原意也是准备日后埋入美岱召祖坟内，后来亦因故未能如愿。美岱召坟地，当地人称为“公家坟湾”，即“土默公家”的坟湾。现在已被摊成平地。我曾给包头市文管所写过信，请求对坟莹和召庙一样予以保护。这是因为阿拉坦汗的坟地，也是属于宝贵的历史、文物和古迹的范畴。

四、土默特辅国公的封地及其生活状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左翼台吉喇嘛札布，因功封为辅国公，授札萨克，增设一旗，隶乌兰察布盟。属民编为四个苏木，由台吉和世袭章盖（佐领）统辖。即以其在大青山后的原驻牧地区为封地。当时的地域是：西界今固阳，东至今武川哈乐儿，北接茂明安旗、达尔罕旗，席力图召沙毕（召河）；南抵大青山中部。约相当于现在武川县的全境。

乾隆二十五年（1760），喇嘛札布以罪削札萨克，成为闲散公爵，没有实权，只有微薄的俸禄，不足以供应生活开支。遂于清末放垦牧场时，也放垦了不少土地。民国（1912）以后，俸禄来源断绝，依靠经营土默公的畜牧为主要经济来源。当时，满山遍野的牲畜，是土默公赖以生活的保障，故色楞鲁勒精札布大部分时间，住在土默公。

1945年，呼市镇国公府被郭长清霸占之后，李连女被赶出府门，她带着我和姐姐回到武川县土默公居住。当时在土默公居住

的人员有：色楞鲁勒精札布和他的母亲（贡格巴勒长妾），色楞多尔计之子保庆，之女梅梅；小公村住着陈银焕。不幸这些老人在三、四年内，都相继去世。当时，只剩下陈银焕、李连女、温都玛和我。当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在苦海中挣扎之际，引起了本家族的二旦台吉和世袭章盖赛补音，占有土默公财产的私欲膨胀。他们欲逼李连女改嫁。李连女看透了他们的企图，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我要抚养教育儿女，决不改嫁！后来，二旦和赛补音也深知土默特镇国公还有后人（两个孩子），慢慢也就不再强逼了。

李连女在陈银焕的帮助下，决心重新振兴土默公。根据当时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垦公爷府所属的土地，允许外人来垦荒种地。这样一来，来种地者络绎不绝。它既发展了生产，也改善了自己经济来源。一时间，使土默公的生活又活跃起来了。按照当时后山的惯例：凡来伴种蒙民土地者，只要有劳力和耕种技术就行，称作伴种地的伙计（地伙计）；由东家提供土地、农具、耕畜、籽种、生活住房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且借给伴种地户第一年的生活口粮。只要保持伴种关系，东家每年就提供这些生产、生活资料；其收获分成是：第一年开荒所种收获，按一、九分成；即给东家交一成，地伙计自留九成；第二年二、八分成，地伙计自留八成；从第三年起，以后永按三、七分成，耕种者自留七成。土默公招垦土地也不例外，照此惯例办理。兼养畜者，每年一群羊交一只作为水草费。

过去后山种地，都是隔年轮歇耕种的，叫压青地。即今年收获的地，明年休歇一年不种。上年掉落的籽粒长出的苗和杂草，待到伏天用犁耕翻过，就把青苗杂草埋压土下，作绿肥沤，明年再播籽种粮。也叫轮歇地。

1947年色楞鲁勒精札布去世后，有马一百多匹，牛一群一百多头，羊约200多只；耕种土地几十顷；另外还有已卖出的土地

的收租钱，水草钱，归化城大南街的地盘儿钱等。当时的土默公有记帐先生，有收地租和水草钱的跑外者，还有种地、放牧、做饭的长短工等二、三十人。还聘请有教书先生，是从察素齐请的卢先生和刘先生。那时，周围几十里的孩子，有不少来土默公念书的。这些学生，在解放初期，都成为当地有文化的人，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

正是这位卢先生，不知何以为据，认为美岱召是辽代萧太后的府邸，从而断定我们家族是萧太后的后代。当我到书坊念书时，卢先生把我爷爷给我起的蒙名满都勒不用，他给我另起汉名萧秀龙。那时我爷爷色楞鲁勒精札布已经去世，虽然色楞鲁勒精札布的母亲，曾多次对李连女说过：“咱们家没有姓，咱们成吉思汗家族是卜尔只斤氏，应该姓包或宝、卜、博……”李连女将此遗嘱也多次同子女们说过。但我年幼无知不懂事，就这样被张冠李戴地，以萧太后后裔用萧秀龙名字至今。现在，既已澄清了历史脉络，理应还历史之本来面目，自然也应纠正误加给我的族属和名字；我不是萧太后后代，而是成吉思汗后代，恢复了我原有蒙名满都勒。

关于美岱召是萧太后庙的传说，和由此而把我们家族也被误认为是萧太后的后代的传说，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甚至，我们家族中，有的人也接受了这种错误传说，并以萧为姓来命名。编造历史是多么的轻而易举！而纠正起来却又是何等之难！

土默公水草肥美，是养畜的得天独厚的地方。这里的草，人们称为硬草；不是草坚硬，而是牲畜吃上这种草膘肥体壮，体质结实有劲。经过试验证明：这里的牲畜卖到别处后，三两个月便膘减体瘦；从别处买来的牲畜，三两月后便肥壮起来了。这里确是养畜的宝地。大公村南的草滩宽约二、三里，长近五里，名叫巴彦花滩。滩中间从西向东有一条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流淌着。滩里的马蔺草、芨芨草、尖草、寸草等杂草密密麻麻，长势一人

多高，真是水草丰美。滩南坡的南角下，有两个水海子。用海子水下的白土抹墙，既好看又耐雨淋，十年八年都淋不坏。再往南就是公营盘了。这里有土坡、平滩、河流、各种草有半人多高。公营盘北面的山坡，人们称作“状元碑”。此山坡上有一通石碑，约三尺宽半人高。碑上刻着：“状元、李如柏行军，祈雨处，大清雍正十三年五月勒”（注：1735年）。还传说，皇帝要求地方献三千喜鹊花马，别的地方都无能为力，只有“土默公”能按时如数交上。这说明土默公的马成千上万。过去，土默公的马不是按匹计数，而是说某滩的马，或某坡的马，是用滩、坡、沟来计数的。如巴彦花滩的马约多少，乃莫沟的马约多少等。

正当土默公兴旺之际，有个叫亢四的人，欺李连女和陈银焕孤寡无依，妄想霸占乃莫沟一道滩。引起李连女和亢四在高级法院打官司，以亢四失败而告终。李连女战胜了家族势力的挤逼和外来势力的强霸，成为土默公的主管者。对那些伴种地的地伙计，她尽力保护。如遇抓壮丁，她就将他们藏进公爷府内。因有“土默公”这个大名，抓人者从不到公爷府内搜查。

1948年，李连女因病染上了抽大烟。1949年，绥远解放了，李连女也得救了。解放后，李连女一家自食其力。土地改革时，土默公一户因情况特殊，归土默特旗管辖，参加土默特旗的土改。当时划为小土地出租者。留足了自种的土地，其余的拨给武川县参与土改。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有时还有适当的照顾，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中，土默公也未能幸免。公爷府被没收并被拆走。很多文物，档案资料，帐册、约据等全被抄走。我们一家人更是在劫难逃，全家人被空手赶门在外，扫地出门，连劳动工具也都被没收了。陈银焕因年老体弱，经不起折磨，不久死去；李连女被批斗致残，温都玛落得得严重精神病，今已成为疯傻人；我受到诬陷，屈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刑投入监狱。

至今尚未平反。

1987年，李连女将残留的几件有关土默公的清代文物，交给了武川县文化局。1984年，土默特左旗旗志办的人到武川县大公村我家，调查土默特辅国公的历史资料。李连女全家感动得痛哭流涕，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光荣、伟大；党没有忘记我们这一家。后来，我把从民间寻找回来的几件文物：《土默特镇国公戳记》（蒙汉两种文字），《绥远省土默特镇国公府》（汉文），《土默特镇国公之图章》（汉文）三枚印章，交给土默特左旗旗志办；旗志办又转交给旗文物馆。

现在中共土左旗旗委和政府，呼市市委统战部和市政府、市政协，对我们全家照顾得很好。我被聘为市政协七届委员；给我女人安排了工作，两个孩子的户口也从武川县大公村迁入呼市，他们都在上小学。总之，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的生活比前几年的生活好得多了。我们感谢党的民族政策，永志不忘党的恩情。

注：①荣祥：《土默特沿革》1981年版，104—5页及256页。

②刘映元：《从嘉乐会馆到大观茶园》呼和浩特史料第七集。

③喇嘛扎布是阿拉坦汗孙把汉那吉的五世孙。世守美岱召祖居。

④阿拉坦汗祖居的坟墓，只埋葬男性，女性不入祖坟。从二十来座坟塔看，及三世达赖苏南加措选定来看，阿拉坦汗确葬于此，故而美岱召曾是阿拉坦汗居处之一，是可确定的。

土默特辅国公家族世系表

世代	辅国公	世系	封袭爵位时间	备注
1	喇嘛扎布	阿拉坦汗裔	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封辅国公并授扎萨克	增设一旗隶乌兰察布盟。二十五年割扎萨克为闲散公，二十一年卒。
2	索那木旺扎勒	喇嘛扎布子 (一次袭)	乾隆三十一年 (1766) 袭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诏“世袭罔替”
3	齐鲁布	索那木旺扎勒子 (二次袭)	嘉庆二十年 (1815) 袭	咸丰五年 (1855) 卒
4	根丕勒多尔济	齐鲁布子 (三次袭)	咸丰八年 (1858) 袭	光绪二年 (1876) 卒
5	贡格巴勒	根丕勒多尔济子 (四次袭)	光绪二年 (1876) 袭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卒
6	色楞鲁勒精扎布	贡格巴勒子 (五次袭)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袭	民国元年 (1912) 晋爵镇国公，1947卒
7	达赖	色楞鲁勒精扎布子	民国后 (1912) 再未承袭	1915年生，1945年急病卒
8	满都勒	达赖子		1943年生
9	额尔敦	满都勒子		1985年生

土默特辅国公漫述

咏 岭

土默特两翼编旗之时，仅有少数几个阿勒坦汗的后裔保有台吉名号，可以算作世爵。超品的辅国公爵位，是清朝定鼎北京百余年之后，才授予喇嘛扎布的。土默特辅国公系闲散公爵，并不参予旗政，对两翼并无多大影响。但是，作为土默特黄金氏族的一个支派，其浮沉兴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土默特蒙古族历史遭遇的一个缩影。因此将散见的史料和采自民间的口碑资料整理成文，仅供参考。

一、土默特辅国公的由来

在说辅国公由来之前，应该先谈谈喇嘛扎布的世系。《王公表传》仅说他是“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坦裔”，但究竟是阿勒坦汗后裔的哪一支派却只字未提。《喇嘛扎布家谱》以喇嘛扎布为始祖，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蒙文史籍《金轮千幅》、《蒙古黄史》等书记载喇嘛扎布世系源流颇详。从中可知，喇嘛扎布世自阿勒坦汗之孙把汉那吉一系。其高祖至父亲依次为温吉特、诺尔布、噶尔丹、丹津。世系既明，因而得以将其家谱补齐（详见《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之谱一）。

1632年土默特部降附满洲之后，其封建领主的命运如何呢？据清末编撰的《土默特旗志》说：“博硕克图汗裔分隶左右翼，称台吉。”其实并非如此。清末，“土默特有二等台吉兼勋旧佐领者二员，四等台吉兼勋旧佐领者一员，四等台吉兼世管佐领者一员；其子孙年已及岁者均为台吉。”说得很明白，只有上述兼

佐领的台吉的子孙才“称台吉”。经查，两员二等台吉系丹巴尔扎木苏(世居和林格尔境)的后裔。四等台吉则系喇嘛扎布后裔，就是说，只有黄金氏族的这两个支派的子孙，才有资格“称台吉”，其数量，“台吉虽增亦十八人”而已。根据史料，阿勒坦汗的子孙中，除噶尔图和他的三个兄弟率部驻兀爱营(今河北赤城县境，入清后移居巴颜和硕一带，即东土默特)而外，其余十数支主要分布在土默特两翼及周围地区。这些支派入清以后，为什么与俄木布一系一样，都未能保有台吉名号呢？这就有必要对十七世纪初土默特部封建领主间的关系，作一些追溯。

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土默特部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汗卒。其长孙博硕克图(卜石兔)分应袭王，但是，博达锡哩(不他失礼)之子素囊(苏都那木)依仗祖母三娘子和母亲大成比吉的势力，竟公开与博硕克图争夺王位，声称“应王者我也”。致使袭王一事一拖再拖，一直发展到博硕克图之从祖父五路台吉(即那木尔)集合七十三家台吉，欲加兵于素囊。加上明朝的斡旋，才迫使素囊妥协，于1614年由博硕克图袭封顺义王。博硕克图汗虽然成了十二土默特的最高首领，但兵权握在素囊手中，他只是徒具虚名而已。争袭王位事件导致了土默特部的公开分裂，极大地削弱了土默特部的力量。素囊的同盟者主要是把汉那吉之子温吉特(即明人所谓冷克木或不速布)，二者均为大成比吉所生(同母异父)。他们共同拥有板升之富，共同掌握西哨军马，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始终与博硕克图汗尖锐对立，直到俄木布时代内讧仍未止息。

土默特民间(甚至包括一些老知识分子)对辅国公喇嘛扎布颇有微词。主要是说他“卖主求荣”，向满洲人诬告土默特王谋叛，致使土默特王爵被削。这个传说是不准确的，因为削爵之时，喇嘛扎布尚未出生。历史上若确有“卖主”一事，也应是其曾祖辈的事。据记载，与古禄格等一同降附满洲，向后金皇帝朝贡的

土默特头目中，是有诺尔布其人，而诺尔布则是喇嘛扎布的曾祖父。大约是历久相传，喇嘛扎布又获显爵，渐将卖主之事传说，安到了喇嘛扎布身上。民间有此传说不无原因，否则，博硕克图汗及其拥戴者的子孙都被贬为庶人，而其反对者却不仅保留了台吉名号，而且获得了新王朝的世职。这种现象就不好解释了。

把汉那吉的后裔，在清代保持了台吉身份，同时也保持了美岱召及大青山后牧场的领有权。到喇嘛扎布时仍是富甲一方，仅马匹一项，民间盛传当时辅国公的喜鹊子花马漫山遍野，难以计数。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廷诏征土默特兵千名，赴新疆伊犁征剿反叛的达瓦齐。喇嘛扎布献军马三百匹。平息达瓦齐之后，喇嘛扎布以献马功，授一等台吉，“命乾清门行走”（即在乾清门入值办事）。从此，喇嘛扎布在宦途上青云直上。

1756年，喇嘛扎布奉命随承恩公明瑞，赴新疆巴里坤，督厄鲁特达什达瓦部迁徙于阿勒台一带。在那里，他结识了和托辉特郡王青衮咱卜，并将女儿嫁给青衮咱卜为妻。不久，青衮咱卜背叛清王朝，喇嘛扎布奉旨随左副将军、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率兵征剿。青衮咱卜兵败后，欲北逃俄罗斯。喇嘛扎布闻讯后轻骑尾追，见面后只与青衮咱卜叙翁婿之情，将其麻痹，而后突然袭击，将其擒获。喇嘛扎布以擒叛功，被封为辅国公。清廷还将土默特两翼的山后四苏木划出，增设土默特一旗，以喇嘛扎布为扎萨克，隶属于乌兰察布盟。1760年，清廷以“不入觐及违例妄行罪”，削去喇嘛扎布的扎萨克，停其“乾清门行走”。新增不久的土默特旗亦撤销，仍归原建制，喇嘛扎布亦复归土默特左翼管辖。这便是土默特辅国公爵位的封赏，以及由扎萨克变为闲散公爵的大致过程。

对于削扎萨克一事，民间也有传说，大意是：喇嘛扎布得爵后，竟向乾隆皇帝夸富，说助军的三百匹马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朝廷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还说，祖遗的喜鹊子花马快捷如龙，

马蹄曾踏遍长城内外无所阻挡。结果遭到皇帝的忌恨，寻机将其扎萨克削去，以防其坐大。此事不论有无，喇嘛扎布居功自傲则是确实的，所有蒙古王公哪个敢于“不入觐”（即不朝见皇帝）？喇嘛扎布竟敢。而且，他在呼和浩特的府邸（位于小东街）召集戏班，整日唱戏宴乐（据说大观戏园就是这么形成的），完全不遵朝廷的有关规定。所以乾隆皇帝在谕旨里说他“不思感激朕恩，奉公守法，乃日耽逸乐，恣意妄为”，落了个削扎萨克回旗效力的结果。

二、辅国公的封地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把汉那吉及其子孙的领地就在美岱召一带及山后地区。这从不少史料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把汉那吉之妻大成比吉，将板升城改建为佛教寺庙，称作灵觉寺，也叫麦大力庙。所以辅国公一系，一直把美岱召视为家庙，其墓地也选择在美岱召侧后的山坡下。再如，1586年（万历十四年）为与三娘子及其子博达锡哩争夺板升城，及板升农业区的领有权，扯力克汗在恰台吉（即达云恰）等的支持下，秘密赴山后，在大成比吉的帐幕中挂弓矢与之合婚。倘若大成比吉在山后没有领地，则她的帐幕是不可能搭建在那里的。可以说，大青山后一直是属于把汉那吉后裔的牧地。

正因为如此，当喇嘛扎布被授予扎萨克辅国公时，清廷即以山后四苏木增设土默特一旗，归辅国公管辖。这实际上是以皇帝钦封的形式，肯定了辅国公对山后牧场的领有权。就是说，大青山后除绥远城八旗马场而外，均属公爷府。因此，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修建沙拉穆楞召（普荟寺）时，辅国公将该寺周围的大片草场捐给寺庙作为香火地。直到民国初年，因报垦该寺香火地以外的草场，公爷府还同普荟寺打官司，争夺报垦地亩的所有权。这也证明山后确曾为辅国公的封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辅

国公已经衰落，但公爷府仍然领有武川县西部克臭鄂博以东的土地，收取那里已垦土地的租资或小租子。至于辅国公封地的面积，因无准确统计，只好阙如。不过，其封地越来越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为省县当局承认的仅火烧地、乃玛沟地亩而已，这同土默特蒙古族户口地亩沦失的情形是一样的。

三、辅国公的没落

土默特辅国公作为封建王公的一员，是同清王朝同步衰朽的。喇嘛扎布以后，辅国公共传五代。历代辅国公除每三年入京轮值和朝觐，按期领取俸禄而外，政治上均无所作为。尽管每况愈下，却依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而骄奢淫逸成为其人丁不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公爷势力的没落，其属民也日渐减少，到清末已寥寥可数。用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来形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辛亥革命以后，辅国公似乎很走红了一阵子。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1913年，第六代辅国公色楞鲁汝精札布，赴京参加了袁世凯导演的蒙旗王公翊赞共和的活剧。接着被晋爵为镇国公。这颇唤起了这位公爷的政治热情。1914年，他参与了向北洋政府要求归还土默特财政，复设专职土默特副都统的请愿活动。其后，在绥远土匪蜂起的形势下，他购买枪支，组建了一支约二十人的镇国公卫队。用以保护公爷府及其财产，并兼维护地方治安。这支枪马齐全的卫队成份复杂，在为公爷府催租讨债的同时，恣意勒索武川西部农民。吊打平民、侮辱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搞得民怨沸腾，因而被绥远都统马福祥勒令解散。从此以后，镇国公急剧地没落下去，家资迅速耗尽，变得衰败不堪。

土默特公爷府的衰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方面是不事生产，不善经营，大肆挥霍，生活奢侈。仅以嗜好一事而言，公爷以下数杆鸦片烟枪，一昼夜就要抽去数石小麦、一条牛。似此挥

霍，即使金山银山何愁不尽！客观原因，则与旧中国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不无关系。例如属于公爷府的乃玛沟一带的草场，被鄂友三部强行开垦，收入尽归鄂部，镇国公则是敢怒而不敢言。再如，镇国公在呼和浩特小东街的宅院，抗战胜利后被郭长清霸占。镇国公之子达赖，抗争不果，气急得病而亡。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曾经显赫一时的公爷府彻底没落了。从以下事例，可以看到其究竟衰败到何种程度。其一，色楞鲁汝精札布于1947年死后，竟无力归葬美岱召祖坟，只得在金长城脚下草草掩埋。其二，辅国公一系本来确实系土默特蒙古，而且是成吉思汗的裔孙，但是，美岱召和大公村一带，民间广泛流传土默公是萧太后的后代的说法。土默特辅国公的后代，受此说之影响，竟以萧为姓氏，而忘却了自己纯系蒙古族的民族成份，误将契丹族的萧氏认为祖先。这种民族史上的悲剧，只能归咎于旧社会反动的民族政策。

位于武川县西红山乡大公村的辅国公府邸，解放前夕本已残败。十年动乱中更遭到彻底破坏，几乎被夷为平地，仅剩一间神堂还较完整。在府邸遗址上，只有散弃各处的柱础石、拴马石和旗杆石还能让人依稀想象出当年公爷府的气派。原存神堂内的各种资料，如朝廷的封诰，不知名目的手抄本、契约，以及府内的书籍、印章等，全被抄没。前几年，喇嘛扎布的八世孙萧秀龙，几经同武川县有关单位交涉，只索回木质印戳两枚，其中一枚为长方形，上刻“镇国公府戳记”，大约是民国年间用于收取钱粮租资的印信。其余的据称早已毁弃。不过，既然印戳能够保存下来，别的资料也有幸存的可能，但愿这些散失的东西能够重见天日。

四、辅国公的坟墓

前文述及公爷府把今土默特右旗境内的美岱召视为家庙，

其墓地也择在寺庙侧后西北的宝峰山下。据萧秀龙介绍，小时候他曾随祖母到坟茔祭祖，祖母曾一一给他指示历代公爷的坟墓。坟丘不大，多为土封砖包，有的还作塔形。坟茔与众不同的是其葬式。本地区蒙古族和汉族的墓葬均为纵列横排，即按辈分由上（北）至下（南）依次安葬，同辈自左而右（蒙族）排列，辅国公坟茔内的坟丘则按圆形排列，即由正北按逆时针方向逐代安葬。这种葬式在本地区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其来源及意义尚不清楚。除第六代辅国公色楞鲁汝精扎布，因无力归葬外。其余均葬于该墓地内。

辅国公坟茔在文化革命中遭到彻底破坏。据美岱召村群众说，坟内多为火葬墓，坟丘内安放骨灰及骨灰合泥捏成的人形及塔形物，同时还葬有五谷杂粮等，现在已无踪迹可寻。

最后，顺便谈一谈太后庙及有关太后的传说。这或许对理解辅国公坟茔择在美岱召近旁的原因有所帮助。美岱召是一座黄教寺院，但大殿东北侧却有一所太后庙，内存骨灰等物。佛殿与俗家的寝殿共存，这恐怕也是极罕见的。考虑到美岱召是由宫殿改建而成的史实，也就不觉奇怪了。有人说太后庙内安放的是三娘子的骨灰，这只是一种推断，并无实据。三娘子固然可以被称作太后，但十七世纪初土默特部被称作太后的并非仅她一人。前文已说到主持改宫城为佛寺的是把汉那吉之妻大成妣吉，在美岱召门额石刻中她被称作“大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七庆即斯钦，把汉那吉也叫七庆台吉，故其妻被称作七庆妣吉是顺理成章的，而“大义好”正是蒙语太后（为汉语借用词）的汉字标音。可见大成妣吉当时也被称作太后，而乌兰则显然是其本名。她生前拥有板升农业区，一直住在美岱召（琉璃殿也称太后梳妆楼，大约即为她起居之处），而且拥有忠义夫人的封号，尊贵而富有。她死后，子孙在她长期居住又由她改建为佛寺的地方，为她修建寝殿也是情理中的事。美岱召内曾有公爷府，可能就是辅

国公前来祭祀这位老祖母时下榻的地方。辅国公（也包括其先人）把墓地选择在靠近其太祖母安息之地的近旁，也是情理中事。

因为美岱召内有太后庙，人们不知曾拥有美岱召的忠义夫人七庆妣吉被尊为太后的历史，把从戏文中知道的萧太后，附会到太后庙上，于是便产生了辅国公系萧太后的后人的讹传。这种传说的荒诞，已被事实驳倒了，毋须多说。

呼和浩特蒙医的发展

刘春甫

呼和浩特早以悠久的历史闻名于世，然而在这块少数民族的肥沃土地上，关于具有浓郁特色的蒙医，却无任何专著论述。许多著名蒙医学家的医疗事迹，几乎荡然无存。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许多老喇嘛、老蒙医，就搜求到的一鳞半爪资料凑成粗文，以此作为笔者对呼和浩特蒙医发展的管窥记述。

一、呼和浩特蒙医萌芽阶段

蒙古族民间传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疾病。医药，就是针对疾病而产生的。那么，呼和浩特究竟何时才有了人类呢？据托克托县地方志中记载，可以追溯到海参不浪人时期。而据北齐斛律金有名的《敕勒歌》记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歌中“敕勒川”，即指呼和浩特的土默川而言。这首歌提示敕勒川族人早已在这里过上游牧生活了。呼和浩特蒙古族人类与疾病作斗争，也可以说就从这里开始。此时，大概为公元七世纪。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医药书籍记载。

公元十世纪末，蒙古族部落逐渐强大。十三世纪初，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南北的七十多个部落，于1206年，建立了蒙古帝国。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蒙古族特有的医学开始萌芽。据《元史》文献资料的记载，成吉思汗的名将布智儿“身中数矢，太祖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随苏”。这就是蒙古族采用热血浸疗医治箭伤的原始方法。后来，随着蒙医学的发展，这一方法逐渐演变为蒙医外伤治疗术。

元朝灭亡后，大漠南北曾一度混乱。直到十五世纪中叶，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地区），蒙古地区才重新趋于安宁。其孙阿勒坦汗（俺答汗），统管土默特万户人民，成为土默特的封建主。这万户人民就是较早的土默特蒙古族部落。这里的牧民们住着蒙古包，过着游牧生活。由于蒙古族崇尚骑射，常因金创及跌打损伤救治的需要，蒙医外伤治疗开始萌芽。据《蒙古源流·卷七》（萨囊彻辰著）一书，记载了土默特封建主阿勒坦汗（俺答汗）腿疼一事。原文曰：“我从前曾有足疾，续因足疾复犯，闻装入马腹内治之能愈，是以杀马，以足伸入马腹之内，其痛愈”。尽管这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十分原始，但它却意味着传统蒙医疗法在呼和浩特萌出了新芽。此外，《蒙医秘史》文献中，还载有用马奶酒救治受伤大出血昏厥病人事例；用烧红的烙铁烙治流血伤口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在蒙古族医生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经验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蒙医独特的外伤治疗术。

二、“喇嘛大夫”的兴起

明、清时代，随着佛教“黄教派”传入内蒙古地区，在辽阔富饶的草原上，相继建起了数不清的喇嘛佛寺。这些金碧辉煌的庙宇，犹如一幅幅华丽吉祥的图案，镶嵌在碧绿的呼和浩特大草原上，把草原点缀的更加美丽。众所周知，这些寺庙是喇嘛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然而，你可知道这些寺庙还是培育蒙医的摇篮。在蒙古族医学史上，蒙医的医疗活动与蒙医学的教育，常常是在这些喇嘛洞或喇嘛寺庙中进行。

传说，很久以前在呼和浩特乌素图村西北“大山尖”的石洞里，有个喇嘛名叫萨木藤阿斯尔。他出生于察哈尔部，幼年时就出家当了小喇嘛；青年时在西藏学习佛经，并钻研医学；壮年时又返回乌素图村“大山尖”的石洞里。他精通藏文，又擅长医术，常给附近的蒙古族牧民治疗疾病，受到当地牧民的信仰、爱

戴声，誉很高。大约在1567—1572年间（明隆庆年间），这里的牧民们募捐给他盖了一座小寺院，起名叫察哈尔束木。后来康熙帝给这个小寺院赐名为“法成广寿寺”。萨木藤阿斯尔就在这里一边念佛，一边行医。他就是呼和浩特最早的一位喇嘛大夫。

萨木藤阿斯尔医术高明，远近闻名。不少游方喇嘛，纷纷前来拜师学医。由于小寺院难以容纳，他们便再次化缘募捐，于1583年（万历11年）又增益了寺院，起名叫“东茶坊”。

1584年（万历12年），萨木藤阿斯尔不幸逝世。他就是乌素图召“呼图克图”活佛的第一世。6年后，于1590（万历18年），他的徒弟们从民间的孩子们当中，找到了他的“转世灵童”，请回寺内，给他修盖了“佛爷府”。第二世活佛成年后，由于他的徒弟当中不少人继承了萨木藤阿斯尔的医术，有几位名气很高的“喇嘛大夫”，即为后来的传人。他们对医术从不保守，代代相传。从此寺庙兴旺发达，生活日渐富裕。于是又第三次募化修建“庆缘寺”。当时的寺名仍然是察哈尔格根束木。直到康熙帝西征“噶尔丹”获胜回师驻蹕于呼和浩特，第三世活佛朝见了康熙帝，并正式封他为“察哈尔喇嘛·呼图格图”。

据说四子王旗有位名叫罗布桑旺扎勒的喇嘛，慕名来乌素图召拜“呼图格图”为师。学成后在乌素图召的附近修建了一座简陋的佛殿，内供主佛药王。当时的寺名叫“玛勒木束木”（即药王寺的意思），从此，他安居在这里，边念佛、边医疗，还收过几位徒弟。他去世后，徒弟们把师父的转世灵童从四子王旗境内请回这座“药王寺”，成为罗布桑旺扎勒第二世活佛。据说这位二世活佛也是自幼学医。成年后，于清乾隆初年，曾跟随“呼图格图”去北京朝拜过乾隆皇帝。巧遇皇帝的一位爱妃患有重病，经他诊治，居然“手到病除”。乾隆皇帝大喜，就要封他为“呼图格图”。当时乌素图已经有了“呼图格图”，况且是他的师祖。奈于这些，罗布桑旺扎勒只接受了一个“呼毕力嘎”的皇封。皇

帝还拨款，给他重修了一座盖有绿色琉璃瓦（“绿瓦”是药王佛的象征）的寺院。并命名为“法禧寺”。

这位好学的“呼毕力嘎”归来重修庙宇后，为了深造，便又到青海“塔尔寺”访师学医。在塔尔寺学医期间，他遇到一位学识渊博的青海蒙古族老喇嘛——松巴堪布·伊锡巴勒济尔。他叩拜为师父，随师学医数年，获益颇多。临毕业时，他的师父伊锡巴勒济尔把自己花费了毕生精力的一部原稿著作《松巴堪布》赠送给他。并嘱咐他一定要把这部经典传于后世，济世活人。这位“呼毕力嘎”回乌素图召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遵照师父的愿望，把原稿进行了精心整理编撰，分门别类，将其归纳为天文、历史、文学、数学、医学五大门类，雕成两面木刻印版，共三千四百五十五块，一直存放在法禧寺内。这是呼和浩特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医药文物珍品。令人痛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文革”十年动乱之中荡然无存。幸运残留的一块木刻版，于1983年8月，被有心人，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巴·吉格木德（现已为教授）收存。这块记载着呼和浩特医学的木版至今完好无损。它是考证呼和浩特蒙医学历史的唯一证物。

“呼毕力嘎”在晚年时期，曾带领几位徒弟回故乡四子王旗行医治病。一次，他听说四子王爷的“爱妻”生孩子难产。他凭着自己丰富经验，胸有成竹地主动上门为其诊治。经他采用针灸治疗后，婴儿顺利产出。王爷十分感激，目睹这神奇的蒙古针灸疗法，当时就要拜他为师。从此，他俩成了至交好友，“王爷”指山为界，赠给他一块相当可观的土地作为牧场，并赠送十几户牧民给他当黑徒，为他服务。

据说在乾隆后期，乌素图又专门修建了一座“药王寺”，专供药王。所谓“药王”，其实就是对医术高超，用药精湛的“喇嘛大夫”的敬称。

乌素图召喇嘛大夫的生涯，就是呼和浩特蒙医兴起的摇篮。

乌素图召的历史，就是呼和浩特蒙医药发展的有力佐证。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纷纷，喇嘛大夫由于不得安宁，只好到处游荡。1925年，乃莫齐召从西藏请来一位佛爷，名叫罗布森达莫毕加勒森。他自幼读藏文经书，学得许多医学知识。于抗战时期，正式开始行医。他擅长治疗妇科杂病与小儿科疾病。据该召里的老喇嘛，云那圣回忆说：“罗佛爷以游医形式治疗疾病，在土默特一带，影响也较大”。乃莫齐即额莫齐之异译，医生之意。

1938年，莎拉布朋兹格领着徒弟庆克尔来到呼市，住在席力图召榆树院大伙房里。由于莎拉布朋兹格从小当了喇嘛，并在藏文医学院（麻巴）读书九年，功底较好，所以，他和徒弟一边念佛经，一边行医治病。因他的医术高明，人们就以“喇嘛大夫”相称。消息很快传开，求医者络绎不绝。当时该召里的负责人札萨克喇嘛萨木腾，准他落籍该召，并分给他一处院子。使莎拉布，在呼和浩特大展宏图，施展蒙医技术，为各族人民医治疾病。

在归绥和平解放之前，呼和浩特的蒙医是屈指可数的。当时，较有名气的蒙医仅莎拉布、庆克尔、罗布森达莫毕加勒森。人们都以“喇嘛大夫”称呼，代代相传。

三、黄教对蒙医的影响

呼和浩特蒙古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变革。他们生息在祖国北方辽阔的蒙古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之中，在宗教信仰方面，最崇拜的是原始的萨满教。传说成吉思汗的第十代祖先哈布勒可汗，有个出众的妃子，名叫洪吉拉特。她患了一种病，经萨满巫医治疗，病情不但毫无好转，反而逐日加重，直至死亡。哈布勒可汗十分痛恨这位巫医，将其痛打一顿，驱之外出。事后，洪吉拉特部落的兄弟们又把那萨满巫医杀死。

自从1559年（明嘉靖38年），黄教传入蒙古，黄教喇嘛的医疗活动对蒙古族人民的影响很大。他们通过行医得到蒙古人民的

信仰，牧民们认为喇嘛是救世活人的医生。特别是土默特的封建主阿勒坦汗，他也开始对黄教喇嘛产生好感。其中影响阿勒坦汗（俺答汗）最大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黄教喇嘛的藏医活动。因为当时蒙医十分落后，人患了重病大多请萨满治疗，就连封建主也不例外。据蒙文《哲布尊丹巴一世传》记载：“阿勒坦汗（俺答汗）患腿痛，萨满医让他剥一活牛肚腹，将腿伸入腹中取暖，即可痊愈。将剥活牛腹时，琐南坚措急止之，谓之：‘我能医尔腿疾，不需杀牛’，琐南坚措遂将阿勒坦汗腿痛治愈”。阿勒坦汗更加相信黄教喇嘛的高明医术。

1576年，俺答汗乃派遣代表到西藏，邀请琐南坚措到青海与俺答汗会晤。琐南坚措接受了邀请，他于1577年11月从拉萨哲蚌寺起程，于1578年5月（万历6年）到达青海，在仰华寺与俺答汗会晤。会见后，俺答汗赠琐南坚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琐南坚措也回赠俺答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金刚持”的意思。“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从此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个称号。

1579年（明万历7年），俺答汗与琐南坚措告别，率大部返回土默特部。琐南坚措特派东科尔呼图克图云丹嘉措作为他的代表，跟随俺答汗赴呼和浩特讲经。就这样，西藏佛教以黄帽派喇嘛教的形式在呼和浩特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蒙古族原来信仰的萨满教。随着喇嘛教的传播，许多藏经也传入呼和浩特。不少有心的喇嘛，则从藏经文里汲取医学知识，充实自己，丰富蒙医。

就在这时，八世纪藏医大师宇妥·元丹贡布整理的《四部医典》相继传入呼和浩特。随着藏医学的传入，大大地丰富了蒙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对呼和浩特的蒙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使之逐渐兴旺发达，形成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

1582年（万历10年），俺答汗病死。其子僧格杜棱汗继位，

袭封顺义王，改名“乞庆哈”。他敦请达赖三世来呼和浩特。1586年，达赖三世来到呼和浩特，他为了推行黄教，战胜蒙古族牧民一向信仰的萨满教，进行了大量的、广泛的医疗活动，从而赢得了蒙族人民的信赖。1589年（万历17年），达赖三世病死于呼和浩特。老喇嘛为了在呼和浩特这片肥沃土地之上立有一席之地，便以“转世”的方式落在俺答汗之孙松木尔台吉家中，即云丹嘉措，成为达赖四世。这样，黄教的势力稳固下来，而呼和浩特却成为黄教传播的中心据点。在此期间，蒙藏医学不断沟通，使蒙医药学吸收了藏医与古印度医学的许多精华，从而把呼和浩特的蒙医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呼和浩特蒙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与黄教的传入是不可分割的。尤其是《四部医典》、佛教主要书籍《丹珠尔经》、《甘珠尔经》等传入是蒙医层楼更上的源泉。

自从黄教传入内蒙古地区之后，黄教喇嘛为了取得蒙古族人的信任，他们广泛为人治病，且取得了效果。加之琐南坚措劝导俺答汗废除了夫死妻殉葬的残酷风俗，以及给死者宰杀很多驼马作祭祀的习惯，更得到全体蒙古人的敬仰。因而大家都抛弃了萨满教，改信了黄教，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萨满教却并不甘心，遂与黄教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时萨满教巫师们还编了一套诅咒喇嘛的经文：“威力无穷的苍天，手握神剑的苍天，用一百喇嘛的血做饮料的，用一百喇嘛的头做念珠的，不看一眼秃驴的，不看一眼喇嘛的，不看一眼黄红色的，不闻一鼻香烟的，高贵的苍天。”（策·达木丁苏荣《蒙古文学一百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

喇嘛教当时在官方的支持下，焚毁了萨满教巫师们使用的法器，“捣毁了愚顽的萨满教”。（《蒙古黄金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蒙文版）。

四、建国以来蒙医的发展

1953年10月，莎拉布蒙医主动申请参加了呼和浩特市卫生协会。与其他西医、中医大夫共同协商，组织创办了玉泉区小东街联合诊疗所，内设蒙医科。1954年，莎拉布号召诊所的17名医务人员，集资扩建诊疗所，改名为“呼市小东街联合医院”。1956年3月3日，莎拉布被推选为副院长，兼蒙医科主任。当时，呼和浩特蒙医水平较高的仅莎拉布与徒弟庆克尔。而莎大夫的医名远近闻名，有许多蒙医前来拜他为师学医，先后有丹片、丹巴永仁、藏巴召、古勒巴召、李俊（现呼市中蒙医院）、丹津等。

1955年冬至1956年春，古那、白清云、敖连和等相继从乌兰浩特的蒙医联合诊所调来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专门从事《四部医典》蒙文译稿的修订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研究所于1956年4月，经内蒙古党委和政府批准，正式成立。由自治区卫生厅厅长胡尔钦毕力格同志兼任所长，鹏飞（冯文卿）同志任副所长。

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成立后，在西乌素图召筹建蒙医进修学校。同时，为解决蒙医临床问题，有七八名蒙医药人员，在大北街中蒙医门诊部开设蒙医门诊，并建立了蒙药房。当时经常门诊的蒙医有白清云、敖连和、敖蛋臣、金玉衡等；组建蒙药房的蒙药人员有包景荣、都格尔扎布等。1958年蒙医为了扩大临床基地，又在设在五塔寺的牧民招待所开设了蒙医门诊部，该门诊由阿拉坦仓全面负责。

1959年，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又成立了蒙医研究室。卫生厅胡尔钦厅长对蒙医的研究工作很重视。他认为蒙医有许多精华值得挖掘。所以，又从区内外聘请了20余名蒙医药及精通蒙藏文字的专家，汇聚呼市，集中精力从事古典医籍的编译工作。据老蒙医回忆，当时聘请的专家有：宁日布、拉喜斯楞、力格德布、依德木苏荣、高喜、占布拉什努、嘎拉森桑杰、登布日勒宁布、尼玛扎拉森、金巴、德宝、普日来、僧格扎布等。编译的蒙藏医学

经典著作有：《碧光琉璃医鉴》、《医宗要旨》、《诃黎勒晶珠医药学鉴》、《医药宝鉴》、《方海》、《增补疗法》、《红珊瑚方剂》等10余部书稿。同时，胡尔钦厅长也亲自动手编著《蒙医发展史》。后因十年动乱，这些宝贵书稿，大部散失。

1956年至1961年期间，在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的基础上，分别建立起内蒙古中蒙医院、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及内蒙古医院蒙医科，是蒙医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的蒙医研究室，有敖玺臣、宁日布、包芹轩、于庆祥、胡和录、丹金扎木苏、武绍新等人继续从事文献编译及书稿的校勘工作。这一时期，敖玺臣的《蒙医经验方》出版，《荣博》的校对工作也在抓紧进行。

1970年，蒙医从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逐渐解脱，内蒙古中蒙医院蒙医科实力逐步加强，阿古拉、包景荣任蒙医科主任。又相继调入一批业务骨干，有杨世民、张巴斯尔、娜仁高娃等。阿古拉等人开展了蒙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病的临床研究；杨世民等人开展了蒙医药防治慢性气管炎、肺心病的临床研究。通过医疗与科研实践，蒙医人员普遍学习检验、放射、心电图等知识技能，提高了素质，促进了蒙医的发展。其中有医学院蒙医专业毕业生。

在72—77年间，包龙同志向阿拉坦仓学习，继承老蒙医临床经验，并协助阿拉坦仓编写《蒙医临床经验》一书，于1976年正式出版，荣获自治区科技三等奖。

1977年—1986年间，呼和浩特地区的蒙医药人员的医、教、研水平明显提高。特别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先后获得科技成果奖的有：阿拉坦仓·《蒙医临床经验》，1980年获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武绍新·《内蒙古药材》与《蒙药材标准的制订》，于1980年双双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四等奖；顾维彰等·《蒙药草乌叶含生物硷的分析研究》于1980年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四等奖；阿古拉·《蒙医药治疗萨病的研

究》，于1986年获国家卫生部乙级奖；顾维彰等《那如注射液的研制》，1986年获国家卫生部乙级奖。通过科研成果鉴定的项目有：武绍新对蒙医药古籍编译整理研究的《医宗要旨》与《碧光琉璃医鉴》均于1985年通过鉴定；顾维彰等人研究的蒙药广枣注射液也于1985年通过鉴定。

1986年，呼和浩特市医院成立了蒙医科。巴特尔大夫研制的“计算机癫痫病诊疗系统”通过鉴定，并获得呼市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来，巴大夫又将课题引深，申请研究“蒙医癫痫专家系统”课题，于1990年通过内蒙古科委的成果鉴定。

1987年至1991年间，呼和浩特地区的蒙医清楚地看到，要发展蒙医，教育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他们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出发点，开动脑筋搞科研。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探讨，挖掘蒙医药宝库里精华。他们承担着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治区科委、卫生厅等多级课题。其中通过成果鉴定的有14项，获奖项目有8个。如“蒙药通拉嘎601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获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此题由陈玉良副主任医师主持。199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蒙医药成果展出期间，倍受中外人士欢迎。会后纷纷来信求购。

总之，建国初期，蒙医机构虽然很少，设备简陋，条件很差，但蒙医的发展方向却很明确。他们始终在农牧民心中，占有一定位置。加之，从四面八方涌入呼和浩特地区大量的蒙医人员，为发展呼和浩特蒙医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文革期间，蒙医处境悲惨，曾一度受到迫害，蒙医事业受到摧残。文革后，蒙医才逐渐恢复，但仍无进展。七十年代末期，蒙医受到一定重视，他们丢掉包袱，奋力向前。跨入八十年代，蒙医大胆地运用现代医学手段，对自己的民族医药进行研究，使蒙医在科学性上迈开了大

步，迅速发展。蒙医人员的素质、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说此时是蒙医发展的兴盛期。在此期间，蒙医临床、科研、教学、医药等方面均硕果累累。

1989年8月，内蒙古医学院白清云教授应苏联布里亚特共和国卫生部的邀请，到那里进行医疗活动，交流蒙医治病经验。沿途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等城市时，在火车上为蒙古人民诊治疾病，受到蒙古家民的赞扬。同年9月20日，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古巴大使馆一等秘书贺什格先生，因患陈旧性脑梗塞，曾以个人名义邀请白教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他治疗脑病。这标志着，蒙医开始走向世界。

跨入九十年代以来，呼和浩特的蒙医不但自身得到加强，而且随着社会改革开放向前的步伐，蒙医也向全国、向世界迈进。1990年4月28日，日本东洋医学访问团，以木下伸一为团长一行10人，来呼市专门访问蒙医。他们和蒙医历史专家巴·吉格木德教授等，共同对蒙医源流进行探讨；对蒙医传统疗法治疗现代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进行了经验交流。此外蒙医专家教授还到日本、蒙古国、莫斯科进行医疗、科研活动。

呼和浩特蒙药的发展

刘 春

蒙古族自古以来被世人称之为马背上的民族。他曾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和影响。然而，游牧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呼和浩特蒙药资料的缺乏。研究它对造福于蒙古族人民意义深远、对发展呼和浩特蒙医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蒙药铺

呼和浩特地区，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蒙医常常骑马行医。在马身上携带一个药褡子，内有小皮口袋，装有各种药物，医到药到，对草原活动性很大的游牧生活非常方便，很受蒙古族牧民的欢迎。

清朝，随着“沙漠之舟”的发达，驼运队由呼和浩特驮上茶叶、糖等用品，直达青海、新疆、蒙古国乌兰巴托等地，进行贸易。返程时将这些地区的药材，如红花、硫黄、鹿茸、麝香、羚羊角、当归等，运回呼和浩特，繁荣了呼和浩特药材交易市场。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小召崇福寺建成不久，在小召前半道街靠北头路西，开始建造药店，这就是呼和浩特第一家蒙药铺——永合堂。药铺门口有一块石头座的通天招牌，上书“永合堂”三个大字，横匾题有“永合药店”字。三间门脸，有暗楼，后面里外三个院子，分别作住人、药库、制药、伙房等使用。

据蒙药学徒乔居正、阎月武、王维荣等人回忆，永合堂的股东是山西祁县的李舜廷，后来由其子李联佩接管。药铺自建成之后，一直没有扩建，比路面约低一米多，故人称“圪洞子”栏柜。这家蒙药店实力雄厚、声誉很高，药铺旁的一条胡同定名为永合

堂巷。

永合堂是个较大的蒙药店。柜上常有三十余人。历任股东除李氏父子外，还有祁明来、宋继贞、李儒英、孟生义、王如山、王杰、申世岐、李希珍、曹寿山等。民国年间，永合堂还在包头市开设永合堂分号。从呼调往包头十几名业务人员，经营出众闻名包头。后来，从永合堂培养出许多业务人员，他们分别另立门户，相继在大北街、大南街、小南街开设了药铺。

乾隆年间，山西来呼做生意的人较多，逐渐形成帮派。那时，做暗房子生意的“广字号”药庄就是由山西人统管。最早的是广仁号，其次是广恒号、广生号，称之为“三大广字号”药庄。后来，广恒号的大同籍掌柜刘鹤龄另立门户，更名为“广源恒”。这家药铺，约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开业，地址在大北街恒昌店巷西口（现在是百货商店），从业人员二十余名。1910年左右，迁至北门外牛桥路北，由刘健接管。1930年左右，又迁至附近羊岗子，经理叫刘循，从业人员十几名。到1947年，只剩刘景泉一人搭里照外。

乾隆年间，“三大广字号”加“广源恒”成为“四大广字号”。蒙药生意兴旺发达，远销新疆、蒙古等地。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由于战争影响波及前后两营和蒙古的通路，“四大广字号”的蒙药生意受到很大损失，有的歇业。

呼和浩特的药铺很多，凡铺外挂有蒙、藏文招牌的都是经营蒙药的药铺。这里的学徒进店后，都要先进行“三番”学习。即学习藏文、译名、药物名等。学徒的业务人员都会说蒙语，能认识蒙、藏药名。业务人员虽然发音不准，但能与购买药物的人简单说几句买卖语。遇到边远牧区的蒙医，这几句行话就不能应付了，他们就到召庙里请教喇嘛来当翻译。天长日久，喇嘛与蒙药铺的关系便非常密切了。为了搞活生意，使商号兴旺发达，这里的业务员对顾客满腔热诚，一见如故。首先给顾客递上烟，然后

敬上一碗茶，热情招待。并视顾客买卖大小，必要时留他们住宿佳肴招待，目的在于使买卖成交。

业务交易中，蒙药铺都有印刷或书写的蒙药经营手册。如广源恒有二册，《番汉药名》是印刷体，式样与藏经文相同。每一药名有蒙、汉、藏文并列。该册收录药物549个品种。另一册是手抄本，与老式帐簿一样，封面用兰布装订成册。每一药品汉、藏文并列，将汉字译成蒙、藏药名，收录578个品种。其中收录有人骨、人头骨、人胆等7种人体药物（解放后已停用）。蒙、藏医可以通过翻阅“经营手册”选择购药。这样既可解决语言不通的困难，又可防止发生差错。这是蒙药经营的特点之一。

广源恒，春林药房是中、小型蒙药铺。除门市零售蒙药收纳现金外，他们还销售给乌盟、伊盟、锡盟等地。销往乌兰巴托、苏联等外地的蒙药，多数采取赊销、分期付款方法。有的还靠旅蒙商代销代运。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拢络住顾客，但蒙古独立，以及遇有灾难，旅蒙商不能返回内地，给蒙药铺带来灾害，损失极大，甚至破产。广仁号、广恒号就是这样倒闭的。广源恒变产还债，由大缩小，后因不景气改为永春堂小药铺，一直延续到解放。

解放后，永春堂、春林药房一直经营蒙药。1956年两药铺都参加了公私合营。永春堂与广兴泰合并，春林药房与德泰玉合并，广兴泰继续经营蒙药。1958年，将经营蒙药有方的人调入大北街济仁堂药铺，兼营蒙药。1960年，呼市卫生局批准在大南街开设专营蒙药的门市部。为了继承和发展蒙药工作，1963年、1964年先后调入该门市部三名蒙族同志，其中有二名获得了中专学历。

十年动乱期间，蒙药门市部全部关闭，仅在济仁堂内设了一个蒙药组。后于1968年迁到中山东路医药综合门市部内，仍是蒙药专柜。

1982年，综合门市部因拆除改建，在南马路设立医药门市部，兼营蒙药，并对蒙药人员进行调整，加强力量，使蒙药工作有了新的发展。1985年，成立了独立核算的专营机构——蒙药经营部，负责呼和浩特地区蒙药的采集、收集、供应工作。下设中山药店蒙药专柜与南马路蒙药门市部。1990年，对蒙药门市部进行大额投资，新建药店，并加强了人员的配备，蒙药品种也较齐全。

二、各医院蒙药房的成立

呼和浩特市第一家有蒙医药的医院是：玉泉区小东街联合诊疗所。它成立于1953年，创建人是席力图召的一位“喇嘛大夫”。他叫莎拉布朋素格，人称莎拉布。1954年该诊所更名为“呼市小东街联合医院”，医务人员共17名，那时求蒙医治病的人很多，蒙药房只有云丹片1人（现席力图召喇嘛）制剂。1959年10月，该医院与玉泉区医院合并，更名为玉泉区医院。莎拉布任副院长，兼蒙医科主任。蒙医科配套完整，设有诊室、药房、蒙药制剂。1978年，该医院整个蒙医、蒙药科室全部与呼市中蒙医院合并，蒙药房与蒙药制剂室的设备得到了改善，加强了蒙药人员的力量，为呼市蒙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在玉泉区大北街成立了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设有蒙医门诊与蒙药房。蒙药房有包景荣、都格尔扎布等人。1958年，在五塔寺又设了蒙医门诊，负责人为阿拉坦仓。门诊有简易蒙药房。1959年该所又在内蒙古医院（现呼市医院地址）设立了蒙医科，蒙医有敖连和等，都格尔扎布专门负责蒙药配制，后发展为内蒙医院蒙药房。同年，蒙药部分由内蒙古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统一管理，在中蒙医系又成立了蒙药制剂室。直至1961年，内蒙古卫生干部进修学院下马，大部分蒙医药人员回归内蒙古医学院，重新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中蒙医院内开设蒙医科。1964年，内蒙古

中蒙医院将中药与蒙药合并成一个药房，蒙药人员有包景荣、丹金、放德玛、陶克套、宝音图等。

“文革”期间，蒙药人员受害最深。有的被打成“内人党”，有的被下放，蒙药房曾一度关闭，蒙药工作被迫停顿下来。

70年代，呼和浩特各蒙药房相继得到恢复。内蒙古中蒙医院除对原有的蒙药房、蒙药研究室加强外，又于1978年新建蒙药制剂楼，蒙药实验室等，蒙药机构有了新的发展。内蒙古医院的蒙药房，由原来的2人增加至5人。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对蒙药方剂实验室、蒙药标本室进行了充实。又于1991年先后在附院设立了门诊、病房、药房；在中蒙医系院内建成一座综合门诊楼，内设蒙医、蒙药房等。

1981年，呼和浩特市医院为发展蒙医事业，把莎拉布的徒弟丹巴永仁调入。成立了蒙医科，设有蒙药房，专人负责调配，1986年，呼和浩特铁路医院成立了蒙医科，设蒙药房，有中专学历的蒙古族妇女调配。

关于蒙药制剂，解放前一直是蒙医自己配制。他们根据患者的需要，特别是针对牧区的一些常见病，将蒙药自己加工成一些成药。既有利于携带，又便于患者服用，深受牧民的喜欢。解放后，在内蒙古首届民族卫生工作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呼和浩特市医药公司抽调专人，收集整理蒙成药方剂。他们召集了本公司一些有经验的蒙药人员，制定方剂，于1964年由呼市中药厂生产，共试生产了10种蒙成药，试销呼市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深受蒙医蒙药人员的欢迎。于1973年，内蒙古医药公司召集了蒙药人员，并邀请内蒙古医院、内蒙古中蒙医院、玉泉区医院蒙医科等，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与制剂经验的老蒙医药人员，结合本民族用药特点，确定了46种蒙成药方剂。报请自治区、呼市两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正式生产，供全区蒙医使用。

自哲盟通辽蒙药厂建成后，从试产到正式投产，内蒙东部区

蒙医所需药品均由该厂供给。呼市中药厂生产的蒙药相对减少，主要供西部区蒙医的使用。

1978年，内蒙古中蒙医院蒙药楼建成，承担了大量的蒙药制剂工作。他们生产的品种竟达200多以上。不但满足了本院蒙医的使用，还可供应其它单位使用。近年来，该制剂室发展较快，设备亦较齐全，其蒙药制剂居呼市之首。

三、蒙草药

呼和浩特蒙药资源丰富，据资料记载有160种。其中中医与蒙医共同使用的有104种，蒙医专用药56种（不包括新资源）。

1. 植物药（35种）黑苣子 羊角子 辣角子 酸刺子
葵花子 莽瓜子 香菜子 蒿子 兰苻花 蜀葵花 草乌花
小兰花 藜朮花 金针花 黄芩花 豌豆花 扁豆花 背阴草
猫眼草 地锦草 山杏 青蒿 小蜀季 金灯果 青蒿根 山梨
刺柏 萝卜干 兔儿丝 独头蒜 松塔 小白蒿 草乌叶
川柳条 紫檀木

2. 动物药（15种）鹿心 鹿肉 鹿油 鹿血 鹿茸血
驴血 猪血 羊脑骨 蟹肉 狼油 狼心 狐肺 兔子心
鹏胃 鹏粪

3. 矿物药（6种）皮硝 土碱 白锡 禹粮土 万年灰
红铜灰

上述蒙药中值得提出的是紫檀木。紫檀木本产于印度、菲律宾、锡兰等国家。蒙医用此药量很大，唯一途径是进口。旧社会，蒙药人员从民间采买，或购买用紫檀香做陈列器具剩下的下脚料入药。解放后，破“四旧”，从喇嘛寺庙里获得许多檀木制作的佛像与器具作为药用。现在这种药材十分缺乏。

蒙医的特点是自采药物，自己配方，自己制药。根据蒙医方剂学，将蒙药制成剂型，并按蒙医特色包装，外面印刷有蒙、

藏、汉三种文字，标明方剂名称、药物组成、剂量、功能、主治、用量、用法。

蒙药铺里，在药斗子上面均书写蒙、藏、汉及汉语蒙译音字的文字。直到现在，仍沿用着。

蒙药，是蒙古族劳动人民在长期与大自然和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的经验总结。它是中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各族人民的康复保健事业，尤其是对蒙古族人民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自古以来，蒙医药人员精心研究它，取得了很大成绩。

解放前，呼和浩特的蒙药发展缓慢。解放后，对蒙药挖掘、发展较快。特别是对呼和浩特地产药材成份的分析，及有效成份的筛选，有新的成就。如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对草乌叶成份的分析及生物碱的分离，获自治区科技成果四等奖。广枣成份的分析、有效成份筛选及广枣注射液的研制，1985年通过科研成果鉴定。

该院1980年以来，先后将传统蒙药“赞旦古日班”研制成复方广枣注射液，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及冠心病；将“那如苏木珠尔”研制成那如注射液，对坐骨神经痛有一定效果，对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亦有明显的效果。此项研究于内蒙科委通过鉴定；将“扎冲朱苏木”研制成扎冲注射液，临床实践证明注射剂对偏瘫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此项课题列为内蒙科委的重点课题；还用喷雾干燥技术改革了蒙药“三子汤”、“沉香八味散”、“玛奴西汤”、“尹达拉西汤”等十种传统剂型为冲剂和片剂。

四、蒙药文献与论著

在蒙医药发展过程中，流传于世的蒙医药著作很多。内蒙古医学院巴·吉格木德教授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他在《中国医药学报》上曾发表了《蒙医学古典著作考略》一文，较完整地介绍

了23部古典著作的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内容、版本和现存何地等诸方面的情况。但关于呼和浩特的蒙药著作或论述，未见有专篇报告。解放后，1958年，原蒙医进修学校校长古那（后为卫生厅副厅长）同志亲自主持，与著名蒙医善友、于庆祥、包芹轩等，着手翻译整理《蒙药学》。于1960年完成初稿，后经反复修改在1971年正式出版。自1958年至1965年期间，仅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翻译整理的蒙医药经典著作就有十几部，约二百万字，给后人研究蒙药打下了结实的根基。

1965年，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武绍新同志，在《中医杂志》发表题为“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宝——蒙药”。该文从蒙药理论五元学说土、水、火、气、空，及六味的生成、转化、功能、五元素与药性的关系、阴阳二基、八种性然、十七种功效规律等蒙药学理论阐述了蒙医用药，蒙药制剂等。对研究蒙药有一定参考价值。

1972——1977年间，武绍新等同志参加了《国家药典》的编写工作，协助起草药典中的蒙药标准。为了完成此项任务，历时五年，他走访了十几个省区，对蒙药材的产地、沿用情况、真伪优劣等作了考查与鉴别，同期对临床效果及使用办法等方面进行了考证，为蒙药材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老蒙医阿拉坦仓赴锡林浩特参加了蒙医工作会议。为贯彻会议精神，促进蒙医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交流，创办了蒙文期刊《蒙医药》通讯。主要由额尔德尼同志负责。从此《蒙医药》刊物在呼和浩特诞生了。

进入80年代，研究蒙药的专家逐渐增多。随之相继出现了大量的蒙药论著，如《内蒙古药材》（其中含有蒙药材）、《蒙药材标准的制定》、《内蒙古蒙成药标准》、《内蒙古蒙成药标准补充标准》（其中收集到12个剂型，200余种成药）、《内蒙古蒙药材标准》（其中收集322种蒙药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其中药材 2 部、成药九种)、《内蒙古植物药志》(含蒙药)、《中华本草》等大部头蒙药物专著问世。可以说此年代,是蒙药学说兴盛时期。

跨入90年代,蒙药不但在全区、全国倍受欢迎,甚至受到许多国家医生的青睐,1990年4月,日本大阪某医疗代表团来呼访问,专程观看了内蒙古医学院蒙医系的蒙药材标本。1991年日本国某大学也曾到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考察蒙药。内蒙古中蒙医院的“偏瘫丸”在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展出后,有不少学者来函索取。在北京召开的第15届国际矿物学大会,对内蒙古药物检验所康双龙同志撰写的《内蒙古蒙药用矿物的研究》予以录取。在国际盛会上宏扬了蒙药。使蒙药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呼和浩特关于蒙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蒙药业已达到兴盛时期。在清末民初蒙药业逐渐走向滑坡,直至解放以后,蒙药受到政府的重视,才又有了生机。

呼和浩特不但有悠久的研制蒙药的历史,而且有丰富的蒙药资源。近年来,经过对地产药材成份的分析,及有效成份的筛选,有了新进展,成果显著。蒙药文献的研究及论著相继出版发行,有的药材及蒙成药还被国家药典收取,部分蒙药正在受到国内外医务界的重视。

五、蒙药的特点

蒙药有独到的理论、传统的炮制技术和独特的疗效。与中药、藏药、壮药等一样,是祖国药学宝库中一颗绚丽的明珠;是祖国药苑中的一枝古老独秀的名贵之花。在药物学高度发展的现代,蒙药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越来越高。

(一) 别具特色的蒙药理论

蒙药理论,同中药理论有不少相似之处,又具有自身特色。概括起来,蒙药具有五元、六味、二基、八性、十七功效的特点。

1. 五元：认为世上物质虽包罗万象，但均由五个元素，即土、水、火、气、空和合而成。就蒙药而言，地为蒙药生长之基本，水为蒙药生长之必须，火为蒙药生长之热源，风为蒙药运行之动力，空为蒙药发育之空间。所以蒙药亦有五元素的特性。

2. 六味：药物有不同的味道。这些味道的产生，简单地说不外乎是由五元在物体形成和植物成长的过程中，所起的复杂作用形成的。味道虽有各种不同，概括起来基本上可分为六种，即甘、酸、咸、苦、辛、涩，称之为六味。药味之源，除“空”之外而其他土、水、火、气四元素，每二个二素合为一，产生一味。即土和水元素为主。其它元素为辅而产生甘味。甘味具有强身滋补，调和气血，清热解毒，延年益寿的功效。火和土元素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而产生酸味。酸味具有生温开郁、帮助消化的功效。水和火元素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而产生咸味。咸味具有强壮人体、开通郁结的功效。水和气元素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而产生苦味。苦味具有清热降火，燥湿杀虫的功效。火和气元素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而产生辛味。辛味具有驱风散寒、健胃开郁、通经开窍、燥湿止泻的功效。土和气元素为主，其他元素为辅而产生涩味。涩味具有清热降火、燥湿止泻的功效。

3. 八性、十七功效、两基：八性指蒙药的性质，一般分为重、轻、糙、膩、寒、热、钝、锐。具有调节病因所致异常状态，使之趋于平衡的作用。十七效指药物的功能，概括为十七个方面，即柔、重、温、脂、固、寒、钝、凉、和、稀、燥、淡、热、轻、锐、涩、动十七种。两基，是对八性、十七效的高度概括，将所有蒙药归纳为热、寒两大类。临床上，热象病症用寒凉药物治疗，寒象病症用热药治疗。用十七效去克制疾病的二十种基本性质。蒙医学把疾病分为寒热两种，这两种进而分为“赫依”（诸风）、“希日”（温热）、“巴达干”（痰寒）三种。赫依的性质是糙、轻、寒、细、硬、动六种。希日的性质是润、锐、热、轻、臭、

泄、湿七种。巴达干的性质是脂、寒、重、钝、柔、稳、粘七种。统称为疾病的二十种基本性质。

（二）鲜明民族特色的蒙药炮制方法

蒙药应用以生药为主，目的是为了保持原生药的气、味、质等。对部分有毒性，邪气腥味的蒙药，如寒水石、野猪羔等，也做必要的炮制。但炮制的方法与中药不完全相同。蒙药炮制方法大体上分为水飞、砂烫、炒、煅、制炭、制六种。但在制的过程中常常喜欢用羊、牛、马奶和奶油等来解除某些药物的毒性或改变某些药物的性质。例如：寒水石的炮制有寒、热、烈、温、灰、泡等六种方法。狼毒的炮制常用诃子汤煮的炮制方法。一些需要增强滋补作用的药物，如玉竹、黄精等常用牛奶、肉汤等营养品进行炮制。用现代科学理论分析，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炮制方法很有道理。

（三）蒙药传统剂型

蒙药的传统剂型有十种，即汤剂、散剂、丸剂、膏剂、酒剂、油剂、灰剂、掺合剂、草药剂、金石剂。制作方法比较简单，使用剂量较小，一般只有3—5克。不但节省药材，而且生产、携带、保存、服用等都很方便，适应于广大农牧民防治疾病的需要。蒙药汤剂、油剂、灰剂等与中药不同，有其独特之处。例如，蒙药汤剂即煮煎散剂，是蒙药特有的剂型。煮煎散剂是将某一汤剂的药物粉碎成粗末，过50目左右筛，按一次剂量分装，煎煮后，服用汁或连同药渣一起服用。既可以发挥汤剂的速效作用，又可以起到散剂的长效作用。又如蒙药油剂是蒙药所特有的一种内服丸剂，一般用于老人、妇女、体虚者的浮肿、湿痹、肾虚。对白癫风及其他皮肤病、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和某些脏腑之疾病均有较好的疗效。

（四）蒙药材

蒙药取材广泛，包括植物、动物、矿物、海洋药物及化学

制品等共2230种左右。蒙药同其他医药取材的不同点是矿物药、动物药的比例相对偏高。仅从清代著名药物学家占布拉道尔吉所著《蒙医本草》一书即可略见其一斑。该书共收载各种药物879种，其中动物药约占24%，矿物药约占14%，植物药约占62%。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医术交流过程中，蒙藏医、中蒙医相互交流。蒙医药取长补短，除因地制宜自采自用地产药材以外，同时汲取中药、藏药材。常用蒙药材有1340余种，其中300余种属于蒙医专用，中医几乎不用或很少应用。另外有1000余种中蒙医通用，有时藏医亦用。如诃子，除中蒙医通用外，蒙医临床应用更为广泛；肉豆蔻中医煨用治疗脾胃虚寒、肠滑等，蒙医用于治疗心脏病，并用其皮衣治疗“赫依”（风、气、白脉）病。这就说明虽然通用，但是由于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临床实践经验不同，采集加工不同，炮制不同，配方不同，而其疗效就有所不同，所以有蒙药、中药、藏药的区别。

（五）蒙药临床用药特点

蒙医在治疗单纯一种病时，除几个方剂可以同时使用外，往往剂型也交替使用，特别是一日的用药特点更为突出。蒙医不是在早午晚三个时间给病人服用同一药物，而是根据病情和患者机体情况，对同一病人在不同时间里分别服用不同药物。例如，偏瘫是很难治愈的疾患，据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报道，对于偏瘫患者常常是早晨服用“额日软——乌日勒”，晚上服用“日迪——13”，经2—3个月治疗均可基本治愈或大为好转。又如草乌不仅是蒙医的常用药物（约在17%的常用方剂中都含有草乌），而且使用生草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药用部位方面，不仅用根，而且用叶、芽、花、全草。凡用草乌，均配诃子，用诃子解草乌毒性。这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看，很有道理。因为诃子中含有大量鞣质，它可使草乌中的乌头碱类生物碱形成难溶性沉淀物，而乌头碱的鞣酸盐沉淀，在适当的PH溶液中又可释放出乌头碱类。正因为蒙

药在组方时，重视了药物间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所以蒙药具有高效低毒的特点。

近代土默特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彭 勇

一、婚俗

为明晰起见，现按整个婚姻过程的先后顺序分述如下。

媒妁：按近代土默特蒙古人的婚姻习惯，男女青年在订婚之前，须由男女双方父母来主持其事，双方青年从未谋面。由男方找一媒人到女方家求亲，当然男方家里早已耳闻或目睹女方的家境、为人和人品等情况，愿意与之结亲。经媒人说项后，如女方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媒人即回报男家，求亲即告成功。

定亲：双方对亲事均无异议时，再由媒人往来于双方，共同商定一个吉日举行定亲仪式，俗称“下定”。下定又分为两个程序：首先由男方托媒人带白酒一瓶、羊肉三斤或一条羊腿、五十个白面点心（即大馍），一只手镯（或其它首饰）到女方家定亲。女方父母收下礼物，此即为“小定”。其次，男方二次托媒人带着较上次贵重之首饰、一只熟羊背子（即羊五叉）、五十个大馍和一对白面蒸熟的喜兔、一瓶酒、两块哈达赴女方家。女方受礼后，用红线将一只喜兔套脖栓住，以示接受定亲。接着设宴招待媒人和女家之近亲。在宴席上，媒人和女家之办事人，互相问清男女青年的生辰八字，并商定“彩礼”。“彩礼”可多可少，视男女双方具体情况而定，亦有女方不要“彩礼”者，但男方也要主动给女方一些礼物，女方亦要给男家一些聘礼。当媒人返回男家时，要将男方带来之白面点心的一半和喜兔两个作为回赠交媒人带回男家。男家接到回赠的喜兔后也用红线将其套脖栓住，以示喜事栓定，不会再发生变卦。接着，让男方青年（即未

来新郎)吃掉这对喜兔,表示这门亲事已经大功告成。从此,男女双方绝无反悔。此仪式即为“大定”。

择日:请人选择吉日定为婚娶之日,一般要请喇嘛来选择。择日后写成文书,托媒人送交女家,对方同意,娶聘的日子就算定了。男女两方即开始准备婚礼,嫁妆以及各种结婚用品,并通知近亲密友届时贺喜赴宴。娶亲礼物通常有耳环、手镯、戒指等首饰,以及女方四季的衣服。陪嫁物一般仅备梳洗化妆用品、随身衣服及皮箱、柜子等。

娶亲:在正式结婚典礼的前一日,先着礼服行祭祖之礼,然后再出发娶亲。新郎一般着鲜艳的绸缎长袍、马褂、腰系红(或黄、蓝)色绸腰带,头戴圆顶红缨帽,脚登牛皮靴(或大绒靴)。左肩挎弓,腰系箭囊、囊中插五支箭,腰带上系绸缎绣花的鼻烟壶袋,胸前揣哈达。陪同新郎娶亲的还有伴郎、大戚(娶亲的长辈贵宾)和数名男性陪同人(一般总人数为双数),皆着节日盛装。娶亲的一行人在出发前,与新郎一同吃“上马饺子”。吃毕,一行人皆骑马,随行还有一至两辆轿车,其中一辆用红毡蒙罩,以备新娘乘坐。同时还牵一只“碰门羊”(活绵羊),一副羊五叉、一瓶酒、五十个大馍。

迎亲:当新郎等人快到女方村舍时,女家要派人跃马迎接,表示“迎亲”。新郎一行来到女家院门,将所携礼物放于事先备好的方形八仙桌上,女家受礼后,新郎等方可入院。

请安:新郎进院后,首先将新娘卧室的一眼窗户打开,把所携弓箭挂在窗户上,然后才能进入卧室。新娘躺在卧室的炕角,捂着脸,面墙在低泣,旁由五、六个姑娘围坐以陪。新郎和伴郎手捧鼻烟壶,先拜见陪坐之姑娘,并向他们一一请安问好。然后再到别屋去拜见新娘的家长、亲友,并依次请安、行礼。礼毕,新郎等娶亲者被邀到迎亲之屋喝茶小憩。

满酒:喝茶后女家即设午宴款待。每上一道菜,新郎和伴郎

即手捧哈达向新娘家长和亲友献哈达并逐一敬酒、叩头。大戚唱起蒙古歌曲，祝愿女方家长、亲友幸福长寿。

讨封：晚上，在新娘卧室的炕桌上摆上羊五叉（杀碰门羊后煮熟的全羊），数名陪新娘的姑娘围坐桌旁，地上站新娘之姐济（嫂子）、姐夫等同辈。新郎单腿跪炕沿边，以刀割羊五叉，每割三下吃一口肉。陪坐之姑娘，同辈等趁此机会用针等物将新郎的袍褂与炕毡串扎起来，使新郎不得自由行动。时间长了，新郎即手抖脚麻，人们以此取笑新郎。接着便是求问新娘的芳名，俗谓“讨封”。其实，男方已早知女方的名字，而双方心照不宣。多此一举，完全是为例行礼仪而已。女方故作冷淡，以拖延时间。甚至，还有意出些难题给新郎和伴郎，实际上是对新郎、伴郎才智、口齿、性格、诚意等的一种考验。若答不出来时，则罚唱、罚酒、罚叩头，耍笑尽兴，方才告以名字。

系腰带：讨名后，即由内弟辈为新郎行系腰带之礼。内弟们拿出女方为新郎准备之腰带，使尽全身之力，一圈一圈地将腰带紧束于新郎腰上。新郎则想办法使之不能束紧；或憋足中气，或插手于腰中，这也是一种耍笑新郎的活动。耍笑活动往往要举行到夜深方罢。

送陪嫁：在新郎来到女家之后，女家即派车把陪送姑娘的嫁妆、衣物、箱柜等物送往男家。同时请一位老年妇女（称毕力更老妈妈）随车去往男家。一方面是为经管这些物品，更重要的是在各方面给新娘以指点、助女劳作；遇事调剂其间，以助成夫妻、婆媳间的和睦。

送亲：第二天即正娶的日子。姑娘清早打扮后，身着绸缎彩袍，脚采绣花缎红鞋，头戴红缨帽，罩上筒状蓝面罩，或以蓝布长筒（蒙名补勒）从头罩住全身，手拿一双筷子和少许食物。由姑、姨夫抱出卧室。上车的时辰是予先请喇嘛看定的。出门后，将筷子和食物扔在门前，表示不忍带走娘家的福禄。

射该：新娘出卧室后，同新郎各骑一马，一前一后由新郎牵引，到院墙外绕一圈，以示留恋。然后新娘下马上车，坐在车里独自低泣，以示不忍离别父母。新郎则拉开弓，按喇嘛指定方向射一箭，俗谓“射该”，即“射灾”之意。后将弓箭系于新娘的喜车上，以驱邪避灾。新郎前行，喜车即可启动。随往的还有与娶亲队伍对等的送亲队伍。

刁帽子：男方家估计娶亲队伍即将归来之际，先派四、五个善骑健儿前去迎接。并带一羊头、一瓶酒，一条两头系有哈达的木椽，将木椽横放道上。当娶送亲的一行来到椽前时，皆下马，迎亲健儿将酒洒向喜车与马头马背，并向送亲人一一问好。然后将羊头扔掉，三股队伍一齐上马，跨过木椽奔向男家。在途中，男女双方的队伍互相纵马竞赛，看谁先到家，同时互相刁抢帽子，互相嬉戏。

撩油：喜车将要到达门前时，点燃立于门旁的草把子。婆母以勺往草把子上撩油以助燃。口中念吉祥语：“一勺勺，两勺勺，来年生个胖小小”等。

拜神：男方在院门口等着，四至十位男女迎亲者，各以对等身份导入新娘一行后，院内鞭炮齐鸣。新郎和新娘则踏红毡至神位，跪于神位前行礼。神位前置银杯一对，内盛牛奶，行礼毕，主持此仪式之长者，将杯分别递给新郎与新娘使饮之，饮半时互换而饮尽，以示和气。饮牛奶后，即由男方近亲抱新娘入喜房，坐于洁白的炕毡上。新郎以箭挑去罩面之筒罩或身罩。

梳头：新娘由梳头妈（蒙名胡土额吉，汉意为福祿母亲，一经认定即终生来往、谊如亲生）以线为之剃面，名曰“开脸”。然后梳头，将原发式分作两半，结为两个鬢髻，表示姑娘已成为新妇。

拜灶：灶前设香案，案上条盘内盛羊肉、冰糖、红枣、奶酪、奶油、点心诸物，外苫哈达。案前铺羊皮或毡毯。还备有一

白布口袋，两侧各有口，可伸入手，以红布剪日、月形，日形在左，月形在右，贴于两侧之入手处，灶内点燃旺火。新娘由同属相之老妇扶着与新郎同跪灶前，新郎膝压在新娘之袍褂边，以示男贵女贤，新郎与新娘分别以手伸入白布口袋的日月形入口处，两手互携，以示同心同德，共同拜灶。老妇捧所供之条盘，在二新人前左转三遭、右转三遭，二人取条盘内各种祭品少许投入灶中。老妇口念吉语，一旁还有喇嘛诵经，祝新人真心相爱，幸福吉祥。二新人叩头，礼毕将盘供于灶前，男女双方合饮一杯喜酒，双方相互施礼，由新郎导新娘入喜房。

拜天地：庭前置一木桌，旁生一火盆，桌上香斗、蜡烛、明镜复以红布，弓箭、羊骨、五叉上苦哈达。二新人先跪拜天地，后拜公婆，次按尊卑对亲属一一拜之。尊亲一一上坐，并赠新妇银钱等物。接着酒宴开始，二新人每上一道菜须敬一次酒，行一次礼。

闹喜房：新娘娶回到此时才可耍笑，宴席后新娘要回喜房，房外同辈则把关作难，要新娘唱情歌，说绕口令，新娘则给同辈赠送一些亲手缝制的褡裢、烟荷包、以及冰糖等，进房后继续耍笑一直到深夜。

掏灰：次日晨，由毕力更老妈妈引导新娘逐屋生火，先己屋，后公婆屋，次本族近亲，以表示尽媳妇本分。生火必先掏灰，灰中公婆早埋有银戒指或玉耳环等首饰，以示灶神赐给新娘的福分。

拜人：中午，二人向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按辈份顺序一一叩头参拜，实际上是新娘认识亲属的礼节仪式。受拜者向新人赠以首饰及银钱，俗称“放拜礼”。小辈近亲则要向新娘新郎行礼，二新人受礼后也要放拜礼。通常是将新娘亲手所做绣花鞋、褡裢、烟荷包等赠予对方。这两种礼合起来亦叫“认大小”。接着便是开酒席宴客，送亲者在酒席后致谢道别准备起程回去，男方

家则对送亲者，再次一一敬酒致谢。

认亲：娶回新娘的第三天，新娘的近亲要前往新郎家认亲，男方称他们为“伊尔格沁”（即来会之宾或探望者）。来者包括新娘之父母，叔伯、姑嫂、哥哥、舅父母、姑父母、姊父母等。他们成群结队，有时竟是几十人的庞大阵容。迎进屋后，互敬哈达，互换鼻烟壶，先茶点后设宴招待之。宴上互相介绍认识、敬酒、尽情欢饮，席散即归。

住对月：新娘在男家住一月之后，即回娘家住一月，毕力更老妈妈亦完成任务随回，即所谓住对月。新娘离开前给男方本族长辈行礼，回来后仍行礼。（注：生子后则可免去此礼）。住对月时新娘要做很多新鞋，回来后送给公婆及长辈近亲穿用，以示尊敬长辈、勤劳不懈之意。

二、丧葬

土默特蒙古的丧葬习俗在明代前多为野葬，又称天葬、生葬、弃葬。即将死者放在车上或马背上，送到偏僻荒野任禽兽啄食。其意是死者生前吃食禽兽之肉，死后仍将己肉还给禽兽。这种葬俗在进入明代后渐废。从明中期起，则以火葬、土葬为主。故特将后二种葬俗分别介绍于后。

1. 火葬

又称熟葬，一般多为王公贵族、大喇嘛、官吏等富裕之人所采用。普通老百姓死后，也有火葬者，只是仪式物用较简俭而已。清末时，火葬在老百姓中已很少实行，只有喇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仍实行。

在人死后或即将咽气时，脱去随身之服，换上绸缎新装，或用白色绸缎裹其身，将死者盘膝坐于三尺大小的正方形“轿式”棺木（蒙语称“散德勒”）中，两手相抱于怀中，头以枕头或其它

衣服支垂于胸前。口中含以玉，或金银类物，手边放些死者生前

所喜爱之物。把轿式棺木封盖后，死者亲属即可举哀嚎哭。

在出殡时，“散德勒”前由孝子牵一全鞍粘的“引魂马”为前导带路（贫者以纸马代之）。“散德勒”后，为家属及喇嘛、乐队，再后为一般送葬亲友。

至火葬地时，将“散德勒”置于柴堆上。点火时孝子们向死者叩头后归家。葬处有专管火葬者守之。加油点然后，直至全部烧尽乃止。喇嘛则在场颂经，为死者祈祷，愿死者尽快“升天”，早入“极乐世界”。

第三日晨，其亲属每人带一白面薄饼、筷子一双（其两头包以金银箔）赴火葬处，以筷子夹骨置于饼上，但须从头至脚依次序而放，再依序放入瓦罐或木匣中，以饼填满，埋入家族之老坟。坟上不植坟树，只在上插以木杆，上挂布旗，旗上写有经文。故土默特蒙古之所谓火葬，其实是火土混合葬。把什村前六十多年时仍是此种葬法。云社堡村云某氏在七十年代迁坟时，发现其前三四代人即是此种葬法。

2. 土葬

土默特蒙古实行土葬最早始于元代，明代仍沿用之。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死后即用土葬。后安照达渎喇麻三世筑有善造之意，以佛教仪式将其骨殖重新火化。于是火葬之风始行。进入清代以后，土葬与火葬同时并行，民国后多行土葬。

在人死或即绝气时，家人至亲立即为之更换新装（即装老衣）。死后停于木板并以哈达罩面，殓衣以兰色、紫色为主，忌皮毛及黑色。口含以金银或铜钱，怀揣打狗饼，腿加绊，孝子至亲朋家报丧。

在黄昏时入殓（忌太阳），棺木与汉族同。请喇嘛择日出殡，一般为三、五、七日，亦有七七四十九日者。

出殡时，也有棺罩、吹鼓、长孙扛引魂幡（树）之俗，亦有长子扛大头，其它人抬两旁及小头之俗。丧服早为黑色，后来有的地方受汉族影响也有服白色者。因土默特蒙古的土葬俗大部分与汉族同，故不详记。

三、衣、食、住方面

1. 衣着打扮

清代以前，土默特蒙古人穿蒙古袍、系腰带，穿皮靴，俨然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打扮。进入清朝后，由于清廷政令习满族服饰，故衣着打扮又近似满族式样。再后由于土地的被开垦，汉族人民大量涌进土默特地区，土默特蒙古的生产方式亦由牧转农，衣着打扮亦向汉族转化不少。穿短衣者渐多，妇女改变则少，梳“两扮头”、穿长袍，不系腰带。到清末时，大多数人与汉族服饰已无异矣。但土默特蒙古妇女历来都是“天足”，即不缠小脚。男孩幼时，留卤前一小撮头发，名曰“马鬃”；十二岁到奶奶庙还愿后，始留发辫曰“十二和尚”；有佩带银、铜锁者，十二岁时开锁，从此再不佩带，谓之“园锁”。十五岁时，又为比丁之年，多留满头发，父兄为之加缨帽，是谓“成丁”，即已够了服兵役的年令。

2. 饮食

清朝以前，土默特蒙古的食物是以肉奶为主，佐以粮米。入清后，由于土地开垦、牧场减少，饮食结构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食粮为主，佐以肉奶。喜吃羊肉，如手扒羊，平时还有黄油、奶皮、奶豆腐、酸奶子吃，也吃奶茶、炒米等；喜饮酒，主要是白酒、马奶酒、黄酒等。过节和待客还吃羊背子、油炸馓子等。进入民国以后，则以吃粮为主，以上食品仅过年过节和待客用。

3. 住宿

土默特蒙古从明代起就有了住土屋者，称为“板升”，主要是向汉人学来的。进入清代以后，由于从游牧转为务农，便大多住上了土屋。家家进门后一半是炕，一半是地，锅头的烟火穿炕而过而进入烟囱，冬取暖、夏防潮，俗谓“家暖一盘炕”。亦有少数纯蒙村仍以牧业为主，如东甲兰营子，夏秋牲畜在外时，亦设帐篷在外居住，直至民国初仍如此。

土默特蒙古虽亦住土屋，内部陈设与汉族无大异。但明显不同点是：家家都供神佛，富者于院之西北房，贫者于正屋之正堂立龕、奉像或悬挂佛像。

四、其它方面

1. 语言

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完全以蒙语为日常用语。无论家庭、社会均以蒙语会话，言谈中如掺杂汉语，当即会遭到长辈的斥责和同辈的讥笑。至清朝中期后，本地区汉族人渐多，土默特蒙古的语言逐渐开始汉化，蒙汉杂居村尤甚，纯蒙村汉化较晚。如土左旗把什乡的沙尔沁村为纯蒙村，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时的中年人甚至少年，均通蒙语；老年人虽会说些汉语，但话很僵硬。王毕斜气是纯蒙村，在民国十多年时，老年人说汉语仍不太纯熟。善岱乡保同河村为蒙汉杂居村，蒙古族老根，生于咸丰八年(1858)，已不会说蒙语。

到现在，土默特蒙古虽已不用蒙语对话，但在日常用语中仍保留着不少蒙语单词：如称父亲仍为“阿爸”，称母亲为“额吉”，称姐姐为“哥哥”，称嫂子为“姐吉”，称叔叔为“伯伯”，称偷窃等行为不正者为“忽拉盖”，称互相谈话为“倒

喇”，称头颅为“天灵盖”等。

2、信仰、祭祀

明代中期后，土默特蒙古在阿勒坦汗的提倡下，信仰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入清以后，清统治者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进一步倡导与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喇嘛；因而土默特蒙古中，几乎每一家族中都有一至几人当了喇嘛。民国后出家当喇嘛者渐少。土默特蒙古称喇嘛寺庙为“召”，如大召、小召、席力图召等，虽然这些喇嘛寺庙清统治者都曾赐名为“××寺”，但土默特蒙古一概称之为“××召”。土默特蒙古人也信仰道家诸神，更信奉关羽，关帝庙（亦称老爷庙）几乎村村皆有。

土默特蒙古在祭祀方面不同于其它民族的主要有祭脑包（亦称鄂博），“垒碎石或杂柴、牛马骨为堆，位于山岭或大道……如遇有疾病、祈福等事，辄唯鄂博是求。寻常旅行，每过其侧，亦必跪祷，且累石其上而后去。”脑包一般有官、私、公三种。官脑包多在本旗边境与他旗分界之处，如白云鄂博、克抽鄂博等，每年例由副都统或派其它官员逐一致祭。其所在地之参领佐领等官员，亦须前往助祭。实际上，有勘界巡边之意。民国后废之。私脑包为某家为祈福或攘病而垒之者，附近之人谁家有灾祈福等活动亦可随时去祭。公脑包为一村合祭之地，其祭品多用羊，由村人集资购备，其它开支亦如是。公推年高德崇者主祭，事毕，不分老幼，皆席地而坐，分食祭品。民国后，祭公脑包和私脑包的活动仍在举行，只是祭品或形式略简而已。现在某些纯蒙村如讨思浩乡上达赖村，每年大年初二晨于北山之下垒一大旺火，全村人皆焚香鸣炮而祭之。

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

于永发

家谱，亦称宗谱、族谱、家乘，是记载一姓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是史志的组成部分。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在《史集》中说：“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记住自己的族源和氏族的习惯”，“他们都有一个可以查问出来的清楚明白的系谱，因为蒙古人有一种记住自己祖先来源的习惯，他们对每一个新生的孩子说明他是哪一族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它的来源。”这里说的是元代蒙古人的情况。元代以后，蒙古族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却依然保持了记住自己的族源和氏族的传统，例如鄂尔多斯的达尔哈特们，现在仍能明白无误地说出自己属于哪个氏族。现居土默特右旗的韩姓蒙古族，亦牢牢记着自己属于哈达赫氏族。对于土默特蒙古族来说，入清以后，由于经济上丧失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文化上沦失民族语言文字等原因，大约从清季以来，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说不清“自己的氏族”和“它的来源”。尽管如此，上自达官、富室，下至普通百姓，许多人依然保持了“记住自己的祖先”的传统，而且把口传变为笔录，一代接一代地续写为各自的家谱。

现存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大致可分为两类，即清朝以来拥有世爵（如公爵、子爵、男爵和台吉等）和世职（如都统、勋旧佐领、世管佐领、骑都尉、云骑尉等）官员的家谱，以及一般蒙古族的家谱。

世爵、世职官员家谱

这类家谱主要是为承袭爵、职而形成的。按清朝的规定，凡世爵、世职官员出缺（即死亡、病休或革职）后，承袭爵位或官

职须向朝廷呈报家谱。《理藩院则例》载：“内外扎萨克及闲散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如遇出缺人员无子，将其亲兄弟造谱全数报院请旨承袭。如无亲兄弟，将立官名下支分全数绘谱报院，恭候钦简。以上各谱均须将曾经获咎及残废者详细声叙，毋许含混。”又载：“凡世管佐领缺出，其子孙无论有职无职，年未及岁，俱拟定正陪，奏请承管……将原立佐领之子孙按其名数，于家谱内尽行书写……驻防外省文武人员，如分应拟正者，先将家谱进呈……其承袭世职俱照此办理”。这类家谱均一式三份，一份呈报理藩院（或兵部），一份留旗存档，一份由袭爵、职者保存。可见这种官员家谱纯系因袭爵（职）而形成，是袭爵（职）的重要依据之一。据调查，个人保存的这类家谱多已散失，仅在土默特历史文献档案中幸存少部分。文中所附谱一至谱五均录自上述文档，惜随谱的承袭（管）的奏摺毁损甚多。现就各谱作些必要的说明。

谱一：《土默特辅国公贡格巴勒家谱》

此谱系土默特辅国公喇嘛扎布之谱系。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喇嘛扎布，土默特人，姓博尔济吉特，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坦裔。”故此谱实为土默特黄金氏族之一支的谱系。喇嘛扎布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擒青衮扎布功，封扎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因“不入觐”、“恣意妄为”削扎萨克，成为闲散公爵。喇嘛扎布以前的传承关系《王公表传》不载，依《金轮千幅》等书所载予以补充（详见家谱及注释），以明其源流。辅国公一系，另有一四等台吉兼勋旧佐领，属左翼三甲，谱内未载。

谱二：《二等台吉勋旧佐领玛尼巴达尔家谱》

元代以迄明清，蒙古人非黄金氏族不得称台吉，故此谱亦为

土默特黄金氏族之谱系。据玛尼巴达尔之族侄包文华（世居和林格尔县台吉营子，八十余岁，已故）说，包（薄）家与后山辅国公系本家。民国初年往来还较密切，以后各自的经济状况不佳，彼此便不通庆吊了。据此可知，玛尼巴达尔一系确为黄金氏族，但谱内始祖丹巴尔扎木素之父祖为何人，属阿勒坦汗后裔哪一系尚待确查。丹巴尔扎木素一系拥有两个勋旧佐领，即左翼四甲一、二两佐。佐领皆为世袭二等台吉，其中第一佐（佐领图森额）在清编《土默特旗志》中写作世管佐领，究系笔误或另有原因，待查。

谱三：《世管佐领福克津额之系谱》

此谱系土默特左翼首任都统古禄格之谱系。据《王公表传》载：古禄格“其先本姓土默特，因灭扈伦四国之纳喇部，遂以为姓，世居叶赫部。古禄格以叶赫部亡，往依土默特博硕克图汗于归化城”，为头目。博硕克图汗（卜石兔）1613年至1628年在位，古禄格当在此期间从扈伦四部（即叶赫、乌拉、哈达、辉发）的住居地松花江中游投奔到土默特部，受到博硕克图汗的信任与重用。天聪六年（1632年），古禄格与俄木布、杭高、托博克、诺尔布等集众降附满洲（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清廷以其“收抚散民投诚有功”，授予一等男爵（顺治二年晋为三等子爵）、左翼都统。从此，古禄格及其子孙成为土默特两翼显宦。古禄格一系除上述世爵、世职外，尚有一个三等男爵（乾隆二十八年裁撤两翼都统后改授）和两个世管佐领，即左翼三甲一佐和四佐。此外，乌布什第一系于康熙五年（1666年）奉旨赴京，编入蒙古正白旗。此谱续写于1925年，系呈请袭授福克津额出缺之世管佐领。呈报蒙藏院的底谱，对“无分”支派之子孙并未尽录，如丹府一系（锡拉补支派，隶蒙古正白旗）之福明额、安续、福升额、福忠额四门均未入谱。

谱四：《世管佐领多尔计云隆之家谱》

此谱系土默特右翼都统托博克之谱系。托博克是继杭高、巴桑之后的第三任右翼都统。清高宗弘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一道谕旨里说：“现出归化城都统班达尔什员缺，此都统原系伊祖杭高功绩所立，后因伊子以军务获罪革退，始将别支托博克补授”。可见杭高与托博克属同一家族，即巴拉格特氏（《王公表传》作博尔济吉特氏，误）。托博克一系是仅次于古禄格的土默特显宦。据《王公表传》等书载，托博克家族共有两个三等男爵（康熙九年诏加三等男爵，乾隆二十八年裁撤都统后改授三等男爵）另有三个世职。即一个轻车都尉，两个世管佐领。此谱约形成于光绪年间，共录十一代人，前后历二百六十余年。托博克之后裔，即呼和浩特之巴姓、经姓、吉姓，以及和林格尔境内之巴姓。

谱五：《世管佐领纳逊家谱》

此谱所载第一代世管佐领阿瑚，系天聪六年（1632年）与俄木布、古禄格、杭高、托博克、大诺尔布、小诺尔布等一同降附满洲的土默特部二十余名首领、头目之一。据王氏《东华录》记载：崇德二年（1637年）六月，“授土默特部章京古禄格、高杭、陶克图美、多尔济、特济拜、都喇、大诺尔布、小诺尔布等二十一人世职”，阿瑚就是这次被授予世管佐领的。清朝中叶，土默特两翼由二十佐领发展到六十佐领，阿瑚所得佐领人丁并未增加，一直属左翼首甲第二佐。民国以来，该佐变更为第三佐，原因不明。阿瑚一系至1913年的二百八十年间，共十二代人，袭授佐领十六次。

以上五谱图同属官员家谱，其共同特点为：

一、各谱多以得爵（职）者为始祖，如谱一以喇嘛扎布为始祖，谱三以古禄格为始祖。

二、严格按照清廷对袭爵（职）的规定造谱。如《理藩院则例》规定“凡勋旧佐领、世管佐领其原得佐领缘由……具奏”，“承管世职俱照此办理”。各谱均遵令在得爵（职）者名下注明得爵（职）时间及原因。另外，按照《则例》关于“各谱均须将曾经获罪及残废者详细声叙”的规定，特别注明某人因何获罪革退（如谱二巴达尔户名下注明“因未服哨卡之差罢革佐领职”）。又如《则例》规定“孀妇准过继独子为嗣”，“若非亲祖之子孙只准承祀为嗣，不准承袭职衔”。谱三丹津无嗣，奏准过继古禄格长子乌珠木之曾孙扎锡泰承嗣，并承袭三等子爵即属此例。《则例》还规定“将袭次佐领与家谱一并进呈”，各谱承袭世管佐领者无一例外地在其名下标明“一次世袭佐领”、“五次袭佐领”等字样。

三、各谱均以出缺者之名命名家谱，如谱一称《贡格巴勒家谱》，而不叫《喇嘛扎布家谱》。原因是贡格巴勒出缺后，报院呈请由其子色楞鲁汝精扎布承袭公爵。反之，当贡格巴勒袭爵时，报院的家谱则名之为《根闾勒多尔济家谱》。

四、世爵（职）官员之家谱，由于每承袭一次，必须报送一次家谱，而造谱者均为旗务衙门的笔帖式（或其下属）。以前各代，一般是抄自存案之谱，往往因辗转抄录而造成差错，这种情况多数谱内皆有。如谱四瓦瓦名下的说明文字中说，“此佐领于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奏准……与伊胞弟谷鲁管理此属目”，这显然有差误，因为谷鲁于康熙十五年袭右翼都统，二十年病故，怎么会在九十八年之后“管理此属目”？另外，名讳的书写错误亦颇多。

一般家谱

据近几年的调查，过去较殷实的土默特蒙古族大多有家谱，存放于神堂之中。解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的淡化，神堂陆续拆

除，相当一部分家谱随之失落。文化大革命中，家谱被视为“四旧”，受到无情扫荡，幸存者百无一二。

谱六：《达尔架之家谱》

这是唯一从民间收集到的家谱。该谱由达尔架八世孙、世居达尔架小东营子的道尔吉老人珍藏。谱内共录八代人，约起于乾隆年间，迄于民国初年，共历一百七十年左右。原谱一至四代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第五代以下，均用汉字书写，第八代有的人名以钢笔填写。谱内无一人曾经为官（笔帖式以上官员），显系普通披甲之家谱。该谱所载，二至七代均有人出家当喇嘛，其中第七代兄弟八人当喇嘛的竟占二分之一。

谱七：《荣门家谱》

此谱抄自土默特文献档案，系察素齐西园子“喇嘛家”之家谱。该谱约起于乾隆年间，迄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共录九代人。

“喇嘛家”自第二代至第八代，均曾有品位不等的官员（从九品笔帖式到三品参领）。其中第六代有两任参领，因而该家族虽非世职、世爵员官之家，但在土默特两翼，也称的上是官宦之家了。因其代有官员，故而家资颇丰。据有关档案记载，二十年代荣氏各门析产，曾向土默特总管署呈报有关资料，家谱为其中之一。家谱书写于白麻纸上，字体颇拙，显系抄自家藏谱牒，而非出自文吏之手。该谱除注明某代某人所任官职外，还注明某人得过产户口地亩等内容。引人注目的是，该家族当喇嘛的也较多。其中第五代兄弟三人，即有二人系喇嘛，故以“喇嘛家”著称于当地。

谱八：《五里坡村多庆宗谱》

此谱共录七代人，约起于嘉庆年间，迄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多庆原系十里坡村百岁之次子，过继给长门满喜承嗣。三十年

代，因继承家产引起纠纷。此谱系呈报总管署的诉讼材料之一。从内容看，此谱当为根据口传忆写而成，仅用作证明传承关系，故无任何说明文字。

以上三谱较官员家谱的时代都晚，从书写格式和内容看，显然是在官员家谱影响下形成的。据以前见过若干家谱的老年人讲，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大多与此相仿。可以说谱六、谱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上述各谱可以看出，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各谱均未注明各自“所由出生”的氏族。不论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或别种原因，说明土默特蒙古族自入清以来，已不甚注重“自己的氏族”和“它的来源”。以致多数人最后竟说不清楚自己出身的氏族。

其次，各谱均以入清以后的某一代祖先为始祖。清朝以前的历代祖先均未述及。如谱二，虽系黄金氏族某一支系的宗谱，因未列丹巴尔扎木素父祖名讳，竟难以与土默特部著名首领阿勒坦汗排列传承关系。该谱第六代贡布扎布旁注：“乾隆五十三年，因老珍国初来归，赏其孙贡布扎布为世袭台吉，世袭罔替”。可以说明1632年与俄木布等一同降附满洲的土默特首领中，有老珍其人。这只能推知老珍与喇嘛扎布的曾祖父诺尔布为同代人。老珍之父丹巴尔扎木素，与诺尔布之父为同辈或同龄人。老珍父子究系阿勒坦汗诸子哪一系，则一无所知。别谱亦然。

再次，各谱所载过继承嗣、乏嗣的内容，表明土默特蒙古族极重视子嗣的延续。如谱二，丹津乏嗣，过继长门之扎锡泰为嗣；扎锡泰之子福宝乏嗣，再过继长门之禄布森多尔济承嗣。谱三，班达尔什乏嗣，过继三门之赛音尧什图为嗣。有的不采取上述办法，而以招赘上门女婿延嗣。如谱六，钟扎布招赘特古斯吉尔格勒继嗣。荣门第五代以下，均系特古斯吉尔格勒繁衍的后

代。此外，还有出嗣外姓的，如谱五的阿克敦布及其侄德力格尔，谱六的丁补楞等，均为他人继嗣延续后代。倘若不以绝嗣为意，则断不会有此种现象。

第四，谱内虽有记事，亦仅只得（失）爵（职）的缘由，以及注明身份（如参领、喇嘛）而已。另外，妇女一律不入家谱，为重男轻女观点之反映。

第五，各谱均为图表式，系受旗人（满族）家谱影响形成，而且以左为长，与汉族的以右为上不同。多数家谱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光绪末年续写之谱，则一律用汉字填写。土默特蒙古族沦失民族语言文字之状况于此可见一斑。

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是研究本地区社会形态、经济演变及人文状况的重要资料。其社会意义首先在于经济方面。有的家谱特别注明某人“得过户口地亩”，原因何在？清代雍正、乾隆两朝，大规模开垦土默特牧场以后，两翼“官无俸，兵无饷”的规定并未改变，只是按职位高低，拨给官兵数量不等的户口地亩，以资当差从征，赡养家口。但是，蒙古兵丁当差频繁，无暇耕耘，也不善耕耘，只的出租土地以租资自养。从大量乾隆年间的土地契约看，蒙古族所得租资既少，“许退不许夺”的永租地又多，这便导致了土地的沦失。愈往后，蒙古兵丁的户口地愈少，生活亦愈困难。于是，渐渐感到地权的重要，视地亩为命脉。这便是前述注文产生的原因。汉族农民向来以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根本。故而来本境落户者，无不千方百计占有尽可能多的土地。清代以迄民国，本地汉族富户的地亩，无不是以正当或不正当手段（如架买架卖、越界开垦，假约强占等等）得到的。而许多蒙古族到后来只能收取些微小租子。土默特地区土地关系的变化过程，在似乎与土地毫无关系的家谱中，也得到了曲折的反映。此其一。

其二，从一定意义上讲家谱似为达官富户所特有。清代土默特两翼，虽然官无俸（指世爵以外各官），但为官者（主要是都

统及参佐领)往往也是巨富者。这是因为,官愈大,户口地亩愈多;而且凭借权势可以敛财。故而,嘎勒达和章盖们,在归化城或乡间都有高门大院、铺产及大量土地。如旧城太官巷内就有“吉老爷”、青山嘎勒达等四家参领的砖木结构府邸;小召三道巷、美人桥、杨家巷及九龙湾大西巷等处,也有参领们的亭子房。左翼都统府的土地,甚至扩展到右翼萨拉齐厅一带。一般兵丁则“衣食多缺”。他们升任参佐等官的机会绝少,也无造谱袭职的实际需要。修立家谱的,自然较官员之家为少。即使有些披甲曾有家谱,也因当差、贫困等因而中辍。因此,富贵之家拥有家谱,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产物。

其三,土默特蒙古族家谱截止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原因之一是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民国初年,绥远当局制造出“土旗蒙古要叛逃外蒙”的谣言。在软禁各参领,解散土默特步、骑两营的同时,对各村蒙古族的压迫歧视亦日益加重。蒙古族进出城门、关卡,不说蒙古二字犹可,凡自报蒙古某某的,轻则遭到打骂,重则被关押,因而许多人竟不敢承认自己是蒙古族。后来,这一事件虽然平息,但压迫歧视并未稍停。如派差摊款,县旗均向蒙古族农民摊派钱粮,竟然有一只羊剥两张皮的现象,人们称之为“一羊二皮”。沉重的负担,使很多人家道衰落甚至破产。以丹府为例,1928年福明额等四人在给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的呈文里说:“宗族四门,人近百口,遭此五谷不登,人将饿死”,“南门、鼓楼一带房产,东西两门一带地土尽被霸夺折卖”,要求“增设闲散参领,发给津贴”。象丹府这样曾经富甲一方的大家巨族尚且如此,一般蒙古族的境遇便可想而知了。生活的日益贫困化,加上严重的民族压迫,迫使土默特蒙古族家谱的续写中辍。民国以来的暗无天日,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也有家道不衰,甚至大发了的。如被称为毕克齐“四大天”之一的李福田,就是在大多数蒙古族日给不继的情况下大发其财的。

但这毕竟是极少数的。

其四，是留下了土默特蒙古族民族语言文字沦失的印记。以谱六为例，原谱前四代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第四代以后全用汉字书写。说明到光绪年间，民间已不用或不能使用蒙文了。这一点，从谱七、谱八亦可得到证明。与蒙语蒙文使用情况相联系的是人名的变化。各谱中光绪朝以前的人名，几乎全部是蒙语人名（也有藏语人名）。光绪以后，土默特蒙古人名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出现满语人名，如图敏额、达冲阿、福克津额等等；接着出现满式汉语人名，如福禄、麟寿、瑞成、经济等等。光绪末年以后，汉语人名已经很普遍，而且，到民国初年以后，汉语人名几乎完全取代了蒙语人名。这个过程正好与土默特蒙古族民族语言文字沦失过程相吻合。尽管清政府曾明令禁止蒙古族说汉语、习汉文。但是，土默特蒙古处在汉族占绝对多数的环境中，汉文化对蒙古族的深刻影响并不是一纸禁令所能遏止的。何况清朝后期，官方行文多用汉文，客观上起到了鼓励蒙古族学习并使用汉语文的作用。因而到光绪末年，蒙古文童的汉语文，已达到了能与汉族童生一起随棚考试的水平。当时，土默特两翼唯一的学校——土默特高等小学堂的主要课程，也都改成了汉语授课。可见其民族语文的沦失，已是势在必行的了。而民国初年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则加速了这种汉化的进程。土默特蒙古族家谱所含文化方面的信息，应该作如是观。

其五，是人口状况方面的史料意义。据记载，土默特两翼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约有一万六千余人。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经过百余年的生息，人口增至六万余口；年平均增长2.84%。再经过一百六十余年，到光绪末年，人口却锐减到一万五千六百余人，与清初相当。而在同一时期，汉族人口却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光绪末年，仅归化城厅即达十万余人。从家谱看，蒙古族人口锐减的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是，绝嗣者所占比例很大，如谱

一、谱五的第五代均占三分之二；谱六的第二代，占六分之五，第五代占八分之五，第六代占四分之三；谱七的第四代占四分之三，第五代占三分之二，第六代占七分之三。官宦人家乏嗣者尚且如此之多，一般蒙古族绝户的就更多了。清代中期以前，每佐领可出一百五十名披甲。而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有的佐领的披甲竟减少到十余名至三四十名不等。足见蒙古族绝户者之多，确实构成了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其次，是出家当喇嘛的多。如谱六第五代、第六代，喇嘛各占八分之三，第七代占二分之一；谱七第五代占三分之二，第六代占七分之二。从实际调查结合家谱看，一般蒙户子弟当喇嘛的比世爵、世职官员子弟当喇嘛的要多。由于喇嘛不能娶妻生子，因而，喇嘛这个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就显得很突出了。

土默特蒙古族人口基数本来就小，在社会的、经济的诸种因素作用下，加上上述两点，便极大地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与发展。1949年，土默特地区（即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凉城七县和归绥市、包头二市范围）的汉族人口共约一百万，几乎是蒙古族人口的四十倍。少数民族之成为“少数”，家谱确实确实向人们显示了若干个中原因。

家谱注释

谱一：

①原谱以喇嘛扎布为始祖，《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说，“喇嘛扎布……元太祖十六世孙阿尔坦汗裔。”《蒙古黄史》、《金轮千幅》载有阿勒坦汗至喇嘛扎布之世系，谱内那顺巴雅尔图以上各代，即据此补充。

②《王公表传》载：“喇嘛扎布祖索尔巴勒济图，父达木巴”，与《金轮千禧》异，存疑。喇嘛扎布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谱内所说“于二十八年间病故”，误。

③索诺木旺扎勒袭爵后，清廷于当年诏土默特辅国公“世袭罔替”。

④色楞鲁汝精扎布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袭爵，民国初年曾晋爵为镇国公，1947年病逝后，无力归葬美岱召祖坟，葬于山后金长城下。

谱二：

①据贡布扎布旁注可知，1632年归附后金的是老珍，并非其父丹巴尔扎木苏。老珍的辈份似与谱一之诺尔布相当。又，该家族拥有两个二等台吉兼勋旧佐领。鄂克齐特之二等台吉可能授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贡布扎布之二等台吉则授予乾隆五十三年（1738年）。

谱三：

①《王公表传》、《大清一统志》等书均载崇德元年授古禄格左翼都统，与谱异。谱载崇德三年“特放都统”，当为实授时间，而元年可能系决定设左右两翼旗并任命为左翼都统时间。

②毕利克及其佐领之情况待查。《王公表传》等书以乌布什第为古禄格长子，误。

③清编《土默特旗志》以阿力纳为古禄格第五子，误。又，多尔济系乌布什第长孙，伊是之后当缺“之孙”二字。

④彭森克仅有一子，敦恩当为第六次袭佐领的敦格，故伊之后当缺一“兄”字。

谱四：

①《王公表传》等书载崇德元年授托博克头等轻车都尉，谱载崇德三年当为实授该世职时间。

②瓦瓦无子，卒后所遗佐领职由其弟乌布什承袭，以下袭次为老占——百岁——班第（以下不清）——多尔计云隆（以下不清）。

④依此注文，托博克一系当有两个世管佐领，分别属右翼首甲二、三两佐。谱内称乾隆四十四年由瓦瓦佐领内拨出增丁二百名编为一佐领，由谷鲁管理，时间不合。《王公表传》等书载，谷鲁于康熙二十年卒，他显然不可能在九十多年后管理此佐。据土默特文献档案记载，康熙初，土默特两翼曾

增编左领，倘谷鲁确曾管理过增丁所编之佐，“乾隆四十四年”可能系康熙十四年之误。谷鲁所遗佐领的袭次，谱内记载不明确。

⑤拉什当鲁布名下的“七次”，系第七次袭世管佐领，第七次袭三等男爵的是噶勒增。依此，则刚保系第五次袭男爵。

抗战前夕土默特旗职官的产生与安排

刘映元

土默特旗原先保存着从明朝顺义王俺答开始，直到解放以前四百多年的档案。尤其是自从一六三二年（明崇祯五年、清天聪六年）臣服满清以后，归化城没有受过战争破坏，所以延至光绪末年的卷宗，更是完整无缺。

先是绥远城将军贻谷，于光绪三十年编修《绥远道志》，《土默特旗志》和《绥远城志》时，其幕僚，从荣祥的父亲都格尔扎布和任秉钧的祖父诺蒙格噶勒（此两人先后任土旗“都统衙门”户司关防）手中，调借去不少明朝时的珍贵历史资料，拖赖未予归还。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沦陷以后，伪蒙政府把土旗境内的归、萨、托、和、清、武和绥东五县编为“巴彦塔拉盟”期间。日本人虽将土默特旗有代表性的档案，编印成书（大连图书馆只有一册、内蒙图书馆早已抄回）。但是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时候，土旗公署的日本参事官留下一个借条，却把很重要的部分装满四、五柳条箱带往东京。土旗总管荣祥和土旗人士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委员任秉钧等，为此呈请“蒙藏委员会”行文，并给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写信，请求交涉归还，可是没有下文。

我们建国初期，旗县干部不重视档案。土旗档案中有百分之四十是满文，更不懂的找行将绝迹的通畅满文的人进行翻译。接着土旗由原来的一个旗，分为左右两个旗，对好几房故纸，更没有人进行管理，遂被各单位的人，弄去当了引火柴。今年土旗重修旗志，才在旗公安局的库房中找出十几麻袋土旗的老档案。

最近，我在内蒙图书馆参考地方文献，从旧籍中看到一九三七

年五月，抗战前夕土旗公署的两份职官姓名表，现抄录在下面。时间距今还不到半个世纪，在文物很少遗留的情况下，也可以从中研究出土旗的一些历史与社会问题。

（一）土默特旗政府各科处暨所属煤炭租总分各局职员衔名薪水表（一九三七年五月）：

旗政府总管荣祥（耀宸），月薪二百六十元。秘书处秘书长张玉成（兰田），月薪八十元。交际秘书金世华，月薪三十元。庶务兼监印员牛宝璋，月薪四十元。总务科科长森额（寿彭），月薪六十元。一等科员文宝（斌珍），月薪四十元。二等科员托克托布（少卿），月薪三十元。三等科员荣昌（耀庭），月薪二十元。翻译员发福哩，月薪二十元。财政科科长殷海（继善），月薪六十元。一等科员苏通阿（子权），月薪四十元。二等科员荣昇（级三），月薪三十元。三等科员张秉文（子荣），月薪二十元。办事员连祥（捷三），月薪二十元。教育科科长克寿卿（寿卿），月薪六十元。一等科员坤厚（子静），月薪四十元。二等科员富勒洪（润堂），月薪三十元。三等科员云徵文，月薪二十元。参领办公处主任庆眷（玉阁），月薪四十元。文牍王蔼仁（致和），月薪二十元。办事员那木凯（任斋），月薪二十元。干事兼文牍员云增魁，月薪二十元。生计股主任锡琨（子玉），月薪四十元。股员崇廉（酌泉），月薪二十元。调查员权林（水亭），月薪二十元。调查员瑞善（子祥），月薪二十元。调查员荣陞阁（松亭），月薪二十元。司法股主任云硕望（令之），月薪四十元。股员云汗章（子田），月薪二十元。收发处收发员王祥（子绥），月薪二十元。书记室书记长云麟祥（吉甫），月薪二十元。书记康寿（乔南）月薪十七元。书记李延龄（寿臣），月薪十七元。书记李俊义（和卿），月薪十五元。书记恒英（镇夏），月薪十五元。书记荣守义，月薪十三元。书记康振邦，月薪十二元。书记马耀文（焕章），月薪十五元。书记荣沛霖（浩

然），月薪十五元。书记舒敏泰（九思），月薪十元。煤炭租税局兼六成地租处局长主任常龄（寿山），月薪六十元。收支兼经徵员崇权（秉钧），月薪三十元。司事员任秉彝，月薪二十元。录事佟集成，月薪十五元。录事沙文亮，月薪十五元。录事荣升，月薪十五元。石拐分局局长苏宴，月薪二十元。录事补智，月薪十二元。巴图分局局长温哲贺，月薪二十元。录事郑兴，月薪十二元。五当召局局长荣亨，月薪二十元。录事云焕章，月薪十二元。万家东沟分局局长恩麟，月薪二十元。录事李国贞，月薪十二元。万家西沟分局局长恩麟（系兼差）、录事云让，月薪十二元。土克木地租所主任麟瑞（掌玉），月薪十五元。录事崇厚（俊峰），月薪十二元。卫队队长翟永禄（耀庭），月薪二十元。马卫队队长荣存瑞，月薪二十九元。排长荣得全，月薪二十元。排长云福升，月薪二十元。录事傅云亭，月薪十一元。差遣员郭珍，月薪二十元。交际员李作楫，月薪三十元。交际员巴文奎，月薪三十元。

（二）土默特旗左、右两翼职官衔名表（一九三七年五月）：

左翼首甲参领巴雅尔，一佐佐领锡琨（公中），骁骑校云汉章，属目地址归绥县。二佐佐领森额（公中），骁骑校巴秉衡。三佐佐领坤厚（世管），骁骑校任秉彝。四佐佐领庆春（公中），骁骑校任秉钧，属目地址归绥县。五佐佐领文宝（公中），骁骑校傅汝枚，属目地址归、武两县。

二甲参领昌森，一佐佐领常龄（公中）、骁骑校云焕章，属目地址归绥县。二佐佐领巴肇安（公中）、骁骑校坤厚。三佐佐领昌森（公中）、骁骑校荣亨。四佐佐领贺云章（世管）、骁骑校荣守义，属目地归绥县。五佐佐领云汉章（世管）、骁骑校凤林，属目地归、和两县。

三甲参领云健飞，一佐佐领王祥（世管）、骁骑校崇厚，属目地址归绥县。二佐佐领云倾望（公中）、骁骑校连祥。三佐佐领

云鹤翔（公中）、骠骑校晋福。四佐佐领麟祥（世管）、骠骑校荣升，属目地址归绥县。五佐佐领赛补英（世管）、骠骑校王葛仁，属目地址萨、武两县。

四甲参领苏鲁岱，一佐佐领穆精阿（世管）、骠骑校李根车，属目地址归、和两县。二佐佐领崇厚（世管）、骠骑校补音德勒格尔，属目地址归绥县。三佐佐领补治邦（世管）、骠骑校德克进、四佐佐领麟瑞（公中）、骠骑校多伦五，属目地址归绥县。五佐佐领苏通阿（公中）、骠骑校富珠哩，属目地址和、归两县。

五甲参领森额，一佐佐领任秉钧（世管）、骠骑校穆精阿，属目地址萨、托两县。二佐佐领荣升阁（世管）、骠骑校云文齐，属目地址归、和、托三县。三佐佐领经天禄（公中）、骠骑校贺云章，属目地址归绥县。四佐佐领云硕德（世管）、骠骑校瑞春，属目地址归、和两县。五佐佐领李根车（世管）、骠骑校云耀辰，属目地址萨、托两县。

六甲参领德克吉珂，一佐佐领殷海（公中）、骠骑校云泽，属目地址和林县。二佐佐领舒敏泰（公中）、骠骑校麟祥，属目地址归绥县。三佐佐领丁贵权（世管）、骠骑校云徵文，属目地址和、托、清三县。四佐佐领孙永贞（公中）、骠骑校殷石麟，属目地址和、托两县。五佐佐领姜继宗（世家）、骠骑校高希柴，属目地址托县。

右翼首甲参领克寿卿，一佐佐领巴文峻（公中）、骠骑校张秉文，属目地址归绥县。二佐佐领任殿邦（世管）、骠骑校荣存瑞，属目地址归绥县。三佐佐领经济（世管）、骠骑校锡龄阿，属目地址和林县。四佐佐领康济民（公中）、骠骑校云存山，属目地址武川县。五佐佐领苏鲁岱、骠骑校章元，属目地址归绥县。

二甲参领巴文峻，一佐佐领富勒洪（世管）、骠骑校奎英。

二佐佐领崇权（公中）、骁骑校任殿邦。三佐佐领克寿卿（公中），骁骑校王祥。四佐佐领德克吉珂（世管）、骁骑校崇康。五佐佐领托克托布（世管），骁骑校通集成。

三甲参领常龄，一佐佐领云徵文（世管）、骁骑校章士祥。二佐佐领那木凯（公中），骁骑校温哲贺，属目地址归绥县。三佐佐领满纳生（代理公中）、骁骑校李炳，属目地址萨县。四佐佐领都隆（世管）、骁骑校卜文林，属目地址归绥县。五佐佐领塔庆阿（世管）、骁骑校阿慎阿，属目地址归绥县。

四甲参领荣祥，一佐佐领富云珠（世管），骁骑校云文翰，属目地址托县。二佐佐领朱实夫（世管），骁骑校云增魁，属目地址萨、托两县。三佐佐领林宝（公中），骁骑校云善祥，属目地址托县。五佐佐领色呼布（公中），骁骑校满纳生，属目地址归绥县。

五甲参领庆春，一佐佐领荣昌（公中），骁骑校云麟祥，属目地址萨、包两县。二佐佐领锡拉琿阿（公中），骁骑校正兴，属目地址萨县。三佐佐领丰绅（公中），骁骑校贺耆寿，属目地址萨县。四佐佐领巴雅尔（公中），骁骑校福寿，属目地址归、萨两县。五佐佐领荣存瑞（世管）、骁骑校庆寿，属目地址萨县。

六甲参领云硕望，一佐佐领巴奎炳（世管）、骁骑校福瑞。二佐佐领晋福（世管），骁骑校补音泰。三佐佐领云健飞（公中），骁骑校丁玉昆。四佐佐领克仁（世管），骁骑校王国柱。属目地址萨县。五佐佐领卜文林（世管），骁骑校丁贵和，属目地址归、和、托三县。

又土旗有军督署，内设前锋校二十名。民国二十六年间，担任是职者为：恩麟、丰文华、朱实夫、太平、云得全、恒英、都隆桑、马耀龙、荣存仁、云彩章、丁贵权、穆精阿、德喜、经济、通贵成、瑞善、云子祥、荣升阁、云兆祥、权林。

此外土旗在包头南海子和托克托县胡滩河朔，设有两个防御

和骁骑校。一九三七年五月间，防御为发福哩、李炳，骁骑校为成新宇、苏晏。

上边两份职官表，前者是土旗民国以后改制。特别是土旗人满泰、荣祥担任了总管以后的政府编制。后者是满清二百年来，由绥远城将军兼任土旗都统。另由理藩院派旗员（满洲八旗与最早降附满清的蒙古八旗）担任副都统时的左右两翼十二参领（噶兰达）和六十佐领（章盖）区的编制。民国以后的“总管衙门”，是在前清的“都统衙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总管衙门”仍保留着许多“都统衙门”相沿下来的旧规矩。

旗，是军事组织。其基层单位是佐（也称“苏木”）。每佐应该能出一百五十个箭丁，由五个“百十户”（也称“保十护”）率领。上边设一个佐领（章盖）和一个骁骑校，相当于现今部队中的正、副连长。在平时，佐是行政组织，又相当于正、副乡长。

土旗编为左、右两翼。每翼有六个参领（噶兰达），每参领都统辖五个佐领（章盖）。共是十二个参领和六十个佐领。这六十个佐领中，有三十六个是选举性质的“公中”佐领；二十四个是继承性质的“世管”和“勋旧”佐领。依靠祖先当官的“章盖”，多半没有工作能力，并且生活腐化堕落而不求上进。所以由五个佐领产生一个参领（噶兰达）时，绝大多数出身于“公中”的佐领。

十二个参领里边的两个（可以说是）“首席参领”。担任“都统衙门”中的兵司（兼刑工）关防和户司（兼吏礼）关防。关防等于“将军衙门”的兵司正堂与户司正堂。也相当于“外藩蒙古”各旗扎萨克底下的东西协理（官府），以及管旗章京。在“都统衙门”中的兵司和户司里，还有好几个能打会算，通晓满、蒙、汉三种文字的笔帖式（也称“笔写契”），等于县衙门中那一帮“住衙门的”，是官底下的吏员，为组成衙门的基干。

土旗“都统衙门”的兵司和户司关防，大都由“都统衙门”中的笔帖式起家。他们有的是先担任了骁骑校，然后住衙门担任笔帖式；有的是由笔帖式兼任了骁骑校和佐领，再升任参领。然后经“公中”推选或经副都统推荐，出任兵司或户司关防。但，笔帖式是一个必经的门槛。因为非如此，不能熟习档案和知道各参领区的兵丁土地和物产簿册。清朝的满族副都统和民国初年的汉族总管，身边只带一两个“师爷”或者秘书，离开这些“当地”吏员就无法做官。

民国以后的土旗“总管衙门”和清朝的“都统衙门”相比较，是取销了兵司，而扩大了从前的户司的编制。以科员、办事员的名义，增加了笔帖式。把土旗的军队，从“总管衙门”中分出，变成由绥远城将军、绥远特别区都统和绥远省政府主席直接指挥下的地方部队。将“总管衙门”变成行政机关。

由于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因而满泰以土旗陆军演变的绥远“老一团”团长，而出任了驻扎在包头的绥西候守使。而且能在“晋军”，“奉军”交替之际，回归绥护理过绥远都统，对阎锡山比较忠诚。故“晋军”统治绥远以后，把兵权交给“晋军”赵承绶的“骑一军”。到一九二八年，始以土默特旗的人，成为土默特旗的总管。

荣祥，出身于土默特旗的官僚家庭。读书时就担任了佐领，以后为满泰的参谋长和秘书长，并兼任了右翼的一个参领。绥远省政府主席，在一九三四年满泰死后，因欲通过荣祥的人望，来影响乌、伊两盟及察哈尔右翼四旗的王公总管们，用以分裂日本卵翼下的德王的“蒙政会”。遂把荣祥推荐为满泰的继任者。

上列两份职官表，是荣祥以文人主政时期，土旗“总管衙门”的编制。这时的土旗，已经很穷。衙门的开支，依靠大青山的炭税和少数土地租息维持。所以土旗政府的编制，只比当时的县政府略大一些。职官待遇比当时的县政府稍高一点。总管比一二

等县长，每月只多二十元薪金。清时“都统衙门”呈理藩院和将军衙门以满文行文，咨各盟旗以蒙文行文，与山西巡抚及归绥道台办交涉，则以汉文行文。进入民国改为“总管衙门”之后，满文完全废止，蒙文偶而用之，汉文则成了对内对外的主要文字。荣祥没有当过笔帖式，以史学和文艺驰名于塞外。所以需要聘用汉族的刀笔老吏，担任旗政府的秘书长。张玉成（兰田）是河北省人。他在满素以前汉族人任总管时，就是土旗政府的秘书。由于服务年代较久，成为土旗政府离不开的人物。沦陷期间亢仁任总管时，张亦担任秘书，抗战胜利以后死于归绥。

抗战前夕，土默特旗的上层人士共分为三种势力，活动于当时的官场和政治舞台。第一种势力是旧官吏，第二种势力是“毕业生”，第三种势力是新老武人。除了老武人是行伍出身，几乎所有的新式学校毕业的分子全是旧官吏的子弟。旧官吏大都集中在旗政府里，科长、股长都兼参领佐领，就连科员一级的小职员。也都兼佐领和骁骑校。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地位。

“噶兰达”和“章盖”，在清朝时地位相当显赫的。虽然没有俸禄，但是品级超过各厅的同知和通判。蒙、汉人民，都称他们为“老爷”。进入民国以后，土旗的公有土地所剩无几，以户口而论，顶不上任何一个县的汉族户口，可是旧官吏们对清朝留下的空头官衔，仍死抱着不放，遇缺即行插入。以致左翼的人到右翼做官，右翼的人在左翼当差，把推选变成委派。

民国以后土旗的新兴势力，实际上是由从北京的公私立大学与“蒙藏学校”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绅士阶层。荣祥便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父兄或者亲属，在旗政府以及参领区当权，当他们在土旗小学或归绥中学师范念书的时候，即给他们安排了骁骑校与前锋校一类的小官。在抗战以前，土旗的知识分子非常吃香，蒋介石和德王都在争取他们。“蒙藏委员会”和“蒙政会”都给予高薪厚禄。有的人兼着好几份差事，多数人

根本看不起政府这个穷衙门，可是满泰和荣祥为了联合团结这些知识分子，亦把他们罗置在左右两翼十二甲的编制里边。故有的当了“噶兰达”，还不知自己所管的苏木在什么地方。苏木中的“保十户”们，也从未见过上边发表的“噶兰达”或“章盖”。

从清末到抗战前夕，土旗形成好几家官宦书香门弟。由西向东排列有：包头城内是巴文嵩家族，美达尔召是都格尔扎布家族，毕克齐是诺蒙格呀勒家族，归化城内是贺色翁家族。巴姓收取包头全城的“地谱”。巴文嵩（焕章）曾以十二岁童生，考中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口外七厅，蒙古籍秀才。此人少亡夭折，据说学问不在荣祥之下。他的同族弟弟巴文峻，从天津南开大学到法国巴黎大学留洋毕业回来，担任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蒙事处处长，以及蒙政会委员。都格尔扎布是清朝“都统衙门”的户司关防，和民国的绥远垦务总局的副局长。儿子荣祥、桂祥（少亡）、善祥，均头角峥嵘；侄儿经权参加辛亥革命在山西作官，和大同侯守使张长杰结拜为兄弟；侄孙经天禄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先后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蒙旗师范学校校长。侄孙女经瑞云毕业于武汉大学，嫡孙殷石麟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诺蒙格呀勒也是清时“都统衙门”的户司关防，民国以后担任过“将军衙门”的参议等职务。嫡孙任秉钧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族孙苏鲁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和“蒙政会”委员。贺色翁除任过“都统衙门”的兵司关防外，并被选为民国七年第二届国会的众议员。长子贺云章毕业于日本高级工业学校，德作义任用其为绥远毛织厂厂长。次子贺普寿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抗战时被陈长捷杀害于“绥境蒙政会”委员任内。土默特旗蒙族的文化，在旧绥远省高于汉族和满族的官宦人家。因为满汉官宦后继无人，而土旗的“噶兰达少爷”很注重读书。

荣祥任土旗总管后，除了把兼任过土旗小学校的老参领森额等保留在政府里边，将巴文峻和苏鲁岱都安排为参领。任秉

钩、贺云章和经天禄，亦安排为佐领。在六十个佐领中，仅有卜文林出身于寒门。他父母原来是给总管“打茶”的一个听差的。他住了衙门以后，得知念中学有县的津贴，住大学有省的津贴，特别是蒙古人可以保送到官费学校读书，所以把长子卜文林送于北京的“蒙藏学校”。把次子卜文瑞送入南京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女儿卜效夏，先是等于总管赵席聘小姐的伴读丫环，从高小毕业以后，即考入绥远女子师范，后来依靠省县旗三方面的津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这样卜家就列入土旗的士林。所以卜文林本来是左翼归化城东古数板申的人，不仅担任了右翼三甲的骁骑校，而且担任了右翼六甲的佐领。此外如任过土旗小学校长的孙永员，大学和蒙藏学校毕业的王祥，傅汝枚、昌森和云硕德等，亦给安排了参领佐领和骁骑校的官职。

带领过队伍的武人和在役军官，在土默特旗也很有势力。像云升阁原来是归化城十王庙的蒙古和尚。曾在清朝归绥地方陆军“蒙古二营”当兵，后来升为“老一团”的连长。他虽然不如李根车（根子林）、黄济川（黄根成）和根子茂这些人能打仗，但他善于交际联络和团结群众。有鼓动能力和说服能力，所以当他离开队伍后，满泰和荣祥都得把他收罗起来，除安排他在政府中担任调查员外，还让他并兼前锋校和左翼五甲的佐领。

李根车是满泰担任总管以后，把“老一团”改为“晋军”骑一军有名的“黄马队”的团长。满纳生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因为是满泰的“大少”，所以这两个人在荣祥任总管时，是佐领兼骁骑校了。朱实夫是“黄埔军校”学生。他叔父文宝是旗政府科长以下的一等科员，并兼左翼首甲佐领，故他很早就担任了前锋校。抗战前夕便成为白海风“蒙旗独立旅”的第一团团长，也就是后来国民党“新骑三师”的主要骨干。

张秉文是归化城南八拜村“武大人”的后代，抗战前夕仍为归化城最殷实的饭庄“惠丰轩”的独资股东。他根本不在乎土旗

政府每月二十元薪金，但荣祥为了表示尊重勋旧，亦给了张秉文一个财政科三等科员的小官，并兼了右翼首甲一佐的骁骑校。对张秉文来说，这样比光当土财主要体面些。

在此处需要把前锋校解释一下。前锋校是没有兵权和地盘的武官，等于国民党时代军师旅团长跟前副官那样的角色。清时土旗编有二十个前锋校，十二个给绥远城将军（兼土旗正都统）“打顶马”；八个给副都统“打顶马”。在将军和副都统出巡时，充当扈从侍卫，等于高级听差。前锋校和骁骑校同一品级，能候补任佐领，也是一个往上升的途径和阶梯，所以亦代表政治地位。满泰和荣祥均以此过了时的名义职衔，把土默特旗一些头面人物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土默特六十佐领沿革

于 公

佐领，满语称作牛录额真，意为箭主；1634年（天聪八年）改称牛录章京，土默特蒙古族习称为章盖。清初，按八旗制度，佐领原分四等；即：“部长率属归诚，爰及苗裔，曰勋旧佐领；功在旗常，锡之户口，曰优异世管佐领；止借兄弟族众来归，授职相承，曰世管佐领；户口寥落，合编数姓，迭为是官，曰互营佐领。”1674年（康熙十三年），又以各佐余夫编为公中佐领，合为五种。佐领系武职，是清代旗制的重要官缺，品秩较高，为从四品。军事上的职责为督率本佐兵丁操演、训练，奉命守卫、轮值，战时率兵从征。佐领同时又是一佐之行政长官，有管理本佐户口、田土，解决民事争端，支应台站差役及缉捕人犯等责。土默特两翼只有勋旧、世管、公中三种佐领。所谓六十佐领，是在清朝中期形成的，1636年（崇德元年）编旗之初仅有二十佐领，每翼十佐。兹将其沿革及分布情况简述如下。

一、土默特两翼佐领之沿革

在谈沿革之前，需要对土默特两翼的编旗过程作点叙述。1628年（崇禎元年，天聪二年），察哈尔林丹汗击败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即卜石兔），占据其领地。1632年（天聪六年），后金（即满洲）皇太极西征，林丹汗裹胁众多土默特部众西走青海，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洪台吉及其所部头目古禄格、杭高、托博克等收集余众降附后金。1635年（天聪九年），后金以谋叛罪将俄木布逮至盛京（今沈阳），第二年后金改国号为清，皇太极改元崇德。是年清廷废土默特之王爵，分其地为二，编为左右两

翼，每翼一旗，各设都统（从一品）一员，以副都统一员（后增为每翼二员）佐之，其下设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所编两翼旗直属理藩院统辖，成为有别于内扎萨克诸旗的“诸事不得擅专”的内属旗。

土默特两翼六十佐领的由来及其沿革大致是这样的：

土默特部降附后金之初，总计三千三百余名壮丁被编作二十队，各以队官一员领之。1636年编旗以后，将上述壮丁编为佐领，每佐一百五十名，共二十佐领，左右翼各十佐，额设佐领（也称作苏木章京）二十员，每佐以骁骑校一员副之。每五佐编为一甲兰，设参领一员，共为四员。

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土默特两翼生齿渐繁，增丁较多，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至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先后增编佐领二十七个，其中世管佐领九个，公中佐领十五个，另由台吉家仆编出勋旧佐领三个。两翼共计左领四十七个，其中左翼二十五佐，参领五员，右翼二十二佐，参领四员。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清廷批准将浩齐特二佐领编入土默特右翼，右翼佐领增至二十四个，参领亦增至五员。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归化城将军费扬古与席勒图胡图克图四世那旺罗布桑拉布坦向朝廷请准，将无量寺（大召）等七大寺院的黑徒编为公中佐领十三个，分隶左右两翼。至此，土默特两翼共有六十二佐领，其中世管佐领二十九个，勋旧佐领三个，公中佐领三十个。苏木章京、骁骑校各六十二员，参领亦增至十二员。

据嘉庆《理藩院则例》载：“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左翼六甲，设参领六员，佐领三十员，前锋校十员，骁骑校三十员。右翼六甲，设参领六员，佐领三十员，前锋校十员，骁骑校三十员”。较之康、雍、乾三朝，减少二个佐领。这是因为，清廷对土默特两翼户口管理极严，《理藩院则例》明文规定，蒙古每一

百五十丁编为一佐，男子凡十五（后改十八）岁至六十岁者，均须编入丁册，土默特两翼三年比丁^①一次，计丁增减佐领。比丁时严格清查户口，如有隐瞒，一经查出，都统、副都统罚五九牲畜^②，参领罚三九牲畜，佐领革职，罚二九牲畜，骁骑校革职，罚一九牲畜，隐瞒之丁则赏两翼效力官员为奴。因此，瞒丁事件极少发生，其壮丁数较为可靠（两翼康熙年间壮丁九千余名，其中披甲五千名），此其一。其二，乾隆初年以降，清廷在土默特地区大规模开垦草场，蒙古族被迫由牧转农，兵丁虽有户口地亩，因充当各路苦差，地多出租，以租资自养。久而久之，既失其牧，又失其地，生活每况愈下，致“兵丁之属衣食多缺”。加之蒙古族笃信佛教，出家当喇嘛者为数甚多，造成人口锐减，乾隆初年土默特两翼总人口为六万余口，到光绪末年已不足两万人。因此，乾嘉年间裁并两个佐领并不奇怪。

从嘉庆年间到清末，土默特两翼六十佐领的编制一直未变。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土默特两翼的佐领制也逐渐瓦解，失去了编旗之初的军事作用，如每年春夏二季操演额定千人，到清末“仅定以百人更番操演，难望其操练成军”。佐领制名存而实亡是不言而喻的。

佐领制虽然衰落了，但其官制却始终未变。世管佐领、勋旧佐领系世职，凡有缺出，皆奏请朝廷由其子孙承袭。而公中佐领则于有功或能力超拔之骁骑校、马甲之内遴选升授。另外，十二员参领均兼任佐领职，这是因为按清制，土默特两翼之世管佐领、勋旧佐领一般不得升任参领，参领均由公中佐领擢拔，公中佐领升任参领仍兼原职，遂形成十二参领兼任佐领之制。因而相对说来，参领较少昏庸之辈。

另外，土默特两翼佐领的军事作用，清末虽被常备军、陆军取代，但参佐领仍基本保持了其军中的地位。如常备军及其后的步骑两营，管带、队官、营长、连长等均由参佐领担任，直至民

国初年亦无较大变更。

二、土默特六十佐领之分布

土默特两翼旗境，是1644年（顺治元年）至1675年（康熙十四年）清廷在其北境、西境和东境先后设置茂明安旗、乌拉特三公旗、四子王旗、达尔罕旗及察哈尔八旗之后最终划定的。东西长约四百五十里，南北宽约四百里。左右两翼辖境的划分大致为：以呼和浩特为中心，西南至海留素太黄河岸边；其北沿乌素图沟至大青山脊划界，其东包括今清水河、和林格尔、武川三县及呼和浩特郊区为左翼；其西包括今土默特左、右二旗、托克托县及包头东河区（察干敖包以东）为右翼。两翼六十佐领就分布在上述范围内。

六十佐领所辖地域，从雍正年间便开始变动，其后各佐人口的迁徙，主要是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逐渐移动，在大青山以南黑河两岸一带集中。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清廷在两翼境内大规模圈划草场。如1723年（雍正元年）划拨废长城以北，浑河^③以南右卫八旗马场约八百平方公里。1739年（乾隆四年），绥远城建成后，又在大青山后划拨驻防八旗马场二万四千余顷^④。另外还划拨台站地数千余顷，圈划庄头地近千顷，“效纳”公主地数千亩。驻牧于上述各地的土默特蒙古不得不迁往别处。二是大量开垦草场。如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开垦土默特牧场四万余顷，其中清水河厅境内就有二万七千余顷。此外还有代买米地二千顷，大青山十五沟地四百余顷，进一步迫使蒙古族迁离垦区。三是边内民人迁来逐年增多^⑤，越靠近明长城的地区越多，蒙古则越来越少。如民国初年的《调查归绥垦务报告书》所载，清水河县境仅有两个佐领分布（见附表一）。而到1930年前后，这两个佐领的不少蒙户已迁离该县。

附表一所示仅为清末至民国初年土默特两翼六十佐领的分布

情况。此前各佐的地域惜无资料，只得阙如。1928年，满泰出任土默特总管以后，大力整顿旗政，于1930年调查全旗户口并整理佐领。根据当时的整理结果，兹将六十佐领的分布详列如下：

左 翼：

首甲 参领 巴瀚尔

一佐：佐领万才，骁骑校云汉章

乌兰板升，麻花板升、姑子板升、桥靠、哈拉不塔、八台营子，共六村，270人。

二佐：佐领森额，骁骑校巴乘衡

星星板升、西把扎、小把扎、古路、什兰岱、尔林岱、生盖营子、小厂圪圖、黄黑楞、东把扎、不塔气、里保、台什，共十三村，450人

三佐：佐领乌尔图、骁骑校富林

什兰岱、甲兰板升、古楼板升、塔布秃力亥、生盖营子、大厂圪圖、讨速号，共七村，438人。

四佐：佐领庆春、骁骑校苏通阿

包尔哈少、土梁、乃莫板升、圪老板升、古尔半马素、白塔、奎素、野马图，共八村，319人。

五佐：佐领锡敏泰、骁骑校傅汝校

归化城，东厂克尔、常黑赖、甲兰板升、生盖营子、古楼、黄岱沟、察汗此老、南双树，共9村，97人。

二甲：参领 昌森

一佐：佐领常龄、骁骑校云焕章

麻什、双树、格此老、小苏计、西黄舍少、公兰太、哈拉沁、大苏计，共八村，70人。

二佐：佐领巴肇安、骁骑校璋厚

归化城、公喇嘛、古尔半忽洞、黑炭板升、聂各兔、蝉亥、王毕克齐、古子板升、那木山、沟门、前班定营，共十村，183人。

三佐：佐领昌森、骁骑校荣亨

毛不浪、可可板升、苦计讨号、红翟吉讨号、二十家子、坑只背、灯炉素、讨不气，共八村，207人。

四佐：佐领富林，骁骑校富祥

买代尔、讨号板升、合沙图，宝树圈图、五路、郜独利、朱亥、三富、讨思号、羊盖板升、西章盖营，共十一村，288人。

五佐：佐领达什，骁骑校风林

七杆旗、公布板升、色肯板升、古力半、牙达木、补尔此老、丹岱、板定板申、公保营、灯笼素、恼木七太，共十一村，178人。

三甲 参领 锡敏泰

一佐：佐领崇厚，骁骑校崇厚

莽倒图沙拉乌素（南双树）、章盖营子、乌把什营子，阿力木（什拉乌素），东水泉子，托力克（根保尔什）、南章盖营子、乌兰布拉克（老龙不浪）、南牛牛营子、乌素什巴太、什拉素（双树）、新申板升、达尔计（八里庄），毕齐克齐、中海流、大湾、恩克赖（西密子）、珠汗白彦、珠力格安吉素（六犏牛）哈登哈少（石嘴子），共二十一村，320人。

二佐：佐领云硕望、骁骑校连祥

百什户、乌兰巴图、南台什、勉勉板升，七圪太、什拉门更、南白庙子、讨不气、沟子板升、色肯板升、桃花板升、土梁，共十二村，279人。

三佐：佐领云鹤翔、骁骑校云硕望

前巧报、后巧报、灯笼树、八拜、达赖营子、什不合气、格尔图、宿尼板升，共八村，222人。

四佐：佐领吉雅、骁骑校（缺）

倒拉土牧、圪力更（八里庄）、小圪力更（前八里庄）、可补勒（瓦房院）、南此老气、冉巴胡图克图（巧什营子）、公布胡图克图、乌素沙巴尔太、讨不气圪（土不粘）、额力更白申、察汗胡图克图、补力特（达赖营子），共十二村，399人。

五佐：佐领塔沁阿，骁骑校王蔼仁

大赛干、哈拉齐老、毕只图、苏波尔盖、美岱尔、和鲁图、伊克席力、磨菇窑子、补力克、哈尔根太、诺木汗、涉巴尔太、巴彦鄂博，共十三村，456人。

四甲 参领 苏鲁岱

一佐：佐领图森额、骁骑校图明泰

把独户、出堰、把尔且营、忽捅兔、厂汗伊力更、北豪庆营、古尔半乌素、北刀拉板升、城南甲拉营、五松秃路，共十村，120人。

二佐：佐领崇厚（署理）、骁骑校补音德力格尔

前白庙子、后白庙子、南豪庆营子、朱亥、东甲兰营子，共五村，165人。

三佐：佐领锡琨、骁骑校德克津

东甲兰营子、大浑津、小浑津、明安、哈力拜、西班牙定营子、小毛寇营子、前朱堡、后朱堡，共九村，542人。

四佐：佐领麟瑞，骁骑校多伦武

后古路、板定板申、南章盖营子、西章盖营子、西云寿、图赖、南的力图、北的力图，共八村，182人。

五佐：佐领苏通阿、骁骑校富珠哩

图赖、古尔丹霸、上七城、潮忽闹、补圪图、孙得利、阿林潮、达赖丹巴、王毕先气、忽洞兔、圪力圪太，共十一村，208人。

五甲 参领 森额

一佐：佐领崇叔、骁骑校穆精阿

满水井、什力圪图、古红岱、耳林岱、什圪畚、讨斯号、斗林盖、城墙上、塔布板升、麦达村，共十村，211人。

二佐：佐领康济民，骁骑校根旺

北台基、拉麻营子、南台基、西厂克、三两尔、波林岱、常黑赖、章盖营、马群、小铁帽、大铁帽、塔布子、章圪塔尔、乌素图、羊盖尔、上达赖，共十六村，469人。

三佐：佐领国安，骁骑校（缺）

后红岱、常黑赖、麻黑赖、淌不浪、北什轴、哈尔图，共六村，369人。

四佐：佐领顺泰，骁骑校瑞春

库布特沙巴太、锁号、塔布子、雨施格气、脑木汗、额勒济图（西白庙子）、锡尼板升、巴独户、波尼圪沁、七炭板升，共十村，369人。

五佐：佐领福勒明额，骁骑校吉瑞

什尔登、口口板升、乃莫板升、黑兰秃拉亥、黑兰更更、南兵州亥、安民（束束）、寒盖，共八村，270人。

六甲 参领 德克吉珂

一佐：佐领殷德贺，骁骑校扎克森阿

土城、喇嘛湾、脑木气、兵达营子、新店子、黑蛇兔、海流、西沙尔沁，共八村，573人。

二佐：佐领舒明泰，骁骑校伊庭玉

什不更、圪报尔、猛独牧、西倒拉秃力亥、淖尔板升、水磨沟、黑水泉、北海流、中海流、三堵墙、小甲赖、大甲赖、小五十家子、西此老气，共十四村，247人。

三佐：佐领恩锡荣（署理），骁骑校云增文

达子沟、当铺沟、库呀图、小庙子、金令窑子、典力素、裁生沟、乌拉补勒克、头道嘴子、八拜沟、二道河、古立尔太、五棋

牛沟、倒拉忽洞，共十四村，212人。

四佐：佐领孙永贞、骁骑校锡琨

哈达图、五当沟、章克特尔、察汗库特勒、鄂克图尔、巴尔噶素、哈值格尔、补尔格素太、特绵古钟、二支树尔、察汗伊力更、固尔巴勒计、灯楼太、摩林太、固尔巴勒津库克伊力更，共十五村，276人。

五佐：佐领姜继宗、骁骑校穆成林

章盖营子、小甲拉村、石窑子、喇嘛湾（黄河边）、樊山沟、打麻营子、甲浪沟、张四河沟、达对营子、杨家圪堵、打木尔架、昌家营子，共十二村，245人。

右翼

首甲 参领 万才

一佐：佐领福克津、骁骑校张炳文

倒拉土木、淌不浪、东打尔架、中打尔架、河沟打尔架、沙家营磨林太、台阁牧，共八村，383人。

二佐：佐领额力德珂，骁骑校文宝

乌素图、归化城、新新板申、霍寨、什拉门更、哈拉沁、察汗板升、塔布板申、攸攸板申、刀刀板申、磨林太、章盖营子，共十二村，252人。

三佐：佐领经济、骁骑校张元

归化城、克略、白彦图、四棋窑子、板定板申、此老气、大西平、小西平、石灰窑子、石嘴子、一间房、毛道营子、沙尔沁、桃尔号，共十四村，179人。

四佐：佐领达恒泰、骁骑校云春山

野马图、马王庙、广庆隆、什拉哈达、井尔沟、三合兴、水磨沟苏盖营子、蓝粘、大毕克齐、五当沟、邵不亥，共十二村，90人。

五佐：佐领苏鲁岱、骁骑校章元

忽寨、十间房、石槽子、胡牙克图、沙拉穆楞、乌拉伊力更，共

六村，35人。

二甲 参领 福克津

一佐：佐领德克吉珂、骠骑校崇廉
毕克齐、沟子板什、杨家堡子、一间房子、朝头房子、小里保、
归化城，共七村，465人。

二佐：佐领托克托布、骠骑校通集成
毕克齐、得尔素、主根岱、康台吉、圪斯贵、把独户、不塔气、
倒拉土牧、花沟营子、黑沙兔、什不更、水磨沟、车轴营子、出
彦、沟子板升，共十五村，522人。

三佐：佐领富勒洪、骠骑校奎英
归化城、毕克齐、沟子板升、店上、出彦、水磨沟、牛牛营子、
兵州亥、苏盖营子、把什板申、苏克齐、塔布板升、古尔半忽
洞、色胡拉克齐，共十四村，505人。

四佐：佐领纳尔洪、骠骑校云秀峰
羊羔尔、什报气、牛牛营子、忽拉格气、哈密圪沁、打尔架、袄
太、栽生，共八村，496人。

五佐：佐领克什克图、骠骑校连祥
讨合气、白塔、小里保、大里保、兵州亥、塔布板升，共六村，
348人。

三甲 参领 常龄

一佐：佐领苏敏额、骠骑校（缺）
大毕克齐、海流、王毕克气、乌尔素、乌兰板升、肯只背、杨家
堡子、乌素图老园子，共八村，620人。

二佐：佐领那木凯、骠骑校德克津
珠尔沟、东沟门、帐房、瓦窑、三盖、什兵地、袄尔圪渗、此
老、点什气、查汗秃力亥、塔布子，共十一村，498人。

三佐：佐领荣祥、骁骑校（缺）

云社堡、道尔济、大营、托克托岱、忽拉格气、竹拉庆、桃尔号小万家沟，共八村，334人。

四佐：佐领都隆、骁骑校卜文林

察素齐、万家沟、大毕克齐、什不更、阿令台卜，共五村，307人。

五佐：佐领塔庆阿、骁骑校阿慎阿

把什板申、竹拉庆、南兵州亥、阿巴尼，共四村，336人。

四甲 参领 荣祥

一佐：佐领富荣珠、骁骑校（缺）

黑兰板升、珠尔汗白彦、补还岱、张四壕、忽拉格气、都勒巴尔、伍把什，共七村，295人。

二佐：佐领常龄、骁骑校殷海

里素、三间房、乃只盖、五申、石打岱、山盖，共六村，90人。

三佐：佐领林宝、骁骑校李春芳

马车窑子、托克托城、召湾、羊厂、归化城、什圪畲，共六村，208人（兼管广宁寺黑徒31名）。

四佐：佐领瑞恒、骁骑校伊习丹增

保同河、善岱、什拉、后善岱、西老藏营子、工布，共七村，209人。

五佐：佐领色呀布、骁骑校孙永贞

毛恼亥、成犁、善友板升、西马群、黑蛇兔、苏波尔盖、平基、参将、那速图、脑木汗、倒拉土木、归化城，共十二村，262人。

五甲 参领 庆春

一佐：佐领荣昌、骁骑校麟祥

大奖古特（石老丈营）、哈拉乌素（白庙子）、小奖古特（赵家圪梁）、黑顺营子、小厂圈图、讨生板升（油房营子）、朱麻营

子、古尔班卯独（丹津营子）、八分子，共九村，213人。

二佐：佐领锡拉琿阿、骁骑校赓寿

上达赖、白银厂汗、讨思浩、古雁、席尼板升、道什尔、高家营子，共七村，411人。

三佐：佐领丰绅、骁骑校（缺）

圪力更、塔尔拜、巧尔气、宁武营子、张老五营子、齐巴尔、白银厂汗、缸房营子、锡林板升，共九村，81人。

四佐：佐领巴雅尔、骁骑校福寿

二十家子、朝号、哈素，共三村，170人。

五佐：佐领锡拉琿阿、骁骑校（缺）

沙兵崖、归化城、设坝营子、南榆树营子、西习力气、习力气、东习力气、三卜树、打令色、纳泰、油房营子，共十一村，350人。

六甲 参领 国安

一佐：佐领巴炳奎、骁骑校福瑞

沙尔沁、薛盛永窑子、阿善沟门、磴口、包头、讨合气、妥妥岱、黑牛沟，共八村，392人。

二佐：佐领晋福、骁骑校补音泰

北只图、东沙尔沁、阿木板升、忽洞沟门、马连尔、西沙尔沁、铁匠沟门、厂克尔、章盖营子、归化城，共十村，516人。

三佐：佐领云健飞、骁骑校丁玉昆

鄂尔圪逊、土合气、纳泰、公积板升、朱尔圪岱、后朱尔圪岱，共六村，231人。

四佐：佐领孟述孔、骁骑校（缺）

萨拉齐、沙尔沁、大袄兑、吴坝、此老气、北只图、忽洞沟门、葫芦头、朱尔圪岱、西老藏营子、章盖营子、偏关营子，共十二村，202人。

五位：佐领殷德贺、骠骑校（缺）

乌尔巴气（毛菴）、脑包沟、小坦保、板申气、黑麻板升、沙尔沁、威俊、波林岱、西甲拉、黑水泉、苗道营、桃尔号、悠悠板升，共十三村，267人。

根据以上资料，绘制《土默特佐领分布示意图》附后。此示意图的原因之一，是各佐向未严格划界，只能标其大致范围；原因之二，是个别佐领所辖各村太分散，如左翼三甲五佐，难以在图中标示；原因之三，是个别佐领所属村庄所记蒙语村名，多以汉语村名代替，现有地图资料难以核实，如左翼六甲四佐即是如此。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图中所示左右两翼的分界，与清末所编《土默特旗志》及《绥远通志稿》所载稍异。即左翼旗境西移至今托克托县北境，究竟系迁徙所致，还是此前调整佐领形成，尚待考察。至于同一村庄共属两翼数个佐领管辖，则完全是由于旗众迁移的结果，因为不管迁至何处，仍属原佐领管辖。

三、土默特两翼佐领制的衰亡

清朝中叶以前，土默特两翼“蒙兵骁勇，南北用兵足资调遣”。到了清季中，特别是“打南阵”以后，如前所述，由于人口锐减，“兵无薪饷，全倚户口地亩且耕且牧，充当各路苦差”，“难望其操练成军”。两翼可调集的兵丁仅千余人，春秋二季仅只百人轮番操演。因此，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绥远城将军永德、归化城副都统奎成不得不置佐领制于不顾，从两翼旗丁内挑选三百人，编为巡防队，用以保卫地方，防守城池。1903年改为常备军。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将军貽谷进一步变革军制，编两翼蒙丁五百二十名为陆军第二营（土默特人称之为步一营）；稍后又以蒙丁二百七十名编为陆军骑兵营。从此，土默特两翼佐领的军事意义便完全丧失。所余仅户籍管理、摊派差徭等行政职能。

民国初年，土默特两翼合为一旗，其最高长官副都统改为总管。当时，绥远政界有人主张，已设县地方废旗存县。因北洋政府曾有盟旗制度一仍其旧的陈命，土默特盟旗以此为据起而抗争，废旗之议始息，佐领之制得以保存。这一时期佐领的袭替、升授，基本如清代。即须由总管署呈绥远都统署转报蒙藏院，由北洋政府批准。1928年以后，这种程式业已不复存在，只凭总管具文任命，报绥远省政府备案而已。

佐领愈来愈徒具虚名，愈来愈不起作用。诚如一位土默特青年所说：“每佐所属之蒙户多者不过百余户，男妇老幼不过五百口，以参、佐、骁骑校、领催等官吏九员，不能治理百户之人民，乃古今史册之未有者也。”^⑥但是参佐各官组成全旗统治集团，维持佐领制，为其利益所关。如参领可任总管署各科科长、副科长、顾问、参议等职；佐领可任各科一、二等科员；骁骑校可任三等科员、录事等职，均有薪金。所以，总管署堂而皇之地称：“佐领皆上承总管之命，下负土地人民之责也”，佐骁等职不可“听其久悬”，“拟即遴员补署”，“以专责成而免旷职”。^⑦继满泰整理各佐户籍，荣祥继任总管之后，于1935年整顿佐领，重新任命了佐领、骁骑校等官（见附表二）。从表2可以看出：1、荣祥任内，世管佐领与勋旧佐领凡已故者不再袭替，而以旗府新贵署理（即代理）；2、参领可以不兼佐领（如荣祥、德克吉珂）；3、佐领兼骁骑校者比例颇大，占25%。旗内职官的任命不按旧制进行，说明佐领制的衰落，保留参、佐、骁等官，只是维持旗制的需要，也是旗府官员身份高低的一个标志。这是旗府对佐、骁各职的最后一次任命，在此以后便任其自流了。

1940年，日寇为贯彻其以蒙治蒙的政策，加强其殖民统治，曾对土默特旗各佐进行调整，重新划分佐领，如右翼三四两甲各佐调整如下：

三甲：

一佐（清字号）：大岱、工布、保同河、善岱、什乐、后善岱、铁帽、锁号、玻璃圪沁。

二佐（慎字号）：毛脑亥、成良、平基、参将、脑木汗、马群、贾家营、善友板升、纳斯图。

三佐（勤字号）：云社堡、大羊、多尔计、忽拉格气、陶尔号、黑蛇圈、妥妥岱、沙尔沁。

四佐（廉字号）：察素齐镇、东沟门。

五佐（明字号）：把什板升。

四甲：

一佐（智字号）：黑兰板升、张四壕、盐海子、树林子、珠尔汗白彦、油房营、忽拉格气、双墙子、托城、伍十家子。

二佐（仁字号）：五申、伞盖、什达岱、乃只盖、小里奈、三间房、万全店营、补还岱、陕西营、王木匠圪堆。

三佐（勇字号）：章盖营、石窑子、甲拉沟、达尔麻营、那木架、常家营、召湾、小羊厂、马车窑子、喇嘛湾。

四佐（忠字号）：北台吉、南台吉、西厂克、三两、海流、波林岱、喇嘛营子、塔布子、脑木汗、乃莫板申。

五佐（正字号）：什力邓、黑兰圪力更、黑兰秃力亥、杭盖、口背板、安民、兵州亥、章盖台。

上列大岱、工布、保同河、善岱、什乐等村原属右翼四甲四佐；铁帽、锁号、玻璃圪沁等村原属左翼五甲五佐；章盖营、石窑子、甲拉沟、喇嘛湾等村原属左翼六甲五佐。其余各甲的佐领也象这样按地域作了调整，并冠以字号。在调整各佐的同时，日寇还成立了伪甲兰办事处。每甲一所，在农村科敛赋税，组织伪保甲团，实施“施政跃进计划”，组织伪“土默特旗青年同盟”，

举办伪青年训练所等等，均依靠各甲办事处进行。较少依靠佐领、骁骑校。

抗战胜利后，土默特旗政府组建了七个自治督导处。即左翼道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右翼首、二甲，三、四甲，五、六甲及山后（召河一带）督导处。各处委任主任、财务、财政、户籍、社教干事，管理本处政务。虽然在户政管理方面，仍照各佐（日伪时期调整的佐领）编查户口，发放国民身份证。但政令均由督导处推行，佐领一般不参予其事。即使佐领员缺，也不再升授或派员署理，任其自生自灭。至此，佐领的行政作用亦消亡殆尽。到1949年全旗和平解放，佐领制亦最终结束。

注：①比丁：即清查户口并登记年届成丁人员，在册之丁，须服兵役并当差役。

②罚畜九数为：马二匹，犏牛、乳牛、三岁牛各二头，二岁牛一头。

③浑河在清水河县境内，也叫作浑河槽。

④大青山后场：在今武川县城外西北方，马王庙村即为该马场驻地。

⑤边内民人：边内指明长城以内，民人即汉人。

⑥1923年锡龄阿呈绥远都统文。

⑦1934年土旗总管署呈绥远都统署文。

清末土默特六十佐领分布简表

甲	首	甲	二	甲	三	甲	四	甲	五	甲	六	甲			
佐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左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翼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右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和林格尔厅
翼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归化城厅



土默特两翼都统的兴废及其它

咏 岭

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满洲将其八旗制度推行于陆续降附的蒙古诸部，每部编为一旗或数旗。这些蒙古旗主要分为扎萨克旗和内属旗两类。前者由各部封建主世袭扎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塔布囊、台吉，在旗内可以“君国子民”，后者则贬废原封建主，实行都统制（或总管制），直隶于蒙古衙门（后改理藩院）。土默特两翼旗始建于1636年（崇德元年、崇禎九年），是建立最早的内属旗。

作为内属旗，土默特两翼“尺地一民不能私为我有”，事事不得擅专，都统虽系两翼最高军政长官（从一品），但一切举措均须秉承朝廷的旨意方能进行，因而实际是清王朝对土默特两翼旗众实行严密统治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两翼都统从1636年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存在一百二十余年、对土默特地区的政治、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土默特两翼都统的施政情况及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两翼都统事略及其兴废

左翼都统：

左翼首任都统古禄格，原为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属下之头目。据载，其先人为土默特人。因灭扈伦国之纳喇部，遂以纳喇为姓，世居叶赫部。其后，叶赫部亡，古禄格投附博硕克图汗，为头目。博硕克图汗1613年至1628年在位，古禄格大约即在此期间依附于土默特部。土默特民间有一个传说，大致是说，古禄格系满洲派到土默特部的奸细。后金建系俄木布洪台吉，废土默特

部之王爵，古禄格为主谋。因其有功于满洲，故朝廷任之为都统，并授予三等子爵。此说并非无因，一则扈伦四部（即乌拉、哈达、辉发、叶赫）为女真部落，生息于松花江中游一带。据现有史料，土默特部最强盛时期，其势力也未波及松花江流域。二则古禄格作为新附头目，尚无某种背景，何以俄木布遭难他却无恙，而且成为可以左右土默特两翼的新贵。当然，这仅是推测，古禄格是否受满洲所派，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当作一种传说，不宜视为史实。

清廷对古禄格恩宠有加，1636年授左翼都统（世袭），1639年（崇德四年）授一等男爵，1645年（顺治二年）晋三等子爵。古禄格则以无限忠诚报效清廷。以朝贡为例，1638年一年之内，于正月、三月、六月三次赴京朝贡、进贡方物。1646年（顺治三年）亦两次进京朝贡。其朝觐之勤，在蒙古各部中是无与伦比的。古禄格报效朝廷更表现在开疆拓土、剿灭叛乱方面。如1646年随豫亲王多铎击喀尔喀上谢图汗及车臣汗部，1649年与亲王多尔袞会兵征喀尔喀。1666年（康熙五年）古禄格卒，清廷对他的评价是“勤劳懋著”。

古禄格卒后，朝廷召其三子乌布什第赴京，隶蒙古正白旗，四子锡拉布袭都统，1670年（康熙九年），锡之长子古睦德袭都统，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以废职罪罢职。都统改由古禄格第六子阿拉纳承袭。古睦德则以佐领职赴京，亦隶蒙古正白旗。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阿拉纳以土众委靡，弓马不娴削职，再次由古睦德承袭都统。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古之长子丹津袭左翼都统（详见附表：土默特左翼都统表）。

丹津袭授左翼都统时，右翼都统停袭已近十年，官方一般均称之为“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两翼诸事皆决于丹津。丹津任内是土默特两翼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这种变革与丹津的个人作用关系甚为密切。例如，1723年（雍正元年），丹津奏请朝廷在呼

和浩特添设归化城同知府，隶山西大同府。土默特地区道厅与都统署并存，一地二治的局面从此开始。再如，土默特草场的开垦，也是由丹津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奏请朝廷，将土默特草场八处共四万余顷交地方丈放开垦。清编《土默特旗志》说：土默特“境内田土陆续效纳屯垦爰助粮饷者所在良多，有交五厅管属征粮者，有交右卫八旗以及绥远城八旗作为游牧者”，“有粮厅管属之庄头地，有拨给公主之地，有代买米地，有补拨庄头等项地，无不由土默特效纳。扎萨克四十九旗之中，若土默特之首创大义以助天朝无或畛域者，盖可风焉”。而“首创大义”的结果是牧场的农耕化，迫使土默特蒙古由牧转农，导致了本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此外，丹津还建立了孔庙以及土默特官学，对发展文化教育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737年（乾隆二年）丹津卒，清廷以其无嫡子（过继族子为嗣）为由，诏停袭左翼都统，改授对品之三等男爵。停袭都统以后，古禄格之后代拥有三等子爵、三等男爵各一，世管佐领二个，仍为土默特两翼首屈一指的巨族显宦。其都统袭次及世职传承关系，参见《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一文之谱三。

右翼都统：

右翼首任都统杭高，出身于土默特部巴拉格特氏族，原为俄木布属下之头目，与古禄格等一同降附后金，土默特王爵被废以后，于1636年被清廷任命为右翼都统。杭高之子巴桑为第二任右翼都统，1647年（顺治四年）因军务获罪被削职，都统一职改授托博克。

托博克与杭高同宗，且为近支，亦为俄木布属下之头目。降附后金之后，先后被授予一等轻车都尉、一等参领等职。1647年（顺治四年），右翼都统巴桑因军务获罪削职，以托博克为右翼都统。

托博克与杭高属同一氏族，世为土默特人。笔者曾听到一个

说他“卖主求荣”的传说。大意是，托博克原为土默特部某贵族的管家，归降满洲之后，托博克竟诬告主人谋叛。于是该贵族遭到“追杀”，因事先得知变故，贵族居家逃到蛮汗山的元山子一带，不久又逃到大青山后的呼和鄂博一带，直到事情平息之后才迁回土默川。提供这一传说的人称：我们家族视托博克为世代仇人，几百年来一值不与托博克及其后人来往。这是一辈子一辈子地传下来的，一直传到我这辈子。这个传说，大约与俄木布以谋叛罪被废为庶人有关。本文不打算就其真实性和是非曲直考证、评论。引用这一传说，只是想说明，托博克、杭高等确曾是以俄木布洪台吉的亲信头目取而代之，成为新王朝之新贵的。

与古禄格一样，托博克确曾极其忠诚地为清朝效力。如1644年（顺治元年）献马，1646年率兵随豫亲王多铎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及车臣汗部，1649年（顺治六年）随英亲王阿济格讨大同叛镇姜瓖。因而得到朝廷的赏赐宠信，加授三等男爵。死后，还被赐谥曰果壮。

1670年（康熙九年），托博克次子古噜袭右翼都统。1675年（康熙十四年）率兵入边会剿陕西叛镇王辅臣，克花马池等地。次年，参加平定宁夏兵变的战役，战功卓著，诏令兼袭三等男爵。1681年（康熙二十年）卒。其子拉察布袭都统。第二年，拉察布卒。其叔乌巴什袭都统，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卒。其长子阿弼达袭都统，次年以不事训练士卒罪削职。清廷令停袭右翼都统，改以京官任之（详见土默特右翼都统表）。

1723年（雍正元年），雍正皇帝下诏说，土默特两旗旧习渐改，训练兵弁行伍整齐。令阿弼达之子根敦重袭右翼都统。根敦原任副都统，以参赞大臣随振武将军傅尔丹进兵新疆，征剿策旺阿拉布坦。1724年复率兵赴巴里坤、吐鲁番等处防青海罗布藏丹津。1731年（雍正九年），率土默特兵进驻巴里坤，接着袭噶尔丹策凌于乌鲁木齐，大胜。清廷以根敦“懋著劳绩”，特赏赐御

用冠服等物。1735年（雍正十三年）回任，于1742年（乾隆七年）卒。都统由其长子班达尔什承袭。1754年（乾隆十九年）班达尔什卒。清廷认为其子赛音弼里克图，以前锋职袭都统“恐非胜任”，台吉大员等亦恐不服调度，诏令停袭右翼都统，另以京员任之。改授赛音弼里克图三等男爵。其世职承袭世次参见《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一文之谱四。

右翼都统停袭后，托博克一支仍拥有三等男爵二个，世管佐领两个，同古禄格家族一样，是土默特两翼的巨族显宦。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裁撤土默特左翼都统。1763年又将右翼都统裁撤。此前，已将土默特两翼副都统裁去三员，仅留一员。至此，又将副都统改为满缺专任副都统，叫作归化城副都统。于是，土默特人充任本旗最高军政长官的权利被剥夺。这是土默特官制的一次重大变化。那么，清廷为什么要改变土默特的官制呢？对此，清廷的官方资料并未明言，但从历史事实中至少可以看出这样两点。一是清初青海、新疆之蒙古、回部以及喀尔喀诸部尚未臣服，土默特两翼地方系清廷对上述地区用兵的前哨阵地和后勤基地；尽管清廷在呼和浩特驻有归化城将军（首任将军为费扬古），但无满洲八旗驻防，故而对土默特多所倚重。如对喀尔喀用兵，归化城为各蒙旗兵力集结地；粮秣也多由归化城发运，沿途押运均由土默特兵丁担负。再如清廷对噶尔丹的战役，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曾驾临归化城。对两翼防务颇为重视，谕令扩建城池，添设官渡，并整顿军纪，撤换都统。其二，清王朝实现大一统之后，仍视土默特地区为“京畿之锁钥，晋垣之襟带，乌、伊诸盟之屏蔽，库、乌诸城之门户”。于乾隆初年修筑绥远城，移右卫八旗驻防城中，派驻防将军（初为建威将军，1761年改绥远城将军）对土默特地区进行直接统治。同时，清廷又在土默特地区设置山西总理蒙古民事分巡归绥兵备道，及管理蒙古民事归化城等五厅。于是，土默特地区出现了隶属关系。

不同的满、蒙、汉三种官吏系统，而都统（从一品）与将军（正一品）相埒，事权不一，相互掣肘，势必有所取舍。土默特两翼都统的重要性，既已降低到可有可无的程度，当然被视为冗员，在裁汰之列。裁撤都统，改置专设副都统（二品）以后，军政统归驻防将军统摄。这是清廷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步骤。给两翼都统子孙以对品男爵已算是“皇恩浩荡”了。封建王朝对臣仆“阴阳以操纵之”的统治术，于此可见一斑。

二、两翼都统衙署

土默特两翼都统府曾经是呼和浩特级别最高的衙门。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存在一百余年。一些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都是经过这两个衙门的全力推行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搞清两翼都统衙署的变迁，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不无小补。

关于两翼都统衙署，前人著述很少提及或者语焉不详。《归绥识略》、《归化城厅志》仅说：“自裁汰两都统三副都统，将各衙署变价归款报部”。俄国人波兹德聂耶夫在其《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虽记载较详，也只说：“呼和浩特有两个固山昂邦（都统），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衙门，每个衙门有四十二间房屋……后来由于两个固山昂邦和三个梅伦章京（副都统）都被认为是额外人员，他们办公的地方也就陆续卖到私人手中”。“变价”就是卖，卖给哪些私人，文中未说，更未提及衙署的位置。记载两翼都统衙门较详的是荣祥先生。他在《土默特沿革》中说：“清初土默特分左右两旗，设左右翼两都统。在丹府前靠西为右翼都统府，其后改为镇守归化城副都统府，就是现在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在议事厅前一条巷内，为左翼都统府，其后改为世家私宅，就是现在恒昌店小学所在地”。根据资料和查证，荣老先生把两翼都统衙署的位置完全颠倒错位了。事实是，今恒

昌店小学校系右翼都统衙署，而左翼都统衙署则是前些年拆毁的“丹府”。

在谈两翼都统衙署之前，有必要对有关土默特两翼的另外两个衙门，即旗务衙门和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作些必要的叙述。旗务衙门，也叫固山衙门，是土默特两翼户兵二司及十二参领办公的地方，地址在旧城大北街路东议事厅巷内。民国年间，一直是土默特旗总管署（或旗政府）所在地，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副都统衙署，波兹德涅耶夫依据实地“游历”记载道：“乾隆初年，呼和浩特只剩下了一所昂邦衙门，它位于呼和浩特城的西南角。乾隆二十八年（1763），工部遵照当时皇帝颁下的圣旨，下令把这个衙门迁到别处去，重新修建房舍。从那时起，昂邦衙门就座落在旗署的对面，即现在（按，1892~1893）的位置上。”

《归绥识略》、《归化城厅志》也说：“归化城副都统衙署，在城北门内路西……乾隆二十七年准工部来咨迁移补修。道光二年重修，四年改建大门，五年添立东西辕门”。两相对照，可以肯定原“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①就是清代的归化城副都统衙门，而非丹府。因为这所衙署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既不是原来的土默特副都统署，更非原都统署改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副都统衙门在民国年间一直是重要官署的办公地（如民国初年的绥远区财政、教育二厅及其后的归绥市政府），而丹府则系私宅。

丹府即左翼都统衙署

清编《土默特旗志》引都哈尔扎布的著述说：“其衙署则北门内南向者土默特正都统衙门，人曰丹府。都统于乾隆间奉裁，旧衙为其子孙世守”。都哈尔扎布系土默特两翼参领，以土默特人记土默特之事自然可信。这与前述引文所谓“变价归款报部”，“卖给私人”的说法是一致的，当时大约是丹津之子孙，出价买得都统衙署，因而该家族方能“世守”。这就是该宅直到解放初期仍属古禄格后裔的原因，说明丹府确系左翼都统衙署。

至于左翼都统署的前身，荣祥先生认为原系土默特王府，后为丹津所占。也许这也是来源于民间的口碑资料。不过，即使确曾系王府，占据者也不应是丹津，而是乃祖古禄格。因为俄木布被废为庶人时，性命尚且可虞，焉能保有其产业？古禄格既为土默特两翼第一显要，占据王府为其衙署谁能奈何？而丹津系古禄格之曾孙，上距清初已七十余年，更何况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清圣祖曾亲授俄木布之子为台吉，在此情况下占据其府第断不可能。所以称左翼都统衙署为丹府，是由于丹津在任三十四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人物的缘故。据载，雍正初年，归化城商民人等曾集资，欲为丹津建生祠（后改建为文庙），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正因为丹津地位显赫，颇浮人望，于是商民便以丹府称其衙署，这大约也是一种出于崇敬的缘故吧。不过，丹府并非官称，而是人们对土默特左翼都统衙署的习惯称呼罢了。

恒昌店小学校址即右翼都统衙署

为了确定恒昌店小学校址即右翼都统衙署，笔者曾作了一些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 恒昌店小学建筑原貌：

据一位三十年代在恒昌小学读书，其后又在该校教书的退休女教师，以及附近耆老介绍：恒小校门前原有麒麟照壁一座，砖雕祥云瑞兽花木甚为精美。建筑格局大致有仪门、过厅、大堂、内宅共三进砖瓦院落。屋脊上均有张口兽头，现仅存一株五楹瓦房，也已并非原貌了。其余都在历年增建校舍时陆续拆除。另外，恒小东隔壁也有一处深宅大院。据说系校址原主巴家，于若干年代前给女儿的陪嫁。这些情况虽极简单，但也足以说明该校址绝非一般家资富厚者之宅院。其次，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只有品级较高的官员才可在门前建麒麟照壁（麒麟恰好是武一品官员补服的图案），屋脊装张口兽，与太官巷几处参领宅院及五塔寺西街“乌大人”（参领）的府第相比，这里的规格似乎

更高，因而可以肯定恒小校址确系显要高官的官邸。

2. 呼和浩特巴氏系托博克后裔：

恒昌店小学校址原属巴姓蒙古。土默特蒙古族姓巴的有两大家族，即呼和浩特巴氏与包头巴氏。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高宗弘历在一道谕旨里说：“现出归化城都统班达尔什缺，此都统原系伊祖杭高功绩所立，后因伊子以军务获罪革退，始将别支托博克补授”。杭高既是班达尔什之祖，而托博克又是杭高的别支，可见杭、托系同一家族，均为巴拉格特氏。土默特蒙古族的汉式姓氏，有以氏族名称首字为姓的，巴姓即是如此。那么呼包的巴姓，哪支是托博克的后裔，哪支系恒小原址的拥有者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持《世管佐领多尔计云隆之家谱》（即托博克家谱）询诸包头巴姓耆老，均说该谱与其上三代先人名讳不合。询诸呼和浩特巴静山先生，巴先生肯定地说，这正是我们的家谱。我的父祖均与谱内所载相合，即祖父福禄，父亲麟阁，堂叔父经济、经阁。巴先生还介绍说，左翼世袭章盖（佐领）经济及其弟经阁，以及我们家原先均住在恒昌店小学祖屋。宅院被征为女子小学校址后，才先后搬迁。其中经阁之子经熙业，卜居和林格尔。此外，九龙湾大西巷的经姓，太官巷的吉维生均为巴氏支派。谱系的确认，证明呼和浩特巴姓确为世家望族。巴静山及其本家各支，确系托博克之直系后裔。经济、经阁、麟阁为托博克十世孙。巴静山为托之十一世孙。托博克后裔的确认，为确定右翼都统衙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3. 巴氏世居恒小校址：

托博克之后裔，虽不能肯定恒昌店小学就是右翼都统署故址，但是都说巴氏祖辈一直住在那里。巴静山先生说，1923年，该处宅院被归绥县府征用。将县立第一女子小学，由三贤庙巷迁来。他家被迫迁至乃莫气召西夹道。但经济、经阁仍住在大院内。解放以后，恒昌店小学扩建校舍，又将经阁之孙女的住房征

用。在学校东墙外，另拨平房两间，作为补偿。由此可知，恒昌店小学校址原先确为巴氏私产。前文已述及都统裁汰以后，“各衙署变价归款报部”，也就是“卖到私人手中”。究竟落入哪些私人手中？事实证明，同左翼都统衙署一样，是“旧衙为其子孙世守”。如果当初衙署确曾“变价”，出资者也应是都统之子孙，否则决不可能“世守”。此为恒小校址为右翼都统衙署的又一佐证。

4. 其它物证：

据巴静山先生说：青少年时代，他曾在祖屋神堂内见有上书“迴避”、“肃静”、“开道”字样的木牌。形制与舞台所见略同。这些木牌，搬迁时曾移至乃莫气召西夹道新居。后毁佚。另外，神堂内还存有印架，其上横搁用黄绫包裹的棒状物，内有诰封、诰命等皇帝谕旨。可惜这些东西随着搬迁和家道衰微而毁损。巴先生只知其先祖曾为土默特高官，而不清楚所任竟是一品武职要员。其所述，若非亲见，是杜撰不出来的。根据史料，有清一代，土默特两翼官员中受皇封者不乏其人。就世爵而言，托博克一系，就曾受封为一等轻车都尉及两个三等男爵。而且，曾有世袭都统等世职。这些爵、职的授予或承袭，朝廷均颁发谕旨。该家族保有皇帝的诰封，诰命并当作圣物供在神堂内，勿庸置疑。

巴先生还谈到，民国初年，在其祖宅神堂里，还珍存着前清时代遗留下来的顶戴花翎、朝珠、补服和甲胄等物。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数件缎、绢、纱质绣龙袍服。龙袍一说乍听之后，疑窦顿生。因为，土默特两翼都统系一品武职，按清制其官服的品级徽识是麒麟，只有皇帝才能穿绣龙袍服。右翼都统署保存龙袍岂不是僭越？但是，考之文献资料，疑窦顿消。《王公表传·根敦传》载：1731年10月，雍正皇帝“谕曰：土默特将弁兵丁连岁从征，甚属勤劳，已命颁帑赏赉。至都统根敦，向在阿勒台军营效力十有余年……今复至巴里坤，懋著劳绩，朕甚嘉之。特赏御用

冠服……”根敦系托博克之重孙，巴先生之七世祖，皇帝赏赐的御用冠服，自然要当作圣物供奉起来并传之后代。巴先生所见绣龙袍，当为这些御赐之物，而这些东西供在巴氏祖居的神堂内，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恒昌店小学校址确系右翼都统衙署故址。至于上述龙袍，巴先生的夫人不无遗憾地说，解放初，为筹办托儿所，这些绣龙袍有的转让给了业余剧团，有的拿到武川换了莜麦，一件也不存了。确属憾事。

三、两翼都统的坟茔

元明以来，蒙古人虽有土葬的习俗，但不树坟丘。入清以后，受满洲贵族的影响，不少显官均土葬堆坟，并刻石树碑。土默特两翼都统的坟茔即系如是。

土默特左翼都统的坟茔，位于今土默特左旗沙尔沁乡牌楼板村外。坟茔内有墓碑数通，当地人都说系丹府祖坟。墓碑内有一通大碑，高约二、三米，镌刻着满文碑文。据识者说，系左翼都统古禄格之墓碑。原碑断为两截，横卧于荒草之中。前几年，古禄格之后裔（旧姓），配合呼和浩特市文物管理部门，已将该碑重新树立起来，妥为保护。另外几通较小的石碑，系第二、三代左翼都统之墓碑。以上各碑碑文，尚待整理研究。

右翼都统之坟茔，位于今呼和浩特郊区桃花乡杨家营子村旁。在市文物管理处同志引导下，笔者于数年前曾到该处，所见唯荒冢瓦砾残碑。坟茔北首，为房舍废墟，原为三楹享堂。享堂之南，蹲伏黑色大理石龟趺三座；最大的一座，长约两米，高约一米四、五。一段约两米长的残碑倒在右侧，碑文亦为满文。据当地群众说，此处坟茔系呼市蒙古巴家的祖坟，已有多年无人前来上坟了。原来的墓碑高约两丈。离老远就能看到。在十年动乱中，墓碑被毁；有的已作了垫脚石或房舍根基。所剩的残碑约为原碑的三分之一。据识满文者称，该碑系托博克之墓碑。现在，

呼市及和林格尔县之托博克后裔，正拟加以整饰保护。

上述两处坟茔，坟丘并不很多。大约纳拉氏（田姓）和巴拉格特氏（巴姓）各支系，在很早以前便另择坟茔，死后未入葬于祖坟。所以，其后裔中有的人已将其忘却。不过，这两处坟茔，已引起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不论是当作文物或者古迹，妥为保护毕竟是件好事。这对于研究本地区的历史，总归将是有益处的。

注：①指1949年解放后市人委，再而后市人民政府迁新址，该处成为大北街市场。

土默特左翼都统表

名 讳	袭 次	袭 (授) 职时间	备 注
古禄格	首 任	1636年授左翼都统，1645年授三等子爵	姓纳拉，原居叶赫部，该部亡后，来依博硕克图汗，为头目，1632年降后金
锡喇布	一次袭，古之四子	1666年袭职	长兄乌布什第袭三等子爵，召赴京，隶蒙古正白旗
古睦德	二次袭，锡之子	1670年袭职	1686年以废职罢，召赴京，隶蒙古正白旗
阿喇纳	三次袭，古之六子	1686年袭职	1696年以废弛军律削职
古睦德	四次袭 (重袭)	1697年重袭	
丹 津	五次袭，古睦德之子	1704年袭职	1720年兼袭三等子爵，1737年卒，以无嫡子停袭

说明：1. 左翼都统停袭后，由京员简授之，名单不全，仅知吉党阿（1742年任）、噶尔锡，卓鼎（1749年任）、众佛保（1750年任）数人。

2. 右翼都统停袭后，以副都统阿尔斌为都统，授班达尔什之子赛音毕里克图为副都统。阿尔斌以后都统名单不全，仅知莽阿纳（1756年任）和傅良（1763年任）。傅到任当年右翼都统裁撤。

土默特右翼都统表

名 讳	袭 次	袭 (授) 职时间	备 注
杭 高	首 任	1936年授右翼都统	俄木布所属头目, 姓巴拉格特
巴 桑	一次袭, 杭之子		1647年以军务获罪罢革
托博克	三任, 杭之本家	1647年改授右翼都统	俄木布所属头目, 1636年授三等参领, 1638年授一等轻车都尉, 1640年晋一等参领
古 嗜	一次袭, 托之次子	1670年袭职	兄瓦弼袭一等轻车都尉, 加三等男爵, 1676年卒, 古兼袭男爵
拉察布	二次袭, 古之子	1681年袭职	
乌把什	三次袭, 托之三子	1682年袭职	
阿弼达	四次袭, 乌之子	1696年袭职	1697年以罪削职, 停袭
札喇克图		1697年简任	京 员
俄 赫			京 员
楚 忠			京 员
塔尔玛山			京 员
根 敦	五次袭, 阿之长子	1723年补袭	以副都统补袭
班达尔什	六次袭, 根之子	1742年袭职	1754年卒, 以其子位卑, 停袭, 改授三等男爵

土默特步骑两营及其演变

于永发

清末，土默特步骑两营属陆军序列，是受绥远城将军节制的地方武装，其装备和薪饷均由土默特两翼负担。这两营陆军是在佐领制衰朽，不能训练成军的情况下编制起来的，因在刀什尔战役中，击退数倍于己的山西新军而闻名于世。1912年以后，其变化颇大，也较复杂，谨择其要者简述如次。

一、从佐领制到常备军

清代，土默特两翼同所有蒙旗一样，军事上实行的是满洲八旗制度。其基本单位是佐领，即以一百五十丁为一佐。凡十八至六十岁的男子（病残者除外）均为壮丁。平时各佐按三丁披一甲（即三分之一服役，其余为预备役）的原则，抽派兵丁操演、当差；战时则二丁差遣，一丁留家。这种兵无俸饷，当差自备马匹、军械的军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随着清王朝腐败衰朽，以佐领为基础的军制到十九世纪末已名存实亡。对其衰败，当时官方的说法是：“承平日久，将鲜知兵，士卒嬉游，渐成风气”。土默特两翼则是“兵无薪饷，全倚户口地亩且耕且牧，充当各路苦差，故难望其操练成军也”。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就土默特两翼来说，户口地亩沦失，经济生活每况愈下，人口锐减（由乾隆初的六万余口，减至清末的不足两万口），恐怕是根本原因。因而其结果是“春秋二仲之蒐猕（即阅兵）仅得千余人”。操演营不得不停，“仅定百人更番操演”做做样子，佐领制便无可挽回地衰败了。

佐领既已不起作用，封建统治者当然要另外筹组军队以代之。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9月，八国联军占据紫荆关，山西吃紧。土默特兵司与户司，经绥远城将军批准，由两翼六十佐领各抽调精壮蒙丁五名，共三百名，配备鸟枪，由参佐领训练成旅，用以防卫地方。这支新组建的武装叫作巡防队，也称常备营。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更名为常备军。其编制如下：

营总（参领）一员，带队佐领三员，队官（骁骑校、前锋校）六员，随营办事官、笔帖式各一员，执旗、擂鼓、鸣金、吹号等兵四十八名，目兵二百四十名。

其薪饷，官员酌给津贴（每月共150两），目兵每月饷银三两。常年共支银一万二千六百两。这些薪饷，全部由土默特六成地租发商生息银两息银（10660两），和六成地租（4000两）项下支付。

1904年3月，由于上述两项租息银入不敷出，遂由绥远城将军贻谷和归化城副都统文瑞对常备军进行了改革。裁减兵员百名，分为左右两翼。每翼设管带一员，哨官二员，排长四员。操练一年后，使之归农，编为续备军。再选新兵入营训练，递相更代，仍称常备军。其装备以德国造毛瑟马步快枪替代鸟枪。目兵月饷亦增为三两六钱。

常备军改变了兵无薪饷的陈规。大概是因为“有饷而勤”的缘故吧，训练颇见成效，确实成了归、绥两城倚重的劲旅。

二、步骑两营的产生及其军事活动

前文所述土默特两翼经过训练的兵丁，入伍操练者为常备军，归农者则为预备役性质的续备军。二者轮换，颇有寓兵于农的意思，其中或多或少地残留一些佐领制的影子。其后组建的土默特步、骑两营属陆军序列，完全成了正规部队，官兵均为职业军人。促成这一变化的是钦差垦务大臣、绥远城将军贻谷。

贻谷在历任绥远城将军中，是比较有作为一个封疆大吏。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贻谷以兵部左侍郎出任督办蒙旗垦务钦差大臣，驻节绥远城。他主持放垦西蒙各旗牧场事务，为光绪朝的新政竭力敛财。1903年，贻谷兼任绥远城将军。他在任内实行新政，颇有建树。如组建新式陆军，开办新式学校（如陆军学堂、蒙养学堂等），试办现代通讯等等。贻谷作为封建末世比较清醒的满洲大员，深为八旗子弟的未来担忧，因而苦心为之谋划生计，将十三圈庄头地分其半给绥远城旗人就是措施之一。可以说这是深谋远虑之举。而土默特两翼蒙古却不仅不曾沾新政之惠，甚至深受其害。如清理土默特地亩一事，就是以牺牲土默特蒙古地权为代价，广收荒价、地价、加价等款，为清王朝大肆敛财。此举虽然中途停顿，却为民国初年绥远当局进一步剥夺土默特户口地权开了先例。至于土默特步、骑两营，也是贻谷利用土默特两翼的兵员和财力，为加强归、绥两城的防务而组建的。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贻谷参照北洋陆军办法改练新军。以绥远城驻防八旗满兵组建陆军步兵第一营和骑兵第一营；以土默特常备军为骨干，组建了陆军步兵第二营，人们习称为土默特步兵营或步一营，由发义任管带。不久，贻谷又招募土默特兵丁组建了陆军骑兵第二营，由福坦任管带，人们称之为马二营。以上两营土默特人一般合称为步、骑两营。其编制如下：

步一营：

管带、副官、营务委员各一员；连长四员，排长十二员，司务长四员，军需长、书记长、医生各一员；司书生六名，号目一名，号兵八名，护目一名，护兵十八名；正目、副目各三十四名；正兵一百三十六名，副兵二百七十二名，伙伙三十五名。额定编制五百二十名，不同年份略有增减。

骑二营：

管带、副官、营务委员各一员；连长三员，排长六员；司务

长、军需长、军医长、查马长、马医长各一员；书记生六名，正目、副目各十二名，正兵四十八名，副兵九十六名；号目一名，号兵六名，护目一名，护兵十名；医兵、掌匠各三名，伙伙十四名；马伏目一名，马伏二十四名；战马二百匹。额定编制二百七十人。

步、骑两营均以德国造斜五眼和汉阳造快枪装备。训练水平较高，与北洋陆军会操，曾获优胜。薪饷除原有的六成地租息银外，另由归绥道关税项下每月拨给半饷计一千三百七十余两。

1911年冬，阎锡山率山西革命军由河曲渡河北上，于农历11月间先后攻克包头、萨拉齐。释放罪囚，组成敢死队，挥军东进，计划占据归、绥两城。阎锡山占领包、萨两城时，绥远城将军坤岫急忙召集土默特两翼十二参领商量对策。决定派兵分三路前往堵击，阻止阎军东进。具体部署是，土默特步一营为上路，由发义率领；绥远城炮兵一连和口外巡防队残部（该部在拉萨齐曾被阎军击溃）为中路，由巡防队统领谭勇发率领；土默特骑二营为下路，由管带福坦率领。三路齐头并进。12月26日（腊月初七），当上路进至刀什尔村，中路进至多尔济村，下路进至马群村时，获悉阎军已抵陶思浩村，于是停止前进，准备迎战。阎军闻归、绥两城派兵西来，亦停止东进，立即部署进击。步一营利用刀什尔村西南场面的石砌矮墙，匆匆构筑防御工事，全营官兵分作两批，轮流监视阎军动态。

28日拂晓，阎军向刀什尔村一阵炮击之后，敢死队越过古尔半河，踏雪向步一营阵地发起冲锋。当其进入步枪有效射程内时，步一营一阵排枪，敢死队倒下一批，前进受阻，战斗呈胶着状态。天大亮以后，阎军正规部队投入战斗，以三倍于土默特士兵的兵力，成月牙队形包围过来，形势异常危险。发义一面派人前往中下两路要求增援，一面筹划退敌之策。他看到一名骑黑马的督战官往来驰骋，指挥阎军前进。于是从全营抽调十二名神枪

手，齐射督战官。枪响处，督战官应声落马。阎军的攻势立即停顿，接着向后撤去。

事后得知，被击毙的是阎军前敌指挥王家矩，当地有谚云：“前敌指挥王统带，一枪揭了天灵盖。”

刀什尔战役之后，阎军退到托克托城，不久即返回山西。据土默特旗耆老说，打完仗以后，步一营一些士兵感到歇后怕，纷纷携械躲回了家，直到局势平静才重新归队。此役之后，土默特步、骑两营再未参加过较大战斗。

三、步、骑两营的解散过程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令蒙旗制度一仍其旧，故土默特步、骑两营得以保留。12月，新任绥远将军张绍曾为防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的军队南下，组建了晋北中路防守司令部。将陆军第一师混成团、二十师混成营及归、包两地的八旗兵、蒙古兵、巡防队、垦务巡防队等编为绥远混成第一旅和第二旅。土默特步一营被编为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营长仍为发义。全营官佐三十一员，兵伙四百五十名。骑二营被编为第二旅骑兵二团第二营，营长福坦（不久由苏联春代之）。全营官佐二十三员，兵伙二百二十四名。两营除执行任务者外，仍驻小教场营房内。^①

土默特步、骑两营，本来是跟随全旗诸位达勒嘎（参领）“翊赞共和”的。未料到外蒙古宣布独立，却成了这支武装力量被强迫解散的原因。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看到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行将覆没，便在沙皇俄国的鼓动下宣布独立。此举引起的震动颇大。土默特两翼与外蒙相距甚远，音讯阻隔。大约是出于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切，参领们于1913年派述吉泰等十二人，前往了解情况。不料此举竟引出骇人听闻的谣言：土默特蒙古要叛投外蒙古。谣言一出，张绍曾立即将土默特各参领软禁于将军府内。据说，参领们向张竭力解释忠诚于民国，并写了形同公开信

的“十不可投外蒙古”的文章，在两翼蒙古族中进行宣传，加之地方绅商的联保，各参领始被释放。但是，张绍曾始终对土默特蒙古存有戒心。特别是对战斗力颇强的步、骑两营，更是不放心，视为心腹大患。于是，便同归化城副都统贾宾卿秘密策划，将土默特步、骑两营强行解散。

1913年11月3日晚，贾宾卿令步、骑两营官兵在营房集合，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听长官训话。队伍集合后，立即被张绍曾所派荷枪实弹的八十团官兵严密包围。接着，由贾宾卿宣布：立即解散步骑两营，官兵全部遣散。官佐每员发给盘费五元，兵士发给一元，着即归家。两营之武器装备，计：步一营步枪四百五十三支，老毛瑟枪十三支，刺刀二百十三把；骑二营马枪六十四支，步枪一百二十七支；以及战鼓、指挥刀、旗帜、军号等，全部解交绥远将军府军器库。

几天以后，张、贾着手重新招募兵员，另行组建土默特陆军混成营。11月10日，贾宾卿在其副都统令中说：“照得土默特原有步、骑两营，经本副都统于本月三号当场谕令一律退伍，另行招募编练，业经电准中央在案。现届边防紧急，军队开赴前方，后路空虚，应即招募新军以资防守”。“查有方汝梅堪以委任土默特陆军混成营营长。孔庆盛任该营副官，华以慧委任该营步队第一连连长，宋镇东委任步队第二连连长，珠尔翰阿委任骑兵第一连连长”，“仰即遵照筹备一切，毋违，此令”。既然“边防紧急”，而土默特步、骑两营又颇具战斗力，足可“以资防守”，为什么要将其解散，另募新军呢？贾宾卿秘而不宣，其中原因，实际就是不信任土默特人。必欲由他自己的亲信代之而后可。新招募的混成营官兵中，几乎没有一名土默特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土默特耆老有另一种说法，即解散步、骑两营，是对刀什尔战役击退阎锡山革命军的报复。这也可聊备一说可供参考。

12月1日，混成营编就。其编制如下：

营部：营长、副官、军需长、军医长、书记长、医生各一名；司书生二名，护目一名，护兵六名，号目、匠目各一名；皮匠、枪匠各三名，掌匠一名，伙伙二名。

步队一、二连：连长各一名，排长各三名；司务长各一名，司书生各一名，护兵、号兵各二名，医兵各一名；正目、副目各九名，正兵各三十六名，副兵各七十二名，伙伙各九名。

骑兵一连：连长一名，排长二名。司书生一名，护兵、号兵各二名，医兵一名；正目、副目各四名，正兵十六名，副兵三十二名，伙伙四名，马伙目一名，马伙八名，战马六十三匹。

这支没有土默特人的“土默特部队”，薪饷仍由土默特旗库支付，常年经费约五万三千元。约当1914年之际，又招募新编土默特骑兵一营，除每月由北洋政府陆军部接济饷项一千九百余元外，亦由土默特旗库支給。1916年，以上两营全部编入绥远警备队，取消“土默特”名号，但薪饷仍须土默特旗供给。其中陆军部的助饷往往支领不回来，前文所述归绥道关税拨饷也常因塞北关拖欠或拒付而亏空巨大，但绥远都统府每月催解饷项略不少贷。土默特旗署不得不将清代遗留之发商生息银两抽出填付。这些军饷直到1927年年中才停止支付。而这时土默特旗署的发商生息本银早已告罄，还欠下银行贷款数万元。

四、步、骑两营以后的土默特武装

土默特步、骑两营被强行解散以后，一部分官兵回家当了农民，其余的则怀着对北洋军阀的一腔怒火，有的参加了卢占魁的“独立队”，如景福曾任卢的副官处长，安安、成成等也分别当了该部的连排长，公开以武装反对绥远当局。还有的加入了玉禄所部，成为“老一团”的骨干。

1913年冬，土默特骑二营三连，在连长玉禄（字鼎臣）率领

下，在武川境内值勤。当步骑两营被强行缴械遣散的消息速迅传来时，恰值派往外蒙了解情况的述吉泰等十二人返回。他们途经四子王旗时，在乌兰花东北的二道沟被滂江守备队抓捕，只有一人逃脱，其余均被杀害。玉禄闻此二事，当即率部暴动。一举歼灭滂江守备队，开始武装反对绥远当局。玉禄起事后，被遣散的步、骑两营士兵陆续赶来加入，部队迅速扩大。为争取外援，获得武器装备，玉禄派人与外蒙古方面取得联系，得到俄式连珠枪四百支，战刀四百把，先后两次进攻百灵庙，迫使北洋军退守武川。张绍曾多次派兵征剿，均以失败告终，不得已改为招抚。森额衔命前往游说失败，又派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和武尔功劝降，几经磋商，终于说服玉禄所部官兵，于1914年被改编为绥远骑兵游击队。编制三百人，常驻包头，由玉禄任司令。下设三队，分别由有亮、松秀、都隆任队长。骑兵游击队成立以后，不断进行剿匪战斗。如1924年初，匪首窦飞龙、刘三红、徐大侉子、金牙红、杨万祯等纠集匪众数千人围攻包头。玉禄率部增援，毙敌百余人，将其击退，解了包头之围。玉禄本人也是在1925年的剿匪战斗中，以身殉职的。该部剿灭土匪，保护境内老百姓的战绩彪炳，功不可没。

绥远骑兵游击队是“老一团”的前身。该部以后番号或隶属关系屡变，始终保持着一个团的编制，因而土默特人亲切地称之为“老一团”。关于“老一团”，因有专文叙述，本文不再赘述，谨将其变化过程择要简述如次。

1916年5月，绥远都统潘矩楹成立绥远警备队，骑兵游击队被编为警备队第三路。总队长玉禄，副总队长满泰（字子舒），驻防于呼和浩特旧城，归北洋军统辖。

1921年10月，绥远都统马福祥将警备队第三路改编为绥远补充团。团长玉禄，辖四大连。团部驻萨拉齐，归宁夏军指挥。1925年春玉禄阵亡后，满泰继任团长。

1925年8月，绥远都统李鸣钟改补充团为绥远暂编骑兵第三团。满泰任团长，仍辖四大连。但兵员增至八百余名，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年3月，李鸣钟将暂编骑三团扩编为绥远骑兵第一旅。旅长满泰，原骑三团以原建制改为该旅第一团。团长李根车，各连驻防于包头、五原、临河、东胜等地。

1926年12月，绥远都统商震将骑兵第一旅扩编为山西陆军骑兵第五师。师长满泰，下辖四个团，老一团为其中之一，编制未变。

1927年10月，奉军入绥后，又将骑兵第五师扩编为陆军骑兵第三十军，军长满泰。原骑兵三团（老一团）为该军五个旅之一。仍为原建制，属奉军统辖。担负包头以西剿匪任务。

1928年，绥远区主席李培基，将第三十军缩编为骑兵旅。归晋军骑兵第二师统辖，旅长李根车（时满泰已任土默特总管）。

“老一团”为该旅第一团，团长晋梅伍。十余天后又缩编为团，团长李根车。当时官兵中不满情绪较强烈，兵员有所减少。该团仍担负临河、五原等地剿匪任务。

1929年，绥西警备司令王靖国，将李根车团改称为黄马队。1932年，黄马队被缩编为两个连，驻包头一带。次年，将黑马队两个连编入黄马队（黑马队土默特人很少）。6至8月，黄马队在李根车率领下开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此后一直驻防于大青沟一带。

1934年，黄马队（老一团）奉调驻防丰镇。不久，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按照阎锡山的旨意，以该部不适应正规操练，染有鸦片嗜好为名，将其调至大同卧虎湾强制解散。枪马归公，人员遣散，“老一团”从此解体。

老一团被解散后，一部分官兵衔恨北上百灵庙，参加了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1936年初，这些人追随云继先等进行了反对德

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百灵庙暴动。次年春，部分参加百灵庙暴动及回家务农的原老一团官兵，加入了以白海峰为总队长，云时雨（乌兰夫）为政治部代主任的蒙旗保安总队。夏季，该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1937年10月，参加归绥保卫战之后撤至伊克昭盟。1938年，该旅改为新编第三师。由于新三师从师部到各连均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因而该师成为受党影响最深，最为进步的最大一支民族武装。1941年新三师被调往甘肃整训。以后几经周折，该师大部分官兵于1948年起义，分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六十二两军。

从步、骑两营到“老一团”，从“老一团”到新三师，直到起义，土默特武装队伍中的先进分子，一直在为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艰难地抗争。经过半个世纪的跋涉、寻觅，终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水流千遭归大海”，其经历不是再一次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民族解放之路吗！

注①：小教场：是清代军队操练和阅兵之处，后亦作营坊驻军，即今内蒙医学院、附院及以北至南马路迤北范围。

归化城的庄头与庄头地

彭 勇

按《山西通志》卷六十五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内务府奏设归化城黑河、浑津十三户庄头。”

庄头地自康熙朝奏设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中间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代皇帝，二百一十多年。其经济体制一直未变，其历史可谓悠久也矣。因而，对于庄头及庄头地的成因、变迁应该有所研究与记载。笔者在修地方志的过程中，看到过一些资料，听到过一些老者的谈话。根据自己的分析研究，不揣冒昧地记述如下，以供专家批评指正。

一、庄头与庄头地的成因

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表面上征服了蒙古各部，并迫使其称臣通贡。但其一旦强盛起来，就不愿再受清廷的控制和约束了。到了康熙皇帝当政时期，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的统治下，再度强盛起来。不仅控制了整个新疆地区，还于1688年击溃了喀尔喀三部蒙古进占了漠北高原。1690年，噶尔丹又沿哈拉哈河南下，攻入漠南。先在乌尔会河（今锡林郭勒盟乌拉根郭勒）一带，击溃清军。后在乌兰布通（今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境）遭到惨败，退回了漠北。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在沙俄的勾引和煽动下，准备发动第二次南犯。于是康熙皇帝率军第二次北巡来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准备工作。其中的一项措施，就是用“跑马圈地”的形式，在黑河流域圈占了大片土地，“添设粮庄十三所”，这就是当地人常说的

“十三圈庄头地”。

圈定了十三圈庄头地后，即“于各庄头子弟及殷实庄丁内，选充庄头，各给地十八顷。每庄岁征米二百石，由归化城都统征收，储本处旗仓”。（《晋政辑要》卷十）

上面所说的选充庄头的办法是“于各庄头子弟及殷实庄丁内”挑选的，这里所说的“各庄头子弟及殷实庄丁”是指康熙八年在热河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所设的132处粮庄的庄头子弟及殷实庄丁。

二、庄头地的面积位置及其变化

归化城的浑津、黑河十三圈庄头地皆大黑河流域之肥沃膏腴之地。从西到东基本上按黑河流向分布在一条线上（见附图）。东面三户庄头俗称东三圈，也称黑河庄头。“东至茂盛营，西至达赖庄，南至道，北至渠（《归化城厅志》卷六）。但据该地老者讲，圈地之西界并未到达达赖庄，而是西界到西地村西（以上三圈现属呼和浩特郊区桃花乡）。西面的十户庄头称西十圈，也称浑津庄头，“东西相距十五里，南北相距七里零”（《归化城厅志》卷六），最西面是张家圈（现叫张庄），最东面是吴家圈（现称小白庙子，在白庙子村西南，已和白庙子村连在一起），（以上十圈现属土默特左旗白庙子乡）。庄头地在康熙三十四年初设时为每庄给地十八顷，岁征米二百石（每亩征米1斗1升1合）。到乾隆三年（1738）时，绥远城（即今呼和浩特新城）开始兴建，准备把驻山西右玉的满洲八旗军队迁到绥远城来。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可是，自庄头地奏设近40年来，由于长期耕种，生产力低下，地力减退，加之水冲砂压，每年各庄都完不成粮食交纳任务。于是，经奏报清廷，每庄各给地增为60顷，岁征米仍为200石，（每亩征米合3升3合3厘）。每亩岁征米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另外奏准归化城十三庄另垦地

1900余顷，交地方官募民耕种输租户部，以增加军队的粮食供应（《归化城厅志》卷六）。

由于历年水淤砂压，花斑生碱，庄头地实种地逐年减少，为了弥补这部分租赋的损失，清廷于嘉庆七年（1802），又从大青山后四旗空闲牧地内，拨补庄头开垦土地七百六十六顷五十二亩六分五厘。从十三圈内抽出一部分庄丁搬迁过去开垦耕种。现在四子王旗西、武川县东还有叫潘庄、吴庄等村庄的，其地名都是沿用原浑津黑河十三圈村庄的原名。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绥远城将军贻谷在办理垦务中，看到满族八旗子弟们成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一旦局势有变，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给这些人留条生活后路，曾以“见地分一半”的政策将十三圈的庄头地分拨给满族人一部分。可是由于当时的满族人还都享有俸禄，根本没人去农村经营土地。民国初，满清政府被推翻了，北洋政府取消了满族人的俸禄，大部分满族人失去了衣食之源。在生计处的安排下，仍按贻谷的政策，将一部分满族人下到十三圈，务起农来。如刘王庄的关小车家、四间房的胡魁元家、小白庙子的李家等。

三、庄头、庄丁的组成成分及变化

庄头地归内务府直接管理，是满清时期的一种农奴制庄园经济体制。

其庄头是这些庄园的直接管理者，虽然也名列庄园的额丁之中，但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生产、管理庄园、监督庄丁、催收租粮。

据大清会典载：“每庄各设庄头一人，其缺各以其亲族承充，欠粮或缘罪革退及新设之庄，均于本庄及别庄丁内补选。”

这些庄头的任免权，直属内务府。这十三家庄头，自奏设以来，也发生过变化。

据土左旗档案局现存的一份历史文献记载，乾隆元年（1736）二月，为恳请宽交上年短欠官粮，其文末具名的十三户庄头分别是：张谋、朱师洛、胡蚤、方文正、王有功、王居中、吴良弼、六十四、温保柱、丁茂盛、李之良、李二辉、赵德胜（别人都是画押或汉文签名，而六十四和温保柱二人则以满文签名）。

而一百五十年后，即光绪年间的十三户庄头则变为：王文魁、刘金钟、宋得胜、吴永茂、杜万山、刘佩、潘世福、赵玉刚、王成、张承业、丁开山、胡建基、李自明。

据老年人传说，方家因犯罪而被正法，改派潘家为庄头；也有人说，是方家把地卖给了潘家，因而潘家当了庄头。我认为后者可能性不大。因为庄头地的地权在内务府，不是私人产业，因而不可能私自买卖。据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龙王庙碑的碑志载，其重修时的经理庄头为潘文奎，说明这时已有了潘家这一庄头。

还有人说，原来西十圈庄头原有一户田家，原因田家绝户而改任他人为庄头。这种说法恐怕不确实。因为，从目前见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田姓庄头，有待进一步查证落实。

据庄头人传说，他们有的是来自热河八沟（今河北平泉县），有的是来自河北霸州（今河北霸县）。

庄丁是庄园的劳动者，其成分比较复杂。在庄头子弟中，有的是披甲武士，还有从热河原庄带过来的庄丁，也有一些是战俘和罪犯。所谓的二十四户雍正的穷亲戚，即雍正帝的外祖父威武，担任护军参领时的披甲武士的后裔。这些人和十三家庄头同时来到归化城一带，以披甲武士的身分留在十三圈，后来都全部充了庄丁。

关于二十四户雍正皇帝的“穷亲戚”，据他们中的老者讲，他们是来自热河平泉县的八沟村（现划归河北省）有的说他们来自热河赵家村。因在雍正十三年时，与十三户庄头打官司，兵部尚

书通智革退了十三家庄头，正法了方庄头，给了二十四户较优厚的待遇，把归化城大南街的一部分赐予了二十四户。二十四户，在归化城南还修缮了原先的旧关帝庙，建了自己的家庙。据说，家庙里还供着一块雍正帝赐予的黄缎子，上面画有二十四户在归化城南的房产和地产。解放后去向不明。乾隆元年（1736），通智被降旨革职、恢复了十三圈庄头原先的待遇。二十四户在乾隆中期，被提升为庄头。其庄头地在卓资县和凉城县交界处的牛角川一带。在归化城附近的（主要在南面和西南面），也给了二十四户一部分土地，让那些没当上庄头的人经营。

关于庄头的民族成份，是蒙是满，清代时区别不大，庄头人亦不记它。民国时期，又搞民族歧视，所以也不敢认定自己是什么民族。解放后，在一九五三年，经内蒙民委调查，最后以“名从主定”（民族成份是蒙是满由庄头人自己选定）的方针，经上报中央内务部批准，确定为蒙族，属土默特旗。

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

杜焯 忒莫勒

绥远僻处塞外，文化远较内地落后，而蒙旗尤其。鉴于日寇在蒙旗的不断渗透，民国政府一面加强控驭，一面倡导普及蒙旗教育，以提高蒙人的国家意识。1935年，教育部颁布《察、绥两省蒙旗教育实施办法》，对察、绥两省蒙旗教育作出具体安排。由于蒙旗师资缺乏，教育难以发展。该办法规定，在察绥境内设立一所国立蒙旗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师资。并定于次年3月1日正式开办。为了各自的利益，察、绥两省力主将该校设于本省境内，因而发生了争执。百灵庙蒙政会亦不甘落后，以该校既系蒙旗师范，自当设于蒙地为由，力主设于百灵庙（乌盟达尔罕旗）。教育部无奈，只得派员调查，进行折中，最后决定将该校设于绥远省东部集宁县。不料1936年春蒙旗行政组织变更，察哈尔右翼四旗改隶绥远省，情况已与前颁办法不尽适合。而且由于日伪军进犯，绥东局势紧张，该校设于集宁已属不可能。经绥远省方请示，教育部遂重行酌定《察、绥两省蒙旗教育实施办法》，准许蒙旗师范与察哈尔省分设，地址定于绥远省城归绥。定名为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由绥远省教育厅负责筹办。于是，绥远省教育厅保荐绥境蒙政会教育处主任、土默特旗名士经天禄（字革陈）为校长，负责拟具该校详细组织规程，并造具概算等，着手筹备成立。这时，已是三、四月间，早已超过原定开办期限。

5月1日，该校正式成立，地址暂设于旧城马路口原新民补习学校旧址。当天，教育部来电批准聘任经天禄为校长，并令其迅速抵京，筹商一切。3日，经天禄起程赴京，校内一切筹备事

宜，委托赵某负责。在南京，经天禄拜会了教育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要人，并与教育部顾司长及郭莲峰科长共同参酌蒙旗实际情况，对各项计划草案加以修正。决定先办简易师范，待蒙旗教育发达到相当阶段时，再改办正式师范。招收学生以蒙籍为限，先招师范生、补习生各一班，以后逐年添加班次。为便利学生实习及实验初等教育，添设附属小学。经费方面，开办费及建筑费为三万元，经常费一万五千元，附属小学经常费二千余元。6月13日，经天禄返回绥远，一面根据教部决定拟定组织大纲、学则等，一面聘任教职员，并筹备招生。17日补习班开始报名，人数多达150余人。7月25日举行考试，录取38人。内中程度较高者升入师范班，程度较低者编入附属小学，8月1日开始授课。师范班于7月7日开始报名，距考试尚有月余时，报名人数即已多达140余人。8月20日考试，录取32名，31日开始授课。附属小学暂设于旧城九龙湾，仅招收五年级一班，学生由各蒙旗保送。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主任云文斋。

该校由教育部主管，遇必要时，得由教育部委令绥远省教育厅就近监督指导。校长综揽校务并担任教学，月俸200元，由教育部任命，原则上优先任用蒙人。校长下设教导处，有教导主任一人，协助校长办理教务、训育事宜并担任教学，月俸150元。此外，有体训员一人，月俸60元；会计一人，月俸100元；均由教育部任命。校医一人，月俸30元；事务员一人，月俸30元；女指导员一人，月俸40元；管理员一人，月俸30元；文牍一人，月俸20元；书记二人，月俸各20元；教员若干人。全校15名教职员中，师范大学毕业生4人，普通大学毕业生5人，专科学校毕业生1人，中等学校毕业生3人，其他2人。

校舍系临时租用，共有办公室2间，教室6间，卫生室1间，学生寝室9间，职教员室9间，女生宿舍2间，女指导员室1间，图书馆2间，理化仪器室1间，储藏室1间，悔过室1

间，盥洗室 1 间，传达室 1 间，工友室 2 间，厨室 2 间，饭厅 3 间，厕所 3 间。卫生室负责诊察教职员、学生及工友的疾病和指导学生卫生课的实习。有器械、药品等 102 件，全部接收自本地民生医院。理化仪器室有理化仪器用品 17 类 119 件，生物仪器用品 9 类 315 件。图书馆有藏书 1116 册，杂志 44 种。

学生享受公费待遇，在校期间的所有学费、膳宿费、讲义书籍费、制服费等，概由校方负责。膳费每人每月国币 4 元 5 角，招工承办，学生请假离校时停止供给。津贴每人每月 3 元 5 角，用于购置书本文具及其他物品等。每人每年发给单制服、衬衣裤各一套，布鞋两双；每二年发给棉制服、棉外套各一套，裹腿布一付；此外，每人发给褥单一条。

该校以养成蒙旗初等教育之健全师资，推行蒙旗义务教育，培养行政人才为宗旨。施教原则为：1. 适应蒙旗社会环境，2. 训练社会组织能力，3. 理解整个民族思想，即中华各民族互助团结之意识，4. 训练师资技能。以第 3 项为重点。宗旨与施教原则如此，课程的设置自与普通师范学校有异。除普通学科外，设有蒙文、农业及实习、畜牧、兽医、医药及附产品制造等适合蒙旗社会需要的学科。师范班学制四年，课程有：公民、体育、生理卫生、国文、蒙文、算学、历史、地理、植物、化学、物理、医药、劳作（工艺）、美术、音乐、农业及实习、畜牧、兽医、教育概论、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乡村教育、蒙旗教育问题、实习等。补习班相当于小学五、六年级学力，学制一年。课程有：公民、体育、卫生、国文、蒙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劳作、美术、音乐、书法、蒙文书法等。每学年自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8 月 1 日至次年 1 月 31 日为上学期，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为下学期。1 月 10 日至 3 月 1 日为寒假，7 月 11 日至 8 月 10 日为暑假。全校共有学生 140 余人，因蒙旗文化落后，程度普遍偏低。该校教导主任宗荣庚曾说：“简易乡村师范班，功课尚及中

乘。若补习班，则程度相差甚远矣”。

该校招生虽面向察绥各盟旗，但由于当时的局势和游牧盟旗文化落后，报考和考入的学生基本限于几个较为开化的以农业为主的蒙旗。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完全汉化的土默特旗。师范班共有学生39名（女生3名），其中土默特旗34名，察盟镶蓝旗2名，正黄旗1名，伊盟准噶尔旗2名。补习班共有学生41名（女生1名），其中土默特旗25名，察盟镶蓝旗8名，正黄旗2名，正红旗3名，镶红旗3名。学生中农民子弟占58.69%，政界人士子弟占23.91%，宗教人士子弟占2.17%，军界人士子弟占1.03%，其他占11.13%。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绥远省政府在《绥远省二十五年度推行蒙旗教育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本年度应添招简易师范班一班，名额以四十名为准。由锡、乌、伊、察各盟及土默特旗每旗群保送高小毕业生或相当程度之学生二名。其不足之数，由学校径行招收之。该校为办理招生便利起见，设招生委员二人，分往各蒙旗劝导学生入学”。

该校经费较为充裕，二十五年度（1936年7月至1937年7月）经常费为三万元，附属小学另有经常费三千元。为促进教学，该校曾拟具详细计划，待校舍解决后，筹设附属牧畜场与农事试验场。1937年春，经多方物色，于归绥城北公主府西南购妥空地105亩，作为新校舍基址。并绘制新校舍平面图呈部备案，筹备建筑。校长经天禄满怀信心，计划“待立体图制就后，即兴工建筑。建筑费共为四万八千余元，预计于本年八月底校舍可望落成”。不料时隔不久，“七、七”事变暴发，察绥局势激变，该校不仅发展无望，很快便在风声鹤唳中悄然结束，前后仅存在了一年多。归绥沦陷后，该校被日伪接收，全部校具最后转归伪蒙古学院所有。

从蒙古学院到厚和兴蒙农业中学

杜焯 白燎原

五十多年前，呼和浩特东南大台什村，曾有一所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最高学府”——蒙古学院。如今遗址不存，故老谢世，已鲜有知者。

说起蒙古学院，不能不提到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三十年代，他年富力强，思想较一般封建王公开明，是当时内蒙古王公中的翘楚，在蒙古政界和知识阶层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德王认为：“凡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之文明进化，均与教育有莫大之关系。而国家之行政，首重教育”。蒙古民族“欲图转弱为强，除兴教育，别无它法”。故早年他即在本旗（锡盟西苏尼特旗）兴办学校。1935年在百灵庙进行蒙古自治时，创设过百灵庙小学。1937年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他又令各盟旗设立小学。并在戎马倥偬之际，于5月，在德化市（即今化德县）创设蒙古学院。委郭尔卓尔扎布（锡盟苏尼特左旗郡王）为院长，陈绍武兼任教导主任，分设师资、电报、补习各班，招收蒙古青年施行短期训练，以培养干部。可是开课不久，绥远省傅作义部攻陷德化，蒙古学院遂告夭折。

1937年10月归绥沦陷，改称“厚和豪特”。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便赓续前愿，着手重建蒙古学院。1938年2月仍任命郭尔卓尔扎布（时为伪政府常任参议）为蒙古学院院长，以桑宝（包维翰，喀喇沁人）为教导主任，文德乐夫为事务主任，负责筹备事宜。办公地点，暂设在政府参议会。桑宝负责拟定章则，计划招生；文德乐夫负责编造开办及经常费预算，并物色院址。当月24日，奉令接收绥远新城南街原绥远省立

工科职业学校为院址，并迁入办公。以后，又奉令接收了原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的全部校具。不久，呈请政府通令各盟旗，按所定学生分配表选送学生，于3月20日以前来院考试，准备4月1日开学。不料院址忽被日军占用，原定计划无法实现。3月25日又奉令接收位于大台什村的原绥远省立农科职业学校为院址，遂着手修缮，以备开学。因各旗保送到院的学生已有30余名，为避免学业荒废，便暂分为甲、乙两补习班，于5月2日临时在旧城马路口原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内开始授课。5月16日第一次教务会议通过自由投考生试验办法。19日举行考试录取，25日师范班开课。是时，因桑宝、文德乐夫年老多病、办事不力，为德王所不满。遂改派米吉道尔济（黄葆庆）为教导主任，吾勒吉卜林为事务主任。是月29日，迁入大台什村新院址，并照常开课。6月中旬，各旗保送到院的学生已达174名。遂照定章编为旗务、师资、师范、电务、补习甲、乙等六班，于20日起分班授课。7月12日，补行开学典礼，德王与伪政府副主席李守信及各机关长官、顾问等出席了会议。院长郭尔卓尔扎布作了开学报告，德王、李守信及曾任德化蒙古学院教师的伪财政部顾问栉部正晖，分别作了开学训词和致词。勉励教职员努力工作，学员刻苦学习，以造就出更多实用人才。

该院隶属于民政部。院长下设有教导处、事务处，各有主任一人。开学不久，领导人等即有所变动。8月中旬，教导主任米吉道尔济赴日满视察教育归来后，升任畜产部牧野处处长。遗缺由政府事务官那苏图（王庆三）接任。9月初，郭尔卓尔扎布改任畜产部部长，院长一职由蒙疆联合委员会阿勒唐瓦期尔（金永昌）兼任。除院长、教导主任、事务主任外，当时全院有职员12人，教员13人，学生196人。其中旗务班23人，师资班23人，师范班26人，电务班45人，补习甲班38人，补习乙班41人。本年首年度经常费为28,460元。1939年夏建院一周年时，除院长、教导主

任、事务主任外，全院有职员、教员各20人，学生231人。其中师资班19人，师范班35人，电务班34人，补习甲班29人，补习乙班59人，补习丙班55人。教员以蒙人为主，多来自文化较高的东部盟旗，以喀喇沁人为多。此外，有少数汉族教员和日本教员。

该院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其教育方针是：在思想方面，“养成学生使抱负复兴蒙古民族，促进东亚和平之正确思想及信念”。在训练方面，“养成严肃整齐，坚忍耐劳，动作敏捷，服从规律之良好习惯。”在精神方面，“养成勤、敬、忠、诚等习性，以发扬团体生活之精神。”其校歌曰：“高举学习的旗帜，我们奋发培养德才，要更新传统社会，让新蒙古的福运盛如新月。坚定不移，固我‘雄邦’。”德王对该院十分重视，不仅亲笔题写了“勤敬忠诚”四字为院训，有时还亲临训话，以加深学生对他的印象。1939年夏学校周年校庆时，蒙疆政府各级首脑、日本顾问等20余人题辞祝贺，以示关怀。事后，该院还隆重出刊蒙汉合璧的《蒙古学院成立周年纪念特刊》，以志庆贺并广宣传。

该院授课以蒙语、蒙文为主，汉语、日语为辅，以培养各盟旗实用人才。师资速成班，学制一年，主要培训各盟旗在职教员，课程有：合作概要、历史、地理、数学、应用文、修身、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行政、民众教育、小学教材及教学法、教育测验及统计、劳作、美术、音乐、体育及实习等。师范班，学制三年，专门培养小学教员。课程有：合作概要、历史、地理、算术、修身、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民众教育、小学教材及教学法、教育测验及统计、蒙文、日文、汉文、生物、化学、物理、伦理学、教育史、教育原理、普通心理、儿童心理、卫生、劳作、美术、音乐、体育、军事训练及实习等。电务人员训练班，学制一年，专门培训电务人员，以扩充盟旗电政。课程有：蒙文、日文、电报收发、无线电公约、通讯概要、工程概要、电池学理、电律、实地架设通信法等。仅毕业一班即停办。补习班，

学制一年，为程度低的学生补习蒙文及各科基础知识，使其能升入各班，继续深造。甲、乙两班课程不完全相同，约有：历史、地理、算术、修身、蒙文、日文、汉文、蒙文书法、卫生、常识、自然、音乐、体育、军事训练等。旗政人员训练班，学制半年，专门培训各盟旗在职行政吏员，以促进旗政。课程有：政治概要、法制概要、卫生概要、农牧概要、合作概要、地方自治概要、普通行政、实用簿记及统计、应用文、地理、历史、体育、军事训练及行政实习等。仅举办过一期。

该院系官费，学生的食宿、制服、书籍、文具等均由院方供给。院内还设有图书室、仪器室，藏有各种图书、教学仪器及各种标本等（大约是绥远省立农科职业学校及绥远蒙旗师范学校的旧物）。院医室有西医、蒙医各一人，负责全院师生员工的健康。此外，院内还饲养有牛羊等家畜，用于改善生活及教学。学生来自伪蒙疆辖下各盟旗，由于蒙地文化落后，各旗保送的合格学生，往往不足规定数额。学院成立之初，额定招生300名，结果仅招收到196名。而且由于蒙旗俗尚早婚。学生多系有家室的已婚青年。因就学较容易，伪满辖下东部盟旗的青年，亦有投亲靠友，入该院学习者。全院学生过军事化生活，校服与军服相仿。因当时常有抗日活动发生，局势不大稳定，故除上课学习而外，学生还须夜晚轮流荷枪站岗值班。

为了诱感和利用蒙古青年为其侵略服务，日寇极力推行“日蒙亲善”的奴化教育政策。而蒙古知识阶层及青年，渴望的是民族复兴，不愿受日寇的驱使。所以，从成立伊始，该院始终存在着蒙古族师生抵制日寇控制和奴化教育的斗争。特别是教导主任那苏图，竭力抵制日籍教师长海治郎、斋藤正广等对学院行政、经费、教学、训练各项工作的干扰，以致日蒙教职员间，不断发生摩擦。在蒙疆政府的一次蒙古教育会议上，那苏图针对日人强化日语教育的企图，提出应学习英语，并与到会的日人发生激烈的争执，致使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在院内，那苏图亦因坚持蒙文授课为主

而与日籍教师多次发生冲突。并在定作学生制服等一些事情上，多次抵制日籍教师的无理要求。甚至在武汉陷落，日寇举行庆祝典礼和强迫市民游行时，那苏图不仅没有表示庆祝，反而潸然泪下。以致被日籍教师斋藤正广告发，险遭逮捕，最终不得不调离学院。以后，随着日寇对蒙疆政府的控制加强，该校增设了由日人担任的副校长，以强化监督，蒙古族师生对日人的反感便更深了。

该院号称“最高学府”，不过是反映了德王对它寄予的希望。由于蒙地文化落后，学生程度较低，充其量不过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迨蒙疆政府迁往张家口并设立蒙疆学院后，它便由混合编制的“最高学府”降格为普通中学。1940年6月1日改称厚和蒙古中学校，由吾勒吉卜林任校长，日人藤本季登任副校长，并将以前的编制改为一、二、三、四、预科等五班。次年3月增设女子部，全校学生额定为220名，共分六班。1942年10月丹璧扎布任校长，不久，日人矶部正一任副校长。1943年1月，该校改称厚和兴蒙中学校。1944年1月又改称厚和兴蒙农业中学校，规定女子部为四年制，同时停办男子部预科班。全校学生定额为260名，分农科四班，女子部三班。校长由布和巴彦（汉名刘醒民，已故，曾任中共内蒙古大学物理系总支书记）出任。1945年夏日寇战败投降，该校遂告结束。

该校共存在了七年，除旗务班外，总共毕业学生176人。其中电务班34人（1939年6月毕业），师资班20人（1939年6月毕业），师范班19人（1940年9月毕业），男子部5班91人（自1940年12月至1944年12月），女子部12人（1943年12月毕业）。就数量而言，这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这些学生大都在各盟旗工作，对蒙旗小学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提高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解放后，他们更加努力的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工作，作出更大的成绩。其中最著者当推国际著名蒙古语文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清格尔泰教授。

先祖父福坛与刀什尔战役

赵相璧

辛亥革命时期，在塞外古城归绥（今呼和浩特）驻扎的满清部队（实际上主要是土默特旗组建的两营蒙古兵）与山西北上晋军发生了一次闻名塞北的战斗。在当时来说，这也是塞北的一件大事，所以人们把它称作“刀什尔战役”或“谷勒畔河之战”。先祖父即是这次战斗中清军一方的指挥官之一。关于这次战斗，前人已有一些记述，但本人以为仍有补充的必要，因此，仅据老人们的回忆，以及本人在1958年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内蒙古组时，所访问到的一些材料略作补充。

先祖父，名福坛，字兰亭，1878年（光绪四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区北讨思浩村。幼年因家境贫困没有读几天书就辍学在家，协助父母做点零活，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青年时期，在外祖父家中当小长工。一天因锄地没有把草铲净，被外祖父揍了两锄把。一气之下，他就离开外祖父家，入伍当了兵。此后，他就随着部队东奔西跑，有一次曾传闻，他在外面走路时掉到冰窟窿里了。他母亲听说（即我的曾祖母），急得把眼睛都给哭瞎了。

祖父为人豪爽，办事果断，在朋友兄弟们中间，他的威信较高，大家都信得过他。因此，当归化城副都统麟寿组织土默特旗骑兵守备队时，就选任他做了管带。

土默特旗骑兵守备队也叫骑兵营，组建于1911年（宣统三年），当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塞外，群情大震。就在这个时候，归化城副都统麟寿为了控制地方局势，成立了这支由二百七十人组成的守备队。这支骑兵部队，虽然是新组建的，但

由于它的士兵，大都是由土默特旗的箭丁组成，年令多在三十岁左右，故能征善战。开始他们的武器装备并不太好，后来因为接收了后路巡防队库存的枪支弹药，换成了崭新的汉阳造步枪。

土默特旗组织的武装，共有两个营。先祖父所带领的骑兵营，一般称作“马二营”。在此之前，还组建了一个步兵营，一般称“步一营”，发义任管带。所谓“马二营”和“步一营”，乃是土默特旗的蒙古人从旗民角度的称呼。因为步兵营组建较早，称“步一营”；骑兵营组建较晚称“马二营”。实际上步兵营的真正番号是“绥远陆军第二营”。它是绥远城将军贻谷组建的两个新式步兵营的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材料中都把“绥远陆军第二营”与土默特旗的“马二营”混为一谈；把绥远“陆军第一营”和土默特旗“步一营”混为一谈。因此，有人把“马二营”三连连长玉禄说成是“步一营”三连连长。故此，对这个问题我想在下面多说几句。）

绥远陆军第二营（即土默特旗步一营）全部是由土默特旗蒙古人组成。它的前身称“巡防队”，建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改为常备军。1904年（光绪三十年），当全国各地大练新军的时候，新任绥远城将军贻谷奏准清廷，把这支部队改编成一支新式陆军，番号“绥远陆军第二营”。一律穿操衣，不穿号挂。官兵人数按北洋陆军章程编制，每营五百二十人。教练由北洋少壮派军官担任，按新式办法操练。武器全部是德国造的斜五眼和汉阳造步枪。堪称装备精良，战斗力也很强。此外，还有一个绥远“陆军第一营”（也称巡防队），是由满洲八旗兵改编而成的新式陆军。管带谭永发。这支部队一般人们也称之为“满洲陆军第一营”。以上即是贻谷在绥远编练的两营新军。

在清代，归绥包括归化和绥远两城。归化城在西，绥远城在东，相距五华里，统称归绥。它是清朝政府统治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政

治、军事中心。清朝政府在这里设有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和归绥兵备道，节制口外十二厅及土默特左右两翼。这里的驻军如前所说，有绥远（满洲）陆军第一营，驻绥远城；绥远陆军第二营（即土默特旗蒙古步兵营，俗称步一营），驻防归化城；蒙古骑兵营（即土默特旗马二营），驻防归化城；还有汉军外八旗后路巡防队，驻防归化城北的小教场。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全国各省纷纷响应。10月22日和10月25日陕西和山西两省先后宣告独立。这不仅震撼了清朝政府在归绥的统治，而且大大地推动了这个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1月9日（阴历十月十九日）驻防在归化城北的汉军外八旗后路巡防队，在统领周维藩的率领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之后，部队即撤离了归化城，西进包头，宣布独立。后因失去警惕，被包头地方反革命势力所镇压。

归绥后路巡防队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决定联络山西晋军北上归绥，重新收复包头，东取归绥。此时，山西晋军也受到很大损失，都督阎锡山放弃太原后决定北上。先攻取包头、五原等地，然后，再谋取归绥。

此时，绥远城将军坤岫闻报，感到万分焦急。当晋军进驻包头之后，绥远城将军坤岫更加焦急。他一面急调满洲陆军第一营赶赴萨拉齐防阻，一面告急清廷：包镇为各厅西北门户，该镇既失，归绥危险至极。若萨拉齐再失，归绥难保，晋、直后路何堪设想。惟有仰恳天恩，迅速就近拨派重兵收复包头，援救归绥，以保边外全局，神京屏障。清廷闻报，感到绥、包形势吃紧，遂赐令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大同镇总兵陈希义各派得力军队往援。尽管如此，何、陈二人仍迟迟不予发兵。

就在坤岫感到情急势危的情况下，晋军于元月16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沿河东下，直趋归绥。至萨拉齐击溃守军，取得该厅。晋军在萨拉齐充实军备之后，继续东进。

这时，归绥城里已是风声鹤唳，官民皆惊。绥远城将军坤岫连日奏报，“匪徒”节节进攻，归绥岌岌可危，要求清廷速飭察哈尔都统、大同镇总兵就近发兵，星夜来绥救援。尽管坤岫苦苦乞求，清廷一再飭令，察哈尔和大同仍然是一兵不发。坤岫在呼救无援的绝望中，不得已召集土默特旗十二家参领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应战办法，妄图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会上坤岫精神沮丧地说：大清帝国已到存亡之际，新旧二城能否守住，全靠你们土默特旗维持了。土默特旗十二家参领在清代享有清朝政府赋予的各种封建特权，对清朝皇帝有世受“皇恩”的感情。对革命他们认为是一种大逆不道，特别是对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的革命口号极为反感，认为“鞑虏”二字中也包括了蒙古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土默特旗十二参领在会上一致表示，拥护清朝政府，愿意出兵阻击阎锡山东进。

会后，坤岫即命令土默特旗步一营、马二营与谭永发的满洲陆军第一营同去西路防守。元月24日（阴历腊月初五日），部队自归绥出发。26日（阴历初七日），步一营进入刀什尔村，满洲陆军第一营进入多尔计村，先祖父带的马二营进入马群村。时已探知晋军已进到陶思浩村。彼此相距大约都是十里左右，部队遂停止前进，各自布防，准备迎战。

是日，晋军行至陶思浩村，闻知清军已在刀什尔附近各村庄布防，亦停止前进，研究明日东进的作战计划。刀什尔村在陶思浩东北，相距十余里，背靠大青山，南临谷勒畔河，地势险要，加之多尔计和马群两面策应，清军的布阵应该说是周密的。然而晋军自踏冰过河，长驱直入，进驻包头，东取萨拉齐，一系列的胜利使部分将士产生了轻敌思想，尤其是前敌总指挥王家驹，认为在萨拉齐已经击溃了清军的精锐部队陆军第一营。精锐尚不堪一击，其余更不足道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向清军发起了进攻。

27日（初八日）拂晓，晋军自谷勒畔河向清军发起攻击。管带发义指挥步一营阻击。晋军以三倍于清军的兵力从西南向东北方面，成扇形包围上来。发义感到形势紧急，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派人与两翼联系。正当双方战斗激烈的时候，先祖父听到枪声即带马二营接应上来。这时，他看到晋军中有一个骑黑马的指挥官在阵前指挥，十分骁勇，他对手下的一名护兵说，“虎子，你看清了没有？那个骑黑马的！”“看见了”，虎子回答说，“那就向他开枪”，说着一声枪响，那个指挥官就落马阵亡了。这个指挥官正是阎锡山的前敌指挥官，统带王家驹。因此，后来在土默特旗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王统带走的快，一枪揭了你的天灵盖”。王家驹阵亡之后，晋军的攻势渐渐地松弛下来了。此次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晋军几经冲锋，仍不能攻下刀什尔村。阎锡山见刀什尔之战如此激烈，估计迅速攻下归绥更难。时间拖久了，恐怕山西的地盘会被他人所控制，遂下令撤兵，由美岱召折往托克托城，稍事整顿后，即返回山西。

据先祖父对家人们说，此次战斗结束之后，土默特旗步、骑二营的蒙古士兵，听说晋军数倍于自己，如果继续进攻，确难支持，因此，都有点“后怕”，有的人竟跑回家了。

刀什尔战役之后，土默特旗组织的步、骑两营部队经过休整即分赴各地驻防。步一营暂驻萨拉齐，马二营被调到武川。此时，民国已经开元。

就在这年的冬天（12月3日，阴历十月九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集团，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在库伦宣布“独立”。接着他们又派人分赴内蒙古各盟旗散发“檄文”，策动内蒙古的封建王公依附库伦。这时（1913年4月）土默特旗龙图章京等，即鼓动驻防在武川大滩（伊克尔地方）的马二营第三连连长（当时称哨官）玉禄发动兵变，响应哲布尊丹巴集团。库伦方面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欢迎，并拨出1200枝俄国造步

枪，支持他们在归绥组织武装。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密说玉禄是先祖父的哨官，他带队投奔外蒙，与先祖父有关系，因此，先祖父即被扣押起来。

外蒙哲布尊丹巴集团煽动内蒙古封建王公响应外蒙“独立”的行径，在内蒙古除引起像玉禄等极少数人的兴趣之外，绝大多数蒙古王公及广大蒙古人民是反对的。一计不成，又施一计。1913年春夏之间，哲布尊丹巴集团又向内蒙古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犯。他们兵分三路向乌拉特中公旗、河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武川县、四子王旗、陶林县进犯，企图夺取归绥、包头。

（向内蒙东部地区的进犯，这里就不谈了。）在哲布尊丹巴集团的军事进犯当中，玉禄等人充当了急先锋。对于哲布尊丹巴集团的军事进攻，北洋军阀政府命令当地驻军，进行全面反击。

新任绥远城督军张绍曾，鉴于外蒙“独立”，土默特马二营第三连哨官玉禄兵变，对土默特旗这两支部队特别不放心，因此当他接到北洋军阀政府全面反击哲布尊丹巴集团军队的进犯命令之后，即对土默特旗这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步一营编为晋北中路第一混成旅步兵第一团第二营。旅长孟效曾，团长刘虎臣。马二营编为第二混成旅骑兵第二团第二营。旅长吴吉长，团长李春秀。整编之后即开赴武川、陶林等地与进犯内蒙古的外蒙军队作战去了。战争结束之后，张绍曾对这两支部队仍不放心，唯恐再发生哗变，遂于秋天即命令他们到小教场集合听训。当这两支部队集中到小教场之后，即被张绍曾预先埋伏下的部队包围，强行缴械，宣布解散。

先祖父被扣押之后，张绍曾派人对他进行了多方面审查，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有支持玉禄私通外蒙的行为。到秋天，当部队被解散之后，他也被放了出来。此后，一直在家务农，再没有出入行伍。

“老一团”始末

张尔杰

玉禄姓王，字鼎臣，本名王玉禄。土默川的广大蒙汉群众，出于对他的爱戴与尊敬，亲昵地叫他玉鼎臣、玉司令或玉官儿。久而久之，习焉不察，有些人便把他的姓氏以玉误王了。他个性耿直，胆略超人，任事诚朴。

玉禄于同治十一年（1873年）诞生在毕克齐村里，岳王庙东边的井儿街，为土默特旗右翼二甲首佐人。幼年家境十分贫困，仅仅念了几天村塾《四书》，就跑到归化城（现呼和浩特）寻找生活出路。他给族伯达恒泰（土旗参领）赶了“红拖尼”轿车子，一直干到三十七、八岁时，应征去绥远陆军步二营入伍当兵。因他很能吃苦耐劳，善于接受新式操练，处处为同棚（班）吃粮的弟兄们起带头；又有达恒泰的情面，和土旗名人武尔功的堂兄弟关系，管带（营长）发义，便把他提升为少尉排长。

宣统元年（1909年），土默特旗的召河地区，已经有零星土匪骚扰，特别是革命党人在南方不断起事的影响，绥远将军坤岫为了镇慑地面及预防党人发难，考虑到巡防新城由满人组成的绥远步一营已经腐化，不能打仗。驻守旧城由汉人统领的各哨（连）官兵，又很不可靠。光凭土旗的步二营，实嫌兵力单薄，难以应付紧急情况。于是，便决定扩建一支蒙古骑兵部队，扶植他们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就让土默特旗成立一营叫防卫马队（后改称骑兵营）的纯土旗籍蒙古骑兵。各级军官都从步二营调升，发义的背副福坛，提任骑兵营管带（营长）。下辖四个连，连长依次为穆子珍、额凤亭、王玉禄、朱宝山。除械弹由将军衙门给装备外，士兵以征募结合的办法来充实。粮饷则仍由土默特旗的大青山煤厘

和“六成粮地”收入项下挤拔。由于新城步一营的满兵，待遇优厚，薪饷从藩库关发；以及除总管衙门外，其余任何机关单位，也没有蒙人参预工作的缘故，致使土旗步骑两营的官兵，对于这种民族歧视，十分不满，而玉禄尤甚。可他既没有多大权力，又没有后台支持，只好憋着闷气，隐忍而已。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全国各地，纷纷脱离满清政府。玉禄便乘时崛起，一下成为绥远地区的风云人物，开始谱写他非凡的历史篇章。他举过民族起义的大旗，当过清匪安民，保卫桑梓的司令，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艰苦创业，缔造了“老一团”。

“老一团”，是在国内动乱政局的影响下，时而被扩编，时而又被缩编，但始终保持着—个团的番号，而得名的。到李根车时期，划归“晋绥军”骑二师郭凤山部节制。由于官兵都骑着黄色战马，故又叫过“黄马队”。二者皆为绥远蒙汉人民称呼子弟兵的敬词。

“老一团”，不是北洋政府的嫡系部队，更非北洋军阀的忠实工具，是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利用各派你拉我拽争夺之风，谁来归谁求生存的。始终保持着它的民族性，地方性，进步性，和独立自主性。因此，绥远的历届统治者都想利用它，又都想吃掉它！

“老一团”的官兵们勇敢善战，胆头子大，枪头子准，它的谋士的笔头子也硬。它与绥远的“独立队”和“哥老会”，有斗争，也有妥协；有时是敌人，有时也交朋友。敌者为保卫家乡，绥靖地方的责任攸关所决定，非打不行；友者因土匪都是北洋反动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当然不愿意落一个“鸟尽兔死”的结局！

总之，“老一团”是由玉禄创建，满泰发展，李根车结束的。在二十年时间里，它作为土默特旗上层文人的政治资本，和北方

十五、六个大小军阀的部属，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夕，在绥远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它都发挥过不同寻常的作用。但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与消失，并不完全决定于每个领导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国内政治风云变幻的形势所主宰。因此，有必要把它的跌宕起伏历程，尽可能地加以整理和详述。

下面，我根据民间传说，结合刘映元先生在采访原“老一团”三连连长云陟阁老人时的口述笔录遗文，并参考多种有关史料，共写三节，以副文题。舛错之处，谅必多有，敬希热心史志的朋友们给以补正。

一、玉禄创业时期

宣统三年（1911年），岁次辛亥，已经在太原宣告山西独立的阎锡山，以“秦晋蜀北伐先锋大都督”衔，率领民军经鄂尔多斯驰驱北上。于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攻下包头，十二月初二攻克萨拉齐，准备进窥归化城。清廷绥远将军坤岫，慌忙召集土旗十二参领开会，决定派出土旗步骑两营堵击，于同月初八日（一九一二年元月二十六日）激战于刀什尔村，替清政府挡住了民军的东进，玉禄参加了这次战役。

坤岫随着清王朝的崩溃黯然去职后，窃据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改派前二十镇（师）统制张绍曾为新体制的首任绥远将军。他于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十四日（阴历九月十九日）接印视事。

外蒙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告外蒙古独立。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由于沙皇政府的支持，建立蒙古帝国改元共戴，被推为皇帝。这本是辛亥年公历十一月十日的事，并于九日已由沙俄驻华公使正式照会北京清政府。就在外蒙独立当局驱逐清廷所派办事大臣三多的同时，一面飞檄内蒙各旗，煽动响应，一面加紧备战，相机南进。但土默特旗的上层人士，如公

主府的朋楚克和一些参领们，由于不愿分裂祖国和为了保全各自的财产与地位，都没有轻举妄动。及至张绍曾瞰中大青山煤厘局这一税收财富，于民国二年初撤换了土旗派任的各分局局长和各卡卡长。换上他带来的亲信故旧掌权后，才迫使这伙统治者不得不起来抗争。因为实质上，张是在为取消旗制迈出了第一步，不啻砸了他们的铁饭碗。于是一面公推武尔功为代表，进京上访，请求保留旗制和煤厘税收权利；一面派章京图森额（鞞图）、刚仁阿、塔沁阿、大召喇嘛尔计、杨家堡人达赖等五人，赴库伦（现乌兰巴托）进见哲布尊丹巴，表示拥戴的诚意。他们受到款待后预允再让扩编三个营，发给俄造大连珠步枪一千二百支。商定于民国二年五月，内外蒙两军会师归化城。并令他们遣返土旗，策动步骑两营尽早发难。这时候，土旗陆军营也派述吉太等十二人偕往库伦联系。

民国二年（1913年）春，防御外蒙独立政府军队南犯的北洋政府军队，已经云集热（热河）、察（察哈尔）、绥（绥远）三区与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袁世凯任张绍曾兼晋北防守（总）司令。他又分任陈希义、朱泮藻、孔庚为绥远境内的东、中、西的三路防守军司令。为了缩短防线，弃百灵庙于不守。而以福坛的蒙古骑兵营，李秀春的满族骑兵营，和驻包头的原巡防队谢若霖的骑兵营，合编为绥远混成第二旅。任吴吉昌为旅长，开到武川县境内布防，归中路司令朱泮藻统一指挥。福坛的营部驻在可可以力更镇。派玉禄与朱宝山的第三、四两连，驻守可可以力更北面的伊克尔地方和岔岔一带，是为前沿阵地。

与此同时，张绍曾为了贯彻袁世凯“先稳定内蒙各旗，再解决外蒙问题”的既定方针。派绥远第一混成旅长孟效增，亲率部队把乌伊两盟盟长，用武力将他们“请”到归化城。召开了“两盟会议”，取得了“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的共识。而玉禄，由于出身寒门，起自行伍，了解兵民的疾苦，不仅官兵关系一贯融

洽，就连在驻地的军民关系，也搞的亲如一家。

那年头，走新疆、甘肃的驼户，常利用运输之便，在驼屉里暗带大烟土，到包头或归化城走私。当行经玉禄防地时，被他缉获了一部分。他没有上报和上交，就擅自给士兵们分发了。因而招致吴吉昌的猜忌。引起玉禄的思想顾虑，恐怕安身不牢。就在这时候，图森额与达赖二人，以喇嘛装束密访玉禄，劝他拉起部队，投向外蒙古。玉禄虽然心动，但仍犹豫不决。可巧，述吉太等十二人从库伦返营途中，被张绍曾的滂江守备队截获。除达饶一人侥幸逃命外，其余都被处决了。玉禄闻讯，怒不可遏，民族自尊心促使他当机立断，决定傍晚拉走；脱离北洋体系，扛着民族起义的旗帜，和朱宝山都带队开到百灵庙，支持外蒙古独立。朱宝山是左翼五甲苏克精阿嘎兰达的孙子。行前，他们集合两连官兵讲话，玉禄说：“这次我们队伍前往百灵庙是有任务的。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要有战事。但不要害怕，我们的枪械弹药是有办法的。大家要抱有坚定的决心，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玉禄和朱宝山的两连骑兵，是民国二年四月中下旬之交拉走的。他率队奔袭了滂江守备队，把他们全部歼灭。同月下旬出席了“百灵庙会议”，径赴库伦进见哲布尊丹巴。被封爵为赛德（大臣之意），补充给大连珠步枪四百支，马刀四百把，以及弹药等返回百灵庙。哲布尊丹巴又实授玉禄为司令，朱宝山为第七营管带，共有四百余人，待命出击。

因东蒙名人松彦光汗（海山）也参加了哲布尊丹巴的政府，被重用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又推荐热河蒙人达赖公为“内蒙招抚使”，收编打家劫舍于察哈尔西部的卢占魁为“骑兵统领”。另任哲盟胡匪陶克陶胡为兵部侍郎兼皇卫队队长。在沙俄炮兵协助下，气粗胆壮，利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无力兼顾北疆的时机，全军南犯。而卢占魁在领到达赖公给转发的枪支弹药后，也已率部挺进四子王旗和茂明安旗境内，与玉禄会师了。他两个

都站在外蒙独立当局一边，参与了进攻武川的战役。旋因外蒙军全线失利：西线被张绍曾指挥的三路军司令挡住，东线为米振标的毅军和吴俊声的奉军打败。致使沙俄气馁，外蒙畏难。至民国二年七月，战事告一段落后，中俄两国代表在恰克图几次交涉，终于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沙俄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外蒙取消独立，实行自治，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但玉禄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原来是：玉禄一拉走队伍，张绍曾就急忙抽调部队去追击。因玉禄顽强苦战，不能收到剿除效果，改派达恒泰去劝说玉禄回旗。玉禄在武川境内某地，单骑会见。达恒泰以参领和族伯身份恃大压小，强迫他服从命令，克日率部回旗认错。玉禄藉口大便解马超乘，驰归本队。张绍曾认定玉禄的问题，与收回煤厘局、卡税收和取消旗制交织在一起。已经演变到受土旗上层人士所操纵的程度，悍然软禁十二参领，作为人质，要挟玉禄就范。十二参领以《十不可投外蒙书》上书张绍曾，藉明心迹。到“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玉禄愤然的说：“剩下我自己也要搞独立。”这显然是一种发牢骚的气话。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而“蒙古帝国”政府，当时认为内蒙去参加的人，多是里通中国的奸细，致使战事失败。所以对于先前流入外蒙的一些西盟籍的官兵，都解除了武装。二次到库伦为玉禄请领械弹的图森额，被扣捕起来审讯。就连松彦光汗（海山）本人，也被抄家监禁，严刑逼供。何况土默特旗籍的官兵，又不愿远离家乡，寄居绝域，致使玉禄进退维谷。由于张绍曾设计解散了土旗陆军营，致使该部官兵，怀着冤枉之心、愤懑之气，陆续投效于玉禄麾下。这时，他已拥有一千余人的伙股，独据百灵庙，与麇集在固阳广义魁的卢占魁相呼应。

张绍曾不甘心玉禄的存在。于民国二年十月，调北洋第二十师（由清二十镇改建）的部队，向百灵庙进发，预计在一个月內

肃清玉禄。该师为北洋精锐，装备优良，步炮配合。接火后，日有激烈战斗，玉禄弃守百灵庙，以机动灵活战术取胜。时已初冬，塞外严寒，二十师的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作战，困苦艰难。忽一日，只见玉禄所部，仓皇后撤。该师乘机发起尾追，勇往直前。不意玉禄回军从正面硬顶，另分两翼向左右包剿，把追兵首尾截断，除被打死打伤俘杀而外，余多弃械逃回百灵庙。从此士气崩溃，不堪再战。便把百灵庙大庙抢劫一空，放火烧毁，然后退回归化城。

这时候，袁世凯为自己能当上中国皇帝创造条件，已经宣告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变，出于羁縻蒙古人的需要，便准予保留土默特旗制。并令张绍曾仍将煤厘税收之权归旗署所有，至此，武尔功代表的官司算是打赢了。张绍曾眼见用武力镇压的手段不能解决玉禄的问题，也接受了中俄谈判时中国首席代表陈箴的意见：“请出玉禄亲人劝说玉禄回旗。”于是释放了十二参领，让玉禄堂兄武尔功、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参领森额、伊精额四人，到后山招安玉禄。玉禄也觉得粮饷弹服没有来源，到处人吃马喂苦害地方，感到当独立队不是长久之计，也派朱宝山为代表，和他们接头谈判。终于达到了有条件的收编：一是保证每个官兵的生命财产和家属的安全；二是编为绥远骑兵游击队，辖三个连，共三百人；三是先给发一个月的薪饷，以示鼓励；四是不进归化城常驻包头。

玉禄所部是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上中旬之交，收编为绥远骑兵游击队的。任玉禄为总队司令，有亮、松秀、都隆分任第一、二、三队（连）队长，但玉禄在百灵庙时已经是一千多人的大股，除限额收编三百人外，又给由绥远总商会拨款，归银海喇嘛率领，驻在什拉木伦（召河）的保商团，安插了一些人。下剩的大几百之众，都参加了卢占魁的“独立马队”，他组成了实质上的“蒙汉联军”。

玉禄驻防包头，自然要时出游击，剿匪捕盗。由于卢占魁部的许多人与玉禄的官兵，是同族、同乡，甚至远在陆军营时已建立了同事关系的缘故，能够相互理解彼此的处境，所以只要玉禄出征，无不退避三舍，望风而逃。“独立队”一跑，玉禄本着“穷寇勿追”，得胜而归。且因他的官兵技高胆大，勇猛善战，遇有不识火色的匪徒顽抗时，大都以被歼灭告终。因此，玉禄声名大噪，遐迩闻名。

民国五年（1916年）五月，早已继张绍曾为绥远都统（将军改称都统）的潘矩楹，为了镇压如火如荼的绥远农牧民暴动大军，请准北洋政府增设绥远警备队三个路。扩编绥远骑兵游击队为第三路，任玉禄为司令，荣祥为参谋长，张玉戌为秘书，耿子荣为副官长，瑞辑五为军需官。下辖四个队（连），以多才、李根车、松友三、荣陞阁为队长。

张玉戌系河北沧州人，字兰田，清末任清水河县红笔师爷，工刀笔，巧心计。后来一直担任满泰和荣祥两任土旗总管的秘书长。玉禄能把他和塞北文豪礼遇使用，不仅证明笔头子硬，也可看出大志所在。从此，玉禄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地替绥远的执政者效劳。在北洋军阀统治绥远时期，他和北洋马德润、张树云（外号张飞）两个骑兵营，跟固阳的兰瑞保卫团，合组为一个第四支队。受“淮军”萧良臣（字汉杰）委派的包头警备司令李际春（1）指挥。他一改过去态度，毫不手软的兜剿卢占魁的“蒙汉联军”。双方长期苦战，伤亡皆重。到民国七年（1918年）九月下旬，终于把卢部压迫到黄河岸边，将作背水一战的时候，在清水河石湾子一段，突然结成一寸多厚的冰桥，渡过了“蒙汉联军”，驰向陕北，参加了于佑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但仍怕他回军绥远，留下玉禄这一支铁骑，就在榆林城外的沙窝里驻防二年半多，以备堵击。迄民国十年（1921年）阴历六月初三，才被继任绥远都统马福祥调回包头，令他进剿“哥老会”。这时，李际春早已调

离绥远。

绥远的“哥老会”，在民国九年前（1920年）就有了自己的武装，由萨县保卫团总侯宪章（名斌成）率领，辖有三个连。石老么、史海、王英（字杰忱）分任连长。晋西和绥包的大龙头杨万祯（小五羊），就住在侯的团部发号施令，指挥徒众。侯的部队在表面上算是保卫团官兵。另外接受“哥老会”领导的，还有卢占魁的旧部苏雨生和赵有禄各部。在绥西河套，更把王同春（王英之父）的“公中”、“牛棋”变成“哥老会”的营盘。王为陕北绥西的大龙头，不过他因家大业大，不以办会吃饭。但他的地伙计和长工短汉们，却到处拧枪下马，扩充武装。虽经萨县二十四顷地天主堂，和固阳黑教堂的神甫向马福祥建议，发表王同春的儿子王英为包五护路司令，也没有把这些“会匪”完全收编起来，反而有了窝藏和遁逃藪。所以马福祥的军阀政权，完全陷于“哥老会”的包围之中。

“哥老会”，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党人对他们的团结、教育、发动和使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民国前阶段对军阀政府，仍发挥着这种作用。他坚决地、不懈地，一直是北洋反动军阀政府的“反对派”。因而被称之为“会匪”。

马福祥的部队，对付不了绥远的“哥老会”。他于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改编绥远警备第三路为仅发八成饷的绥远补充团，任命玉禄为团长。想依靠玉禄的铁骑，为他“安邦定国”。武尔功向玉禄建议：“你要想搞好团体，文人必须用张玉成，但还不够，武人必须用满泰才行。”

满泰字子舒，是土默特旗鄂尔格逊村人，且系老同盟会员。民国六年（1917年）倡议“绥人治绥”，发动“五英雄起义”失败后，被北洋绥远都统蔡成勋下令通辑，辗转流浪到大连，不能回旗。武尔功遂向马福祥以多年积案，不应纠缠为理由，申请明文撤销通辑令后，被任为补充团中校团附（副团长）。其余官佐

未动，兵额仍为三百人。团部驻萨拉齐，各连分驻绥西各地，维护地方治安。

当时，归化城以西的半个多绥远，完全成了“哥老会”的天下。除铁路沿线的较大县镇外，后套、后山、梁外和东胜等大部农牧地区，几乎没有“白头牛”（“哥老会”对未入会者的讥称）。负责卫戍包头的城防司令蒋辉若（2），仅有董升伯的一个团的兵力（“西军”步兵）。玉禄增派云陞阁连，去给他壮胆。民国十年阴历六、七月间，“会匪”侦悉包头城防空虚，决心攻占该城。其先头部队，到达西北门外时，城里尚不知晓。但因他们闯进城外“放小场”（3）的马群里抢马。惊跑了马信，随即向负责守备西北门与西门的连长云陞阁告急。云便马上关闭两门率兵登城抵御，才使“会匪”未能得逞。然而包头依然处在两千余“会匪”的包围之中。驻在萨拉齐的玉禄团长，星夜驰援。于次日到达包头，下令云陞阁、多才（4）率两连出击。在西北门外的花圪台村遭“会匪”伏击。多才身先士卒，冲入敌群，中弹后仍战斗不息，不幸壮烈殉职。此役“会匪”方面，一个姓那的连长亦被击毙。包头之围遂解。

马福祥感到“哥老会”对他的政权威胁太大，决心展开全面剿除。于同年阴历十一月间，分两路出兵：后山是“西军”刘实甫和马子材的两个骑兵团；前川是玉禄的补充团和马鸿逵的骑兵。玉禄为了在“马家军”面前显示土默特健儿的英勇善战，便主动承担了“西军”的开路先锋。可是，他的官兵由于和“会匪”都是绥远的地方人，有的甚至是在百灵庙搞独立时已经相识的老友，心里恨不起来。加之又鉴于多才牺牲的教训，故多不愿意狠打痛剿。特别是玉禄率部由包头出发，已经挺进到西山咀附近时，马鸿逵的骑兵还在公庙子一带蹒跚；更没料到补充团通行无阻地走到董牛河头时，竟然与从甲兰坝庙开出来的“会匪”遭遇了。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和没有后续部队，仓卒应战，乱成一团，很快就

被“会匪”层层包围起来。玉禄奋战，臂部负伤，云陞阁见情况十分危急，突围不得，就破喉高喊：“误会啦！误会啦！朋友们误会啦！”“会匪”听见后，因不愿意与地方部队结下深仇大恨，也便让开一条出路，各自收兵了。

绥远补充团长兼萨县清乡司令玉禄，在扒子补隆养好伤后，仍回驻萨拉齐。马福祥见他很有利用价值，自然十分器重。让他继续担任包、萨、武、固、归、和各县境内的剿匪任务。他南征北战，东打西杀，为保卫家乡，不顾鞍马之劳，一直干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的部队，从民国六年到十二年间，所有驻防和路过萨县的人吃马喂，都让商会和农会一律结算出来，照数付清。没有在地方上落下亏欠，这是以往各军从未有过的事情。因此，老汉们有的就说：“咱们的玉鼎臣，不愧是玉官儿”！一直称誉到他牺牲以后的许多年。

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于马福祥利用、分化、消灭“哥老会”的手段彻底败露，激起“哥老会”的“海水大潮”（5）向他算帐。致使包头城防再度吃紧。马福祥急调补充团移驻城内，责成守备，兼负河西剿匪任务。到次年七月间，“哥老会”动员上五千人马的乌合之众，在窦飞龙、杨万珍、王金牙、刘三红、徐大侉子……等人的带领下，再次围攻包头城。玉禄指挥所部，分路出击，酣战彻夜，卒将他们击退。

当时，绥远境内民变迭起，乱象环生。所谓“会匪”、“独立队”、变兵、土匪，遍地都有。大股的千二八百，小伙的十来八人，各有“把儿头”，到处滋扰，破坏社会秩序。玉禄为保护人民安全，除暴安良，追剿不懈。苦战经年，终于将中、小股匪伙，基本肃清。惟大股匪帮仍然恃众流窜。

原来，苏雨生、赵有禄、王英都曾是为马福祥收抚的骑兵营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马派他们率队出发，支援直军。战后，奉令移驻北京南苑。马福祥怕他们回到绥

远“捣乱”，秘密串通直军将他们全部缴械。王英跑回绥远，因是马的干儿子，当了都统署的参议。苏、赵则跑到河西，号召旧部，重振旗鼓，决心报此一箭之仇。专门和马福祥作对。他们吸取山东临城劫车事件（6）的经验，率刘喇嘛（7）等股，奔袭了和林县的达尔素天主教堂。掳去比利时神甫卜某，又游击到五原境内，把游历过境的英国少将费某绑架。都带到河西大淖尔根据地，好吃好喝的按“财神爷”供养起来，并通知马福祥来赎肉票。因为是洋人遇难，马怕引起外交抗议，丢了乌沙帽，急派都统署参谋长赵守钰偕中校参谋陈玉甲去见苏、赵，商议赎价，未谈出结果。玉禄却用“佯变诈降”计，派战士根旺和胡金海二人投效苏、赵。趁隙把英国少将费某解救出来。苏雨生大骂：“这狗日玉鼎臣真不够朋友，真的给马福祥当忠臣呀！”遂对玉禄怀恨在心，耿耿不忘报复。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雨生、赵有禄、刘喇嘛等，合股两千余众，从河西过黄河，流窜于托克托、萨拉齐、和林格尔等县。这时，就连王英的姐姐王友琴（二老财）之婿段得功，也在五原的南牛渠招兵秣马，形成匪股。达拉特旗蒙人金虎臣（金此老）、金山（小金子）、金双喜父子，也在河西骚动起来，大大地扰乱了冯玉祥的政权。绥远都统李鸣钟乘专车到萨拉齐视察，差点被苏雨生在公积板车站附近活捉住。而驻守包头的警备司令石友三的步兵，又追赶不上“独立队”的骑兵。李鸣钟一面把遥控“会匪”的龙头杨万楨（小五杨）、张耀等枭首示众，一面派补充团进入伊盟痛剿。玉禄率领全部人马，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正月十六日，从包头孤军渡过黄河，二十九日挺进到五凤魁山附近。苏、赵、刘、金等人，深知玉禄恃勇好胜的个性，和惯用的猛冲猛打战术，把他诱到杨三虎圪卜包围起来，四面环击。当时玉禄已经是五十二岁的人了，因嫌鞍马劳累，常坐上轿车子指挥战事，目标太大，又不易转移，遂负伤被俘。

苏雨生等想拉玉禄下水，劝他领上众人造反。玉禄破口大骂后，暗吞金戒指一枚（8），在桃力庙附近气绝。苏等恨他立场坚定，割头剝手，以泄私愤！

玉禄的牺牲，震动了整个绥远地面。为了缅怀他的功绩，激励来人，绥远都统李鸣钟报请北洋段祺瑞政府，发给抚恤费银洋三千元。陆军部追赠陆军少将衔，在归绥旧城给建立了忠烈祠堂。石友三在包头城南滩地里，高搭灵棚，亲自主祭，举行了规格空前异常隆重的追悼会。包头各界万人参加，每人左臂佩带黑纱，以示哀悼。李根车请银匠模拟玉禄的遗像，铸造了一颗银人头，镶嵌在颈项上。未几，满泰接任团长，全体官兵在满泰率领下再进伊盟，化悲痛为力量，同仇敌忾地打得苏雨生各股匪徒不能在伊盟立脚。他们除把玉禄首级奉还外，大部投降了榆林的井岳秀。被收编为另一“哥老会”龙头高石秀的骑兵营，驻防在府谷、神木一带。苏雨生则被冯玉祥收编为少将骑兵支队司令，这些都是后话。

二、满泰发展时期

玉禄死后，补充团团长的继任人选，成了问题。当时所辖的四位连长是：松秀（字友三，此老村人）、李根车（毕克齐人）、云陞阁（字松亭，白庙子村人）、金自成（色丙地村人）。流行的顺口溜是：“头连全硬二连勇，三连养活些姑娘兵，四连不打不闹称英雄。”正如张玉成向石友三介绍的那样：“一连连长松友三资格最老，二连连长李根车最能打仗，三连连长云陞阁长于对外联络，若论文武双全，还是满泰团附。”石友三采纳了他的意见，报请李鸣钟任命满泰为团长。于民国十四年春末，在东胜县城，宣布接印就职。同年八月，李鸣钟扩编绥远补充团为暂编陆军骑兵第三团。增员加饷，充实战斗力，团部及所辖四大连人马，已达八百余人。同时，也有少数达拉特旗蒙古人和归、萨籍汉人参

加进来，仍任满泰为团长。由于他是一个团的番号，所以，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老一团”。

满泰个性宽和，深谋远虑，颇有长者风度。早年饱读《四书》《五经》，熟知古今成败历史，很有政治头脑。他当了三年多时间的团附，便接了玉禄的班。所以当时有人说：“玉禄是打江山的，满泰是坐江山的。”玉禄奔波了十五、六年，奋勇创业，却给满泰奠定了青云直上的政治基础，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了。就在大革命时期，成了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各派军阀头头都想争取的人物。先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军”攻打山西。绥远都统李鸣钟，赴前线指挥作战。让归绥道尹邓长耀（字建三）代理都统。邓和“老一团”秘书张玉成原是磕头弟兄。张见去年虽然镇压了杨万祯许多人，但绥远的“会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他便向邓建议提升满泰为旅长，依靠满泰的部队维持社会秩序。经邓向上级反映，李鸣钟也为了安定后方，就给满泰下了旅长的委任状。把“老一团”扩编为两个团。升连长李根车和团附耿子荣分任两个团的团长。紧接着，满泰在军阀混战，互相拆台斗争的夹缝中，很快地当上了“晋军”的师长兼护理都统。未几又升任为“奉军”的军长兼包头镇守使。这时候，他何尝不想把早年倡议的“绥人治绥”提上议事日程。可冯、阎、张的目的，都是为了利用他削弱各自政敌的势力，和暂时看守绥远这块地盘。他仰人鼻息，寄人篱下，受人控制，形势迫使他只好“坐顺车”，不能也不敢稍有越规。可见政局纷乱，情况复杂，对“老一团”的影响，是很深的，有必要作详细介绍，以弄清其来龙去脉：

先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晋系阎锡山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北洋段祺瑞执政府为了缓和矛盾，发表冯的部下刘郁芬为甘肃督军，让“国民军”离开察绥向西北发展。冯玉祥以退为进，通电下野，从集宁到苏联求

援。西北边防督办一职，交张之江代理。同年夏，“奉军”攻打南口。“直军”攻打涞水。“阎军”也结集雁门关外，欲切断京绥路。目的是迫使冯军，尽早离开察绥西去甘肃。他们事前曾商定，在占领察绥以后：奉张接收察哈政权及京绥路，晋阎接管绥远政权。但冯系“国民军”不甘心放弃既得的察绥地盘，就在南口恶战起来。张为了改变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由冯系宋哲元指挥韩复榘和石友三两部，主动向雁门关首先发起强攻。此时，“国民军”在绥远的部队，因吉鸿昌部已在开往甘肃途中，仅留石敬亭的一旅步兵驻守绥包两城。包头到石咀山之间，则由王英的包宁护路队驻防。大青山前后广大地区，则由满泰的骑兵旅，和刘会文与陈玉甲的警备第一、二路保护社会治安。到了八月份，“奉军”攻占了张家口以北的多伦。“晋军”的张荫梧和傅作义固守大同、天镇。李培基紧扼雁门关，用太原兵工厂新发明的大小手榴弹，给石友三部以极其惨重的杀伤。是时，张之江见无法取胜，急令全军撤往绥远的后套。宋、韩、石三人却就近投降了阎锡山。而南口方面溃退下来的十几万冯军，都涌进绥远境内。过去，卢占魁的“独立队”最多不过发展到一万人，老百姓还可以从甲地跑到乙地躲藏。请了“财神”还能付价抽赎。现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下来十几万人，市、镇、乡村都是兵。老百姓无处躲藏，约把百分之八、九十的骡马被拉走，连个抽赎的机会也没有，极大的破坏了农业生产。特别是当他们经过丰镇隆盛庄以西，被跟过卢占魁的人用镰刀棍棒夺去不少枪支。从后山西撤的也让武川“十大区”的民团缴走许多武器。王英的护路队，马上变成“拦路队”，亦在乌拉山前拧枪下马。以前被陕北井岳秀收抚的赵有禄、段得胜、赵青山（赵半吊子）、郭春山（郭秃子）、金山山（小金子）等人，听到“国民军”退却并乱成一团，更是喜不自胜。认为机不可失，都马不停蹄地跑回土默川扩充势力。原有百八十人的小股，用“国民军”的械弹装备成

千二八百的“大伙子”，原有三十、五十的“小班儿头”，越发遍地皆是。归、萨、托、和四县境内，由于有满泰、刘会文和陈玉甲的防护，没有受到大的骚扰。其余地方，都遭了兵匪的双重特大灾害。

同年八月下旬，韩复榘把晋系商震欢迎进归化城就任了绥远都统。“晋军”从此改称“晋绥军”。阎锡山因见冯系重用满泰为旅长，也派王谦（大同人，后任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来绥远宣慰德意，扩编满泰的旅为“晋绥军”骑五师。升满泰为师长，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及独立四个骑兵团。每团都以四大连编就。王英的护路队，也被扩编为“晋绥军”骑四师。另聘赵有禄为都统署参议。让他招抚段得胜、赵青山等部为“晋绥军”的骑兵独立旅。

同年九月上旬，冯玉祥和于佑任从苏联进入后套，十七日举行“五原誓师”后，到包头把韩复榘和石友三两部向商震要走。张作霖深知阎锡山滑头滑脑，不肯出动大军追歼“国民军”。遂用火车急运马占山的骑兵旅到包头，经乌拉山前的中滩去进攻后套的东大门西山咀。商震舍不得牺牲“晋绥军”嫡系赵承援的骑兵，又不敢依靠新收编的段、赵两部，就派满泰的骑五师，从乌拉山后的高台梁去进攻后套的北大门乌不浪口子。因此，迫使“国民军”不得不火急离开后套向西安去解杨虎城之围。

“国民军”的骑兵支队司令苏雨生，因与吉鸿昌建立了结义兄弟关系，死心塌地追随冯玉祥。他给“国民军”把守乌不浪口子，以掩护“国民军”安全离开后套。骑五师的官兵怀着为玉禄报仇的决心，一个马冲锋便把口子突破。并且穷追不舍，苏雨生沿着两狼山山麓率部西逃。把后套的最大商业中心乌兰脑包镇抢掠一空。满泰听说骑五师开出包头不久，商震便遵照阎锡山的命令，派“晋绥军”嫡系傅汝钧旅，接管了城防，并担任了包头镇守使。他才清楚了阎锡山是在利用土旗官兵。自然也联想到“一

旦没有利用价值时的后果”。所以不声不响地驻在乌兰脑包镇按兵不动，拖到次年春，才从后套开回包头。

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国民党蒋介石的东路北伐军，继西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也攻克了南京和上海。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东出潼关，于六月间到达洛阳、开封、郑州。阎锡山见战争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国民党，发出服膺三民主义的通电，加入了北伐行列。商震立即在绥远卷起五色国旗，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就算是革命了。九月，“晋绥军”分两路出兵，进攻“奉军”。右路由随冯玉祥援陕途中任“国民三军”参谋长的徐永昌（字次辰，崞县人，时任“晋绥军”第三军军长）指挥，沿京汉路北上；左路由“晋绥军”扩军后任第一军军长兼绥远都统商震指挥，沿京绥路东进。他在东进前放心不下绥远的事情，认为满泰和他的官兵还比较正派，便请准阎锡山让满泰护理都统印，为他看门守户。并给骑五师扩大编制，把“老一团”团长李根车提升为第一旅旅长。论资历，第二旅旅长本来应叫云陞阁充任，但商震为了监视和制约满泰，竟然把他的同乡史钦芳所收编的土匪添进骑二旅，强扶史钦芳当了骑二旅旅长。并指令郭青山、金宝山、赵青山这几个收抚的“晋绥军”独立旅，统归满泰指挥。不过满泰深知个中奥妙，私下常对“老一团”的老干部如李根车、云陞阁、黄根成他们说：“咱们是土旗武装，从王鼎臣以来就是保境安民的队伍，所以得到全绥远蒙汉乡亲的爱戴。现在各派军阀都在重用咱们，实际是都想吃掉咱们。不要看给咱们旅和师的番号，这是拉拢咱们的招牌。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谁也不是亲娘，只要咱们抱紧团体，谁也奈何不了咱们……”。

“国民军”仓促西开，自身难保，来不及把“老一团”吞并已属万幸。山西是紧邻，岂敢轻易得罪，自须处处谨慎。“奉军”势力强大，也得事先联络，献出殷勤。这便是当时满泰所部的处境。所以不得不用灵活的手腕，圆滑的应付，真可谓用心良苦！

为此，满泰在护理都统印伊始，即派荣祥到北京观察局势。荣祥的诗友邱杰臣，是王禄跟过的李际春的亲幕僚，而李又能够直接见到张作霖父子。遂通过邱、李的关系，向张氏父子表达了土旗官兵对“奉军”的欢迎与拥护的心情，争取张大帅的好印象。

商震让满泰护理都统印，并扩大骑五师编制。因给安插进一个史钦芳，并没给满泰增加了实力，反而造成了土旗官兵的分裂。首先是云陞阁不愿屈居于李根车之下，力主由他原先率领的二团扩编为第二旅。要求满泰拒绝把史钦芳添进骑五师。满泰劝说云陞阁耐心等待。可云陞阁迫不及待，就带上自己的全部和黄根成的人，参加了陈玉甲的绥远警备第二旅，给编为两个骑兵团。除任命黄为二团团团长外，陈叫云陞阁以副旅长兼一团团长，充实起警备二旅的空架子。满泰顾全地方大局，不愿伤了和气，对云陞阁的自由行动，也就听之任之了。

商震指挥的“晋绥军”左路军，于十月间未受较大抵抗，便轻易的占领张家口和宣化。当继进到下花园时，被“奉军”张作相、万福霖、汤玉麟三部迎头痛击，大败亏输。便慌忙破坏了一段铁路，退守雁门关，而将雁北十三县和绥远放弃。

徐永昌指挥的“晋绥军”右路军，沿京汉路北进。也因太行山的娘子关即将被“奉军”攻破，只好把傅作义扔在涿州，困守孤城，移军去增援娘子关。此时，“奉军”沿京绥路西进，收复了察哈尔，所有在绥远的山西军政人员和参加了国民党的绥远人，不是慌忙藏起来，就是从清水河退往偏关。满泰听说奉军骑兵旅长郭希鹏已率部即到归绥的消息，便带领归绥商会的人和新城满族代表李春秀出城欢迎，把郭接进。又在都统署插起两面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满泰把绥远都统大印捧上后，带着李根车去包头协助二旅旅长史钦芳维护地方治安去了。

张作霖继派刘振东为绥远警备司令，协助都统郭希鹏统治绥远。并从北京电召满泰、王英、刘会文、陈玉甲这绥远四大军头

进见。四人遵命，同时乘车赴北京，在顺城王府受到张作霖的接见。张让他们进攻偏关，以威胁太原。王英满口答应。满泰却说：

“我带的主力部队是由土旗蒙人组成的，他们有家有业，瞭不见大青山就哭鼻子。与其影响前线，不如替大帅看守后方。何况晋绥密迩相连，宁得罪远亲，也不敢惹恼近邻。我现在不打晋，将来也不反奉。”张作霖早已摸清了绥远的情况，见满泰诚恳坦率，说了实话，心里颇觉器重。遂改编“晋绥军”骑五师为“奉军”第三十军，任满泰为军长。下辖五个旅，“老一团”仍是其中的一个旅。王英的骑四师为第三十一军，任王为军长。刘会文、陈玉甲两部，分别由绥远警备第一、二旅扩编为绥远警备第一、二师，任刘、陈为师长。

张作霖十分大方，不象阎锡山那样小气。可见权术谁也会用只是巧妙不同。满、王、刘、陈四人被招待在北京最豪华的旅店里。给每人制做了一件红缎里子的高级军尼斗篷。单独传见满泰时，又加委他兼包头镇守使。给了他一张五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发给四门迫击炮及弹药。也单独给过王英、刘会文、陈玉甲等支票，只是都没给炮和弹药。仅知刘会文是四万元，王英和陈玉甲的确数不详。但是，两年以来，由于他们的部队番号急剧升格，都必须充实编额，就各派“招抚委员”，争相收编土匪。甚至有从甲部拉到乙部，又由乙部变到丙部的现象。因此，军纪难以整肃。除王英搞成官匪一体的部队，并到后来堕落为汉奸而外。刘会文因团长马骥刁抢武川案，被继郭希鹏为都统的奉系汲金纯所枪毙。陈玉甲虽然没有送了命，也在军法处戴了一个多月脚镣。他拉去的云陞阁（9）黄根成（10）两团，也在云、黄二人被汲金纯软禁期间，都自动跑回满泰身边。满泰把“老一团”发展、扩充为旅、师、军，可谓盛极一时。但因收编的各部匪类，都没有粮饷供给，到处人吃马喂蹂躏地方，遭害老百姓。大大地影响了“老一团”的声誉！

当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奉军”执行的是张作霖制定的“有党皆杀”政策。国民党在绥远的活动转入地下。满泰支持革命，把国民党人李正乐（11）任为三十军的军需处长，让他住在军部，指挥国民党的工作。

转眼进入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国民党最高层领导集团在徐州会议上决定继续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路出兵，会讨盘据在北京的张作霖。阎锡山利用因“奉军”顽抗使蒋冯李三军不能很快挺进北京的有利时机，近水楼台，发起全线反攻，抢占地盘。张作霖于六月二日通电离开北京，四日，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车站附近。九日，商震指挥的张荫梧师进驻北京。被“奉军”从涿州俘虏的傅作义也从保定软禁中跑出来，收编了张宗昌“直鲁联军”的一部残兵败将，占领了天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改热察绥三区为三省，都统改称省主席。任阎锡山为华北卫戍总司令，他成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二市的统治者。而以张荫梧、傅作义、商震分任平、津二市警备司令及绥远省主席。商震第二次统治绥远，但实际是在保定组建河北省政府，绥远省主席一职为兼职。他兼了四个月，阎锡山改派商震的师长李培基接任了省主席，“老一团”也从此进入了李根车的结束时期。

三、李根车结束时期

李培基是河北献县人，来绥前任“晋绥军”陆军第一军商震部的师长。他和河北清苑县的商震形成了晋系中的冀派。李于民国十七年十月接任省主席。这时的绥远，是自民国十五年以来连续四个年头，兵灾、匪灾等人祸加旱、涝、疫诸天灾，而天灾又加剧了人祸。致使全省赤地千里，遍地成灾。阎锡山却在四省二市统治范围内扩军备战，阴谋翻天覆地，却令李培基缩编绥远部

队。

李培基把“奉军”第三十一军，缩编为“晋绥军”骑四师，仍任王英为师长。第三十军缩编为骑二旅，拨归“晋绥军”骑二师郭凤山节制。满泰急流勇退（12），让李根车当了旅长，下辖晋梅五（老一团）、史钦芳两个团。土默川的广大蒙汉群众以李车称呼他，表达了亲切的心情。满泰旋被任为土旗总管。

李根车目不识丁，行伍出身。勇猛善战，看不出军阀们眼花缭乱的阴谋手段。他跟上玉禄和满泰，从士兵、副目（班付）、正目（班长）、排长、连长、团长升到旅长。凭的就是能打，所以还想争取当几天师长。没想到十天以后，再次缩编，仅保留了晋梅五一个团受第二师直辖。李根车只好辞职回家。他去找满泰，一进门便放声大哭，说是阎锡山欺骗了他（内幕不详）。满泰有什么办法，只好对他说几句宽慰的话！

但是地方治安，必须有军队维持。已被阎锡山改称为“晋绥军”骑一师的师长郭凤山，不久即又起用李根车为“老一团”团长。让李担负五原、临河城防和河西剿匪任务。把他和原在“晋绥军”骑二师当第一旅旅长缩编的孙长胜团，分属为兄弟单位。

民国十八年（1929年），阎锡山的嫡系将领王靖国任绥西警备司令，改称“老一团”为“黄马队”。因孙长胜所带的骑兵，就是前宣化镇守使谭庆林的老“徽军”旧部，人称“黑马队”。这样，郭凤山的“晋绥军”骑一师，就被人叫着“黄、黑马队”成为绥远地区剿匪的劲旅。又经阎锡山派北方军校毕业的学生充实进去，越发加强了战斗力。孙为该师第一旅旅长，李为该师第二旅旅长。李根车的三位团长是晋梅五、吉永昌、卜子嘉，共约一千来人。兵强马壮，阵容威武，实系“老一团”的精华所在。故在上年（民国十七年）十一月间，驻防集宁的“晋绥军”旅长赵青山（赵半吊子），因不接受缩编，率部哗变。自称“绥远革命军”总司令，拥两千之众盘据善岱、大岱各村。李培基派“黄

“黑马队”把他们撵起，进入后套。李根车率部跟踪穷追，于次年（国民十八年）阴历正月初，被“晋绥军”王英的骑四师袁占鳌迎头击毙于五原的义正集圪堵。从此，包头到五原的旅途畅通，中滩、固阳、归、萨一带人民的起居，才比较粗安。但也不要以为“黄、黑马队”都是打土匪的急先锋：当赵青山部将到大岱一带之前，善岱乡绅张茹辛就连夜跑到萨拉齐城向驻军“黑马队”告急。孙长胜的“黑马队”先绕到西老藏营子钉马掌，然后从容就道，缓步进军。他们还没有接近土匪的驻地，就及早鸣枪示警。土匪听到枪声，携载金银什物开拔。若后面枪声紧，抛弃的东西多；枪声稀，抛弃的东西少。双方的配合堪称默契！

嗣后，郭凤山因与王英部的袁占鳌、杨耀峰有来往，被阎锡山免职（13）。令孙长胜接任骑一师师长。李根车认为自己也理所当然的当骑二师的师长。便央求在满泰时期曾当过第三十军参谋长的苏凤山为他策划。请五原县长蒋子正和沃野设置局长高谦之，借助二人与李培基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关系，拿出三万元白洋的活动费，向即将离任的李培基主席买了一张“晋绥军”骑二师师长的委任状。这已经是国民十九年的事了。

回头再说张作霖被炸死后，少帅张学良“东北易帜”。北洋军阀政府的组织体系从此瓦解。国民党掌握了中国的统治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分裂，白区工作转入地下。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锡山已经由原有的六个旅扩充到六个军。他联合冯玉祥发动倒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从这年四月到八月，双方恶战于河南、山东。旋因张学良以调人身份挥军入关，占领平津，阎冯失败。蒋令张全权处理华北军政，张派傅作义接替了李培基的绥远省主席。由于阎锡山和张学良都不承认李培基的那张骑二师师长的委任状，李根车只好照旧当他的“老一团”团长。

不过还“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老一匪’在多年剿匪的工作

中，积极协助共产党作地下革命活动。如党的早期党员李森同志就曾是“老一团”的一名排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为地下党组织作了大量工作。吉雅泰同志，曾在“老一团”内挂名任职，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云泽（即乌兰夫同志）、先烈李裕智同志，都先后利用“老一团”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并多次负责接送内蒙青年赴蒙古和苏联留学的人员的往返安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同志，都曾利用‘老一团’暂时隐蔽。为党开展地下革命工作，提供过方便，保存了力量”。“老一团”在奎璧诸同志的协助下，对革命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绥远的统治者，虽然亦有所耳闻，但他们捉不到真凭实据，只能是对“老一团”增加不信任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老一团”被缩编为仅辖两个连的团。一连连长卜子嘉，二连连长赵义明。次年，又以“黑马队”两个连拨归“老一团”节制。同年六至八月间，团长李根车奉令率部赴多伦抗日，战后，回防包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瓦窑堡与陕北红军会师后，立即派徐海东将军由三边北上抗日，受到靖边地主武装张廷芝勾结三边洋教堂神甫的合力阻拦。经过长征本来已经十分疲惫的红军，久攻安边城和小桥畔洋堂不下（小桥畔易守难攻，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久攻未克）阎锡山接到榆林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的求援急电，又担心红军从陕北“窜入”伊盟，和恐怕牺牲了自己的基本部队。就令驻防包头的“老一团”，星夜驰赴三边堵击。中共在绥远的地下党员，就是在这次的李团掩护下，跟上队伍南下三边，才与延安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李根车派卜子嘉和徐海东将军见了面。徐认为打不下三边城和小桥畔，将会影响抗日军威，但继续攻坚，又觉力不从心，感到处境颇难。于是卜子嘉便当了和事老，他三进三边城和小桥畔，

以民族危亡的大义，终于说服他们拿出十万元银币的抗日救国捐送给了红军，达成和平停战的协议，又回防包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老一团”调驻丰镇。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决心解散他们。傅以该团官兵不适应正规操练和沾染鸦片嗜好为藉口，把他们调回包头，还是先从缩编开刀。因深知“老一团”不单纯是军队问题，更主要的是关联着民族问题。所以猛虎缚兔，全力以赴地慎重处理。让“晋绥军”第七十师师长兼绥西警备司令王靖国，专责监编。“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从绥东驻地率一部到包头准备接收。排长（前为连长）赵贵河闻讯率部哗变，投效了西公旗。因他的行动符合拆散“老一团”的目的，未被追究。结果缩编为直属骑兵司令部节制的“晋绥军”骑兵独立营，令驻五原县西槐木村里休整。李根车憋着满腔闷气：“营长我也要当”——这毋宁是土旗上层文人共同意愿的体现，——尽可能保留一点有生力量。

然而，“起早的不如夜行的，人管的害怕管人的”。未几，赵承绶下达命令，调他们移驻大同孤山下的卧虎湾去整训。官兵闻讯，全体哗然，私向李根车建议：“拉上大青山，就象玉禄那样当‘独立队’……。”李根车不等把话说完，一声断喝：“住嘴！你狗日们谁敢胡闹，我先打死谁，屁也不懂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李根车这一回是清醒的。

李根车带上由“老一团”缩编的骑兵独立营，移驻卧虎湾的大营盘里。四周驻着阎锡山的嫡系部队，虎视眈眈的“保护”着他们。他们采取扔下枪马，今天跑一个，明天溜两个，和请假探亲的办法，陆续回到土旗家中。最后剩下李根车一人，去见赵承绶：“我带兵无方，都走完了，来向司令请罪！”赵承绶答：“你先回家休息，等我请示（阎）总司令后再通知你。”心里却说：“你还识火色，完成了我们需要你完成的任务，该滚蛋了。”李根车如释重负，坐火车在包头下车，回到家中。（14）

至此，这支保境安民，造福家乡，度过近二十年战斗生涯的土旗蒙古骑兵“老一团”，被彻底解除了武装，成为历史名词。但它给后人不仅留下了如前文所述的史实，和令人扼腕的结束过程。也给后人做出了某些学习榜样：“老一团”的干部，包括领导人在内，为了维护土旗旗权，为了争取民族平等，为了保卫祖国领土，真正做到了顾全大局，能上能下，不计较个人名位——做过护理都统印的大员，俯就荐任级的总管；坐过旅长的将军，甘当营长；当过团长的上校，降任连长；至于连、排长回头又去当战士，就更是平常的事了。这一点的确令人敬佩，也值得今天某些人借鉴和学习。

注释：

(1) 李际春，名鹤翔，天津人，出身“二十镇”。后任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其实是暗藏的汉奸，故在日本人驱使下，发动过天津事件。

(2) 蒋辉若：宁夏人，回族。因政治需要，曾被杨万祜收为“哥老会”徒众。日本占领时期，任伪“西北保商督办”。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旋病死狱中。

(3) “放小场”：包头城里的马匹，派专人早出晚归的赶到城外放牧，叫“放小场”。

(4) 多才：蒙古族，萨拉齐城南七命葫芦头人。即经天禄夫人多淑英和白海凤夫人多淑秀的父亲。

(5) “海水大潮”：是“哥老会”的黑话。即到处起义，全面暴动的意思。

(6) “临城劫车事件”：山东匪首孙美瑶率四、五百人的伙股，活动于峰县境内，“官军”屡剿不散。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他在峰县的临城与沙沟两站之间，拦劫火车，掳去外籍旅客，作为人质，要挟北洋政府，一时震惊中外，是为“临城劫车事件”。

(7) 刘喇嘛：达拉特旗人，蒙古族，真名不详。外蒙独立传檄西盟各旗后，四子王、茂明安、乌拉特三公旗、达拉特各旗，都曾秘密派出多少不等的骑兵支援。达旗扎萨克逊博尔巴图派白彦公率队出应。“恰克图

条约”签订后，白部投顺了卢占魁，刘喇嘛一直是白彦公部的士兵。自死后，刘离开卢占魁，自成一股。

(8) 吞金戒指：当时北洋军官，都兴戴金戒指，玉禄不能免俗，故能吞服。

(9) 云陞阁被汲金纯释出以后，再没带兵，后被绥远财政厅任为绥西征收局局长。解职后，因他江湖朋友很多，成了包头士绅。解放后，被聘为内蒙古政协委员。

(10) 黄根成被汲金纯释出后，改名黄济川，到五原行医看病，抗日战争时期成了后套的名医。建国后，任内蒙古文史馆通讯馆员。

(11) 李正乐：归绥县潮忽闹村人，是绥远国民党“潘赵派”的顾问人物。后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委员，病死于台湾。

(12) 满泰退下来以后，阎锡山利用他的威望，任他为土旗荐任级总管，是为本旗人当总管的第一人。“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亦以同样的原因，任他为中将蒙边司令。但粮、饷、兵、械都没有着落。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病故。

“满泰急流勇退”。阎锡山商震认为绥远当是山西的后院，必须想法控制在晋系手中（以后傅作义、王靖国治绥就是具体实施）。而满泰一贯主张“绥人治绥”的自治口号与之相抵，尤其对满泰接受张作霖的扩编更是心怀不满。于是就削弱以至消灭满泰控制的地方部队，以达到“以晋治绥”的目的（是后来在大同孤山彻底激械遣散“老一团”确立的“既定方针”。）故商震返绥后，以整顿改编部队为借口，来瓦解这些部队，他们提出希望满泰脱离部队；同时对其部属许以升官晋级来收买分化。满泰早看透军阀们的种种手段，目的在于扩充地盘，壮大自己，残踏地方，也深知为地方广大蒙汉群众保境安民的宿愿与之相悖，为所不容。只好接受土默特旗总管的安排，退而为土旗尽其保境安民之愿了。于是阎锡山下令撤去满泰军长兼镇守使职务，又考虑到满泰是当地蒙族中的知名人物，在蒙汉群众中威信很高，不便过于苛刻，遂委他为土默特旗总管。

(13) 郭凤山，山东人。他被免职后，未敢去见阎锡山。跑到榆林给井岳秀当了少将参议，安于贫苦，过着一个人的生活。病死于抗战胜利前夕。

(14) 李根车住家于包头，不谈兵，不问政，以吸毒消磨岁月。日寇

占领绥包后，任他为游击师师长，因凑合起一些人马先后哗变，他以伪师长身份住在伪绥西联军王英的司令部，等于当食客。傅作义部反攻五原时他被俘。在护送陕坝途中，见他年老，给照顾一头毛驴，他倒骑毛驴进陕坝，说是“没脸面见后套蒙汉老乡”了。傅作义把他优待养活起来，并电询住在榆林的荣祥“如何处理”？荣祥赶到陕坝，伴他同住一时期。经傅作义同意，派回包头（任务不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非刑逼供，因日本顾问山田力保李根车绝非反蒙抗日分子而释出。后病死于解放战争时期。但绥远人怀念他的是他在“老一团”时期对地方的功绩。

玉禄事迹补正

杜晓荣 忒莫勒

玉禄，字鼎臣，蒙古族，土默特旗右翼二甲首佐人。初，为土默特陆军第二营士兵，民国初年升任该营第三连连长。以后，随所部编制的扩大和变动，先后任绥远骑兵游击队司令、绥远第四路警备队队长、绥远骑兵补充团上校团长、绥远骑兵第一团团长等职。时，绥远西部匪患猖獗，生灵涂炭。玉禄率所部蒙古健儿，奋勇追剿，出生入死，保境安民，成为名震绥西，百姓称颂的英雄。1925年春，因为民除害心切，不幸中匪奸计，受伤被俘，遇难而亡。

关于玉禄的生平事迹，在三、四十年代，于效仁的《绥远二十年匪患记》（已亡佚）、《绥远通志稿》、《萨拉齐县志》都有所记载。近年来，亦有知情者及史志工作者，撰文追述。因彼此记述多有歧异或讹误，本文仅据有关史料，略作考订或补充，敬请识者指正。

一、关于玉禄的死

《绥远二十年匪患记》载：“团长玉禄追匪深入，受困于杨二虎圪堵地方。腿部已受重创，被围数重，冲突不出，竟为匪掳。苏匪（即苏雨生）等视为奇货，待遇甚优，环请统率其众。禄瞋目发指，骂贼不绝口，旋引枪自毙”（转引自《绥远通志稿》卷62民变）。

《绥远通志稿》卷59军事载：“团长玉禄困于杨二虎圪旦村，肩部被创甚重，突围被执，骂贼不屈，自戕以殉。”卷62民变亦称：“骂贼自戕”。卷91忠烈玉禄传则具体说：“力尽被执，绝

食而死”。

《萨拉齐县志》卷14王禄传称：“誓死骂贼，遂及于难。阵亡时年五十有二也。”死亡方式不明。

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或从《绥远通志稿》绝食说，或从《萨拉齐县志》，记载模棱，还有认为王禄是被杀的。①无一从《绥远二十年匪患记》引枪自毙说。

然而，据1925年2月26日，绥远都统李鸣钟致民国政府电称：“顷据八旅（即石友三绥远第八混成旅）王参谋长宥（26日）电称：转据东胜县知事武尔功代电称：玉团长于陷敌之后，即拟自裁。奈匪徒素知该团长忠义过人，轮流严防。该团长日夜骂贼，宁死不辱。养日（22日）我军郑（金声）团长跟踪驰至，意在包剿。匪徒闻风惊窜，希我军大部追击，势难脱逸。……欲挟玉团长禄以俱遁。该团长为贼所挟，气愤填膺，乘匪徒狂窜之际，防护稍疏，夺匪徒所执之手枪，连击数贼，旋即自戕等情”。②这大概是关于王禄之死的最早、最具体的记载，其可靠性自非后世追述者可比。故《绥远二十年匪患记》引枪自毙说属实，其余诸说均误。

另外，有人称王禄被俘遇难于阴历二月十九日。③查是年阴历二月十九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与前述之养日即二月二十二日不合，误。二月二十二日阴历为正月三十日。

二、王禄遇难前受命剿匪的原因

王禄剿匪，自然是为了保境安民。《绥远二十年匪患记》、《绥远通志稿》、《萨拉齐县志》及近年诸文章众口一辞，都作如是说。这固然没错。但王禄此次受命剿匪的目的不比往常，是要营救被匪绑票勒索，引起国际交涉的比利时戴神父。据1925年2月15日《西北周刊》“外人被掳案近闻”的报道，戴神父被掳后，比利时公使“叠次向外部质问办法，而日前又由驻绥普司教

直接向李都统交涉。李都统答谓：欲保全外人，此次必有所牺牲。若因匪掳洋票，便由官厅去赎，是又沿临城之故智，从此土匪以洋人为奇货可居，而外人之生命财产益趋危险。……余对土匪决意剿办，近日已枪毙小五杨，表示痛剿之决心。”于是派遣部队跟踪追剿。前引之2月26日李鸣钟致政府电内明确称：“玉团长禄因奉命营救戴神父，奋勇杀贼，身先士卒，一往直前，疏于侧顾，致为匪徒诱入深庙，以身陷贼。”据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记载，戴神父即戴礼伯，被匪掳去达78天，后生还。驻京比利时公使曾为此致电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表示感谢。《绥远通志稿》教案卷失载此案。

三、关于玉禄的善后

《绥远通志稿》卷91忠烈玉禄传载：“都统李鸣钟闻禄战歿，率文武哭祭于包头，厚恤其家，请追赠中将衔，以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

《萨拉齐县志》卷14玉禄传载：李鸣钟“转请中央赠晋少将衔，从优议恤，并在绥远城建昭烈祠以祀之，生荣死哀，旌恤备至。”

所请究系中将还是少将，因尚无其他记载参证，难以判定。近年有人将《萨拉齐县志》“转请中央……”句的“中央”当作国民党中央，大误。时国民党尚未主国政，此中央系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政府。至于昭烈祠一说，近年多有附和者。然《绥远通志稿》、《归绥县志》均无记载，呼市耆老，亦茫然不知，当系误载。

据1925年4月《西北周刊》第9、11两期“西北要闻汇报”栏报道：玉禄死后，“冯督办赏给恤金三千元，李都统二千元，开会追悼，呈部请遗族效羽林养教之例，由公家负责培植。一面增兵剿匪，寻找遗骸。”尸身找回后，于四月“七、八两日开吊，灵柩由专车运送包头客籍。适李都统因公前赴张垣，当由都

署李参谋长及贾（德润）政务厅长、邓（长耀）道尹、邓（哲熙）财政厅长等前往执拂，沿途帮同抬扛。送至距绥四、五（十）里远之毕克齐，有东胜县知事武尔功，系该故团长之弟，当即谦让挡驾，一再拦阻，李参谋长等始各分别回署。”绥远“全区大小机关，均赠挽联等物。”一些官员，如教育厅长沙明远、绥远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冯延铸，还赋诗悼念。冯诗题为《题战将玉团长禄遗像》，其辞曰：“骁健平边负盛名，屹然西北倚长城；冲锋如入无人境，绝命犹闻骂贼声。士气不衰余勇贾，将星遽落一军惊；虫沙猿鹤谁非死，为国捐躯最有荣。”④

四、与玉禄有关的一场剿匪战

《绥远二十年匪患记》载：1925年1月8日，“团长田金凯率步兵一营，并携大炮二尊，会同警备队、托县保卫团，集合于善岱镇，出发与匪大战于柳二营地方。发炮十余响，土匪不支，始西窜。是役也，毙匪十余人，获枪十余枝，救出被掳男女四五十人”（转引自《绥远通志稿》卷62民变）。

《绥远通志稿》卷62民变载：“绥远档案：2月……田金凯部以步兵一营，炮两尊，约刘（会文）、霍（国珍）两部，与匪大战于柳二营子地方。毙匪十余人，夺获枪械十余枝，救出难民四五十人，大获胜利。”

而1925年1月3日绥远都统李鸣钟江电称：“顷据日前派出之田团长金凯报告，于一月东日（1日）早八点率混成一营，由太水营子出发，向菜柳营子一带侦察进剿，途次与绥远骑兵玉团长禄合计分剿。匪经玉团痛击后，窜至托城一带。田团先向河口进剿，次闻匪窜托境，乃复改向托城柳二营子跟踪追击。午后五点，行抵该村。田团以步兵合围先剿，匪势踉跄，弹雨所至，毙匪枕籍。余股乘天色昏昧，顽抗突围，向东南窜去。田团遂于七点进入柳二营子，救出被掳男女四百余人，于时仍有悍匪百余名，

盘据村隅，竭力顽抗。经派手枪队数十名、步工兵各若干，以步兵围场，以工兵掷放炸弹。该匪死守抵抗，酣战经时，经手枪队当场击毙土匪数十名，以炸弹抛击炸毙七十余名，生擒十余名，均经讯明，就地正法。打死匪马无数，得获匪马数十匹，复又救获被掳妇孺数十名。负隅残匪全数剿灭。向东南窜扰之匪，当经派队向该匪逃方追击，沿途毙匪无数，夺获匪人骡马各十余匹，复又救出被掳男女一百余名。计是役田团、玉团及双方救出被掳男女不下五六百名，毙匪亦在数百名以上。我军绥远骑兵赵营受重伤排长一名，兵二名。此股匪徒，经此痛击，业已望风鼠窜”。⑤

同一场战斗，无论时间、经过还是战果，记载竟如此不同。李鸣钟所引乃当时战报，自然具体翔实。况冯玉祥治军严明，时值国民军励精图治之际，田金凯的报告不会有假。而《绥远通志稿》所载，时间亦不如于效仁书切近，并以“毙匪十余人……”为“大获胜利”，记载显然不大可靠。

参考文献

①从绝食说者，有李茂林：“老一团”，《土默特史料》第十集；高志昌：“清剿匪患，保境安民”，《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六辑。从《萨拉齐县志》说者，有“老一团始末”，《包头史料荟要》第八辑；程景华：“玉禄生平概述”，《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二辑；东河区志史办：“旧军首领玉禄、满泰”，《东河文史》第七辑。称被杀者，有瑞辑五：“我所知道的玉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②见1925年3月15日《西北周刊》第5期“西北剿匪之详情”。

③高志昌：“清剿匪患，保境安民”。

④见1925年《绥远教育季刊》创刊号。

⑤同②。

曾祖父白维利创办中和店以及白氏父子在民族和宗教事业上的奉献

白慧中

一、中和店创办前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

清王朝初定中原以后，除继续推进其统一全国的大业外，对已被其统治之下的北方和西北各民族，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为防止北方蒙古族部落实力南侵，利用经商贸易向内地延伸和渗透，康熙皇帝曾在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明令将蒙汉间的贸易和牲畜交易，限制在当时的张家口和归化城两地。这就为归化城的经济繁荣和更大范围地开展牲畜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其后，清政府相继出兵，征讨卫拉特蒙古准格尔部，并平定格尔丹叛乱。较长时间的战争，进一步把地处运输线上的归化城，推上了举足轻重的后方军需供给站的地位。频繁的兵马流动，众多的军用物资集散，再加上为满足军事需要而开展起来的随军贸易等等。客观上形成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归化城内牲畜交易、骆驼运输、钱行、客店、饮食饭馆等行业，异常兴旺的局面。

从康熙至晚清，历时二百多年，其间虽有起伏和变动，但每年平均进出归化城的马匹约在二十万匹左右，羊在五六十万头左右，牛在五万头左右。这些在绥远和归化城有关的地方史志中，都有记载。而且，在当时的驻防官员的记札里，甚至在俄国游客波兹德涅耶夫的考察笔记中，也均有详细的陈述。如此量大数多的

牛马羊驼，川流不息的买卖双方、牙纪、掮客、赶运人员……，每年均按时令和季节涌入集市，在各自的“桥”上买卖交易。这种人畜相间、挨肩擦背、人欢马叫的交易情景和盛况，至今仍被传为佳话。据健在的老人们说，那时，光是存放牲畜的库伦和围栏，遍布于青山脚下，归化城四周、数十里内外的板申、营子和村庄。这种经济繁荣招引山西、河北、京津、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牲畜巨商和牛羊肉客贩蜂拥而来。专门接待牲畜客商，代客买卖，押运，负责客商食宿的多种服务集于一身的羊马客店便应运而生。中和羊马店（简称中和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下，由我的曾祖父白维利一手创办起来的。数年之后，成为清末和民国初年归化城回族人经营的最大的牲畜行买卖。当时，由回族人经营的牲畜商号和羊马客店，主要集中在归化城北门外的北沙梁、东沙梁、西沙梁、太平街、后沙滩、通道街、营坊道、东顺城街和以南的剪子巷等处。如：永德店、中和店、玉成祥、玉成魁、广顺和等。所有这些，在呼和浩特回族经济生活中，都成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曾祖父白维利和他的创业道路

曾祖父白维利，字义斋。生于清·道光末年（公元1850年）。河南省孟县桑坡镇人。

据史书记载，老祖辈于明朝万历年间，因重大变故，出走河南：一部分东入河北，一部分北上山西大同，落脚谋生。我的祖父白福哈吉和家父白世贵老人，生前常常给我们晚辈讲述曾祖父一生勤奋、上进，艰苦创业的经历。

因家境穷苦，曾祖父幼年，曾在大同跟铜匠学手艺当店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十四岁那年，他毅然抗着用麻袋裹着的小行李，步行从大同起身，西出口外，闯荡谋生，落脚在归化城。他不想干那整日里叮叮咚咚敲打铜器的活计，经人介绍住进了开设

在原东顺城街路南、由回族费氏开的双和马店（也有说叫永利马店）当学徒。他当时才十五、六岁，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勤快诚实。打里照外，眼里有活；待人接物，有礼有序；深得柜上众人和客商们喜欢。刚进店时人小个子低，身体瘦弱，每天早晚打扫擦店里的高台大柜时，总是踩着个小板凳。由于他勤奋、刻苦的工作，几年后，自己便有了一些积蓄。十七岁时，掌柜便给他顶上了生意，有了自己的股份。这时的他，已是柜上大小事能独挡一面的“小老大”式的小掌柜了。

在其后的数年中，凭着他办事干练，做买卖、看行情有眼光，讲信誉，有魄力，而且由于自己在柜上的股份日益增大，已经到了足以掌管全店生意的成熟地步。这时，费掌柜年事已高，自己不愿再挤身商界，便请中人算息退股。曾祖父便从费氏手中，把双和店全部买了下来。

买下双和羊马店，业务上全由自己裁夺。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修缮和人员调整，为了开展大范围的牲畜购销业务，他大胆高薪选聘在牲畜行当中知名度高、有眼力、能忠于职守和独挡一面的行家里手。如费国泰，其人回族中少有的牲畜行的尖子。曾祖父对他敢请敢靠。费在羊桥马桥上成交买卖时说了算数，深受东家信任。

双和店易主更新后，隆重开张，改名为中和羊马店，简称中和店。人新店新，面貌远非从前，由于广开财源，经营灵活，加之知人善任，与人相交，处处以信义为先。因而，中和店誉满归化城，羊客马贩，门庭若市，买卖异常兴隆。

三、中和店及其经营概况

中和店坐落在归化城的东顺城街，分南北两店。北店在现在的东顺城街小学校门西侧的原新绥旅社院内。南店在该小学校门正对面马路南，原呼市计量所占的东西大院中。

原店址坐南面北，老式的青砖砌成的四方形大门，宽阔高大。店院中间，各为一栋背靠背的客厅，将大院分成东西两院。西院正房七间，是柜房（即帐房）及从业人员集聚的业务室，南面是厨房灶上及储藏室。东院大部分是客商们的住宿客房。东院正面靠西面的三大间是东家掌柜的工作室。在东院中，由南到北高高拉起几条钢丝拉绳，绳上经常拴吊着数十匹专供客商上桥（走交易市场）、下场时骑乘的走马坐骑。北院是四面有房的四合大院，一般是京津羊马客的包间住房。常居常住，方便清静。整个东西两院及南北两店，宽敞清洁。客房室内窗明几净，并且专门设有供穆斯林客商封斋礼拜、沐浴净身的房间。尊重宗教信仰，突出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这种安排设置，是一般客店所不具备，博得了穆斯林客商的称赞。

我的父亲白世贵老人在世时，经常告诉我们：“你老爸爸（曾祖父）十四岁进双和店，艰苦奋斗二十来年，后来熬成自己开办的中和店那样的大买卖。凭什么呢？就凭他老那股子用心劲。什么牲畜行的门头脚道呀，什么羊马牛驼的牙口膘情呀，羊马店应该怎么做才有发展呀……这些，在他老人家来说悉底尽明，别人是瞒哄不了他的”。“再一个，就是他老人家一生秉性梗直信义当先，本人虽然没有多深的文化，但打过交道共过事的人，没有不举大拇指的。你老爸爸开中和店时，手下就你大爸爸（指长子白松峰）能顶点事。但那时他还年轻，对那么大的买卖，买进卖出，一年到头牲畜几十万只（匹），银钱上万元，靠的就是知人善用，敢委敢靠，用人不疑……”

当时的中和店，上上下下人很多，有：值勤下夜的，有打里照外“站院的”；管账的、收款的；陪同客人上桥交易的；领着客商下场看羊看马的，有专门为中和店接收三大号移交牛羊马匹看膘情估价格的；有为中和店站桥买进卖出的；还有专为客商准备骑乘，训养‘走马’压马的……，这些人既有分工又有相互间

的配合，在老掌柜的统一安排下，由各位领班的“班儿头”负责，各司其职，忙而不乱，诸事有序。

拿白天负责接待站院的来说，此职一直由来自大同的同族人白喜担任。据老人们说：白喜三十开外的年纪，穿戴整洁，腿勤眼快，嘴巧声亮。客商一进院，他立即上前，相迎相让，其声传入柜房，通报客人来到。众人闻报，出室接待，扛行装的，搬物件的，异常热情和礼貌。

又如：中和店高薪聘请的，能在桥上独挡一面的牲畜大班儿头费国泰，身怀绝技，在桥上看膘情，估价格，技压群雄。在羊马桥上的回汉族人中是出了名的尖子。凡经他看过成色、估过斤秤的牛和羊，宰下来过秤，上下差不了二斤。此外，如夏青山、丁红、马膘子等，都受雇于中和店，在桥上买进卖出，都是中和店的牲畜班儿头。

羊班儿头有福元子猛拉（马福元）、刘仓、马润月；训练骑压走马的班儿头有马登云、润德喜；负责给客商往京津、山东、河南、河北各地押运、赶送羊马的押运班儿头有靳长有等；而掌管店中银钱出入的账房总管是汉族人宠槐先生。宠先生为人老实可信，忠于职守，不久被白维利老人升任为新开发的中华书局经理，成为独挡一面的负责人。柜上平日里代东家主事的帮办助理为白姓族侄白焕斗，后来由于创办了南古丰轩饭庄，调他任饭庄业务主持。其余如客房、灶上，采购帮办，一应服务人等，均有详细的分工与职责。其任职人员，超过百人，在整个中和店南北两院中，有机地运转着。

总观当时中和店的人员安排，可以从中测出其每年的经营规模。据家父回忆：当时由中和店过手的牲畜业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用自己柜上的银两在牲畜旺季到来时买下羊马牛，销往外地。其中，有按购销合同按时押运交货的，也有抓信息，赶

行情，组织人员赶上牲畜去外地出卖的。

(二) 接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号由外蒙草地，赶运回来的牛羊和马匹，绝大部分经由中和店，给牲畜过数、分等、评估价格后，安排上桥销售或是下场入圈存放，中和店净赚印子钱（即手续费）。每年光是大盛魁的羊，经中和店过手的，就有十多万只，全部为白银支付。

(三) 每年和张家口、北京等地的羊马客店，履行供销合同。即由归化城代客买上牛或马匹，负责组织押运到指定地点交货。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代购代运，跨省区的横向联系业务。

中和店在归化城，接收大盛魁从外蒙大库伦运回的羊和马匹后，一部分转往张家口，送回族人老郭三开的广兴羊马店；大部分膘情好的羊和马匹，由专人赶运发往北京。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送老北京回族羊马行的富户马四爸开的永利羊马店交货。这马四爸乃是当时北京城最大的羊商。据说，他和清廷的七王爷有交情，门路很宽，买卖也大。年年由归化城中和店买进了上好绵羊，都销给清朝宫内外的王爷和达官贵人。有的用做年节宴席，有的留做旗人祭祀大典的供品。

总之，中和店从其营运的范围和规模上来说，每年的营业额都在白银数十万两之内。

曾祖父白维利在继中和店之后，又独资开设了中华书局、南北古丰轩饭庄、兴隆元点心铺等。而这些饭庄和点心铺，在民国年间，都曾是归化城中知名度极高有信誉的字号。

四、白氏父子在民族宗教事业上的奉献

白维利和他的两个儿子，作为回回民族的一员，出自虔诚的穆民家庭，在呼市的民族和宗教事业上也做出了一定的奉献。下面我归纳几个方面概括记述：

(一) 出资购买北坟地中的“七十亩”地，捐为公坟，掩埋亡故

的穆斯林。

呼和浩特回族人的坟地，最早有的是“老坟地”。地点在今清真大寺对面，百货纺织批发部大楼及其后院。在清朝中叶，由于老坟地埋满亡人，由当时回民大众集资购买了现在的回民果园南墙以南，包括新华大街一段、铁路宿舍至市皮毛厂全部在内的大片坟地。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切刀把子”地和以后又买的一百亩地。共计一百八十亩。到清光绪年间，除一进门的一小块地尚未埋葬亡人外，北半部已埋下了不少亡人，余留空地不多，急需再往北延伸，购地扩坟。

当时正值中和店买卖兴旺之际，白维利老人作为一个信仰至诚的穆斯林，真诚实意，毅然独家出资，购买了现在的回民果园中靠北部，由白维利老人的坟头大青石碑起，往北至回民区少年业体校北墙根，这七十亩地。据后来知情的回族老人们说，这七十亩地的地价近三千两银子，全部由中和店柜上支付。这块地一直到50年代初，都尚未埋满亡人。

（二）发起买地自建北寺坟

原北寺坟是进入民国以后，由当时的伊斯兰教中新教派人自己建立的坟地。位置在新华桥以西，回民果园东墙外，铁路宿舍所占的那片地，总面积约为25亩。

清真北寺的乡老们介绍说，当时在辟地建坟中，我的二位祖父白松峰和白福，从选地丈量到捐资筹款，以及安排埋葬等方面，他们二位都亲身参加，并以个人和商号的名义分别捐资出散。在后来的日子里，和北寺的众乡老一起，把本来是西人的坟，大同人的坟，本地新派人的三墙紧挨的坟地，用土板墙围了起来，形成了整体的属于新教派北寺坟的格局。

（三）在重修清真大寺的过程中

由清·光绪年间到民国十五年，清真大寺曾进行过几次重大的重修寺院的上建工程。在这几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中，白维利和

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经营的商号买卖，都曾出人出力，捐助银钱，协助操办，人钱到位。

当人们进入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在礼拜大殿南侧，有座简易的碑楼，碑楼下一字排列着七块大石碑。在这些石碑上记刻着从建寺以来各次重大维修工程中，穆斯林群众、商号的捐资情况和参加人员的功绩。在七通石碑中最东面的一块上，记刻着“中和店资助钱粮银贰佰吊文”的文字。主要工程项目是修建大寺的山门。也就在同一块石碑上，详细记录着修建工程中的经管人员，其中的第四人便是曾祖父白维利，这清楚表明他就是当时重修大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进入民国后，在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四年，清真大寺进行了最大的一次重修工程。碑上明确记着工程项目包括：起高和加大礼拜大殿，展后并重建南北讲经堂，扩大寺院等。这时的白维利老人，虽已谢世归真，但其长子白松峰，次子白福，秉承父志，继续全身心的投入，兄弟二人是这次工程的主要参加者和经管人员。他们不但以个人的名义出资捐助，而且连自己开办的买卖商号，也都单独出支。在石碑上明文开列着：中和店助洋陆拾元；南北古丰轩助洋壹佰元；兴隆元助洋柒拾元；白松峰以个人名义捐资拾伍元。在石碑碑文下端，书刻着白福是这次工程的主要操办人之一。

清真大寺，在民国十五年进行了又一次小规模的重修。在捐助名单中，仍有南北古丰轩各捐十五元资助工程。

（四）在兴建原清真北寺的过程中

原来的清真北寺，坐落在通道街南端。即现在的通道街加油站，和以西的马路及回民中学大楼前后的地方。是呼市地区的一座伊斯兰教新派的礼拜寺。它的前身是小北学，是在清·同治年间由旅居归化城的甘、宁、青等省的穆斯林和当地的新派穆斯林共同建立的。

进入民国年间，新派穆斯林，逐步发展增多，小北学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礼拜人，便于民国十年（1921年）重新买地盖寺，整个工程历时三年半。

当时的白家，除本人出资外，他们开的商号买卖中和店、南北古丰轩、兴隆元等都出巨资捐助。而白松峰则是建寺的总设计师和工程的总负责人之一。

在建寺的整个过程中，白松峰不分昼夜，住在搭起的席棚里，住寺监工。为了使工程如期完工，他还自己出资开窑，按工程要求的不同型号和形状烧制青砖，这就是人们常道及的：“白松峰出资开华青窑，为建北寺而烧青砖”的事。

（五）参与创建绥远第一个回族人的社团——绥远回教俱进会；创办归绥第一所回族子弟学校——归绥回部学堂

绥远回教俱进会，是继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京牛街成立之后，我们归绥的回族人，在王宽阿訇的倡导下，于一九一三年发起创建的。

一九一三年，王宽阿訇由北京来到当时的归绥后，联络当地回族中的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绥远回教俱进会。

王宽阿訇来到归绥后，据老人们回忆说，就下榻在中和店北院，在北古丰轩包饭，与我的大祖父白松峰朝夕相聚，情投意合。不久，便在王宽阿訇的指导下，由白松峰，刘朝、艾玉玺、马俊、刘化春五位当地的知名人士参加，共同募集捐资，创立了绥远省第一个回族人民自己的社会团体——绥远回教俱进会。

俱进会成立后，设在由“彰国风夫人”杨寡妇老人，出散给大寺南面的大院中。当即开展活动，到各礼拜寺向穆斯林群众讲述俱进会的宗旨，并且提出了从创办回族学校入手，逐步提高回回民族的文化水平的主张。深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赞同，纷纷自愿出钱，捐资办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回族人自己出资兴办的第一所回族子弟学校——归绥回部学堂，正式于1913年，在

绥远回教俱进会院内开班授课。

回部学校从成立到现在，将近八十余年，虽然政局变迁，几度更名，但一直延续至今它为我们呼和浩特的回汉等各民族，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才；也为提高回回民族的文化素质，做出了值得颂扬的贡献。我们呼市回族中不少人，都曾在这所学校里接受过启蒙教育。我的祖父白福也曾担任过绥远回教俱进会的会长。

（六）在清真大寺开办阿文中学和在自己家中办阿文小学

我的祖父白福和他的父兄一样，也是一位民族和宗教事业的热心人。他酷爱学习阿文。父亲白维利对二子的愿望深深理解，倍加赞许。在父亲的心中，也希望在自己的家人里，能培养出一名受人尊敬而且是出色的阿訇。

我祖父先在归绥的清真大寺和东寺，跟随阿訇学习经文。后又去山西大同清真寺和北京的密云县清真寺，投奔名师，继续攻读和深造。几年后，在密云清真寺学成毕业，“穿衣挂幃”，荣归故里。回到家乡归绥不久，便在清真大寺创办了阿文中学。为投身于阿文学习的初、中级阿訇们讲学，补习。他自己不辞辛苦，礼拜、讲经、写经、授课，受业者近三十人。个别的学员，后来都成为本地和外地传播教门的阿訇。

为了提高和普及回族青少年的伊斯兰教基本知识，我的祖父便在自己家中腾出余房，设置桌凳，开办阿文小学，讲授阿文和教义。他为了让一些家境贫寒的小孩能坚持学习，自己出钱购买了简易的木织机和棉线，亲手教学生们织布、织带（老人们过去用的帮裤腿的黑色带），制作书包，卖带换钱，给孩子们购买学习用品。当时，此举在全市回族人的心目中，反响很大。因为从过去到后来，还没有哪一位阿訇能在自己家中独自开班办学，而且别开生面地去搞现在学校中所提倡的“勤工俭学”式的教育。

白维利和他的儿子们，从清朝末年到民国三十多年，在走了

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征程里，从创办中和店到后来开办如中华书局、南北两号古丰轩饭庄、兴隆元点心铺等，以及热心倡导参加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事业，都赢得了全市回族大众的敬重。一直到今天，当我在完成这次资料搜集和挖掘时，我所听到的是一些高龄的回族老人们，饱含着深沉的回忆和怀念的情感，道出了很多我从来未曾知晓的事例，倾诉着对我祖辈先人由衷的崇敬。使我倍受教育，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绥远满族岁时节俗

富景华

自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绥远建城以来，绥远城的满族逐渐由换防制改为驻防制，所以，其一切生活都沿袭了在东北时的习俗。尤其是岁时节日，不论大小，满族都有一套十分讲究的过法，和其他民族比较，显示了其浓郁的民族色彩。

一、岁首节

元旦，即指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俗谓大年初一。是日凌晨三四点，先接喜神（即吉神），每家影壁的土地祠下贴有一条竖联：迎喜接福。这时，要在大门外生一堆火，用一个竹篓装上“黄表”和用木板印刷的神像码子，点着火，再加上麻秆和柏枝，以助火势。接着，在火上点着“把香”（即指一束香，要用红纸包住其末端），由家中的长者擎举至家，置于佛堂的香炉之中（栽在香灰中未烬净的香根，一直要到初五后才能取出）。这时，要在佛堂前磕头（妇女不磕）。与此同时，外面开始燃放鞭炮，家里有人用磬锤在佛堂击磬。紧接着，全家老小都要换好新衣，男的（包括小孩），要在袍子外面系上一根红腰带。女的（也包括小孩），要在头上戴一朵绒花或翎花，并戴一块新包头，还要系上用红布缝好了的裤带。之后，阖家团坐一处吃元宵（此举叫“揣元宝”，取其吉庆之义）。接喜神后，最忌讳開箱子（要开的话，也只能等到午时以后）和往外泼脏水。接着，就开始包饺子。讲究在饺子里，悄悄包一个铜钱。待中午吃的时候，如若谁吃出这个带钱的饺子，谁就会接受大家的一番祝愿。包饺子和煮饺子最忌讳饺子的面皮破烂。上午开始拜年，主要是晚辈给亲戚

去拜年（女性不拜年）。长者在接受礼拜之后，必定要给“压岁钱”（指用红绳穿好的铜钱）。

正月初二。凌晨时，商店、铺户开始接财神（迷信的人指可以使人发财致富的神仙，原为道教所信奉的财神。据传姓赵名公明，亦称赵公元帅，也叫财神爷）。接财神时，商号的门前要垒旺火，燃放爆竹，地方的鼓手也要出动。所吹奏的曲牌是“得胜令”。还有讨吃的也随着出来说吉庆话，送“元宝”（金纸叠的），以得到比平日更多的赏钱。居民要在晚上祭财神，在佛龕前焚香，跪拜，燃放炮仗。

正月初五，亦称“破五”。在商号和手工作坊里，若有学徒平日不守规矩，消极怠工，一般都不处理，而要等待“破五”中午开饭时，掌柜给徒弟斟一杯酒，无须多言，这就意味着被解雇。饭后，徒弟便可整理行囊回家。传统习惯自是日始，方可出行，去探亲访友。家中佛龕前要换供，将原来所供的饽饽（点心），换成自家做的油炸馓子。

正月初八，称为“八仙节”。这一天，纸码铺里都出售“星科码子”（这是一种用木板印刷的带有天体上各种星宿的图案）。人们买回家后，要贴在房檐下所供奉的“天地爷”下。晚九点多钟（所谓天上星全之际），要在“星科码子”之前设一香案，同时，要用色纸做成灯花（亦即用各色纸扎成一朵朵小花，上洒素油），然后，从香案下一直摆到大门外，再由外向内分几路，摆至所有的佛龕（如土地祠、灶王、主佛龕）。焚香后，全家人出动，用麻秆点燃。灯花亮后，闪闪烁烁，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一般有钱人，都在院中各个角落里摆灯盏（即：先制一个圆形木托儿，然后用色纸围糊，内置一个油鼻。这是一种陶器，扁圆筒状，带底，直径约三厘米，内底中间有一空芯圆柱，柱上有一小眼。注入麻油，将棉花搓成灯芯，穿入其中，冒出顶端）。它较灯花亮，且颜色鲜艳，并能点很长时间，此举意为“祭星”，也叫

“顺星”。

正月初十，称之“蒸十”。这一天，大部分人家都要吃蒸食，即吃馒头、包子、花卷、莜面等蒸熟了吃的面食。

二、元宵节

元宵节，又称“上元佳节”，也叫灯节。一般要过两天，从正月十五到正月十六。正月十五是日，商铺的元宵开始上市。卖元宵的充斥街头，当众滚制元宵的、生着火炉边煮边卖的，吆喝着招来生意，十分红火。元宵，讲究个儿大，米软，馅精味美。各摊点形成一种竞争的气氛，请顾客随意品尝。家家户户买回元宵后，先供在所有的佛龛前，然后点燃香烛。夜晚，开始张灯结彩闹元宵，放炮仗。鼓楼最上层的四角，要高悬串灯；二层楼的栏杆上，挂有红灯百余个，景象甚为壮观，引人入胜。商户门前都垒着旺火。当民间社火频频出现在街头，鼓乐之声不绝于耳时，人们都涌向鼓楼前，伫观景色。这时，炮声大作，哨响飞鸣，火树银花，全城一片明艳通亮。正月十六，是“散百病”的日子。是日晚上十点钟前后，人们扶老携幼，来到新城鼓楼的楼洞中（鼓楼不开放）扔几个钱，以示“散病祛邪”。孩童便争相在黑暗中寻觅扔下的钱（清代用铜制钱，民国后使铜板）。其间，社火仍沿袭不衰。

三、添仓节

正月二十是“小添仓节”，正月二十五是“老添仓节”。人们在当天要或多或少买些米面，以象征来年米充粮足，生活富有。

四、二月二

农历二月初二日，俗称“二月二”，这也是大年以后的最后

一个节日。这一天，要祭土地神。街市上有小摊出售蒸熟的面寿桃，纸码铺卖一种红纱布。人们买上寿桃和红纱布回家后，将寿桃供在影壁的土地祠内，把红纱布裹在“土地”的塑像上。意即给土地神换袍祝寿。有句俗谚：“二月二龙抬头”，所以，人们一般在正月时不剃头，而要等到这一天剃，谓之“剃龙头”。人们将这天的吃食和龙的称谓附会在一起，譬如：吃猪头肉谓之吃“龙头”；吃烙饼谓之吃“龙皮”；吃包子谓之吃“龙眼”；吃饺子谓之吃“龙眉”；吃面条谓之吃“龙须”。该日夜晚，社火依旧出现。主要是龙灯和九曲黄河灯。郊区黑沙图村的九曲黄河灯，最为出名。大年至此，民称“下庙”。

五、清明节

俗称“鬼节”。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上坟扫墓，焚烧，祭祖，哀悼亡灵。

这一天，家家户户还要给孩子缝制“清明串儿”（即将各色布剪成铜钱状的小块，大约一厘米左右，谓之“小布钱”。然后，将苜蓿剪成一厘米长的小段。用线穿一个苜蓿，接着穿一个小布钱。如此两者相隔连串，大约穿六七寸长即成。这个“清明串儿”讲究两端小布钱的颜色。开始穿时，必须是白布钱，末端应是黑布钱，其它颜色不限。穿好后，要在黑布钱底下缝上个小布穗，以示气候回暖，万物复苏，天人皆同。戴在衣襟上，清明节后两三天再取下。

城隍庙这一天，要在庙门前的两根旗杆上挂黄旗。巳时（上午十点左右），正殿中的藤架城隍（迷信传说中主管城的神。这尊塑像是由藤子编的架子，柔软而坚韧，能随意抬起任何一个部位，便于穿袍佩带）偶像，被八抬亮轿（无篷轿）抬出府，到城隍的行宫（旧址在今新城北门外铁道以北，有庙门、院墙，三间殿房）驻蹕三日。城隍出府时，有执事（俗称仪仗）开道，灯笼

火把伴同。每户都要提灯迎送。此时，要做道场（旧时和尚或道士做法事的场所）。如家里有前辈是阵亡的将士，就在烧纸上写其姓名，到城隍偶像跟前焚烧，意即让城隍将冥钱给死者转去。道场毕，城隍要在第三天夜间起驾返回。若家中只有孤寡老小，行走不便，就到城隍庙焚纸。

六、端午节

端午，即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亦称“端阳”或“重午”又叫“蒲节”。相传，这一日，屈原投江自杀，后人为了纪念，把是日当作节日。一年一度，历经千载百世，端午即成了传统节日。绥远满族也过端午。

五月初一开始，小商们就要到大小黑河畔及茶坊河岸挖菖蒲苗，然后运回城里扎束叫卖。吆喝的是：“菖蒲艾哎——子儿了噢——”，声音甚为凄楚委婉，直卖至初五。各家将其买回后，再捆上艾蒿，在初五早晨挂在各个门框上。每户还要买好木板印刷的彩色“五毒纸”和钟馗像及纸剪的老虎，贴在两扇大门上。还有的人家要带上各式各样的葫芦状的红剪纸，到绥远城东门外娘娘庙内东配房的药王殿焚香挂葫芦，意为祛邪。所以，这一天，在药王殿的墙上挂满了剪纸葫芦，形状各异，手工精细，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这一天，街市上到处都是设摊叫卖凉糕、粽子的小贩，点心铺也专营起粽子、麻团、绿豆糕、五毒糕之类。人们除买回去自家食用外，还要馈赠亲友。也有的不买，而自家制作。

端午中午，大人必喝雄黄酒，还要把酒给小孩的鼻孔和耳朵眼上涂抹少许，并到药房买回菖蒲根，用五色线拴在小孩外衣襟上，以避瘟祛邪。饭后，小孩一律不许外出，还要将街门关好，意为“躲五毒”。五毒即：蜈蚣、蝎子、蛇、壁虎、蟾蜍五种动物。所以，小孩过端午，非常神秘好奇，没有不怕五毒而敢随便

出门的。

也有的人要到城外挖田地里的旱蛤蟆，逮回后，等端午中午，将一锭京墨塞入蛤蟆嘴中，蛤蟆窒息后，将腿拴好，用线~~绑~~在房檐下风干即成了“蛤蟆墨”。遇有人起了无名肿毒或小孩得了腮腺炎，就用蛤蟆墨蘸汲水井的水研磨成汁，用其涂抹，疗效甚佳。若有人流鼻血不止，喝这种蛤蟆墨水，也可止血。

晚上，要将挂在门框上的菖蒲艾取下，贮存好。日后遇有小孩“洗三”（小孩出生三天时要洗澡，谓之“洗三”）时，要在水中放少许。家人谁若身上起了皮癣疮疥，也用端午时的菖蒲艾熬水来洗。

这一天，出嫁的姑娘大部分要回娘家过端午，以示“躲端午”。

七、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俗称“鬼节”。“中元”一说，道家和术数家各有所指。“道家以阴历七月十五为中元”，“术数家以第二甲子为中元”，亦称“三元”。唐人谓正月七月十月之十五日为三元日。由此可知，将阴历七月十五日称为中元节，是采用了道家之说。按照旧俗，中元节有烧衣包、祭祀亡故亲人等~~活动~~。这一天早晨，城隍庙门前的旗杆上挂黄旗。平日供奉在城隍庙正殿中的藤架城隍偶像，由灯笼，火把伴同“出府”，到新城北门外城隍的行宫驻蹕三日。每户居民及商号都要提灯迎送。还要演戏三天。此时，要做道场，设盂兰盆会（是指佛教徒为超度亡灵所举行的仪式）。其时，先由和尚、道士放焰口（为亡灵施舍之举），把五谷杂粮随意抛洒开，意为“舍孤”（即给孤魂施舍）。然后，由其引导，经过两座木板搭设的“金桥”，“银桥”。过桥时，敲打大钹吹奏笙管，口诵经文，人们紧随其后，也要过桥。道场毕，城隍于夜间起驾返回。归途中，城隍乘坐着

八抬亮轿缓缓而行，有的人还戴着小鬼、判官的假面具，前后簇拥，灯火照耀，鼓乐齐鸣。沿途人山人海，场面热闹非凡。民国以后，城隍即不出府了。改为在庙内吹奏，诵读经文，烧香焚纸。

满人在是日，还要由家长携带子孙后辈，到新城北门外三合村的满民坟茔扫墓祭祖。

八、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从八月初一开始，街市上的饽饽铺，就开始悬灯结彩，挂上写有“中秋佳节”字样的红绸条幅，陈列出琳琅满目的各色月饼。其品种繁多，制作精细，尤以馅的材料丰富，味道各具特色为甚。还要陈列一个直径约一米、厚度二十厘米许的“大佛光”月饼。有一些饽饽铺（如“福兴元”、“工艺局”）要开炉（吊炉），承揽加工薄月饼（混糖月饼）和制作“耍花”（如鱼形、兔形、虎形等月饼）的生意。顾客要自备油、糖、面，根据需要前去加工。加工时，一般要专制两个比较大的月饼，一个刻着“佛”字，一个刻着“月”字。待成熟后，加工点有专人负责抬送至家。节前，大街小巷弥漫着浓郁的油香气味，颇为诱人。很少有人自制月饼。

在此间，水果也大量上市，多由驴骡驮着从山西的太谷、原平等地运来。这时，在新城鼓楼以南，延至二眼井巷口之北，出售水果的摊点林立。有的高搭席棚，日夜经营，特别是上市的葡萄，主要由住户供应，也有河北宣化来的葡萄。

大街小巷还有人叫卖零售月光纸（一种由小作坊用木板印刷的色纸，俗称“月光码儿”，上绘太阴星君，若菩萨，下画月宫及捣药之玉兔，还有桂树，广寒宫）的。

八月十五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左右，人们首先将月光纸贴在屋里的墙上（可随意贴），然后，在月光纸前设一香案，正

中供兔儿爷（它是以泥塑兔形，衣冠倨坐如人状的祭月造像，在其足间有一药臼，它双手持捣药槌，做捣药状，上面遍施彩绘，还加之靠旗，各种伞状等饰物，形制大小不一），点燃两根蜡烛，香炉下压上黄表、千张、元宝；再把“月光”月饼、各种水果、黄豆角供上；还要选一个上好的西瓜，剞作各式各样的形状供奉，简单的大多是月形、元宝形。再在佛堂的佛像前供上“佛光”月饼，在其它的佛龕（如灶王、天地、土地）前也要供一个月饼和各种水果。供好后，就要烧香，叩头。当晚，在月亮初起时，人们就开始“玩月”了。其时，要将屋内的月光纸移出贴到住家的房檐下，然后将香案及供品都移到房檐下的月光纸前。这时，家长要领后辈子孙在香案前，面向月光纸和兔儿爷焚香叩拜。大约一个时辰后，人们就将月光纸焚化，撤回供桌、供品。

如遇“八月十五云遮月”的阴雨天，“玩月”照旧进行。

中秋节后，亲友之间还讲究相互馈赠月饼和水果。即使有在近郊的，也要将礼品送到。

九、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日，古人以为是日“日月皆值阳数”，故名之曰“重阳节”。旧日，每逢佳节至此，人们都有登高的习俗。据《幼学琼林·岁时》载：“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灾”一句，便可知登高之来源。此句出自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中的一则故事。东汉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出游。房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背上，登山饮菊酒，可免此灾。”桓景听从了他的话，举家登山。晚上回来后，见鸡犬牛羊都死了。费长房得知此情后，便对桓景说道：“代矣。”意即所死的鸡犬牛羊已代替了灾难。这就是登高习俗的最早来历。

新城满族也有登高的习俗。重阳节这天，新城鼓楼全天开

放，供人登高远眺。游人从早晨七八点起，便陆陆续续登楼。登鼓楼眺望，人们除了能鸟瞰全城星罗棋布的街巷外，还可以领略到四野的田园风光。向东能够遥看到白塔的身影，朝南可以远瞰象匍匐在平原上的巨蟒一样的大黑河和昭君墓堆，至西能够远望到大青山的“白道梁”，望北似屏障一样的绵延起伏的大青山脉及山脚下的乌素图召庙可尽收眼底。新城的四门城楼虽在平时无人看守，可随意上下，但在此天，游人除上鼓楼外，也专来登城楼。在夕阳西下，薄暮将至时，鼓楼楼门随即关闭。

这一天，家家户户有吃黄米粘糕的讲究。南街卖糕的摊点都扩大了经营范围，所售的一般是未经油炸的又软又粘的热素糕，用木桶装着，上苫棉垫。人们或买上素糕回去包馅（有熟牛肉馅、豆糖馅），用油煎炸；或买好黄米到碾房轧成米粉，自家蒸食。

十、十月一鬼节

俗话说：“十月一，送寒衣。”农历十月初一，是鬼节，也是城隍爷三出府的日子。是日，城隍照例到新城北门外的行宫驻蹕。只此一天，当晚起驾，归途的隆重程度远远不及中元节。家家户户这一天，仍要到坟茔或城隍庙祭坟烧纸，但要烧整张的五色纸，以示为亡灵做寒衣用的布料。

十一、冬至

“冬至一阳生，是以日晷初长。”冬至的“至”，就是极点。从冬至始，开始数九，阳气上升，白天渐长。满族人为计数九之始，一般要自制一张“消寒图”。这张消寒图是用一张一尺见方的白纸制作的，在白纸上画成等份相同的九个方格，每个方格里绘九个大小的黑边圆圈，一共八十一个圆圈，代表数九的八十一天。在消寒图的边上有一项说明，即：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雪，雨中心。意为每个圆圈代表一天，如果表示阴

晴，就将这个圆圈平分成上下二等分；如若是日是阴天，就将上半涂成黑色；若果是日是晴天，就将下半涂成黑色；假如表示风雪，就将这个圆圈平分成左右二等分；若是刮风天，就将左半涂成黑色，至于下雪，也依图上说明的方法类推。故而，数九八十一天的每一天的气候变化都可形象简明地记在图上，令人一目了然。

还有一种消寒图更为讲究，也是用一张白纸，画为九块。每块里用红色书写一个大都是九画的汉字，巧妙的是这九个字恰好是一句颇含诗意的话，即：“待到春风重染郊城柳”或“若是客来拜，香茶烟待。”从冬至始，每天用墨笔在红字上按笔顺涂一画，基本上九天涂完一个字，一个字代表“一九”。

还有一种消寒图，用纸较上两种稍大，其形式也较之复杂。它是用墨笔书写的汉字组成一个“葫芦套方胜”的图形，即：外面是一个葫芦图形，套着一个方胜图形。所谓方胜，本指古代一种首饰，形状是由两个斜方形一部分重叠相连而成，后来就泛指这种形状。用来组成图形的汉字颇有说道，基本上是按“一九”到“九九”的顺序，编成的《三国演义》上的故事，而且押韵。譬如：“一九冬至冷难当，刘关张结义在桃园。青牛白马祭天地，不愿同生愿同亡”；“二九数尽交小寒，董卓吕布戏貂蝉。司徒订下连环计，董卓一命丧黄泉。”等等。方胜图形上的九块也用红笔书写九个九画的汉字，这九个字可随意编写，也是从冬至开始，每天用墨笔在红字上涂一画，九天涂完一个字，一个字代表“一九”，一共是“九九”。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是彩绘成魁星提斗的图形的消寒图。

不管是哪种消寒图，上方正中都要画一个扇面，内书“消寒图”三个大字。有的还要在图上的左右两侧书写一副对联，曰：“点尽图中墨黑黑，方知野外草青青。”

“冬至馄饨夏至面”，这一天讲究吃馄饨，或以水饺代之。

十二、腊八节

农历腊月初八日，是腊八节，亦谓之“佛祖成道节”。据说，这是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日子，因而这一天煮“腊八粥”供佛，寺院内外僧俗共食“腊八粥”，早在我国宋代就形成了习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腊八这一天，“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施，贵宅等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亦载曰：“诸大寺……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由此可见，腊八节最早是个宗教节日，而“腊八粥”也属于宗教的食品。以后，过腊八节，食“腊八粥”为整个汉民族所接受。这一天，也成为民间传统节日之一了。

绥远城的满族过腊八节颇有一些讲究。过去，一进腊月，街市上到处都有叫卖“腊八枣”（红枣）、“腊八豆”（红豇豆）的。在腊八的早晨，人们开始煮粥。“腊八粥”的原料主要有黄米、红豇豆、红枣、红糖等。讲究的还要有桃仁、瓜仁、果脯、栗子、薏米仁、长寿米、葡萄干、青红丝等，以甜食为主。做好的“腊八粥”，粥香诱人。人们除自家中午食用外，还要用碗盛装馈赠亲友。这一天，家家户户大都煮粥而食，忌吃荤腥。

腊八节这一天，人们还要将上好好醋，和剥了皮的紫皮蒜瓣装在器皿里密封，谓之“腊八蒜”。腌好后，要等到正月初一吃饺子时，才能开启。腌好的“腊八蒜”，蒜瓣翠绿，醋味清香。

郊区的农民要在腊八节的前一天，到大小黑河中凿一大块冰拿回家。待次日腊八早晨太阳出来前，将冰块立在自家的耕地中，然后把煮好的“腊八粥”倒在冰上。

出嫁的姑娘如在秋收后住娘家，就非得等到吃了“腊八粥”才能回婆家。

十三、祭灶节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是祭灶节。这一天，街市上卖“祭灶糖”的达到了高潮。集中的设摊场所在新城鼓楼以南。这里小商云集，顾客熙攘，十分热闹。是日若遇刮风下雪，商贩们也要想方设法将“祭灶糖”推销出去。

所谓“祭灶糖”，实际上就是大麻糖。它是用大麦芽和黄米糖化后，熬制成饴糖，再经过花样加工制成的。大麻糖名目繁多，有芝麻灌馅糖、白坨子糖、皮糖块、御谷糖、麻子糖、白棍糖、白糖块、大筱面片、取灯糖、糖瓜子等。其中以大筱面片、取灯糖、糖瓜子为主。大筱面片足有一米多高，一米见方；取灯糖有两米高、半米宽的片子。它们制作精巧，又酥又脆，香甜可口，摆在摊点上，十分醒目。除此而外，还有饽饽铺的南糖（以芝麻、桃仁、瓜仁为主要原料）。

人们买回“祭灶糖”后，不能随便动用，而要等到晚间九点多钟祭灶。祭灶时，先将灶王爷（灶神，旧时迷信的人在锅灶附近供的神，认为他掌管一家的福祸财气，也叫灶君。灶王爷佛龕上一般要贴这样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横披为：“一家之主”。也有的写：“东厨司命主，人间福祿神”。横披同上）的佛龕从厨房请出来，供到堂屋正中的香案上，然后在前面置一个香炉，两个蜡钎。在香炉下压三张黄表，黄表下压一串锡箔叠的元宝和一片千张（似薄的豆腐干片，意为供灶神上天的天梯）。再将“祭灶糖”放在盘中，摆于佛龕前，同时，还要用小碟装水少许，再放一束青草和少量茶叶供上。一切安置妥当后，点燃香烛。这时，家长要跪拜在灶王爷前叩首三次，同时，外面要燃放爆竹。接着，要将灶王爷佛龕上裱糊的灶王爷像撕下来和黄表、元宝、千张及草、茶一并拿到院中焚烧，意即：送灶王爷上天。回来后，凡家中的炉灶处都要在其炉盘上放一个糖瓜子，待火慢

慢将其熔化后为止。这时，家长才将“祭灶糖”按人分份发到手中。如若家中有人在外地，也要设法送去一份。有句俗语曰：出家乡，离家乡，我在家乡也吃麻糖。颇有感慨思乡的意味。

人们除了在家祭灶外，还要到家庙举行祭灶仪式。家庙，原址在今新城北街的家庙街中间，是一殿式庙堂，东西各有配房三间。此庙正殿的佛龕供有一米余高的泥塑灶王和灶王奶奶各一尊。两旁有泥塑小童站像各一尊，还设有香炉、蜡钎、磬钟等供器。在举行仪式时，主要是把“祭灶糖”供在灶神前，并要焚香表叩拜。同时，到庙院内燃放爆竹。

这天，文昌阁的和尚还要到家庙诵太平经。

灶王爷佛龕一直到除夕晚接神时才被请回厨房，意为灶王上天后至玉皇大帝那述职完又回到民间了。

居民还在这天用胶泥合头发茬搪炉灶，饮食业也要停业一天，整理炉灶。

十四、近岁节

除尘节，农历腊月二十四这一天是除尘节。民间有“二十四，扫房日”这一说。是日开始，家家户户洒扫庭除，粉刷房屋，裱糊贴挂，整修院落，拆洗被褥。

从腊月二十五日始，山神庙还请来归化城大召的喇嘛念经，直至大年三十。念经结束时，喇嘛还要送“坝廩”（此为蒙古人的一种佛式），四翼蒙古人完全要下跪到山神庙外，由喇嘛抬上坝廩，从头顶穿过，然后焚烧坝廩，以示除去尘秽，毁掉过去一年中的不吉祥的事情。

每个人还要沐浴更衣，剃头刮脸。

除夕。俗称大年三十。这一天，要在全院及门首张贴对联，在门楣上贴“足文钱”（是一种挂签），还要在大门的门扇上贴两张武门神（即秦琼、敬德的画像）。天黑后，要张灯结彩。这

时，家家都要备一桌丰盛的酒席。开席前，先由长者带领全家向祖宗叩拜，此谓“祭祖”。接着，晚辈要逐一给长者磕头，同时，长者要给“压岁钱”。夜里，笼旺火守岁。

呼市新城满族的节俗是封建文化的传统形成的浓厚的沉淀层。综上所述，很多节日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和清代统治者利用宗教来麻痹和奴役人民有直接关系。清代，战火逐渐平息，随之便兴起建庙高潮。特别是清康熙和乾隆时期最盛，因而，民间在岁时节令时祀拜神佛都离不开宗教的内容；再者，也反映了人们生活的贫困和文化素质不高。人们为了减少天灾疫疾，摆脱贫困，求得生活的平安幸福，势必就要在岁时节令进行祈神、拜祖等项活动；当然，也有一些民间习俗的内容是健康向上的。象过端午节挖菖蒲、掘艾蒿、喝雄黄酒以“避瘟”就能说明这一点。端午时节，天气由暖转热，正是细菌虫害孽衍、百病丛生的时候，所以，在节日里清瘟解毒实为保健祛病之举。又如：腊月的除尘节，将一年的积尘彻底清扫一下，以便庭院、屋室、个人焕然一新，也不能说不是是一件好事。还有的节俗讲究也反映了满族这个民族的文明礼仪，如中秋节、腊八节馈赠亲友食品就是一个明证。故此，这些民间习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它封建迷信的一面，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繁缛的过节讲究已不复存在了。

忆我的父亲冯振玺

冯必嘉

一

我的父亲冯振玺，字蓁忱。满族。1890年8月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祖父只有伯父冯振华（字祝三）和我父亲两个孩子。伯父从小研习书法，学得了一手好字。成年后，一生为北京师范大学文牍员，专门写字、篆刻。

我父亲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入北京医学馆学习中医。这是一所专门为满族子弟开办的学校，是当时清政府的最高中医学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民国初年，受聘于冯玉祥部队，担任军医官，驻防在呼和浩特市。进入本世纪20年代，军阀开始混战，父亲深恶反动军阀横行，社会黑暗，毅然辞掉军医官的职务，退伍回到了北京行医。后又迁回呼市，一直在呼市地区行医和工作。

呼和浩特，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新城，又是满族集中的地方。我父亲在以后的行医过程中，接触了呼市地区汉、蒙、满、回等各族父老乡亲，他行医出了名。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冯医官”。四十年代初，经原绥远师范学校校长刘汉先生（著名教育家，原国大代表，解放前去台湾）介绍和聘任，父亲还曾任过中山学院和绥远省师范学校校医。

解放初期，我父亲又进入北京中医进修班学习。1951年结业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给他中医师证书（中字00181号）。回呼后，他和邓子厚先生等著名医师，在呼市火车站成立了联合诊所。1955年调入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工作。后研究所改为内蒙古

中蒙医院，我父亲曾先后任中蒙医院儿科主任、妇科主任和病房主任。以后中蒙医院归属内蒙古医学院。1959年我父亲被评为副教授，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这期间，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多的荣誉和待遇，他曾担任归绥市人民代表，呼市政协委员，市爱委会和内蒙古中医师协会领导成员。他非常感激党的培养和扶持，抗美援朝时，拿出我母亲所有的金银首饰，甚至连铜香炉都捐献出用于购买飞机大炮。又亲自送自己的三女儿参加志愿军赴朝鲜。他也曾多次写入党申请书，表达自己爱党爱国的志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受到了冲击。当时尽管他患病，但还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子女们也受到了株连。1967年11月，我父亲在惊恐不安中离开了人世，终年75岁。当时，由于处在无政府状态，我父亲去世时，竟无一人过问，单位只给报销了一个67元的骨灰盒钱。

二

我父亲是中医科班出身。他的中医理论基础深厚，医术高明。他尤善诊治儿科和妇科疾病，象小儿无名高烧、惊风神昏、腮腺发炎、以及妇女胎前产后疑难重病和伤寒、黄疸等病，父亲都有自己独到的治疗方法。记得1960年，有一位七岁小儿高烧不退，惊风神昏多时，请我父亲诊治。父亲只用羚羊角、龙胆草、清半夏、生赭石等几味小药服下，病儿在两三日内即痊愈。

1959年，有一位姓刘的女同志因患伤寒，高烧昏迷，情况严重。我父亲诊脉后，只用麻黄、桂枝尖、知母、甘草、杏仁等中药配以安宫牛黄丸，不久病即痊愈。

我父亲热爱祖国医学，也积极学习西医医术。解放后，父亲十分拥护团结中西医的政策。他在努力研究中医医术的同时，积极参加学习西医理论，并在实践中力求沟通中西。他常用西医学

的理论解释中医学，也用中医学的理论解释西医学，中西医结合，用于临床实践。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小儿无名高烧、惊厥以及其它病症，都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父亲也非常重视地方病的研究，如内蒙古地区的布氏杆菌病和克山病，他都有自己的观点和论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愈了很多病人。

父亲看病，特别认真。他临床辩证论治，精详严谨，选药组方，恰合理法，自成一家。他的处方用药剂量很小，但效果极佳。他说，用药不在多，而在精和专，要抓住病的要害，对症下药。

积五十余年的医疗实践，我父亲累积医案、病历资料颇丰。解放前，他的看病病历和处方存根都放在我家两个大木箱和一个大躺柜中，多达几千本、数百万字。后来被不少医界同仁转借参考，所剩部分“文革”中也全部损失。父亲曾立愿，晚年一定整理一生医案，著书立说。他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整理出许多可供医家参考、借鉴的病历。记得，父亲的大徒弟关国祯曾说过：“老师不但审病洞见隔垣，用药丝丝入扣，而且病历简而不漏，首尾完整，十分严谨。”他所以重视完整病历，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把感性认识不断提高到理性认识。

父亲在内蒙古中蒙医院工作的十余年中，发表过不少具有创建性的医学论文，如：“清热并治疗小儿无名热13例临床观察”、“加味地黄丸治疗小儿软骨病8例”、“开郁舒肝法在妇科病中的应用”、“两例不孕症异治的体会”等。

父亲生前酷爱书籍，我家西房曾存有父亲多年购置的医书数百部，其中不乏中医典籍精品和绝版书籍。这些书籍连同老人家案头写下的珍贵的治病心得体会，“文革”中几经浩劫，损失殆尽。到如今，我们这些子女手中竟没留下父亲的敬业遗物。每每想到此，不免无限遗憾和痛心。

父亲一生，所以能够专心研究学问治病救人，这和我母亲的

鼎力辅助是分不开的。我母亲叫安淑琪，是给资本家打工的穷苦人家的女儿。她没文化，但跟着我父亲学会了打针、针灸，也认得各位草药。父亲治病忙时，母亲就是好助手。她常替父亲服侍病人。她聪明贤慧，心地善良，病人都非常感激她。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街道工作，成为居委会干部。她热心为居民们服务，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冯大娘，选她当了新城区的人民代表、区人民陪审员和爱国卫生模范。

父亲一生徒弟很多，他们大都已成为自治区中医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国祯。关国祯是新城满族，16岁就跟我父亲学医。他象家人一样，和我们生活一起。他的学习勤奋，尊敬师长，学业进步很快。解放初又到北京中医进修班学习。以后，他担任了清水河县医院的副院长。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挖内入党时，他被残害死于牛棚。

三

我父亲清贫一生，在世时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经他救治的病人数以千计。他医德高尚，在内蒙、特别是呼市地区是有口皆碑的。

父亲生前对人极富同情心，当他给穷人治病时，总是尽量少收或不收脉礼，甚至还用自己的钱，为病人抓药。记得，新城西街耶稣堂旁边住着一家叫“李瞎子”的母子。他们多次找我父亲看病，父亲扶贫济困，为他们看病，还用自己的钱为他们抓药。听说“李瞎子”家里断了火焰，我父亲又为他们买了炭送到家去。

在我小时候，家里老有“闲人”寄住。他们都是父亲的穷亲戚朋友。我还记得，在生活拮据的时候，我家的马叔常带着我上当铺典当物品。父亲在社会上喜欢结交下层劳动人民，象修脚的郭叔、上鞋的关师傅、卖肥鹇鸡的于叔等，都是父亲的好朋友。

相反，父亲对豪门权贵却敬而远之。日军占领呼市时期，父亲谢绝给日本人、汉奸看病。那时候出城门要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我父亲宁可不出城行医，也不给日本兵行礼。

四

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宽厚待人，豁达乐观。他爱古籍，爱书法，爱说书。我们兄妹七人，就是在这种生活的气氛中成长的。父亲给孩子们讲起《三国》、《聊斋》的时候，绘声绘色，使我们听得非常快活。可是他要求我们学习时，却十分严厉。我记得父亲在我的铅笔盒上为我写的座右铭是“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还教育我们兄妹“做正派人，学真本事”。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妹七人个个事业有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我大哥冯克嘉，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留校。五十年代初入党，被评为教授。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他曾任北师大天文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是亚太地区天文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编纂者。1987年去美国讲学。精通日语、英语，个人著作颇丰。二哥冯克聪，山西理学院（山西大学前身）化学系毕业，留校后，曾任化学系主任，后任学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教授。1980年曾赴美讲学，本人著作译著也不少。大姐冯惠英，中共党员，北师大毕业，在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任教，是北京市特级教师。二姐冯芳英，河北音乐学院毕业，是天津艺术剧院的演员。三姐冯克难，中共党员，高中二年级参加志愿军歌舞团去了朝鲜，回国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和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现为副教授。四姐冯克明，中共党员，现为旅顺经济开发区经济师。我在上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内蒙古妇联工作。

回忆我父亲勤勤恳恳行医五十余年，不为私利、救死扶伤。

这是父亲立业的力量源泉和一生的奋斗目标。在旧社会他弃官不做，淡泊明志，以治病救人为宏愿，为无数群众解除病痛。他一生清贫为安，没有房地产，没有股份。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为人民服务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对病人认真负责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更为大家所钦佩。

绥远五族学院

杜晓荣 白燎原

1925年，在爱国名将冯玉祥的治理下，察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均得到迅速发展。在新建诸学校中，绥远五族学院颇引人注目。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又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是内蒙古地区筹建高等学府的最早尝试，在内蒙古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出身行伍，了解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因痛于国势零弱，列强欺凌，遂以强国利民为志，并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鉴于外蒙离异，边疆危机四伏，他力倡开发西北，巩固国防，以救时艰。1923年7月5日曾上书当局，认为：“从前西北之数为边患，旋仆旋兴，迄未能一扫荡平者；其原因即在徒求一时之苟安，不定百年大计。……今则五族一家，平等相互主义，为举世所公认，自非兴养立教，不足言安反侧之心；则实业与教育尚矣！……就教育言，不外设立学校，编辑书报，搜购图书，讲演德化，以实行其社会教育、普通教育等是。……总期不毛之地，变为沃野之乡。无识之民，悉获良善教育。俾西北之文化，将来与东南媲美。此又正本清源之策，奠定百年之计者也。”他推崇孙中山融合五族为一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思想，遂萌生创建五族学院之念。1924年冬，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开始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离京赴任前，他邀请教育界人士沙明远负责筹划五族学院的创设。

沙明远字月坡，回族，山东临清人，曾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员。据说“学问道德，均极高尚”。受命之后，

他首先向马子贞、王鸿一诸先生征询有关建设与组织事宜，拟具了组织大纲的框架。1925年1月，五族学院院址定在归绥后，他又受命出任绥远教育厅长，开始着手创办。到任的第二天，他便开始拜访地方名绅，征询意见。首先随同绥远都统李鸣钟造访原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以后又次第访见了土默特旗名士武尔功、森额、荣祥、归绥回教俱进会会长白志先等。还通过包头垦殖公司经理孙则让等将乌拉特东公旗嵩博尔巴图（嵩德甫）、包头回教俱进会正副会长韩胜海、王同恩请到归绥面谈。其中嵩博尔巴图“热心兴学，筹画有方，……关于学院建设及招生事宜，尤多所建议。”与此同时，沙明远还派专员赴包头、萨拉齐、五原各县调查，宣传创建五族学院的意义，并与当地蒙、回各族联络。又派教育厅秘书柏端及牛得楚、于培祥等调查附近蒙、回各族人口与现状。以期因地制宜，谋划切合实际。因一时无法建筑院舍，且急需开办，他征得归绥县署和土默特旗署的同意，借绥远会馆旧址（今旧城恒昌店巷东侧）作院址，以土默特旗仓廩为练习武术及各项运动的场所，稍加修整，拟先开办讲读、武术两部。

为制定妥善而周详的组织大纲及简章，沙明远约请北京研究教育人士到绥帮助拟定初稿。以后又根据实地调查的结果和地方人士的意见，调整并修改了学科设置与学生待遇。几经修订，于2月5日拟定，其组织大纲规定：依学科性质及程度高下，学院暂分讲读、实习、师范、女工、武术、研究六部。研究部即大学部，主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宗教等。因扼于经费，拟于翌年开办。学院的办院方针有三：一、因“感受学风之堕落，以重道尊师、清苦绝卓为训育上标准。”二、“因西北荒芜未闢，农村急待建设，故以农垦教育为急务。”三、“因西北宗教纷歧，对于信仰一任自由。”简章规定：学院第一期招生300名。其中乌、伊两盟每旗10名，共130名；土默特旗20名；各县局回籍学生100名；学院直接招考50名。“为优待满、蒙、回、藏子弟起

见，入院者概免学费。”第一期学生的“应用膳宿书籍各费，一律由院筹备。”拟定3月20日举行开院式。

为使五族学院成为西北文化中心，并“凌驾中原”，沙明远力图聘请国内名学者前来执教。曾函请山东省省长龚积柄代为聘请特别讲座及主副各教授，还拟请王鸿一、梁漱溟、米迪刚、尹仲材、贾佩卿等任研究部教授，请若干扎萨克喇嘛专事黄教研究。又与回教人士白松峰商妥，拟购买铅印机，请有学识的阿訇翻译经典，阐扬回教文化，从而有回光社之设。由于研究部未能开办，这些计划未能实施。

2月8日，冯玉祥将沙明远召至张家口，飭令即刻筹备，急速成立。15日都统署特别会议又提出讨论，责成各道、县协助成立。3月2日，绥远都统署发布政字第268号训令，委任麟庆、张汝恢、银海、嵩博尔巴图、孙则让为劝学委员，赴乌伊两盟各旗“宣布学院宗旨，俾免隔阂。”以后，又批准学院开办费2600余元、年经费23856元（其中学生膳费书籍费14400元、教职员薪修7128元、办公费1200元、杂费1128元），由卷烟吸户捐收入项下开支。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学院于3月22日举行开院典礼，宣告正式成立。截至24日，各县选送学生共190人。尽管待遇从优，因游牧各旗对鼓吹农垦多有疑惧，就学蒙生并不踊跃，大多来自完全农业化的土默特旗和半农业化的达拉特旗。经过编级测试，学生分为六级，教员共15人，28日正式开课。除一般课程外，农业、工作为主要必修科目。农业每周授课2小时，实习8小时；工作每周4小时，以制造实用物品及器具为主。还选修蒙语，以利蒙地开发。训育主旨为“养成独立学生之能力，坚忍之意志，高尚之人格。”院训为“敬、朴、勇”，敬即“敬师、爱友、求真”，朴为“吃苦、勤俭、高洁”，勇即“互助、进取、好义。”为严格管理，制定有考查、操行、学业成绩考查、奖惩、管

理诸规则。此外，设有学生自治会，以举办演说会、美术研究社、新剧团等方式开展课外活动。

开学不久，鉴于蒙旗就学消极，学院便改变原有计划，变“来学”为“往教”。除斥退部分成绩太差的学生外，将其余学生改编为师范部，以培养办理蒙古教育的师资，学成后分赴各盟旗就近施教。同时，制订下半年工作计划，拟于师范部设前期师范两级，学生80名；前期师范补习班一级，学生40名；农村师范班，学生40名，课程以农业实习与军事并重，学制两年，派往各旗县指导农事兼训练民团；蒙古子弟特别班，学生40名；师范专科班，学生80名，招收中学毕业生及供职于教育界者，学制三年，课程以蒙文、汉语及教育为主，毕业后派往乌伊两盟执教。拟于8月增招大学部理工、预科学生两班，以满足五卅惨案后上海失学学生的转学要求。同时拟办试验中学部。因绥远会馆房舍狭小，多不适用，周围环境亦不理想，计划另觅新址，建筑院舍。还打算通过向西北各长官及内地各省募捐和本院学生演剧筹款来建筑图书馆与实验室。因掘于经费，上述发展计划很难全部实现。仅预科一班按期开办，但不久又改为高等师范，另有初中一班，全校共5班。

1926年晋、奉军阀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形势急剧恶化，察绥地区的开发顿受挫折，五族学院前景暗淡。9月，奉教育厅令，学院的班级有所变动，并入师范讲习所一班，原有三个初等师范班合为两班，新招小学两班，初中一班划归绥远第一中学校。全校总共6班，校长钟尔强（原训育主任）。1927年6月，学院迁至省城（今新城南街东侧），改名中山学院，终未成为高等学府。

五族学院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它以开发西北为目的，课程“讲求一切实业之学识技能”，“必先谋学生毕业之出路，造就有用之人才”的作法，在今天仍可资借鉴。

何况官费待遇使贫寒子弟，尤其是蒙、回贫寒子弟，得有升学的机会。它成为高等学府的努力虽告失败，但毕竟为教育落后的绥远增添了一所中学，从而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冯玉祥及其僚属受封建文化熏陶很深，崇尚传统的孔孟教化与宋明书院之制，指斥新式学校“趋青年于放纵之途，……师道堕落，学潮暴烈，将数千年之道德，几扫地无余。”故五族学院的建设即“参合古书院之制”，以“发扬东方文化，阐明孔孟礼教”为务。“以洒扫应对进退为修身大纲”，甚至以“鞭扑督责”。这种对旧传统的过分依恋和推崇，使五族学院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保守色彩。

土默特地区喇嘛庙的制度及经会仪式

伯 谋

土默特地区的喇嘛庙有完整的制度，仅戒律就有二百多条，简要介绍一些：

一、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始于十三世纪噶举派(白教)的噶玛巴支系。格鲁派(黄教)兴起后，转世制度更加流行起来。土默特地区寺院的活佛转世，在乾隆以前，都是前世活佛遗言，并查经卷确定，再访得灵童，然后由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的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呈请清廷批准即为呼毕勒罕(蒙语，意为转世者)。到乾隆朝，乾隆皇帝认为旧的活佛转世指认制“率出一族，几与世袭禄爵何异？”因而创立了金苯巴瓶掣签法，废掉了原来的指认制。

金苯巴瓶掣签法，系由清廷制作金瓶两个。一个置于西藏的大昭寺内，用以决定达赖、班禅及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掣签时，班禅或达赖及驻藏大臣等均到现场监督，将所访得之数名婴儿的出生年月、姓名，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各书写于一签上，贮于金苯巴瓶内。诵经后，于大众前掣出一签，定为呼毕勒罕。另一个置于北京的雍和宫。系决定整个蒙古的呼图克图(大活佛)的呼毕勒罕，由理藩院大臣和北京的章嘉呼图克图会同掣签决定。从乾隆五十七年(1792)起，土默特及全蒙古的114位活佛转世，全用这种掣签法裁出。同年，理藩院还规定，呼毕勒罕必须于“闲散台吉或属下人等及唐古特之平民子嗣内”选抽。

道光三年(1823)清廷又敕令：“从此后，不准从庶民中寻

找毕呼勒罕。”

进入民国以后，土默特地区活佛转世又恢复了由前世活佛遗言寻访呼毕勒罕的制度。

二、独宫（大经堂）内的座次

每当诵经日，独宫(经堂)内的座次是：大经堂内与门相对的正中设高座，为活佛的座位；于高座左右设次高座，为锡连达喇嘛和扎萨克达喇嘛的座位。蒙语锡连是座位或桌案。居高位，受膜拜，地位极尊的达喇嘛称锡连达喇嘛。土默特寺庙中的锡连达喇嘛一般是由年老退了职的具有最高行政权的执事喇嘛担任。论实权此级不及扎萨克喇嘛，而受到的礼遇和尊荣却胜过扎萨克喇嘛。扎萨克达喇嘛（是一座庙内活佛下具有最高行政权的执事喇嘛）等相向对坐的座位以下又设稍低座，为文扎德（领导全寺僧众诵经的经头）、拉胜文扎德（领导全寺僧众诵经的副经头）的对向座位。自此以下，依次为巴格文扎德（小经头）、嘎赖布文扎德（预备经头）。至入堂第一排明柱，一律为半尺高、三尺宽的长榻，为众僧的座位，一般分两行，如徒众甚多时，可增设几行，但大小文扎德必须在左右诸行的最上首坐。独宫的西南隅设一高座，为萨克沁格斯贵（为大经堂教律的最高监察执法者）面北而坐的座位。

喇嘛庙等级森严，因而独宫内的座次是不能随便坐错的。

三、土默特各召庙举行佛事活动(经会)

以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为第一会。五月或六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为第二会。其仪式除诵经外，还有跳布战、请乃琼崇、迈达尔出巡、送巴令等，此为主要经期，但各召略有差异，撮其要简述如下：

1. 经会

每当举行大经会时，会前由达喇嘛指挥各执事徒众，各遵本

职进行准备工作，如佛前供品、法物乐器、经堂茶水、食料等一一齐备无缺。届日全召大小喇嘛，于黎明前起床盥漱静候。到时小格斯贵鸣钲，僧众齐集经堂，接着奏起细乐，点燃熏炉、张起香幡，以软轿从佛爷府将活佛接入经堂，升正殿。其余僧众依次列坐于下，开始诵经。晨八时左右，小格斯贵率年幼的值日徒众，各提特制大铜壶向僧众散茶；到中午散食也如此。至晚，依照喇嘛阶级的高低，由公中分别散给经钱。如此，做经会三日而罢。

2. 跳布战（布战是蒙语，即舞蹈之意。恰木是通用名称）在经会的正日举行跳布战，蒙语称跳恰木。

跳布战的角色化装一般是：印度人（阿什勒）4人、骸骨（塔克木）4人、鹿面（卜格）1人、白色老者（察干俄布根）1人、3男8女、黑帽牛（千勤迦勤）1人、狮子1人、海兽1人、焰魔王及其妻，其它配舞者无定数。

跳布战时，在场地的一角，不断地诵经典。经典的内容是由章嘉呼图克图将有关经典的内容摘汇而成的。跳布战是随着各种鼓乐、法器的音乐声舞蹈的。参跳者的各种面具，色泽鲜艳，造型颇为奇特。跳布战的意义是祈福祛灾、降服妖魔。

3. 请乃琼（崇）

请乃崇，俗称顶神官，蒙语谓请沙靠斯，译意即请护法神。土默特凡较大的召庙前面总有乃崇庙，为专供沙靠斯的地方。每当经会期间，总要虔诵经咒，请沙靠斯。沙靠斯“神自附体”后，其形状威猛可惧，身穿古代军事实用甲冑（头盔及鱼鳞细甲，均以青铜或纯钢制成，重不下四十斤），执戟悬刀，行动如风。初由乃崇庙驰出时，必先给正殿的佛象及活佛顶礼膜拜，活佛告诫以谨慎护法后，沙靠斯在距佛像稍远处，受僧俗瞻拜。其间或也给人治病，最后巡阅全寺。如发现不善之事，即训斥执事喇嘛。巡阅毕，仍返乃崇庙而罢。如经会期有迈达尔出巡和送巴令之礼，沙靠斯也必护送，以尽其责。

4. 迈达尔出巡

蒙语迈达尔系梵文弥勒的音转，亦作弥得勒，汉文意译“慈氏”。

每次经会的正日，早晨大经诵毕后，约八时左右，即开始跳布战。事先请迈达尔佛象于殿外特设的宝座上。佛象高约尺余，颈饰璎络，身披袈裟，灿烂庄严。跳布战结束后，化装的各喇嘛仍保持原角色，拥迈达尔佛象升坐特制的车子内。车子雕镂极精，四面开敞，表里通明，辕前分系白绂二幅，专供拉车用，白绂长三丈余，绣满佛教中的人物、故事。众喇嘛与信士推挽迈达尔出巡时，一般寺庙仅绕巡一周而罢，但呼和浩特各大召庙，必环巡旧城四郊，最后齐集慈灯寺（五塔寺）前，合跳布战一次后结束。

请迈达尔出巡，意在祈福消灾，禳除不祥。

5. 送巴令

送巴令为喇嘛庙的驱邪送祟之礼。教中专有送巴令的经咒，每当大经会的末日，必举行此礼。在诵经之前，由巧艺布喇嘛（专管佛前设供的执事喇嘛）用大麦粉和乳油及水，捏成二三尺高的三棱尖形物，其顶端插一箭，并附骷髅形状的魔首，整体用紫草羊脂涂后，即成为巴令。巴令制成后，盛于大小适合的三角浅盘中，放在经堂中央的高桌上。迨全召喇嘛列坐诵经时，选精干喇嘛二人，以哈达或净帛蒙口鼻侍立于巴令左右，并以二寸见方的降魔菩萨画像一帧，悬于巴令的顶端。二喇嘛随着诵经的内容，不断加膏、注水、燃灯、添香，丝毫不敢有错。俟诵经完毕，二喇嘛一捧巴令、一捧应送的供品，其余僧众吹螺鸣角、伐鼓撞铙随从于后。至山门外火场，将巴令投入火中焚烧。如有沙靠斯伴送，即由沙靠斯向火发一矢，并从烈火上腾踊而过。至于降魔菩萨画像，为各寺珍贵宝藏之品，已在巴令入火前摘下，待礼毕，仍恭捧还寺，供在佛殿中。

经会至送巴令毕即闭幕。

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

伯 谋

呼和浩特是藏传佛教传入最早的一个聚点，又是藏传佛教向整个蒙古、新疆等地区传播的中心。同时，也是内地向西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联系的主要交通要道。清康熙年间，呼和浩特有地位、有影响的喇嘛已为数不少，和其它地区的喇嘛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当时，康熙皇帝为了利用分而治之政策，加强对蒙古人的控制，严禁跨越盟、旗游牧。自从下了此令后，跨盟、旗界游牧已得到了控制；但喇嘛之间的来往，却难以制止。为此，康熙皇帝十分忧虑。他的忧虑是不无原因的，在噶尔丹进攻外蒙古时，就曾首先派出一千名游方喇嘛为内应，随后派军队追击，里应外合，一举获胜。使康熙皇帝更为忧虑的是，黄教最高法王达赖五世对朝廷的不忠。基于以上原因，康熙皇帝决心分化瓦解黄教势力。在北京、热河、多伦、沈阳和呼和浩特五处建立了喇嘛印务处，以蒙古及北方黄教势力与西藏喇嘛教势力抗衡。呼和浩特的喇嘛印务处设在无量寺（俗称大召）。

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在以上五个印务处中，又是康熙帝特别重视的一处。此印务处由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和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及掌印扎萨克喇嘛三人共同执印。其印鉴由清朝中央政府颁发，在处理呼和浩特十五大召庙的政治、经济、宗教、行政事务各项重大问题时，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有权坐用清太宗皇太极曾在呼和浩特坐用过的御用宝座。这种最尊荣的礼遇，显然是为了提高呼和浩特喇嘛教领袖的地位和权威。同时，康熙帝还规定：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可直接向清廷呈报事务，并准许根据阿勒坦汗时代的惯例，让土默特左右两翼每月派十名官兵到印务处轮流值班。呼和浩特十五大召庙范围内的一切行政事务，诸如贯彻满清

政府的法令、敕谕；制定各召寺内的一切规章制度，各召庙财产的保管处理；各召庙之间、僧侣之间的纷争、诉讼、奖惩黜陟，皆需由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参与裁决，各召庙只能服从，不得有违。

对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的任命，康熙帝也特别慎重。因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皇帝派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伊拉古克三去劝止噶尔丹汗和外蒙古的哲卜尊丹巴及土谢图汗的武装冲突时，伊拉古克三投降了噶尔丹汗，并把军队引进了内蒙古乌珠穆沁部境内。当时，北京各大寺院的活佛、呼和浩特各大寺院的活佛多数站到了伊拉古克三的立场上，给清朝政府造成很大威胁。尽管内蒙古各盟旗王公贵族，支持清军在乌兰布通打败了噶尔丹汗。但在宗教方面，清朝政府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康熙皇帝越来越认识到，加强喇嘛印务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键是人选。所以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下谕旨说：“管理呼和浩特的喇嘛事关重大，其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由内外达喇嘛中选择任命。”根据这一命令，任命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时，首先由理藩院负责从北京、沈阳、热河、多伦等地的活佛中提出正式候选人一名，后补候选人二至四名，然后由皇帝选定。这样，呼和浩特各大寺院的活佛，就完全被清廷控制了起来。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巩固，清廷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又规定：以后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不能直接向清廷呈报事务，而应先呈报绥远城将军衙门，然后转呈理藩院上奏。尔后，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出缺时，也改由绥远城将军、归化城都统会咨理藩院核准人选。民国以来，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则由呼和浩特各大寺院公推有资望的活佛或扎萨克喇嘛充任。民国二十年（1931）蒙藏委员会曾明令撤销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及所属印务处。后因各大召庙强烈呼吁而未能实行，但其职权已每况愈下矣。

附 清代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正、副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任职表：

归化城的小召和大召

韩云琴

归化城（呼和浩特市）在明末清初向以“召城”著称。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之说。其中以“大召”（无量寺）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它是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于明代建立。“小召”（崇福寺）位于大召东与大召相距不远。说是小召，其实同属于七大召范围。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出巡归化城，为啥不驻“大召”而驻“小召”呢？原因很简单，小召安全。因为小召的座床喇嘛托音二世（法名阿旺罗桑丹比坚赞）与清室关系密切。托音二世是清代喇嘛高僧，他生于康熙十年，1679年迎入小召坐床后，同年二月就往北京朝见皇帝。因他年纪很轻，被皇帝看作是重点培养对象，待遇特殊。因而，他很早就掌握了喇嘛教的部法和灌顶。说穿了他是康熙皇帝精心培养的政治喇嘛。请看他一生中几件较重大的政治活动，和他在蒙古政教中的威望，便知言之有据。

1691年，清朝征召锡泊、呼拉沁等部落时，因托音二世参与而顺利完成任务。因此，康熙皇帝把皇城中的罗刹天王寺拨给托音二世，作为其在京城的驻锡庙。

1695年，皇帝特派托音二世入西藏探听情况。当时的达赖已死，摄政第巴控制政局，秘不发丧。第巴唆使噶尔丹扰袭内蒙。托音二世要拜达赖，第巴设阵让托音遥拜假达赖。托音又会见班禅，邀请班禅进京朝见皇帝，班禅受第巴控制不敢出藏。只由班禅以密信与皇帝勾通。托音此次驻藏两月，归来带着班禅密信和收集到的情报面皇汇报。

1696年清军分三路反击噶尔丹，托音随皇帝出征，并为之出

谋划策。他的宗教攻势和康熙的政治策略与费扬古大将军的军事进攻，紧密配合，取得了昭莫多大捷。托音既为清朝如此效力，理所当然地受到皇帝的信任，他坐床的小召，自然被皇帝视作安全行宫。之后，托音便成了扎萨克达喇嘛（归化城的喇嘛首领）所以康熙二次出巡归化城驻跸小召，并留纪念物于该召。从此托音在蒙古王公、喇嘛中，威望空前提高。昭莫多战役后出现的和平统一局面，归化城繁荣兴旺，托音便首先扩建小召。资助布施者来自四面八方。蒙古各王公布施三千两银，康熙皇帝赐给白梅、檀木各色饰物。扩建后的小召金壁夺目，规模宏伟。托音二世既掌召庙大权，便在被满清政府视作“朔漠屏障”的归化城四周，遍设小召属庙。北及大青山后，南至长城口外，东到察哈尔境内。刘映元先生生前曾谈及小召，他认为所有小召及其属庙构成了清朝在塞北的情报网。这大概就是“小召不小，大召不大”的原因所在吧。

博格达喇嘛和广化寺

澜 麇

广化寺，俗称喇嘛洞召，位于毕克齐镇以北十五里的崇山峻岭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黄帽派（格鲁派）寺院。广化寺虽不在呼和浩特七大寺院之列，但其影响及地位仅次于大召（无量寺）、席勒图召（延寿寺）和小召（崇福寺），在本地区佛教史上占有很显著的地位。

广化寺的开山祖师名叫拉希扎木苏。他被尊称为博格达·察罕喇嘛，官方称呼为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广化寺喇嘛口口相传，博格达喇嘛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蒙古地方传播喇嘛教。云游到毕克齐镇北的大青山中，看到今喇嘛洞三面环山，开阔宽敞，山上松柏翳天，沟中泉水清澈，便驻足于此，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苦行坐禅，广收徒众，讲经说法。据说，博格达坐禅修行，始终不穿鲜丽的有袖之衣，不入奢华的有檐之屋，恪守戒规不渝，因而得迪彦齐（隐居修行有道的禅师）的尊称。其徒众在博格达教导下，虔心向佛，苦习经典，大多学有所成，成为有道高僧。1627年（明天启七年，天聪元年），博格达喇嘛在他坐禅的山洞里圆寂。众弟子将其遗体以坐姿密闭于山洞内，并将山洞修建为佛寺，俗称银洞，喇嘛洞召即因此而得名。博格达喇嘛圆寂前留下四句偈语，直到现在，广化寺的喇嘛们依然能够背诵：

山里我有四个弟子，
我留下一支拐杖和一个法钵。
山里有长流水呢，
水里有宝哩——这是念经的好地方。

博格达喇嘛的拐杖和法钵，被其徒众视为镇寺之宝，一直珍藏在寺内。十年动乱中寺庙被毁，两件宝物也流落寺外，八十年代初几经曲折才得以追回。博格达所说的四个弟子，即查干、额尔德尼和查哈尔三位迪彦齐胡图克图，另一名大约就是博格达圆寂后代其坐床的道布迪彦齐。广化寺达喇嘛金泉（1990年卒）曾经无限敬仰地说：博格达老人家法力通天，你看，他老人家说水里头有宝哩，这不，洞沟里出了金子，完全应验了，真是咱们这一方的圣人啊！

博格达·察罕喇嘛受到崇敬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据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的资料记载，喇嘛教“在土默特没有传播的时候”，博格达在本地区已很著名。这里所谓“没有传播”，显然是指未被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土默特部官方认可。实际上，其时博格达在民间传播喇嘛教，已经卓有成效。因而必然对阿勒坦汗皈依佛教产生一定影响。阿勒坦汗决不仅仅是在西征瓦剌时接触到喇嘛教格鲁派之后，接受鄂尔多斯彻辰黄台吉的建议，突然决定弃萨满而信佛陀的，此其一。其二，是博格达培养了众多的喇嘛教高僧，如查干迪彦齐成为慈寿寺（即什报气召）的第一代活佛；额尔德尼迪彦齐成为崇禧寺（即东喇嘛洞召）的第一代活佛。查哈尔迪彦齐成为庆缘寺（即乌素图召）的第一代活佛，足见其在布教方面的巨大成功。其三，崇福寺（小召）第一代胡图克图内齐托音曾与博格达喇嘛一起研讨经义，对博格达甚为佩服，盛赞察罕喇嘛“修就生起次第，达到了圆满次第。”博格达喇嘛及其三大弟子的历代呼毕勒罕（转世者）中，共有六人，先后出任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扎萨克达喇嘛或副扎萨克达喇嘛。而且被誉为本境喇嘛教最高学府的广觉寺（五当召）的活佛，还是广化寺活佛的学生。直到现在，五当召的僧众仍称喇嘛洞活佛为“巴格希格更”（佛爷老师）。足见博格达·察罕喇嘛的影响之大和宗教地位之高，在本境是无与伦比的。

顺便谈谈广觉寺活佛以广化寺活佛为师的事。据喇嘛洞召僧众口传，五当召第一代活佛栋科尔（法名对音库尔·班第达）原为博格达喇嘛之徒。他木讷寡言，笃行笃学。一次博格达命众弟子在银洞前石崖上各雕凿佛像一尊，别人均已刻就，栋科尔尚未完成一半。他不顾别人的讪笑，专心雕刻，虎口滴血也不稍停，终于刻出一尊形神皆备的佛像。博格达对他说，你的功德已经圆满，往西去吧，那里有你的参禅之地，你应修建起自己的寺院。栋科尔拜别师傅后，西行至吉忽隆图地方，见一妇人在山坡上行走，奶桶忽然掉到地上，奇怪的是奶汁竟沿坡向上流去。栋科尔顿悟这是菩萨在指点他，于是选定奶汁倒流之处为佛寺基地。从此苦行化缘，终于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广觉寺。他便成了该寺的第一代活佛。这个传说，显然是神化了的，历史未必如此。不过，广觉寺第一世活佛，曾为广化寺之徒或者竟是真实可信的。据印务处资料记载，广化寺第九世活佛，曾从广觉寺第四代活佛学习经典，广化寺僧众应称广觉寺活佛“巴格希格更”才对。为什么却相反呢？如果广觉寺第一世活佛不曾为广化寺活佛之徒，则曾经在五当召学经的，现今广化寺活佛王铎却被五当召喇嘛尊为“巴格希格更”就是咄咄怪事了。需要指出的是，栋科尔生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其时博格达喇嘛圆寂已七十年，二者不可能有师徒关系。广化寺第四世活佛生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卒于1736年（乾隆二年），如果栋科尔确曾系广化寺活佛的徒弟，那就只能是该寺第四世胡图克图了。

广化寺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到现在共传十世。第一世为博格达·察罕喇嘛，以下九世依次为：

二世和三世均生于土默特两翼，分别为巴图宝勒德和道尔济之子。这两代活佛的名讳与生卒年月均失载，有人以为，他们应是继承博格达喇嘛之位，代其坐床的道布迪彦齐和阿哈木德迪彦齐。这两位迪彦齐很可能是博格达喇嘛的再传弟子。在清廷大兴

喇嘛教时，经西藏各大寺院认可博格达为胡图克图，寻找第四代转世灵童时，被追认为二世和三世的。也有人认为，“阿哈木德卒于康熙五年（1666），到二十四年（1685）的十九年中，出现了二世和三世两代呼毕勒罕转世者。”两说孰是？一时难以确定，只好存疑。

四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法名那旺楚木培勒尔，1685年转世于土默特参领巴图孟和家，九岁坐床。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朝见清圣祖，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修建前寺（即广化寺大殿）。1724年（雍正二年）奏请朝廷赐封达喇嘛一名，赐给度牒四十道。1737年（乾隆二年）圆寂。

五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1739年（乾隆四年）转世于乌拉特东公旗色楞家，1746年坐床。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敕封为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扎萨克达喇嘛。同年扩建寺庙，乾隆皇帝赐寺名为广化寺。并赐度牒六十道，增格斯贵、德木齐各两名。曾三次进京朝见皇帝。于1797年（嘉庆二年）圆寂。

六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1798年转世于东公旗嘎尔丹斯仁家，1801年（嘉庆六年）坐床。1812年（嘉庆十七年）至1821年（道光元年）在西藏阿木多寺研习经典。1823年敕封为喇嘛印务处副扎萨克达喇嘛。三次朝见道光皇帝，1832年（道光十二年）准乘绿帟车。1837年（道光十七年）六月圆寂。

七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转世于准格尔旗满都家，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用金本巴瓶掣签定为转世灵童，八岁习经。曾三次朝见皇帝。1880年（光绪六年）圆寂。

八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罗布桑·丹比·沙拉吉德，1887年（光绪十三年）以金本巴瓶掣签确认为呼毕勒罕。

九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扎木苏·迪彦齐，生于准格尔旗，九岁坐床，曾以五当召第四世活佛为师，学习经典。宣统年间被选推为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四十五岁时，赴五当召教该召六世活

佛经典，为避乱长住该召。1943年迎回广化寺，当年六月圆寂。

十世吹斯喀巴迪彦齐胡图克图，1945年5月生于土默特旗卡台基村，法名阿格瓦·罗布桑·帕日赖·扎木苏，俗名王铎。三岁时确认为转世灵童，七岁赴五当召学经。1957年读小学，1964年读中学。十年动乱中备受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得到平反昭雪，入呼和浩特蒙文专科学校读书，毕业后在毕克齐蒙校、土左旗民族中学任教。1984年回寺，现兼代广觉寺活佛坐床。

广化寺规模较大，由前后两寺组成。据载，后寺系博格达喇嘛之徒众于1658年（顺治十五年）依博格达坐禅之山洞扩建成，为三层佛阁，内塑坐佛一尊，自洞底直达洞顶，高约三丈。坐佛左下侧有一洞穴，其深不知几许。寺前有石阶一百二十四级，东侧悬崖上有不同规模的摩岩造像多尊。前寺建于1719年，扩建于1783年，共四进殿堂：天王殿三间，内供四天王；大经堂四十九间，楼两层，每层七楹；大雄宝殿二十五间，供三世佛，大殿檐前悬挂蒙、满、藏、汉四种文字金字匾额；二殿为欢喜佛殿；东西八角楼供十八罗汉及观音菩萨。各殿佛像均为铜铸，工艺高超，栩栩如生，为其它召庙所无。寺内各殿小铜佛及藏、蒙文经卷甚多。佛爷府位于前寺东北，后寺之前的山脚下，为历代活佛居处之所。

广化寺有属召两处，其一，坐落于萨拉齐境内沙尔沁村后半山腰，称西广化寺。其二，位于朱尔沟口东侧，称中广化寺。武川境内的水泉沟还有一处活佛的避暑召，规模较小。

广化寺的僧众，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统计，共有胡图克图一名，达喇嘛一名，德木齐二名，格斯贵九名，一般喇嘛二百四十二名，俗徒二十七名，计二百八十二人。据说该寺最兴盛时僧众达四百余人。

广化寺的庙产，以香火地为大宗，归、和、萨、武四县均有分布。惜资料毁损，已无法知道确数。寺内喇嘛说，解放前几

年，仅在武川黄壕滩、水泉沟及洞沟前的土地上收租，其余的均弃置或沦失。另外，在呼和浩特旧城和毕克齐镇有些铺产，若干牛马羊群也在解放前耗尽。

清末以来，由于信徒日益减少，土默特蒙古族经济状况愈来愈糟，寺内所得布施也逐年减少；加上庙产经营不善及兵匪骚扰等因素，广化寺日渐衰败，到解放时，仅有喇嘛十余名。寺院年久失修，散布于前寺两侧的僧房多成断壁颓垣。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所有佛殿均被拆毁，喇嘛被遣送农村，一方名刹遂成废墟。值得庆幸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现已修复后寺和佛爷府，前寺的修复亦在筹备之中。有关部门还拨款修筑了通往广化寺的公路，喇嘛洞作为呼和浩特地区的名胜，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光旅游者。

解放前公教教育的回顾

李西樵

解放前，天主教在我区曾广泛传播，在广大城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在教务扩展过程中，公教教育确实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解放前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我区开设学校，扩展教务情况作一回顾。

天主教开办学校、目的是为了宣扬教义，扩展教会势力。这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清朝政府对洋教的传播实行严禁的时候，一些避身塞外偏僻山区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的外国传教士，就“确定了对蒙古民族的传教方针（《西湾圣教源流》下同），据该书记载：当时担任蒙古教区第一任代牧的法国味增爵会司铎孟根生，为了在我边疆地区发展教务，对开设学校“异常热心”。特别对少年儿童灌输“圣教道理”更认为是“关系到将来教友及“圣教广扬”的重要问题。因此，尽管当时清政府三令五申发布禁教的诏令，但在长城边外山沟中，却先后出现了男女两所天主教小学校。两校共招收教徒子女一百余名，均为八至十二岁儿童。

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居民稀少，除了极少数富有人家请老先生教育子弟的私塾以外，根本没有学校的设立。尤其在蒙古民族中，识字的人更属寥寥无几。教士孟根生为了“劝化西湾子以外那些蒙古居民”，他和教士们学习蒙古语言、穿着蒙古服装，前往蒙古包中进行巡回教学。由于喇嘛教在蒙古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洋教士们喋喋不休地宣讲什么“天堂幸福，灵魂得救”，然而要从蒙古人头脑中驱散固有的信仰，却是十分困难的事。因而虽然费了不少气力，却是收效甚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洋教实行开放，外国传教士在

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涌入我国。公元1865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接替了法国味增爵会主持在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传教事务。被称为圣母圣心会会祖的南怀仁、到了西湾子以后，怀着发展教务的急切心情一开始就着手公教学校的开设。他要求每个堂口都设立学校、并贴出布告，要教徒都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他告诉信徒们说：“你们领过圣洗圣事，这还不够，每人就该当学会耶稣的道理，这是一件很喜悦我心的事情。”（《西湾圣教源流》）

由公元1865年，圣母圣心会接办教务开始，直到1949年9月内蒙古全境解放。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天主教的传播，在我国辽阔的北部边疆，东起热河、西至宁夏，包括雁北和陕北三边地区、办起了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教会学校。从这些学校中培植出了成千上万的，经过灌输天主教义的会徒。这些会徒走出学校之后，绝大多数的人，为宣扬教义发展天主教会势力起到了作用。

天主教开设的学校分要理学校，公教公学、初级小学和新学制学校等。另外，有时还根据需要开设一些专科性的职业学校。这些不同名称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按照教务发展情况的需要，确定施教内容的。如果从时间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由1865年（同治四年）至1883年（光绪九年）这是开设学校的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所办的学校主要是。要理学校（又名修身教育书房）。当时传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西湾子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学校开设的目的，完全是为向人们宣扬教义，广泛吸收教徒。学校招收的对象，除教徒子弟外，也招一些志愿入教的成年人入学。学校设备简陋，学期长短不定。这些所谓的学校，既没有“开发民智”的课程，也没有“有益学生身心”的活动。全体学生无论成人或少儿，每天只是抱着一本由教会编写的《要理问答》，哇哇不休地熟读背诵。这本书的内容全

为天主教的基本知识，采用问答形式，如：

问：为什么生在世上？

答：为慕天主教自己的灵魂。

问：什么是救灵魂？

答：就是死后免入地狱、得升天堂。

……

除此以外，便是天主教的一些清规戒律，如“天主十戒”，“圣教四规”“圣事七迹”等。学习这些课程的用意、正如该书的“序言”所说：“为使教徒能对天主圣教主要教义，教规加深理解和有所遵循。做到认主益深、信主益坚、望主益切、爱主益诚……并使望教者探求圣教要理、获得进教阶梯。”一句话就是向人们灌输进教入门知识。

要理学校，除了上述这些所谓修身要理课程之外，还采用了当时民间习见的教本如《三字经》《百家姓》等读物。

第二个时期：由1883年（光绪九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1883年，罗马教廷将我国长城以北划为由圣母圣心会传教的三个教区。即东蒙古教区、中蒙古教区和西南蒙古教区。这一时期，天主教势力发展颇为迅速。一方面因为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地方上官府和人民不敢触动；另一方面，内蒙古地方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给教会势力发展，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那些洋教士认为使教务更快的发展，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加之学校中教师的缺乏，更是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培植传教助手和学校的师资，便开设了较要理学校高一级的“公学”。

公学初办时，只有东蒙古教区男校和女校两所，共有男女生八十余人。到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除东蒙古教区原有的两所学校外，中蒙古的南壕堑（今河北尚义县）和香火地也设立了男校两所、女校一所。西南蒙古教区设男校三所。全内蒙古教区总计有男校七所、女校两所、共有男女学生将近四百

人。

公学的课程除国文外、增设了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在南壕塹公学，还添置了一些简单的试验仪器。这在当时社会闭塞的情况下，确也是难得的。尽管如此、宗教课程仍然是公学中的主科。宗教活动更不可少，学生每天必须热心“神功”，清晨起来望弥撒、念早课，晚上念晚课。望弥撒时，下跪尤须恭敬，不得有半点含糊和应付。学生还要将全天的言行，无保留地向神父汇报……。宗教课程不及格或宗教活动不积极者，随时都有被勒令退学或被开除的可能。

由公学毕业的学生、除被认为优等生送修道院继续深造，以备将来做教士外，一般都被分配到各堂口所办的学校中任教。特别是出身于南壕塹公学的毕业生，在边疆地区各公教学校中，都有他们在充任教师。

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宣传天主教基本知识的要理学校，不但有增无减，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据王守礼所著《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统计，1888年（光绪十四年）前后，在内蒙古传教区设立的要理学校，男校四十六所、女校二十三所、男女生共九百八十四名。到了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要理学校男校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五所，女校一百一十四所，男女生共达五千七百四十人。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务迅猛发展，说明当时我国的北部边疆，堂口林立，教徒众多。几乎每个堂口都有教会学校，诵经祈祷之声随处可闻。那些洋教士们坐在堂中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我国辽阔的边疆、好象变成了天主教国度似的。

第三个时期：1911年（宣统三年）至1949年。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由辛亥年到1949年内蒙古全境解放，前后三十八年间，为天主教教会学校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科举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教育体制也随

着变化，但由于军阀混战，政局不稳，一切教育法令并不能在全国贯彻。民国十八年（1929），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维护教育主权，对宗教团体设立的学校制订规程，要求教会学校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立案，并受其监督和指导。其组织课程及其他一切事项，均须遵照教育法令办理。至于学校施教，规程中明确规定教会学校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学校内如有宗教仪式，亦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特别在小学中不得举行宗教仪式。规程中这些要求，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国家说，应该是起码的限制。但由于国家积弱，政治腐败，一些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宗教团体，根本无视所在国的政策法规。加之边疆地带远离内地，对中央法令的贯彻更为漠视。在这一时期，公教学校较前有了更大的发展。为适应形势的要求，教会将要理学校改为初级小学；在分区所在地，创立高级小学；将原在教区的公学改称中学或师范。据1935年全国各教区报告统计：在全国范围内，天主教所办公教学校达到三千所。仅在我北部边疆，就超出一千所。这些学校除了少数经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立案外，大部分并未立案。即使立了案的，也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对之不闻不问。稍有进步的是，学校的课程略有改进。以素称办得好的南壕堑公学为例，这个学校于民国九年改称“养正中学”。设有高、初中两部，学生最多时将近二百人，除了口外学生，还有来自张家口和雁北一带的。课程有数、理、化和英、法等外文课。如果不是被浓重的宗教气氛所笼罩的话，这在当时的塞外地方，确也象是一所新式学校。这个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可谓“无微不至”。笔者曾见过一本《南壕堑养正学校校规》，内分十一章、章下分节、每节又分若干条，共为160条。举凡学生参加宗教活动，读书，休息以至吃、喝、拉、撒、睡无不有详细规定，可谓烦琐无比。更奇特者，如第五章“论散心”中规定，“散心时切忌站着不动”。第十一章“厕所”中有“苟无必要不准入厕，并不可逗留彼处……”

在厕所前等候者当离厕所至少两步以外，背向厕所。”真是废话连篇。至于参加宗教活动做到必恭必敬、读书要求正襟危坐……更是规定得详尽无遗。对《规定》若有违反，轻则申斥，重则“驱逐”出校。学生入校即处于高压之下，动辄得咎，人人手足无措。

公教公学的学生大都是教徒子弟，非教徒子弟为数不多。学生家长将子弟送入学校时，必须与学校订立契约。契约规定学生在校应自备笔墨衣衾，遵守校规。倘中途退学、须将入学以来所耗费用一概偿还。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校方遣归。这说明了学生一旦入学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听任教士支配。

公学课程中的自然学科是学生唯一能从中学到一点科学知识，受到一定启蒙教育。历史和地理课，使学生们知道除中国外的广大世界。特别是晓得西方许多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我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就不能不使有些学生有所思索，从而萌发出爱国主义的思想。说到这里，笔者有一友人，青年时代就读于南壕堽养正学校。他家中送他入学是希望培养他将来做神父，以便在教会中占有一定地位；但他却选择了一条与家庭的希望相反的道路。因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有加无已，尽管学校像一个密封的罐头，严禁外界消息传入；但内地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还是被他知道了。有一次当他正在阅读一份进步刊物时，不慎为教士发现，当时以“阅读邪书，违反校规”被勒令回乡务农。离开该校后，他不但未回家中，径直跑到省会归绥考入了归绥师范学校。在当时，教徒子弟，入教外学校，是不被教会允许的。因为这将对教会有相当的不利。更何況这个学生，还参加了当时反对教育厅长的学潮，事情被养正学校教士们得知后，大为惊慌。教会恼羞成怒，一面停止了学生全家“领圣体”（天主教仪式，即教徒领了圣体，同耶

稣合成一体，圣体养活灵魂，脱罪过、立善功，免地狱、奔天堂。）同时威胁学生家长：速将子弟招回。这个学生接到家中讯息后，不但未予理睬，反而和别的同学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革命。这对政教合一的教会，不啻当头一棒。

当然，象上述情况在教会学校中是极少数，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多数人在教士们的严密控制下，每天只是在圣经残卷中寻找虚无飘渺的人生。更有一些人受洋教士们夸耀西方国家物质文明的影响，日久天长在思想上产生严重的民族自卑感，盲目崇尚西方文化，认为外国什么都好，甚至拜倒在洋教士的脚下，模仿洋人的生活习惯，以做为一个“假洋鬼子”而沾沾自喜。

在这时期中，由于社会比较安定，所以教务发展迅速，公教学校续有增设。特别是1925年（民国十四年）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天主教开办的各类学校，（包括公学初高两级，国民学校，要理学校）增长颇为迅速。据统计：1925年在全内蒙教区有学校738所，男女学生21,204名。到了1935年，学校增加到960所，男女学生达25,450名。十年之间增设学校222所，学生增加了4,200多名。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强调发展国民教育，教会根据这一形势，较多的增设了国民学校。在民国十四年时，全教区国民学校共207所；到了民国二十四年，达到320所。十年间增加了113所。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久，东蒙古和中蒙古教区，相继沦入敌手。由于战争的关系，特别是在欧洲战场上，比利时等国参加了同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因此，内蒙古沦陷区的外国传教士，被日寇视为敌性国家的人民进行集中管制。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方的教务发展一度趋向低潮。在抗战八年中，教会学校有不少被迫停办，如玫瑰营子女子师范讲习所，窑子沟家政学校、集宁教区的文化学院（后改为文化中学），抗战时均遭关闭。继续开课的除小巴拉盖的培英中学（男女分校）以外，只有河套及西南蒙古一带未被日

寇侵占的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教务的恢复，被迫停办的公教学校相继恢复。除了旧有的学校外，还增设了一些中等学校，如绥远教区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设立了以主教樊恒安、穆清海二人名字命名的“恒清中学”、“圣家小学”。河套陕坝在普爱小学的基础上设立了“普爱中学”。三盛公设立了“明德中学”。集宁教区设立了“平兰中学”等。这些都是较正规的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除上述窑子沟的家政学校外，归绥公教医院于1925年曾创办一所“护士学校”。这个学校自1930年后，每年毕业十余人，都具有一定的医务知识，解放后，还有一些人在各旗县从事医务工作。

从1865年由圣母圣心会主持，天主教在我国北部边疆地区进行传教事务起，直到1949年9月全境解放，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修会的洋教士们，于发展教务的同时，在我区办起了数以千计的教会学校。教务的发展，给开办学校提供了条件；而学校的创办更促进了教务的发展。尽管这些公教学校在向人们普及文化知识，进行科学启蒙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并非是他们们的初衷。洋教士们之所以不辞辛劳、殚精竭虑地经营教育，正如他们的教宗比约十一世在《教育通牒》中所说：“为提倡保护公教学校，使他们的儿女得益处，不拘作什么，无疑的都是信仰工作，更好说是尽公教进行的职务，实在叫我为公父的心里欢喜至极，这些竭尽心力用各样办法，专务这种极重要的工作，是该特别赞扬的”。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什么在宗教活动中，特为重视公教教育的原因所在。

天主教在我区所办的慈善事业

鲁 阳

天主教一向对办理慈善事业，颇为重视。因为举办慈善事业，既能博得人们对教会的好感，又能借助理慈善事业与社会各方取得联系。多年来，天主教的教士们，对圣母圣心会在我国边疆的一些“善举”，不厌其烦地进行夸耀，无非是要人们感戴教会的“恩德”，以扩大教会的影响，进而巩固教会在我边疆的势力。

教会医疗事业

天主教会所办的医疗事业、主要指开设医院和诊疗所以及施舍药剂等。天主教会最早在我国开设的医院，是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在天津开设的法国医院。后来，在青岛、南昌、九江等地也开设了医院。这些都是属于法国天主教系统的医疗机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传教士对发展医疗事业更加重视。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开设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公教医院，就是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创办的一所颇具规模的医院。

归绥公教医院成立于1923年（民国十二年），原名为公医院，后来为了免被误认为公共医院，于1937年改为公教医院。它是由比籍教士吕登岸着手创办的。吕登岸一向在察哈尔西湾子一带传教，1920年被任为圣母圣心会会长。这个修会的教士们，在长期的传教生涯中，看到我国边疆地区缺医少药、疾病和疫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尤其外籍教士因患疫病死亡人数众多。据王守礼所写的《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记载：从1865年到1945年八十年间，仅内蒙古西部地区，因患斑疹伤寒死去的外籍

教士多达二百余人；而自1910年到1930年二十年间，竟死去了112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感染疫病死亡的人，半数以上均未活到三十五岁。严重的事实，迫使教士们不得不考虑预防的措施。当然，在这期间，我边疆地方的人民因疫病而死亡的更难以数计。为了解除疾病对人们的威胁，特别是保障教士们的生命和健康，圣母圣心会决定在长城以北开设一所医院。至于把医院开设在当时的归绥，那是他们考虑到归绥不仅是圣母圣心会传教区的中心，而且也是当时长城口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所在，医院设在这里，对联系各方人士、扩大教会影响，无疑将起到直接作用。

创设一所较大的医院、需要一笔建院基金。在基金的筹集方面，据一些有关资料记载：一是捐助，除由中、比两国人士及热、察、绥、宁诸省当局捐助开办费外，还由一位留华多年的圣母圣心会会员比籍教士捐助的巨资。二是来自比利时国内的“庚子赔款”，至于使用庚款问题，据王学明在《归绥公教医院》（载《呼和浩特史料》第三集）一文引证王守礼写的《厚和公教医院概况》法文版中记载：“1929年中、比教育委员会和慈善委员会，给了一笔基金、以保证医务事业正常进行。”王学明在文中肯定上述资金就是庚子赔款。至于为什么王守礼含糊其词不敢明确提出是庚子赔款。那是因为他完全明白庚子赔款的来历，是比利时帝国主义者从中国人民身上吸取的血汗。用这笔款在中国建立慈善机构、无异于“强盗施赈”。不仅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甚至将有可能发生不利于教会的事件。

归绥公教医院地址、在新城西门外铁路以南。这里原是清代驻绥远旗兵操演的教场、面积约八十亩。医院以每亩八十元价格购自“旗民生计处”。在医院建设中、绥远都统马福祥又将医院以西土地六十亩拨给了医院，共占地140余亩，加上附设的护士学校以及职员和工友宿舍，全部占地超过二百亩。院内有西式洋房五所，还有花园，小湖、养畜鹅鸭、花鹿等，园内林木青翠、

环境幽雅，是养病的理想处所。医院有内科、外科、眼科、妇科及小儿科。在设备方面、诸如电疗、化验、换药、消毒、药房应有尽有。一些较贵重的诊察仪器如爱克斯光诊察器、射热器、电光照浴器，回光无影手术灯、眼底诊察仪、水晶体诊察器、视力诊察仪等都有设置。此外还有锅炉暖气、蒸汽锅等。病房分男女两部、共有床位一百二十余张。这在当时的口外地方、可算得上是一座现代化的医院。

医院因是天主教会所设立，目的在于传教，院内建有圣堂一座、病房内竖立了“耶稣圣心”和圣女“小德肋撒”塑像。教士和修女，随时都在向病人宣讲“圣教教义”，还劝说一些病人和他们一起参加每天早晚的祷告，希望解除病痛。每天身着长袍大衣的神父和修女，在病房中进出，给人一种庄严而肃穆的感觉。

医院管理、由院长总揽，副院长协助院长处理院务，设参事一人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至于病房、护士和工人的管理、统归修女负责。自1923年医院成立。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间，所有担任过院长的，无论正式临时或代理，基本上都是外籍教士。只有在归绥沦陷时期，（即1943年3月21日到1945年12月30日）由于日本人将医院外籍人员集中于山东潍县管制，医院才由中国神职人员如白祥、王学明等先后一度担任院长。

在这所医院工作的大夫，有外籍的也有中国籍的。中国大夫绝大部分是毕业于上海天主教办的震旦大学医学系，然后再被保送到法国或比利时医科大学深造后回国的。例如，1925年到1929年在这所医院工作的张汉民和宗元凯两位大夫，前者专项眼科、后者是精神病专家。他们二人均获得法国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以后，医院还聘请过陈少波、张汉宏、黄鸣谷、陈家宾以及直到解放后还在这里工作的舒兆勋、王聘臣等。他们都毕业于震旦大学、获有外国博士学位、在医学方面各有专长。外籍大夫中较有声望的，除了医院开办初期的比籍那、甘二位大夫之外，还有

1927年后到院的匈牙利籍施道拉医生（眼科）、奥地利籍女大夫（内科）、美籍安德森大夫、德籍殊大夫以及比籍的司福音、兰衡思等。他们不但有精湛的医术对待患者也关心热情，因而受到人们的爱戴。由于医院有好的医生施诊，再加上有购自德国的有名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所以遇有一些疑难病症，往往在别处就医无望者，在这里得到良好的疗效。这就为医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因而数百公里以内的患者，不辞长途跋涉前来就医。据三十年代资料统计，每年门诊接待患者近千人。主要疾病以肺癆，花柳为最多，肠热病与瘟热病也很流行。其他，因季节不同，如赤痢及一般传染病发病率也很高；至于妇产科疾病，大多为逆产。这是由于当时一些人对新法接生持怀疑态度，或经旧式收生婆接产无效时才送进医院、所以孕妇的死亡率特高。

医院附设的医护学校、成立于1924年，后来改名归绥仁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原分男女两部授课，1935年后专收女生、不招男生。入校学习必须是教徒、在校学习期间每年膳宿费40元，学习三年毕业。学校为半工半读性质、上午劳动、下午上课。统由修女管理，对待学生非常苛刻，稍有犯规或学习不及格，就被勒令退学。学生毕业后先被留院劳动，只管吃饭不发工资。这个学校前后毕业八个班，学生共200余人。除留院外，大部分到外地教堂诊所工作。

在这所医院工作的无论医生或职工，生活待遇非常悬殊，中外籍人员的界限很明显。除了外籍院长修女因是神职人员都实行包干制以外，中国医生的工资只等于外籍大夫的一半。至于一般职员和工人的待遇就更低了。有的只管膳宿，每月给少量的零用钱，而医护学校学生，在医院工作，纯属无偿劳动。

教会除办公教医院外，还在各地教堂中办了一些诊疗所。教堂开设诊疗所，是天主教会举办医疗事业的又一形式。在我国边疆地区、自清朝政府开放教禁，天主教势力迅速扩展，在东自热

河西到宁夏，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建立起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天主教堂。这些教堂，一般都附设有诊疗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大小不等的诊疗所，不下六百来个。分别隶属于212座教堂管理。如西湾子教堂附设的诊疗所，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后来又加扩大，增添了设备，有专职医生和护士很象一所小型医院。当地小儿发病率颇高，诊疗所接待患者以此为最多。南壕堑（尚义县境内），玫瑰营子，以及香火地（今凉城）等地的诊疗所，都颇具规模。教士尚守礼在施诊中，对待患者比较热情，颇受称道。大同教区大同县榆林村及天镇县教堂都设立门诊所。广灵西加斗诊疗所研制的戒烟药，有不少人服用后颇见功效。后山固阳一带，因医疗条件差，1932年霍乱病流行，教士为注射防疫针，达数千人。陕北靖边小桥畔教堂诊疗所，是三边一带的医疗中心。这里因地处偏僻，居民前去就医的不少。东蒙古教区，朝阳、松树咀子以及平泉等地教堂附设的诊疗所，大都由修女主持。除此以外，这些诊疗机构，还经常向人们传播一些卫生知识和防止疫病流行的办法等。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比籍教士吕登岸和我国医生张汉民，共同研制成功的预防伤寒药针。1933年张汉民根据吕登岸由波兰寄来魏格医学博士化验成功的药针，在北平辅仁大学化验室继续研究，然后制成预防伤寒血清。试验结果，不但疗效好而且反应较波兰药剂为小。在口外地区对预防与抑制伤寒的流行，起到了一定作用。

解放前的较长时期内，圣母圣心会的教士们，虽然是通过行医施诊，进行传教活动，单纯从治病、防病客观效果角度讲，在医疗条件极端缺乏的边疆地区、解除人们疾病痛苦，救死扶伤方面起到不少作用；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不少医护人员。并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我内蒙古地区。凡此种种，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慈幼事业

天主教会的慈幼事业，包括安老院、育婴堂以及收容残废儿童的盲哑机构等。在内蒙古地区圣母圣心会主要举办了一些安老院和育婴源堂，少数残废人也收容于上述机构中。

我国边疆地区、近代以来，由于连续不断的灾荒和战乱，常常使不少人陷于家破人亡的境地。天主教会既然以“劝人行善”为宗旨，对那些丧失生活条件孤苦无依的老人加以收容，是符合教义的。安老院大都附设在较大的堂口、收容人数多少不等。也没什么条件限制，只要是真正无以为生的人，都属收容范围。收容多的有二三十人，少的数人。也有个别无依无靠的老人，为教堂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换取衣食以度余年。安老院对收容的老人都有专人管理，根据每人情况分配一定的工作。如种树种花、看门、守夜等。院中只管衣食。对一些丧失劳动力的即在院中休养以终余年。有病给予诊治，死后由教堂给以安葬。

在边疆地区最早成立的安老院，是巧号村教堂的安老院。它大约成立于清朝光绪初年。这个安老院的规模颇大，收容孤老百余人、由修女负责管理。其次是高家营子安老院，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教徒母女二人所创办，收容老人男女不限。民国廿五年（1936年）时，院内收容妇女58名、男子13名，前后共收容过一百余人。其余如西湾子、南壕堑以及巴拉盖和西南蒙古小桥畔等教堂，都设立了安老院。据民国廿六年调查：总计边疆各教区，共有安老院廿所。收容男女孤寡老人约二百六十余人。在这50多年内，被收容者不下千名。

外国传教士们在我国办理慈幼机构，天主教的传教士要比基督教的传教士更加重视。

在我国边疆的传教区内、由圣母圣心会开设的育婴堂，比较普遍。几乎每个堂口，都有这种机构。据了解，大的育婴堂收养

婴儿最多时、达二三百个。小堂口收养多少不等。旧中国，人民生活贫困。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由于灾荒和战乱，人们终年陷入天灾人祸贫苦不堪的境地。对生下的子女无力抚养，不是遗弃荒郊野外，便被送进育婴堂。加上重男轻女旧思想的影响，遭遗弃的女婴尤为突出。因而教会育婴堂以收养女婴为主。人们将婴儿送入育婴堂后，教堂即交由乳母哺育。待其稍长即接回堂内。育婴堂一般都由中外修女管理，这些年轻的修女，是由各种原因出家修道的，她们既没有抚育婴儿的保健知识，有的还缺乏必要的耐心，甚至有的修女性情乖戾、脾气古怪，以自己的好恶对待儿童，稍不如意就是打骂。儿童因传染疾病或被折磨死亡时，教堂为免于激起人民的义愤，又以各种借口掩盖真象。十九世纪后期，内地有些地方发生的教案，有不少就是起因于此。

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是教堂的重要一步。育婴堂中墙上挂了不少宗教画片：有天堂图、地狱图、好人善终得上天堂，恶人死后被魔鬼拉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给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一层阴影。当孩子稍微长大后，逐渐教以纺织、缝纫和刺绣等，除了使儿童本身学习到一些技能以外，也给教堂提供了收入来源。到了成年，由教堂代为选择对象。一般被嫁给贫苦的教民。结婚以后，由于他们共同的信仰，成为笃信天主的教民家庭。据了解，在边疆这样的家庭不下二千余个。

这里应该特别提的是，教士们对一些民间陋习的改变。如主张男女不到成年不结婚。因当时民间有早婚的不良习俗，为了早生子或使家中增添劳力，往往男女不到成年即行婚配。甚至有的在襁褓中、就已订亲。这很容易造成家庭悲剧。教堂规定男女非达到成年，不准婚配。教徒子女的婚姻也受约束。其次，主张妇女放足。旧中国妇女裹足，是传统陋习，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远在八十年前，教士们在西湾子就曾设法改变这一恶俗，他们劝导教徒妇女放足，并以放足的妇女作榜样进行宣传，使不少

妇女改变了裹足的习俗。育婴堂中的女婴从幼儿时起即不受缠足的痛苦。这些应该归功于教士们的倡导。

在边疆地方教堂设立育婴堂是比较普遍的。几乎每个教堂，都附设有育婴机构，并有修女在那里负责。据王守礼所写《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调查，自1870年（清同治九年）起，至1940年（民国三十九年），前后七十年间，边疆地方热河、赤峰、察哈尔、集宁、绥远、宁夏和大同七个教区，共收容了4,597名婴儿。其中以察哈尔教区和绥远教区收容婴儿较多。两教区收容多达2772名。其他教区多少不等。从这个统计数目中，可以看出：解放前在边疆地方遗弃婴儿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救济事业

救济事业是教会整个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战乱不已，各种灾害，连绵不断。特大的灾害就有1876（光绪二年）至1879（光绪五年）华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和陕西五省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大片土地龟裂，树皮全被剥光。整个华北大地呈现出一派惨绝人寰的景象。1911年黄、淮水灾和1929年华北旱灾等，都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人民流离失所遭受巨大的损失。

每当天灾降临，都有一些传教士对灾民施行救济。1878年的特大旱灾中，在山西灾区施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过“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这就如实供认了教士对灾民施行救济的用意所在，作为吸收教徒的手段。

内蒙古地处边陲，灾害的发生甚于内地。除了特大的旱灾以外，还有水灾、雹灾、虫灾、兵灾以及疫病等。每当灾患降临，使整个地区农村破产，饿殍载道、鬻儿卖女比比皆是。在严重的灾荒

年月里，圣母圣心会的教士们，便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拯救灾民。如光绪十八年察哈尔大荒，教士向灾民散发粮食；在南壕瓶教堂一个月内发放麦子二百袋。民国十七年大灾中，东起热河、西至三边一带、二百五十余处教堂向灾民施舍衣物、发放粮食，还收养不少被遗弃的孤儿。在内蒙西部黄河沿岸，水灾不断发生、特别当春季天暖、河中冰块溶化、堵塞河道、河水大量溢出。清末宣统二年、整个河套西部一片汪洋。史料记载，光绪三十年黄河水势冲塌河岸、土默特村庄被冲毁为数极多。银匠窑子二十四顷地等，由于当地居民与教士的共同努力防堵，才幸免于难。为了救济水灾，1911年美国通过红十字会向我国捐助捐款和慰问品，由在华的传教士负责向灾民散发。不久，成立了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这个救灾机构除了对黄河淮河两岸灾民施行救济外，还决定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发放贷款作为修筑堤防、修筑道路，振兴实业等之用。内蒙古萨拉齐托县境内民生渠的修筑，就是由圣母圣心会教士参与由华洋义赈会的捐款所修筑。除此以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通过各地成立的分支机构，由教士参与发放善后救济物资。这些物资大部被中饱侵吞，分到灾民手中为数极少。

教会救济事业、有其慈善的一面，通过救济、救活了不少人；但也有其伪善的一面。这就是传教士利用慈善事业作为搜集中国情报、干预中国政治，推行文化侵略的手段。如李提摩太在山西灾区活动时，就曾随身带了测量仪器、沿途绘制地面和勘察矿藏等，内蒙古的传教士还不断将我边疆地区灾情、死亡率、灾民流散情况以及移民等与李提摩太互通情况。然后他们将情报汇总寄往英美有关部门。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及其伊斯兰文化

甄可君

一、呼和浩特清真大寺的建成和发展

内蒙古呼和浩特是一座历史悠久、民族杂居的古城。这里，生活着蒙古、汉、回、满、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三十多个民族。在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北方的历史中，这里的各族同胞在生产上互相支援，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彼此影响，生活上互相依赖，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劳动汗水，共同推动着呼和浩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呼和浩特佛教文化特别发达，因这里建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而素有“召城”之称。又因为这里生活有数万回族穆斯林，所以伊斯兰教文化也很发达。

伊斯兰教传入呼和浩特地区的时间，大约是在蒙古汗国到元代初叶。1219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西征东归时，曾带回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穆斯林。以后，窝阔台汗于1235年，蒙哥汗于1252年和1253年又多次兵征西亚，回军之时，又带回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穆斯林。元王朝建立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大批西亚穆斯林也来中国经商。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这几部分人中，有的则定居下来，以后成为元帝国的臣民，成为元代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的主要成分。

呼和浩特地区当时是西亚人经由河西走廊进入元大都（北京）的必经之路，又是漠北进入漠南的停居之地。同时，该地区与蒙古民族的发祥地“三河之源”以及窝阔台汗建都的喀拉和林（今蒙古国的哈尔和林）又相距不远，因此西亚穆斯林进入中国

后留居呼和浩特地区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呼和浩特地区当时称丰州，《马可·波罗游记》第73章中记载：“治此州者……，亦有偶像教徒及回教徒不少”。回教徒既然在此定居，那么与此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带到了这一地区。（1）

呼和浩特地区开始修建清真寺的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或此以前，另一种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因为进入清王朝以来，作为屯军重镇、南北交通枢纽和贸易货物集散地的呼和浩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地位已经确立，留居此处的穆斯林人数也必然逐渐增加。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在呼和浩特和张家口开设的塞内外互市，常有新疆一带的隶属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汗的商队来此“互市”，商队中有不少穆斯林就便留寓呼和浩特，这也增加了呼和浩特地区穆斯林的人数。康熙三十二年，清政府和噶尔丹汗发生战争，为了便于控制塞北的穆斯林，康熙下令将张家口的穆斯林也迁入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大约就在这时就修建了清真大寺。这就是康熙三十二年建寺说。但由于“康熙三十二年建寺”说，没有文字记载，仅以历史推论，所以史学上对这种说法很难确断。

另一种说法是“乾隆五十四年建清真大寺”。此说尚有该寺现存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重修绥远清真大寺碑记》参考。碑文曰：“溯我绥远之有清真寺，创自前清乾隆五十四年，维时只数百家，亦非土著，多来自区东区西。”另据《绥远通志稿》云，清乾隆平定新疆一带准部及天山南路的战事后，二十五年（1760年）“清军凯旋，……其出力之回军一部，则驻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旧城）外候命，总数不足千人。初居于城南三十八里之草原，恣其驻牧，日久遂成村落，并建寺以崇其教，即今之所谓八拜回回营也。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以回民既不便返西域，且解兵籍后，有妻孥而无恒产，……于是由驻防将军、都统等奉命敕其散居，俾得自由谋生。自此始迁入归化城为

民。同时于城北门外，……创建清真寺一座”。

《绥远通志稿》中所说的“八拜”，即现今呼和浩特郊区的八拜村。据当地史学工作者现场勘查和史料考证，此处在清乾隆年间确有回回军营一座。呼和浩特地区回族乡老对这段历史的口碑传说是这样的：清乾隆二十五年，清王朝平定了新疆一带的蒙古准噶尔汗国的战事后返京时，将协助平叛有功的新疆阿里和卓回部的将士一同带回京师，并安置定居，接受清廷的官爵和俸银。该部首领的女儿，即以后封为乾隆皇帝的香妃，曾由新疆一带的族亲护送其进京。待香妃平安抵京后，乾隆皇帝便赐给香妃亲族铜锤一把，以表示香妃亲族为“皇亲”。护送香妃的这几百人从北京返新疆，他们路经呼和浩特的八拜村，见这里风光如画，水草丰茂，便启奏皇帝，请求留居此地。乾隆传旨，赐给他们“一马之地”。从此，这部分人就定居八拜，后迁入呼和浩特城里。呼和浩特现马氏家族，被认为是香妃本族，铜锤一直为该家族马德家保存，直至日本入侵（1937年~1945年）后遗失。

但不管哪种说法，呼和浩特清真大寺的建成，至少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的建筑规模，是分几个年代逐步扩大的。在清乾隆五十四年建寺之前，此处已有土房数间，作为穆斯林简单聚礼之用。五十四年的修建，该寺始初具规模。据当地回民口碑传说，这次的建寺资金，主要由康、陈、马三户回族富商捐助。为纪念这三家的贡献，此后每年斋月开经时（诵念《古兰经》），增念三匝经以为祈祷。（2）以后清同治八年（1869年），该寺又重修南北讲堂（阿訇讲授经典的地方）；光绪十八年（1892年）建盖了山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回民康正明、康正兴邀同土默特左翼末代都统丹津的后人，共同将“丹府宅院东地基情愿施舍于清真寺建筑照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该寺刘辑五阿訇又整修了清真大寺，并开设了经学（宗教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少五继任清真大寺阿訇，劝捐“纯和成”、“福泰源”、“义和泉”三商号房屋，并修建了该寺浴室；民国十二年（1923年）至十四年（1925年），回民合众捐资，“计重修大殿起高五尺，加大七间，南北讲堂展后一丈七尺，起高三尺，寺院展大数丈，一切设施木石、雕琢彩绘备极灿烂，洋洋乎洵九边之大观”。此次重修，有回族杨寡妇将大寺后面自己的房产捐赠大寺。为感其馈赠，大寺每年斋月开经时，又增念一匝经，以示纪念。1939年，该寺又新建一座望月楼，高约36米，是建国前呼和浩特市最高的建筑之一。建国后于1956年、1978年、1987年、1991年该寺又多次加以修缮和彩绘，使其更加富丽堂皇。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位于旧城之北，现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它坐东迎西，内外两进院落，由圣殿、讲堂、浴室、过厅、望月楼、接待室等建筑组成，是呼和浩特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并作为呼和浩特地区最大的伊斯兰教活动中心而开放。

二、呼和浩特清真大寺的建筑艺术风格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是中国传统式的建筑风格。它的整体布局是东西狭长的一进两处四合院。建筑由西向东依次是：照壁、山门、圣殿、南北讲堂、过厅、望月楼、浴室、接待室。

清真大寺寺门坐东朝西，为出檐式建筑。两边八字墙陪衬，中开三门，两小一大。大门上有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所制“清真大寺”长横匾一块，两旁有楷书“国泰”、“民安”两短匾作陪衬。大门平时不开，只在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穆斯林三大节日时敞开。

清真大寺的圣殿建在一米高的地基上，殿长26.5米，宽16.5米，共25间大小，为水磨青砖中式建筑。圣殿门为三开拱式门。圣殿最有特点的是顶部，它由五座出檐小塔楼将殿顶连为一

体。五顶，意寓回族伊斯兰信仰的“五大天命”。这种结构法，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教学说，同时解决了用横木起脊的单调。小塔楼飞檐彩绘，使整个圣殿显得精美大方，起伏多变。当地回族穆斯林对这五顶的设计十分欣赏，赞誉说，“五顶大寺，均沾回赐”。

处于寺院东南的望月楼，是1939年增建的工程。高约36米，整座楼为六棱体，楼身中部用中、阿两种文体镌刻“望月楼”三个大字。楼内分两层，有78级台阶盘旋至楼顶，楼顶是瞭望台和凉亭。望月楼既是穆斯林呼唤人们礼拜的地方（也称邦克楼），如今登楼凭栏远眺，又可饱览青城（呼和对特别称）美丽的风光。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建筑上的砖雕可谓该寺的艺术珍品。这类砖雕又分浮雕和镂空雕。浮雕主要是中阿文书法。进入山门，在圣殿的后壁上，分别雕刻着汉字“认主独一”、“日监在兹、极乐真境”、“见性、明心”和“正心、诚意、修身”，每字数尺见方。其中“日监在兹、极乐真境”八字为魏碑体书写，笔势凝重大方；而正中雕刻的楷书“正心、诚意、修身”以及“见性、明心”，为民国初年曾任绥远都统马福祥的手笔，其笔势雄浑、有力。圣殿门庭前和南北讲堂的山墙，多处雕有阿拉伯文书法，其中有横幅、竖幅，有的还组成团形和菱形。

这些浮雕，刀工讲究。汉字砖雕，不但每一笔画雕刻得法，就连书法用笔的“飞白”之处，也精细雕刻出来。字突出砖面，有神采飞扬之感。阿文砖雕，变化多样，有的写竖幅而每字又设计为菱形，而团形文字的周围又饰以花边，充分体现伊斯兰书法艺术的灵活多变。这些字雕刻之后又进行了细致的打磨，更显得字体的俊秀和精美。

由于伊斯兰教不搞偶像崇拜，所以清真寺院一般不饰以人物、飞禽、走兽形象，因此建筑的门楣、窗口、屋脊、飞檐等多以花卉造形来装饰。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建筑的窗口处、墙壁

上，常见到的是刻在砖上的花卉浮雕。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寺圣殿屋顶的四角和门顶，刻镂了七座花卉镂空雕。这七座花雕，每座高约三尺许，它雕刻精细，花枝与花枝空隙处都空镂出来，看去枝叶分明，花团锦簇。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厅堂内多为画栋粉墙。圣殿大厅内顶梁彩绘，天花板也装饰以彩色图案。厅柱为赭红油漆。横梁和厅柱都挂有木制的黑底、蓝底金字的汉字横匾和阿文条幅，整面粉墙洁白无瑕，书以硕大伊斯兰经文，黑白分明，使圣殿既显雍容华贵，又庄严古穆。该寺五开间的过厅，是穆斯林礼拜前后休息的地方。廊檐彩绘，而厅内南北墙，整壁绘有圣地麦加（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克尔白”图（是麦加城“禁寺”内一座方形石殿的名称，也称“天房”，是全世界穆斯林朝拜的中心。），该画既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伊斯兰教绘画艺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的长期交流，尽管呼和浩特清真大寺是以中国传统风格为主的建筑，但它依然带有浓厚的伊斯兰风格。不过它又与外国伊斯兰教建筑不同，处处表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种中阿合璧的建筑，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花坛，它是历代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辐射全城的教坊及经堂教育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清真寺。在呼和浩特地区，以它的地理位置为中心，全城还散落着数十座清真男寺和清真女寺。其它清真寺根据坐落的不同方位，分别称东寺、西寺、南寺、北寺、东北寺、西北寺等。从其它寺院的称呼上，就足以证明清真大寺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

是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每座清真寺都将自己周围的穆斯林自然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地域性的松散的宗教和民政组织单位，这被称作“教坊”，俗称“坊上”。（3）每个教坊都有穆斯林民主推举出的管理本教坊清真寺世俗事务的人员，他们被称作“乡老”。乡老不是宗教职业者，而是由本坊德高望重并具有较强组织管理能力，又热心宗教事务，诚于履行穆斯林的各项功课，能够秉公办事的虔诚的穆斯林来担任。乡老人数的多少，由清真寺的大小来决定，一般三至五人、五至七人不等。各坊清真寺的日常经费，都由本教坊的教民负担，一般每户以月计算，向寺内缴纳一定的费用钱（交费多少由教民自己决定），称作“月儿钱”，另外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时，各寺也可募集钱财，这称作“乜贴”。呼和浩特除了清真大寺的教坊区最大以外，还分别有东寺、北寺、西北寺、南寺、新城寺、察素齐寺、毕克齐寺等教坊区。现在除八拜寺、车站寺、善岱寺因拆除、迁移、合并等教坊不复存在外，其余教坊，基本上仍然管理和操办着本地区的宗教事务。

每个清真寺的宗教职业者叫阿訇。主持一寺宗教事务的大阿訇称作教长，除此还有分管其它教务的阿訇。阿訇一般由坊上定期聘请。

由于清真大寺的中心地位，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二百多年中，呼和浩特城内的东寺、西寺、南寺等先后为清真大寺所管辖，那时，各教坊穆斯林每日的五次礼拜（称五番乃玛孜）可以在本寺进行，但主麻日（星期五）的聚礼必须去清真大寺完成，而各教坊穆斯林的婚丧嫁娶也必须由清真大寺的阿訇主持。到民国以后，大寺所辖的各寺才逐渐脱离大寺的管辖，独立处理本教坊穆斯林的各种宗教和世俗事务。

清真寺院，除了每天领导穆斯林做礼拜外，阿訇还要招收学员若干名，传习伊斯兰教的经典和功课，用以培养适应中国

穆斯林社会生活需要的宗教人才。这种收徒学经的教育，叫经堂教育。呼和浩特各清真寺，都有自己招收的学员，但由于清真大寺是当地最大的清真寺，所以在解放以前，大寺招收的学员也最多。这些学员是已经完成了初级（小学部）伊斯兰启蒙教育后，自愿献身宗教事业且具备条件后才能继续深造的。这部分学员被称作“海里凡”（哈里发）或“满拉”。海里凡的教育课程，由寺内开学阿訇教授，一般分基础课和专业课两大类。基础课包括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三门，都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共同课，基本上没有宗教内容。专业课包括认主学、教学法、圣训学、伊斯兰哲学、波斯文法、波斯文学、《古兰经》等。经堂教育的读本没有统一规定，但一般来讲，要学会十三本经。这十三本经是：

《连五本》，包括《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米额台·阿米米》、《米素巴哈》五卷，是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本课本。《遭五·米素巴哈》，是对《连五本》卷五《米素巴哈》的诠释，是基础课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一本入门书。《满俩》是阿拉伯语法理论课本。《白亚尼》，是修辞学名著。《阿夏依杜·伊斯俩目》，是认主学的经典著作。《舍来哈·伟夏业》，是哈乃斐学派的教法著作。《虎托布》，是对四十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偏重于道学。《艾尔白欧》，也是对四十段圣训的注解，但偏重于理学。《米尔萨德》，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波斯文哲学著作。《艾什尔吐·米麦尔台》，是伊斯兰哲学著作，认主学的最高理论，《海瓦依·米诺哈吉》，是波斯文法。《古洛司汤》，是波斯文学著作。《古兰经》，是伊斯兰最高经典。（4）

海里凡在寺内学习时间的长短没有固定，一般需要七八年以上。完成学业以后，得到教学阿訇的认可，即为毕业。毕业时，要举行“穿衣挂幛”仪式，这样，才取得了受聘当阿訇的资格。

呼和浩特地区的清真寺也培养女阿訇，学习课程和程序同男

人一样。但由于女寺较小，经费来源不足，所以历代培养出的女阿訇较少。女阿訇主持女寺教务，一般称“师娘”。

呼和浩特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小学部分，一开始也是附设在各清真寺内，所学内容为阿拉伯语和初级宗教知识，是伊斯兰宗教的启蒙教育。辛亥革命以后，新文化逐渐传入本市，回族和伊斯兰宗教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民族和教门的振兴和发展，必须跟上社会潮流。在中国回族教育家、北京王宽阿訇的倡导下，呼和浩特地区于1915年，创立了本市第一所回族小学——回部学堂。回部学堂就设在清真大寺的旁院，产业系本市回族杨门张氏人称杨寡妇的捐赠的。回部学堂的学生既要完成经堂教育小学部分的学习任务，同时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体育等新课程。

在经堂教育中，有些学员在课余，还学习钻研伊斯兰文化艺术的一些技艺。比如伊斯兰经文书法和伊斯兰宗教绘画。呼和浩特学经的海里凡们，多数都用竹板书写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久而久之，书法技艺提高，而竹板书法，也成为呼和浩特地区书法艺术的一种，一直延袭到今。从过去到现在，呼和浩特地区的清真寺院、回族开设的店铺，以及家院庭堂中，常挂有伊斯兰经文书法的匾额和条幅，它使周围的环境顿生一种庄严、肃穆、高雅的气氛。近些年，在全市举办的书法展览中，也常有阿拉伯文书法展出，但从书写内容上，已脱离了伊斯兰教的范畴。

由于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所以海里凡们学习的绘画，从不画人物和飞禽走兽，多以花卉、宗教建筑（如克尔白图）、宗教故事中的器物（如尔利宝剑图）为绘画对象。这些略带装饰性的绘画，悬挂墙上，顿使堂室生辉。

呼和浩特的回族学校，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脱离了经堂教育，成为部颁教育标准的民族学校。呼和浩特市现有回族幼儿园和小学六所，回民中学一所，回民补习学校一所。1985年6月，

该市又成立了“回族教育基金会”，以奖学金的形式鼓励回族青少年求学上进，造就振兴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

四、清真大寺周围的“五教共和”

呼和浩特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现有34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历史上，这个地区除蒙古族建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和回族建有十数座清真寺外，其他民族也都各自修建了自己信仰的宗教寺院。如汉族的佛寺、道观，信仰天主、耶稣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就在清真大寺周围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历史上就建有蒙古族的太平召，汉族的城隍庙和关帝庙，以及外国人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堂、耶稣教北堂和修道院。这特殊的地理环境，被当地群众称作“五教共和”之处。

太平召又称“和硕召”，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由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土默特两翼官兵捐资修建。清廷于隆乾四十九年（1784年）赐名“宁祺寺”，它是喇嘛教的寺院。（5）城隍庙建于清雍正中期，它和关帝庙均为汉式佛教的寺院。天主教堂始建于1900年以前，1922年大规模扩建，它和修道院（1936年秋建成）是天主教的寺院。耶稣教北堂是基督教的教堂。清真大寺是伊斯兰教的寺院。这五个宗教的寺院，都坐落在呼和浩特城北札答海河两岸一片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地方。每天钟乐鼓声和鸣，诵经唱诗不断，但做法、礼拜彼此互不影响。这片聚居着多个宗教、多个民族的地方，几百年来和平共处，非但未发生过宗教的、民族的冲突和纠纷，同时在办教务、办民族学堂方面，还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

光绪十三年（1887年），“大美国宣道团”派英国牧师华国祥等来呼和浩特城传教，开始时没有住处和传道的地方，是本市回族钱姓开的“永宁号”收容了他们，使传道士们暂时有了栖身

和传道的地方。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回民费氏将自己祖先在札答海河边开设的“玉成魁”牲畜店让出来，使汉族学人办起了呼和浩特地区著名的“古丰书院”。

清末民初（1915年），回族白松峰和杨福寿在清真大寺旁筹办“回部学堂”时，帮助筹备的还有满族人赵增寿、汉族人赵国鼎和耶稣教北堂牧师王登云等。学堂建成后，又聘请汉族人王一善、满族人赵松桥等为教师，并请汉族人武敏为校长。而汉族人韩权、武敏等在筹办三贤庙女校时，回族人艾玉玺也为学校捐资出力，并成为该校的校董之一。

“五教共和”和各民族相互支持办教务和学堂的史实，说明了呼和浩特自古就是一座民族团结、各宗教和睦相处的城市。

五、婚丧嫁娶和节日娱乐中心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山门前，是一片广场，它历来是该市回族穆斯林群众欢度自己民族节日时的娱乐活动中心。

回族有三大节日，即“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开斋节，是阿拉伯语“尔德·菲图尔”的汉译，回族同胞俗称“大尔代节”。它是回族同胞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这个节日是在回族穆斯林封斋（封斋期间白日不进饮食，日落和夜半进两餐）一个月后的次日举行的庆典。宰牲节，是阿拉伯语“古尔邦”的汉译，回族同胞俗称“小尔代节”。宰牲节是在每年开斋节后的第七十天举行。这个节日穆斯林同胞要按宗教宰牲献祭。圣纪节，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诞生、逝世（相传穆罕默德诞生、逝世于同一日，即伊斯兰教历太阴年三月十二日）的纪念日。每当这三大节日，回族穆斯林们都要沐浴盛装，炸馓子、做油香等食品，去清真寺举行会礼。会礼后要互相拜节、游坟，全家举行盛大聚餐。圣纪节时，全体穆斯林还要聚集在清真寺集体大会

餐。

每逢这样的节日，呼和浩特清真大寺门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回族健儿抖擞精神上场摔跤和比武，一显身手。由于回族崇尚武功，历代都有不少骁将、跤师名扬海内外。呼和浩特的回族同胞，几乎人人都会舞拳弄脚，近现代该地区出现的回族武术家吴桐（包括他的家族）和跤师白老八（白儒珍）都是全国著名的武林人物。

不仅民族节日的庆祝娱乐活动在清真寺举行，回族的婚丧嫁娶活动也离不开清真寺。

回族人死后实行土葬，亡人在入土穴之前，要举行肃穆庄严的送葬宗教仪式，这个仪式，一般也在清真寺举行：当亡人由阿訇主持在家沐浴净身，用白布包裹好之后，装入“埋体匣”（称匣罩）抬往清真寺，在清真寺，众穆斯林要为死者举行站“者那孜”（站礼）等殡仪，然后将亡人送入墓地埋葬。在这个过程中，阿訇自始至终是主持人。众穆斯林集体为亡人送葬，而清真寺则为亡人提供“水溜子”以洗尸体，提供“埋体匣”装送亡人。随着回族穆斯林生活的提高，现在许多清真寺购置了运送亡人的汽车，解决了人们步行远送亡人到墓地的劳动之苦。

回族人结婚，往往亲朋好友都来庆贺，人数一般是很多。现在，清真寺准备了结婚宴席用的全套炊具和家具，凡是举行婚宴的穆斯林，都可租用这套家具。有些回族家庭，由于地方环境小，也可直接到清真寺操办喜庆宴席，清真寺也提供待客的宴席厅等。由于清真寺条件的改善，呼和浩特现有的几所清真寺里，几乎都有操办婚事的全套设施，大大方便了回族群众。

1989年，呼和浩特民委、回民区政府联合摄制了大型回族风情系列电视艺术片《青城回族风情》，全面艺术再现了呼和浩特回族节日庆祝、婚礼喜庆、民族食品纷繁精致的盛况，该片在中央电视台、自治区、市级电视台播放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

欢迎。

六、清真大寺前的回族食品一条街

回族的居住方式，往往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围绕其周围形成一个人口较集中的民族居住区。呼和浩特从近二、三百年的历史到现在，一直沿续着这一居住传统。由于清真大寺周围，有几万回族群众居住，所以，解放后这里建立了“回民区”的行政区划建制。

清真大寺的周围，从古到今，清真食品_的生意十分兴旺，逐步形成了以清真大寺为中心位置的回族食品一条街。在这里，无论是开饭馆卖清真菜肴，还是搭凉棚卖清真小吃，都是高朋满座，食客如云，这里成了呼和浩特各族同胞美食光顾的地方。

回族的清真菜点和传统小吃，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又是在严格遵守伊斯兰教饮食规定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唐宋以来，中华民族就对穆斯林的饮食风俗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许多古书中都写到：穆斯林的“饮食与华同”，但“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也不食“自死物”、“不用牛羊的血液、生殖器_等物”，“水产类也只用那些背有刺、腹有翅、身有鳞、口无齿，形美而性善的鱼类”。（6）回族食品所以受人称道，主要是做工精细，用料讲究，品种繁多，风味独特，恪守卫生，经济实惠。

在呼和浩特清真大寺附近的牛桥、羊岗子、通道街、营坊道、北门外等处，历史上就有很多清真菜馆和糕点铺。如“北古丰轩”、“同和轩”、“隆兴元”、“兴隆元”，还有数不清的卖回族传统小吃的凉棚、推车和地摊，这里的饮食繁华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还营业的老字号“古丰轩”，如今设备更新，装璜讲究，已成为呼和浩特接待伊斯兰外宾的饭店。古丰轩过去因做出“纸包鸡”、“甜苜蓿汤”这一菜一汤，曾名噪京津沪，被封疆大吏

马福祥呼为“绥远第一家”；而如今的“古丰轩”更是名菜繁多，令中外宾客赞不绝口。古丰轩现今的“烤羊腿”、“呼味羊肉串”、“糖溜里脊”、“蜜汁葫芦”等，风味独特，都是十分叫座的菜肴。

在呼和浩特，要吃经济实惠的菜肴食品，就是“涮羊肉”和“稍麦”。而吃这两种食品，呼浩和特的各族同胞，不管多远，往往都要到清真大寺附近的回族饭馆来食用。因为这里的涮羊肉刀工精细，片肉如纸箔，锅底用料讲究，味美而价廉。而稍麦，全用精肉拌馅，去皮去筋，货真价实。

清真大寺附近的回族传统小吃十分丰富，如油香、麻花、馓子是伊斯兰经典食品，它制作味道的与众不同，往往给人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另外如大头麻叶、蜜蘸麻叶、糖酥馍、油酥馍、糖三角、长麻花、干垫儿、江米枣糕、黄米枣糕、江米凉糕、江米粽子、江米条儿、麻团、碗豆黄、茶汤面、油茶面、油炸糕、生炸糕、元宵等小吃，多食而不腻烦。特别是清真大白焙子，虽只是一团发面焙烤而成，它皮焦黄而里虚白，细细咀嚼，给人留下甜甜的新麦香味。

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进一步开发挖掘回族食品文化，使回族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清真大寺前的回族食品一条街，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规划和拓展。清真大寺对面，现已建起了回民区所辖的“金鹏商贸大厦”，它的经济效益名列呼和浩特商业的前几位。清真大寺的北面已开业的回民区所辖的“金桥商厦”，是座综合商场，发展势头良好。另外在清真大寺周围正筹建一底一楼的个体传统食品摊位，到时候呼和浩特回族食品将结束它搭凉棚、手推车、打地摊的落后的历史性的格局。

附注于后

注：

(1) 白贞：《呼和浩特地区的伊斯兰教与清真寺》（《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一集第71页）

(2) 白贞：《呼和浩特地区的伊斯兰教与清真寺》（《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一集第76页）

(3) 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第30页

(4) 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第188页

(5) 刘映元：《呼和浩特回族来源初探》（《呼和浩特回族史料》第一集第42—43页）

(6) 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第165—168页

呼和浩特市伊斯兰教协会时福森会长

代 林

呼和浩特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清真大寺教长时福森，是一位仁慈谦让、温良宽厚的老阿訇。他那高尚的品格，和一生对宗教的执著追求，受到世人广泛的敬仰和怀念。

时福森，经名伊卜拉欣，河北省海兴县东后庄人。一九〇三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由于世道黑暗，父母常年劳作于田间地头，养活不了一家老小。被艰辛生活折磨得面黄肌瘦的时福森，一听到清真寺或穆斯林家庭传出念《古兰经》的声音时，精神便为之振奋。当他十来岁时，稍有闲暇，就跑到村里的清真寺，听阿訇为“海立凡”（学生）讲解经典。阿訇看到这个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听课认真，就让他作为一名编外学生。少年的时福森，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清真寺里学上几句经文，回家后嘴不住气地念叨，手不停地练写。次日再到清真寺时，经文背得一字不差。正式学生也望尘莫及，使阿訇大为惊异，遂准许他随时来听经。经过几年编外学习，时福森初步接触和学习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基础知识。

时福森十五岁时，欲外出寻师求学。家里成年在等米下锅的窘境下生活，哪里还有钱打发他上路呢？因而双亲天天愁眉苦脸，时福森也急得团团转。这时有本家一位伯父，认为时福森有培养前途，特地为其购买了一件粗布大褂。当送衣服时，看到时福森穿着一双露着脚指头的大鞋，老人便又替侄子添置了一双布鞋。由于时福森初次外出，伯父亲自陪他徒步至天津的海霞新城清真寺，介绍他投到张殿兴阿訇门下学习。

旧中国的清真寺，费用短绌，大部分难以为继，靠周围的

“高目”（信徒）出散“乜贴”（指教徒因各种原因，决意施舍或捐赠的财物）维持。当时，在时福森看来，清真寺里的生活，已比家里好多了。可一想到父母还挣扎在饥饿线上，便暗自伤心，下决心奋发向上，以期日后能为亲人争光。因无力购买必要的伊斯兰教经书，只好与师傅或同学借书，利用空暇抄写。白天不误五时“乃玛孜”（礼拜），不误聆听师傅讲经，晚上等别人入睡后，为不影响别人，在房屋的犄角独伴孤灯开始抄经。就这样一页页，一本本地将有价值的经书，都抄了下来。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它的经书蔚为大观。时福森爱书如命，每发现一本新书，便千方百计借来，边抄写，边贪婪地汲取着营养。星移斗转，秋去冬来。宿舍取暖条件较差，抄写一会儿，不得不起来活动活动手脚，接着再抄。有时为赶着在人家限期内抄完一本经书，尚需通宵达旦。本来体质不太好，天天熬夜，加之营养又跟不上，他出现了呕吐，有时还吐血。在一天晚上，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便一头栽倒，额头上血流如注。后来伤好了，可额头上永远留下了一个肉包。这个肉包成为他艰苦攀登知识高峰的见证。

张殿兴阿訇对其吃苦精神大加赏识，时福森在其门下的三年打下了坚实的伊斯兰经典功底。

时福森外出学习三年后，首次回到家里。按照父母之命，与邻村的刘莲香姑娘结为秦晋之好。蜜月甫过，时福森无心恋家，就二次出外求学。这次，他直奔津东南市头清真寺，从李希珍大阿訇学习。李希珍俗称顺爷，河北沧州人士。出身于中国颇有声望的阿訇世家，伊斯兰教造诣颇高，是一位载誉远近的“尔林”

（有知识者）。时福森投在顺爷门下，顺爷见其相貌端庄、秉性耿直、心笃志诚，将他当作爱徒。时福森遇顺爷，如鱼得水，学习更加刻苦努力。几度寒暑，苦心学习，接受了伊斯兰教严格的经堂教育（又称回文大学）。在顺爷的口授心传下，学习《舍来

哈·伟曼业》、《虎托布》、《艾尔白欧》、《米尔萨德》、《艾什尔吐·来麦尔台》、《海瓦依·米诺哈吉》、《古洛司汤》、《古兰经》等“十三本经”。顺爷学识渊博，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兼授，要求徒弟苦心学习，以为世用。他常向徒弟提出问题，时福森对答如流，因而他益被师傅所重。

青年时代的时福森，在事业上执著地追求、锲而不舍，为了学有所成，和新婚妻子一别六载。他走了一年，长子降生。当孩子四岁时，因患肺炎咳嗽不止，终因无钱求医而夭亡。

孩子下世一年，时福森才回到家乡。他得知儿子病故，确实悲痛不已，但为了完成夙志，不久，时福森又告别父母及妻子，再次踏上寻求真理之途，拜师求学。他身背一卷行李，徒步奔波于冀中平原。沿途有清真寺就借宿一夜，若没有清真寺，身上又没分文，只好随便找一个遮风避雨之处，休息上一夜。无论阴暗风雨，还是高山峻岭，孑然独行于访师途中。这次他先后又跟著名阿訇李文兰和张恩远学习了几年。

嗣后，时福森又辗转至天津清真北寺，再次投在李希珍大阿訇门下。师徒再次相遇，情谊益发深挚，均认为是“哈该”（缘分），师友忘年之交的情与义更加笃实。李阿訇将祖传的一些优秀经书，拿给时福森看，他兼收并蓄，终成李阿訇的大“海立凡”。李阿訇起先应聘于天津清真西寺，1935年又应聘至绥远清真大寺，都把时福森带在身边。

时福森为人诚恳，不追求浮名虚誉，不贪荣华，不慕权贵，他的人生准则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念经。来到陌生的绥远举目无亲，他不好交游，不事张扬，天天以经卷为伴，珍惜寸阴。年余，李希珍阿訇认为时福森学有所成，在绥远清真大寺为他和师弟马文瑞、陈超胜三人举行了“穿衣挂幛”（即出徒）仪式。从此时福森开始了阿訇生涯。“七·七”事变前夕，李希珍阿訇三年聘期已满，便辞学回到故里。时福森洒泪送别了师傅，

自己却永远留在了绥远，为绥远省伊斯兰教的弘扬、普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在绥远清真大寺，时福森受聘于中学阿訇。在学习、实践及传授宗教知识的过程中，他发现普及教育是不容忽视的一环，便立志终身抓普及教育。他把传播伊斯兰教知识与发扬伊斯兰教精神结合在一起讲授，言传身教，使学习者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解放前后，呼和浩特不少回族青年，都跟随他念过经。其中现已成为阿拉伯语专家的刘桢教长和曹忠哈吉等，都在其门下接受过启蒙教育。

后来，时阿訇受聘于呼和浩特清真东北寺、西寺、车站寺及乌兰花清真寺任教长。他每到一处，都看作实践和提高自我的机会，虔诚地履行“伊玛目”（教长）的职责。每当新到一寺当教长，他讲的第一个“瓦尔兹”（指礼拜前教长或阿訇等向教民宣讲教义），都是以树立“伊玛尼”（信仰）为前提，紧紧围绕“爱护本土属于信德”，引经据典，号召穆斯林脚踏实地，既要耕耘后世，亦勿放弃耕耘现世。此外，时阿訇把民族团结和宗教间团结，作为宣传的又一个重点。他主张民族间平等互助，宗教间互相尊重，各行所遵，各办其事。

回族历来尊重教长，每遇邻居纠纷和家庭不和，都要进清真寺找阿訇评说公道。时阿訇每次都耐心说服，循循善诱，化干戈为玉帛。五、六十年代，呼和浩特的广大穆斯林群众生活水平较低，时阿訇也以微薄收入度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地阿訇来呼，只要找到时阿訇求其帮助，时阿訇总是毫不犹豫为他们提供食宿。有的阿訇和家属，在时阿訇家一住就是几十天，他从未怨言，总是尽力让客人吃好住好。一些素昧平生的阿訇，看时阿訇对自己敬如宾朋，激动的热泪盈眶，几十年后仍津津乐道。

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有位乡老的老伴下世，请时阿訇念“塔哈”（殡礼的一个程序），举意的“乜贴”是一对金耳环。

这天，时阿訇按时去了这位乡老家，可是另一位阿訇听说“乜贴”是对金耳环，提前不请自到，念了“塔哈”，拿走了金耳环。看见时阿訇，这位乡老家的人尴尬异常。时阿訇安慰他们不必介意，和颜悦色而归。他的这种不为钱物所动的精神，遂传为佳话。

时福森的作风和品德不但影响着教内人，也令一些教外人肃然起敬。呼和浩特书法家曹子颜，曾赠送给时一把扇子，上书赞辞，颂扬了他豁达大度的气概和对事业坚忍不拔的追求精神。

1958年教制改革，呼和浩特的几座清真寺合并，时阿訇到了清真大寺，任副教长。十年浩劫开始，时阿訇在学习班接受教育，并在小将们的威逼下，将自己三十年来亲手抄写并精心裱糊的五十四本经书，全部烧毁。经书被毁，如同肠痛寸断。他重病一场，多日不思茶饭，忧思憔悴，暗暗流泪。这时，有人向有关部门写黑材料，肆意捏造了10条罪状，述说时阿訇对现实不满，告状之人中，也有他曾经帮助过的人。但时阿訇淡泊自守，以一位职业宗教者特有的忍性，面对世界。

“文革”结束了，他和不少的人一样，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受聘于呼和浩特市清真大寺任教长，被推选为内蒙古第一、二届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呼和浩特市第一、二届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会长暨呼和浩特市伊斯兰教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并连续三届当选为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

年逢古稀人未老，神清目朗精神爽。天天除在拜功中行使教长职责，还要带“海立凡”。定时为几位阿訇、师娘（女阿訇）讲经，并随时为求教者解答问题。他春风化雨、滋润后学的功德，人人交口称赞。特别对青年人的关怀和提携，尤为恳重。他用亲身感受告诫后生，不要光钻研经学，要中阿并学，才可收到预期的效果。1986年，时阿訇因年老，主动辞去清真大寺教长，担任了名誉教长。为伊斯兰教界人士废除终身制，带了一个好头。

时阿訇在外有达观超脱的长者风范，在家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父。他膝下有五女一子，解放初生活拮据，孩子们上学由国家免费，衣服靠人民政府补助。他利用一切机会告诫儿女，珍惜时光，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有用之人。儿女们时时铭记父亲的教诲，学习上努力，工作上奋进。五六十年代，大女儿时秀兰在呼和浩特市联营商店当售货员，忘我地工作，多次被评为标兵售货员和“三八”红旗手，《内蒙古日报》曾多次报道了她的事迹，称她为“呼和浩特百货公司系统售货员中的一面红旗”。1964年时秀兰作为内蒙古参观团成员，光荣地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八十年代，四女儿时秀荣又成为呼和浩特供电局的劳动模范。她几十年如一日，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多次被华北电业管理局、内蒙古电业管理局及呼和浩特供电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时阿訇的孩子们成家立业后，生活好了，仍以俭为荣。每月把子女们给的钱和穆斯林出散的“乜贴”，合理使用。除日常生活费用外，余下的钱或接济生活无着落者，或寄回老家的清真寺。而自己多年用的一把扇子，却左补右粘，孩子们想给他买一把新的，他执意不肯。1987年，笔者应呼和浩特一家新闻单位的约稿，前去采访时阿訇，目睹了老阿訇仁慈助人的一件事：一位“要乜贴”的（即穆斯林中的乞丐）站在时阿訇的院子里要饭，时阿訇老伴边掏钱边往外走。他老伴出去，像是与要饭的讲什么，进屋后时阿訇问老伴，老伴讲：“他跟我要一块，我给了他五毛，他有点不高兴。”时阿訇又讲：“再给五毛你就掏不起了？为什么不让他高高兴兴地走呢！”老伴见时阿訇脸色不悦，急急地追要饭的人去了……

1990年，时阿訇经医师诊断患有脑血管硬化，即遵医嘱，深居修养。1992年老阿訇再次病倒，前去看望的有亲朋好友、学生及各级领导，大家的关心使其老泪纵横。在病中，他不厌其烦地

对儿女们讲着一句话：“我是用‘包贴’把你们抚养起来的。要记住广大穆斯林的养育之恩！”有时，孩子们见父亲精神较好，就和老父亲开玩笑：“爸爸，您老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口唤’（穆斯林常用以表示相互信任和对某事的同意）给我们吧！”老阿訇笑笑讲：“我没有金条也没有银条，只有几根炉条。不过也不能现在拿，等我和你妈都‘无常’（去世）了，你们姊妹几个人一根，千万别打架。”

1992年10月10日，时阿訇走完他八十九个曲折的春秋，两袖清风地离开了人世。时阿訇归真的消息一传开，前去吊唁的穆斯林络绎不绝，有人放声嚎啕，有人呜咽抽泣，更多的人垂着头，泪水洒满衣襟。次日安葬时，人流滚滚，人们争先恐后想抬一抬这位老“尔林”。有的老者自己迈步还比较吃力，硬抢着要抬上几步。81岁的内蒙古伊斯兰教协会曹梦麟副会长说：“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当“埋体”（遗体）抬至墓穴时，墓穴周围已有四五百人站着或跪着在那里等候了多时，他们要最后见一见这位德高望重的教长；送一送这位以敬畏和笃诚奔向永生乐园的“伊玛目”。这样的隆重场面，只说明一个问题：一生敬重别人的人，人们是敬重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坦诚正直的人，人们是永远怀念他的。

归化城城隍庙史

孙明亮

呼和浩特“道教——火居道”一派的概况和归化城土默特城隍庙庙史及庙主土默特旗蒙古族孙氏家族的始末。

一、道教宗旨和呼和浩特“火居道”的起始发展

中国的道教是我国最古老最原始之教，亦是我国独有之教。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根抵全在道教”。“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橘朴——一个日本研究道教的专家说：“要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道教大辞典》绪言作者李叔认为：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流，中国文化以道教文化为中心。……是以道教文化即中华文化之根源。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理学都渊源于道家”……“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今日道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所占的地位至少和儒家同样的重要”。

所以台湾学者大胆肯定：“中国文化的组成中，自有一支道教文化”。

道教在中国哲学、科技、思想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了。而道教文化的现状又是如何呢？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写道：“道教带给人们的不是一种宁静的情感与恬淡的心境，而是一种热烈与迷狂的情绪；同样，它带给中国文学艺术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绪，一种色彩缤纷，瑰伟怪诞的意象群，

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正因为“宗教与文学似乎有一种血缘关系”它的源头便是“人类童年时代那种原始情感与原始思维”。

相传在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李耳所著的《老子五千文》称为《道德经》，奉为道教理论的基础和学说。并尊老子为教主。

“道”是从哲学理论、阴阳变化，内丹，外丹，修身治国，易象术数多方面阐释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以虚天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变化衍生的。老子以“道”解释自然的统一，以自然天道观为主，目的在于以自然规律来治国，馭众，固位，保身；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道”可以解释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有着“独立不改，周而不殆”的永恒绝对的本体的意义，它包括着某些朴素辩证法因素。道教崇拜的最高信仰是“道”，“道”即《老子》，人格化的三清尊神。

几千年来，经过各朝各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进步的演变，随着国体的更替，各教间的争鸣也十分激烈。在各朝各代间各教形成的鼎盛时期各自立说。从小说中看：封神演义、孔子周游列国、西游记、济公传、八仙过海、聊斋等等，虽说是小说演义，也可从其侧面窥视到教与教间的争端，也是随着国体而演变的。

从隋唐时期，儒、释、道称为三教。此后，三教又出现合一的趋势。但毕竟儒、释、道的宗旨虽有某些一致，但在实行中又各自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而难以合拢。因而便著书立说，各成宗教。从历史的国体中看各教，不是可有可无的。从我国文化书库中就可看到，各教经典著作是极其丰富而宝贵的。道教著作，除经典外，还涉及医学、生物、体育、保健、天文、地理等等论著，确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大宝藏。

1222年，成吉思汗在雪山召见了丘处机，请教长生之术。丘祖说：没有长生药，只有养生方——清心寡欲。成吉思汗请教治国之术，丘祖告以爱民，止杀相劝。成吉思汗深契其言，甚至半年不出猎，并特许广发“度牒”。凡持此度牒者，可免服兵役，不缴赋税。这种保民措施功昭日月，使当时陷于战争之苦的民众得益殊厚，甚为后人所称道。老子创道以“无为”为宗旨，以修身见性为本意。至丘祖已造福于民众。清乾隆题丘祖画像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见此，成吉思汗封丘祖赐号神仙，掌管天下道教，并在大都建立白云观。道教当时在蒙古族的信仰者中发展到鼎盛时期。因此，蒙古族中的孙氏祖先，早已是虔诚的信仰者了，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

道教的道徒称为道士，也可说是学“道”之士。“道士”一般指以道教为宗教的信仰者。所称道士，以其务营常道故也，亦为其职业者。但道士的派别甚多；一曰天真道士、二曰神仙道士、三曰山居道士、四曰出家道士、五曰在家道士（火居道，也有少数出家的）、六曰亡祭道士等等名目繁多。从道门科范大全进行传统的仪式拜章、消灾、忏禳、安宅、启醮、谢罪等等办道场者是也。呼市从历史发展条件下产生，特别保留下来的职业道士是“火居道”，有家室，有子女，有住庙及父传子业者为主。

二、“火居道”是呼市历史产物和发源地

据绥远通志记载考证。归化城城隍庙和玉皇阁为最早蒙古族主管的二庙，其他庙宇尚无一处。当时有明令规定，单独游僧游道不准许在当地停留。当时青城为何不让游僧、游道停留呢？因内地白莲教影响而特定令条。这证明呼市从建立道庙起就是“火居道”的起因，特别还是以当地人为主。在归化城最早创建道庙的土旗蒙族的一家两户孙氏，建庙前在毕克齐镇就信仰道教，至今已传到丘祖龙门派第二十二代理字辈了，这是仅有的一户。他

们的排字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元明，至理忠诚信……”。孙氏是最早就从复字辈，在毕镇时信道教的。从先祖桑布复字算起，信道建庙时改名孙绍茂，其子孙后代都按丘祖派百字排辈。孙本元传孙合真，再传孙教龄，又传到孙永福，下传到孙元亨及后代孙明亮已是七传下来了。现已传到至、理辈，共九代。当时就是住家庙，办私塾；其他族人仍用蒙名未姓孙，在家放牧务农，有的在旗里任文武职。自本字辈来呼建庙，才正式成为丘祖龙门派传人和“火居道”的。“火居道”是因当时政治要求决定的，也是依据道教派别中第五种“在家道士”而定下的，在社会实践中，已传二百年左右。是信道的全家住庙，积德好施，劝人为善，利于后代，以苦在乐中为宗旨的职业住庙学道之士。后约有从山西来的梁道人，是全真道。他是云游道人，但已是民国初年之事了。当时从山西经商来者众多，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在通顺街南巷盖了一座间半大的“五道庙”，又娶妻，改为“火居道”长住了下来。后因庙房多年失修改为住房，在玉皇阁庙东墙外租赁了间半房，开起了“阴阳道铺”。这也是呼市阴阳道铺的起始。其儿孙已有三代接传，现都已转到其它行业了。

三、土默特旗蒙古族孙氏创建归化城城隍庙和入道的始末

土默特旗蒙古族孙氏原居毕克齐镇。户多人旺。后有几大户迁往镇南沟子板申。先牧后农，至今已有二十多户了。迁来呼市的原有六户，现只有四户了。从毕镇孙氏坟园来看，已有二百几十个墓堆，有十代以上了。但建墓前还都是火化。一九八〇年坟地被摊时，有孙姓本家意欲挖迁转移，仅挖了四、五个墓堆，就出现一具身穿道装的棺木。这足够证明，孙氏来呼前在毕镇已进入道教。迁来呼市的孙氏又在郊区大青山麓元山子村立坟，现已有十四个墓堆，六代已葬入墓地。

从祖辈六代相传，蒙古人中信仰汉族道教和以道教住庙为职

业者，仅有土旗孙氏一族中的两户。自第一代桑布来呼建庙起，孙绍茂率其子孙本元创建城隍庙时，正式归道教丘祖龙门派，按百字辈排辈。以前都无汉姓，皆以蒙名或藏名为主，不姓孙。如不入道的二门兄弟齐密多尔济、是旗里的骁骑校；三门的忽必力克是旗里笔帖式；四门朝克应巴图，当兵少亡。现只有四户，两户一直至今有的任公职，有的执教。民国初年建立户口制时，村里的本家们才都姓了孙。据悉在东三盟蒙古族中姓孙的也很多，可见蒙古族孙氏在清末时已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了。

蒙、明媵和后，约在嘉靖后期（距今有三百二十多年），青城开放了集市贸易，大量汉族从大同、山西、河北、陕西等地涌入。当时百业盛兴，在市内民众中汉族多于蒙族。因只有蒙族的喇嘛庙，汉族人又不懂礼佛规矩，而且也不准汉族进召。阿勒坦汗府责令桑布（孙绍茂）率其子孙本元到归化城创建城隍庙，建立起汉族朝拜基地，从而避免了群众到处设坛顶礼。是适应汉族信仰者之需求，建立了城隍庙。当然，建庙也是劝人为善，安定社会秩序，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发展青城的善举，为青城的百业繁荣创造了条件。

孙氏祖先奉命把毕镇自家牧畜变卖了一部分，到归化城经土默特部指定的羊岗南坡上，起建城隍庙基建工程和私人住宅。从此孙氏第一代和第二代人便一起创建归化城城隍庙的筹备事宜。从第二代人孙本元起真正走上了带家眷的“火居道”。这在青城是独一无二的蒙古族人掌管道庙的史实。在漫长建庙年月里，经过了土旗板申之战及林丹汗进入青城后的兵灾摧残；特别是后金汗国战夺归化城，大肆掠夺破坏，令人目不忍睹。灾难生活当然也降到孙氏父子身上，进退两难，好在庙尚未建成，可工人们避难外走，工程几度停顿，只有提心吊胆地守着城隍庙的雏形残躯，度日如年地过时光。直到康熙大败噶尔丹后，康熙为了巩固其统治地区，重修青城时孙本元已八十多岁了，经再受督促要其把庙继续

建盖。孙本元之子孙合真继承父志，继续工程的建盖。以后归化城确实是进入生活安定，百业俱兴之期。直到第三代孙合真，从乾隆中期接建工程时，已把毕镇的所有产业全部卖光，人和财物一无所剩地都投进建造归化城城隍庙和道教事业上了。把一个牧业兴旺的蒙古族家庭，已穷到罄光！开始了艰苦清贫的生活。到第四代孙教龄时，熬煎到嘉庆时期才算具备一定规模的庙宇，耸立在归化城北羊岗的前坡上。庙貌壮严，具有明代建筑的风格。更有上十三层，下七层共二十层的奇特拱斗，镂雕色绘，描金的排楼。是青城较有特点的宏伟建筑。还有较完美的看台和戏台各一座；十殿阎君的塑像，是十分动人的工艺创作品，真是一座塞外唯一宏伟而壮观的古代工人艺术珍品结晶的奇建创作。到此，再无力继续扩大建筑工程的力量了！把一块方形地基的五分之二的庙西地基和砖木材料献给土默特旗，新建了“常平仓”一座。后改为监狱。这在土左旗老档资料中，有可查的事实。

四、归化城城隍庙的建筑，根据中国历史传说，每一件物品都是工人们的心血结晶，更是蒙汉人民共同心愿的产物，也是青城历史的见证

“城隍”是古代神话中的守护城池之神，后为道教所供奉。道教奉城隍为剪恶除凶，护国保城之神。称它是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灵应之神。从唐代以降，凡郡县官府之首官，年年必先祭祀城隍。祈佑全城平安年丰。张悦、韩愈、杜牧等皆写下祭城隍的名文。后代帝王又封城隍为王、府为公爵、县为侯爵。我市城隍为“灵应侯”。道藏《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是城隍庙年年定时设坛必唸之经。帝王京城邻都又以城隍为管各郡县亡魂之神。道士建醮“超度亡魂”时所写的文牒叫《城隍牒》。因而成为中国最古之教，也是汉族信士供奉神庙之一。而蒙古族孙氏也接受了这

一信仰。这对广大蒙古族起到了共同信仰之带头引路作用。

城隍庙建有十殿阎君，以示掌管人间地狱，轮回、善恶、惩罚等等。设秦广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初江王、宗帝王，伍官王、阎罗王、变成王、转轮王等十殿，各管人间地狱的善恶报应。这是城隍庙中主要之殿。塑造上非常精緻，真不愧为青城古建筑艺术的佳作。如爬刀山、下油锅、大斗小秤、挖眼、掏心、割舌、走金桥、过银桥、望乡台、转生台等等造形逼真。实为塞外建筑史上罕见的珍品。都是劝人在世莫作亏心事。正像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辰未到；莫以乖巧处世欺人，遗害后辈儿孙。报应是以神设教，劝人为善。

归化城城隍庙是奉命所建，且必须盖在城北羊岗子的前坡上，要正对归化城北门、通照大街，直向南门洞口，是取镇压一城之邪，取寺庙神佛、福化青城之意。

城隍庙建筑的设置安排：大殿十间，有坐像和出马像各一尊，供奉在大殿中央。东西宫门各一座；后寝宫正殿三间，东西配殿各两间；大殿前东西十殿阎君殿各三间；东西曹官殿各两间；东西钟鼓楼各一座；院中有上十三层，下七层拱斗，玲珑剔透，精刻细雕，彩画贴金的排楼一座，这是塞外青城唯一的一座风格独特的建筑物。每逢风大一点时，上层就摇摇晃晃，经历了塞外之风颠簸了二百多年之久，从未发生过事故的古建筑。当拆除时，人们原以为木材可建多少需要的房子。结果，没有一块较大木料，全是几何形体的小奇形木块。东西看台各三间；西南有孤魂殿一间；东西马殿各一间半；戏台九间连庙大门洞在一起；戏台也是当时较为奇特的建筑。因地势高，四面被河水包围，内特设有传音装置，锣鼓一响，全城轰鸣，人人都可听到戏声；戏台两侧山门各一座；庙门外东西栅栏；旗杆石墩东西各一台；庙前有长两丈五尺的大照壁一座，有古传神话的壁画“吞月”一幅；下面是扎达盖河从东向西流着，河东南有国内外知名的“十字流河水

不混”的古景一座。庙东墙外是孙氏世代的住宅一所；正房五间，东西房各三间，二门一座，正房后院绿化地半亩多。东墙外是水磨巷水渠一条。庙北是天主教堂的育婴院。庙西是原土旗常平仓，后改为监狱。呼市老年人常说：要看天堂（天主堂）、地狱（城隍庙），人间地狱（绥远监狱），去羊岗子！

五、这座城隍庙是蒙明燐和后的历史产物

归化城城隍庙是土旗蒙族孙氏奉命从明万历后期起，卖掉家产筹建盖起来的。历经战火的洗礼，忍受了生活的千辛万苦，是六代人的心血和磨难的结晶。城隍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过劝人为善的作用，是青城历史发展的见证之一，也是呼市唯一的蒙古族相传信仰汉教之由。以后各族善男信女为维护该庙随时布施维修，所以解放后庙宇保存完整。“火居道”在归化城起源地的完整存在，说明了在历史进程中，蒙、汉、回、满民族的团结，起到了社会安定，信仰自由，繁荣市场的作用。伴随孙氏四代人的艰难历程，城隍庙一直耸立在青城。但到第五代人孙永福时期，已是清末，社会进入混乱动荡不定的大转变的前期阶段。他年仅三十，因患病无力医治而早亡。更为痛心的是留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二十四岁的妻子，刚满两岁的第六代孙元亨，只靠老小寡妇，坚持守着庙宇，过着没有生活来源的日子。只靠村中的以农为业的家族们的帮助，过着饥饱不定的特殊生活。直到孙元亨十五、六时，才算勉强主持着全部庙务和家庭生活。但这些年是青城灾年不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候。一直在苦海中熬到呼市的解放。正因是有亲身痛苦的经历，教训，也就有渴望理想美好的生活。第六代人孙元亨在解放前一直支持孤子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愿将来能有天开露日的一天。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过臆霸蒙古族父子世代相传的归化城城隍庙之事。经申诉及实地调查看碑文后，确认是父传子的庙，

不是师传徒的庙产。又经查访蒙、回、满、汉年长者，一致公认是孙道家传之祖产。在该地叫羊岗时，无住户时就已经有城隍庙孙道了。地名改叫十间房时，城隍庙和孙道就是最早十家之一。街道命名城隍庙街时，就是因最早有了城隍庙才命名的。历史事实的存在，胜比强权雄辩！

可遗憾的是，在左的路线下，把三百多年的历史文物古迹无声无息了！对古建筑，古历史，古文化存在的价值，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这是中华民族人民的心血、历史存在的考证纪念啊！有古迹的存在，才能考证历史的发展！如何尊重历史，珍惜现实，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才能达到民族历史和古文化的发展呢？我们应总结教训，立法保护。但城隍庙街还继续延用着，是尊重历史。而一座与呼市共同成长的城隍庙只留残躯，恐怕将后这一点残迹，亦会全部消失！可口头文学是留传万古而有生命力的。

就连几代人收集收藏起来的汉族道教的文物资料；道藏文卷，古乐法器，从宋、元、明、清，并在各朝代搜集到的神话故事的古画帛五十多幅、象牙笏板，古书籍等等也被在文化革命浩劫中几抄净尽，第六代人孙元亨忧郁而死！其妻被惊吓而亡！骨灰至今还在家中；其子是高级教师现已离休，就是因宗教家庭出身的蒙古人，被整得死去活来，身心致残！儿女被下到乡下兵团！有关庙产，有人说庙是当家的卖了的。五十年代时期能有国家买私人的财产的事实么？！历史当初的起因和发展，是事实的根据，归化城城隍庙是土旗蒙古人盖的，自家传代住的这是事实。有人说召庙都是群众捐助（化缘）盖的，这也是事实。喇嘛召就是蒙古牧民捐助盖的，城隍庙却是自家盖的，在以后的维护修补中，也使用过香火钱，它是各族人民进庙上供给的灯油香火钱。才把庙保持到解放后的。但要考研蒙古人盖汉族庙，住汉庙、学汉人教是什么缘故？这正是地方史志中要考证清楚的一大问题，而文史资料正是为地方修史收集口碑材料的。

后记：回忆呼市庙会的盛况

至今回忆起呼市每年每月的庙会盛况，一直萦绕在心里。呼市有两个城隍庙，新旧城各一个，孔庙有三个，这是任何省城没有的特点。正月初八，游八仙；召庙中跳“却木”；二月十九观音庙会；三月十八三官庙会；四月十八奶奶庙会；五月端午节；六月六日儿童节；七月十五盂兰会，对过世亲人寄托哀思；八月十五中秋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望丰收，（道家认为此日是厄日，登高为避难）；十月一日回忆祖先，教育后人；还有祭孔日等等。虽然都是庙会，但各有特点，到时市内人潮涌，终日游兴不减。特别是集市贸易，繁荣活跃，热闹非凡，真是一派昌盛太平景象。今后能和新节日接合起来，给集市贸易，流动市场，再加文艺宣传活动，就更开扩了市场，活跃青城，丰富人民日常的生活，增添情趣，也给我市经济繁荣，增添了活力。

最后的话

以上根据我七十年的亲身生活经历和一些地方志、名著，特别是党的明智的开放政策的启发下，给了我写这份青城史段的信心，愿给后人留下青城真实的历史资料，并给地方志中留有一线眉目。历史的事实和事迹，不可能用几页纸，就如拨算盘珠子一样，一下子数清楚的，但要有数可数是依据。希有志之士斧正之。

后 记

呼和浩特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传播的城市，为了反映这一历史特点，我们征集、编纂了这本《少数民族与宗教》专辑。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忠于历史的原则，突出重点，照顾全面。其中有几篇文章，在涉及同一个问题时，观点不同且有待商榷，为了尊重作者，尽量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本集的编辑，除了感谢各方面作者热情赐稿以外，曾得到中共呼和浩特市委统战部的关怀和支持，内蒙古和呼和浩特市佛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也都给以大力协助。在稿件审阅时，我们还请李西樵、张剑琴、云海、扎木苏、甄可君、王希贤等分别就其本身所熟悉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评阅，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经验不足，书中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编者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九辑·(少数民族与宗教专辑)

作者 =

页数 = 274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